

目录

无名之辈	1.1
39位抗战老兵入伍时间轴	1.2
前言：他不会名列其上	1.3
小兵种	1.4
工兵：从这里通向东京	1.4.1
伞花：不是谁都能从飞机上跳下	1.4.2
空军：考上第五批留美飞行员	1.4.3
宪兵：他眼中最后的南京	1.4.4
炮兵：一个炮弹48公斤	1.4.5
潜伏者：至今不轻易吐露身份	1.4.6
防空兵：有些装备，你们见都没见过	1.4.7
汽车兵：我们开车不配枪，每人背一把大刀	1.4.8
遗存	1.5
春华山：四次长沙会战都争过这里	1.5.1
野猫坡：一个埋人的故事	1.5.2
花桥：泰山军十三壮士墓	1.5.3
铁路桥：南方交通线上的痛点	1.5.4
烟堆岭：湘西会战在这里拉开序幕	1.5.5
龙潭：最后的战场	1.5.6
纪念章：这一枚编号No.283822	1.5.7
木筐：它们都是有故事的	1.5.8
敌后	1.6
自卫团：警察和游击队组成的抗日队伍	1.6.1
别动军：装备比嫡系、王牌都还好	1.6.2
游击区：在潇水和湘水间打游击	1.6.3
铁道线：粤汉铁路上的铁道游击队	1.6.4
边区：国民党在湖南唯一的抗日根据地	1.6.5
自卫队：鬼子一出邵阳三县的县城就开打	1.6.6
根据地：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	1.6.7
游工队：一直游动，一直流浪	1.6.8
乱世情	1.7
兄弟：老兄胆子比较细，我打死就打死了	1.7.1
金兰：相识于岳麓山下	1.7.2
袍泽：我和李默庵	1.7.3
嫁给他：做了两年半的夫妻	1.7.4
忘记他：如果当时和他去了呢	1.7.5

军中情：最艰难的时候，爱情也没有消失	1.7.6
爷爷：我六十年前就肯定他	1.7.7
去台湾：一个永安女人的一生	1.7.8
后记：诚恐的附随	1.8

无名之辈

NOBODY

抗战亲历者记忆库 著

40位抗战亲历者的最后回忆 一段动荡时代的浮沉身世

他们是士兵，是抵抗者。

之后，他们是解甲者，

是沉默的无名之辈。此刻。

他们是点亮抗战史细部暗处的微光。

9年口述、肖像采集。

不遮蔽、不矫饰。

小角度切入抗战历史纵横面，倾听一个个生命浮沉的微茫声息。

39位抗战老兵入伍时间轴

1937

- 肖伯闇考入空中侦察摄影班
- 周义云逃离南京
- 刘俊明投军

1938

- 叶菊明投军
- 刘建白进入防空训练班
- 李祖元投军
- 易唯诚当上文艺兵

1939

- 粟翼航投军
- 舒和荣投军

1940

- 空军李启炽进黄埔
- 马如龙被抓兵
- 曾锡贤考入军医预备团
- 黄德明加入长沙县白沙乡抗日自卫队
- 戴民同入黄埔学军队
- 刘津投军

1941

- 谢慈友投军
- 肖若霖进无线电培训班
- 柳元青加入自卫队
- 柳庆禧进后方医院

1942

- 工兵谢浦高投军
- 房可吉投军
- 周绍耿投军
- 邓得凤进政工队

1943

- 蒋大洁参加自卫队
- 金宣训投军
- 颜君福投军
- 刘光德投军
- 刘光尧投军

1944

- 杜学义投军
- 向本全被抓壮丁
- 王有恒参加长沙县国民抗日自卫团
- 何振球加入别动军
- 何月祥参加别动军
- 曾兴湘加入游击区
- 易信贤参加青年军
- 文淑仙参加青年军
- 王琦霞参加青年军

1945

- 向梦瑞投军

前言：他不会名列其上

纪念无名之辈比纪念名人要艰难得多，但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对无名之辈得铭记。——本雅明

长沙岳麓山的鸟是早晨5点20分左右醒。它们在茂密的叶子里鸣叫，脆生生的。那时候是春天，岳麓山下雨的春天，有时像极了一个悄悄还魂天。夏天，它的气息就要舒朗、辽阔很多，鸟儿5点10分醒。

岳麓山葬过各个时代的人。百姓，僧侣，学者，将领，士兵。就数量来说，抗战时期的将士最多。自1945年抗战胜利已过去72年。岳麓山见过炮火，见过血，也见过生命垂死时的种种痛呼，但它始终不说话。不管我们是曾遗忘还是来追寻。

1940年9月27日，一个叫本雅明的德国犹太作家在西班牙布港小旅馆被迫自杀。那一年，万里之外，日本已进犯到中国腹地。那些在战火中死去的人——双方士兵和百姓，大多没留下名字。后来还有更多这场战争幸存下来的抵抗者，在很长很长时间里，人们也从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沉默、艰辛的存在。这些幸存者和牺牲者将有着相同命运——“他不会名列其上/当这场战役被载入史册之际”。

本雅明写过一篇《论历史的概念》，其中有句话，现在被刻在布港面向大海的一块玻璃纪念碑上，用了五种语言，“纪念无名之辈比纪念名人要艰难得多。但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对无名之辈的铭记”。从一个个体生命的角度，铭记无名之辈，铭记他们在曾经的时代要求下所做出的简单、壮烈回应和浴血付出，这是我们对72年前那场全民抗战史具微而真实的认知和纪念。

在过去九年中，“抗战亲历者记忆库”口述历史团队低调、诚恳，采集湖南境内抗战老兵肖像和口述史料，共计图片2万余幅，同期视频25000分钟。其中小部分收录此书中。这一部分人、事所在的领域及角度，有些并不太常见于抗战的主体叙述里，比如一些小兵种，宪兵、伞兵、汽车兵、防空兵、游击兵；比如一座被遗弃的伤兵医院，那些带不走的重伤兵被封进土窑后的“哎哟哎哟”声；比如被裹挟在大的时代疼痛里一个一个人心绪的千丝万缕，有些独自百转千回了八年十八年八十年。这些整理，也都谨慎遵循了口述记录的基本原则，无修饰、不遮蔽。在残酷的事件和环境里，时代烙印以及人性本身渺小却温暖的东西，迷惘的东西，恐惧、矛盾的东西，软弱与决绝的东西，都不能剔除。能澄清就澄清，能留就要留下。

在记录这些口述的同时，我们也拍下了这些老兵肖像，这是抗战年代里一个特定群体一生的最后一个阶段。80年前，他们是士兵，是抵抗者，之后是解甲者，是沉默的无名之辈；此刻，他们是中国最后的抗战史。他们正在对我们低声说，再见。历史与当下，当下与未来，这也是一场最后的对视吧。呈现这种对视，也是我们对历史态度的一种重新认识和表达。它从对“无名之辈”的认知走向对“无名之辈”的纪念。与其说我们希望为今天这些抗战的“无名之辈”找到在历史上的位置，不如说也是给我们自己的未来，给每一个个体生命寻求一个出口。只有在一个对个体生命有彻底尊重的世界，生存才是值得的，付出才是值得的，所谓美好和公义，人烟之处那普遍而普通的丝丝柔情，也才是真切的吧。

在此，我们学习用一种对个体生命细微、清晰的铭记，令其一生不被庞大而空洞的符号、标签席卷而去。我们想在历史最终无情而渺茫的深渊里，小心翼翼，珍重地放下这些地方，这些名字，这些样子，这些声音。这些呼吸和体温。当时间永逝，他们依旧要触手可及。

邹容 美国堪萨斯 2017.05

工兵：从这里通向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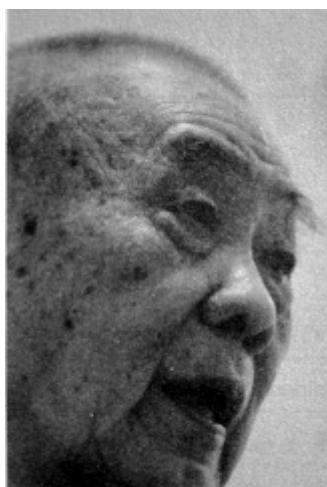
小兵种

工兵：从这里通向东京

谢浦高是典型的“南人北相”，身材高大，国字脸，浓眉大眼，长期的井下作业让他患有严重的肺气肿，躺在医院病床上，脸色就跟灰色的上衣一样毫无光泽。但回忆起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他的情绪一下子亢奋起来，脸也突然变得红润，“我们38师很能打，英国人见了我们都说，Chinese Ok”。

1942年，谢浦高家里因无钱买丁，万般委屈去投了军。从永阳、到都匀、入云南、飞印度。从印度又一直打到缅甸。“在印度蛮好玩的，我们师长孙立人很能打，孙悟空也很能打，我们开玩笑是跟孙猴子来取经了，师长听了也不生气。”吴承恩笔下的西游，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最终修成正果，功德圆满。而谢浦高的西游，九死一生，结局却是意兴阑珊。

工兵谢浦高关于印度的记忆里，雷多是印象极深的。在这条伟大的公路上，曾立有一块路牌，上面用英文写着：Road to Tokyo（从这里通向东京）。1945年，抗战胜利后本来准备前去日本驻军的谢浦高¹，却最终在长春放下了武器，而东京作泊一个地名，一直停留在他记忆里的那块路牌上。



口述人 / 谢浦高，1927年农历五月十四日出生，原国民革命军新38师工兵营2连士兵。14岁当兵的谢浦高，亲历了1943年缅北大反攻，从印度一边修路，一边作战，穿越了缅北大丛林。因军姿威武，谢浦高被抽调到国民革命军第67师，准备东渡日本，结果却被裹挟进了内战。在长春谈妥“三个条件”²后，谢浦高最终放下了武器。

上世纪50年代初，谢浦高从新疆建设兵团自愿回乡务农，后进入马田煤矿当了一名矿工，退休后，随着孩子住郴州。现患有严重肺气肿的谢浦高，经常为了医疗费和“工资”问题四处奔波。

采集人 / 李桦 **采集时间 /** 2014年9月11日

“上飞机前，要求我们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

我老家在永阳，没有读过书，也不认识字。饭都没得吃，哪还有可能让我去读书。我家里人多，不算姊妹，光是弟兄就有六个。那种日子，想都想得到。我大哥年纪比我们大很多，一直在乡下种田。二哥死的早，我好小的时候他就死了。日本人来了以后，乡下开始抓丁，三哥胆子大，脾气也倔，为了躲抓丁，一个人偷偷跑到湘

江上去掌船。按当时的规矩，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四哥（谢浦郎），五哥（谢浦方）就只有去当兵去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入的伍。五哥后来战死在安徽，三哥后来一直没敢回家，他认为是他把五哥害死了。

按道理，四哥、五哥去当了兵，我家里就不用派丁了，但我们当地的保长很坏，那个时候发国难财的人也蛮多，他才当了两年的保长³，就已经买了二十几头猪。保长到我家里找到我父亲，要我家出钱买丁，我家里哪里有钱买丁咯，反正家里人多，我父亲就让我去乡里报了名。

到了乡公所，有个穿黄衣服的人过来帮我量身高，我记得是1米5，过磅不到100斤，那个人可怜我，就对保长说“太矮了，当不得兵”。保长说：“矮？以后又不是不长了。”没办法，我就这样跟其他11个人被分成了两组，我们6个人这一组被送到了衡阳。

没有车，乡里到耒阳县城三十几公里，走了快一天。从耒阳坐车到衡阳，再从衡阳坐火车到柳州，再到贵州的独山，最后到了都匀，那已经是1942年秋天了。在营地体检，年纪上了三十岁的、身体不好的，站一边，三十岁以下的站一边。我体检还不错，接着打针⁴，也不知道是什么针，每个礼拜打一次，打了快一个月后，就要我们打了针的从贵阳去云南。

到云南后就有美国的飞机在等我们，上飞机前，要求我们脱光身上的衣服⁵，其他的东西都不让带，每个人只发一个呕吐袋，那个飞机颠得厉害，估计是翻喜马拉雅山。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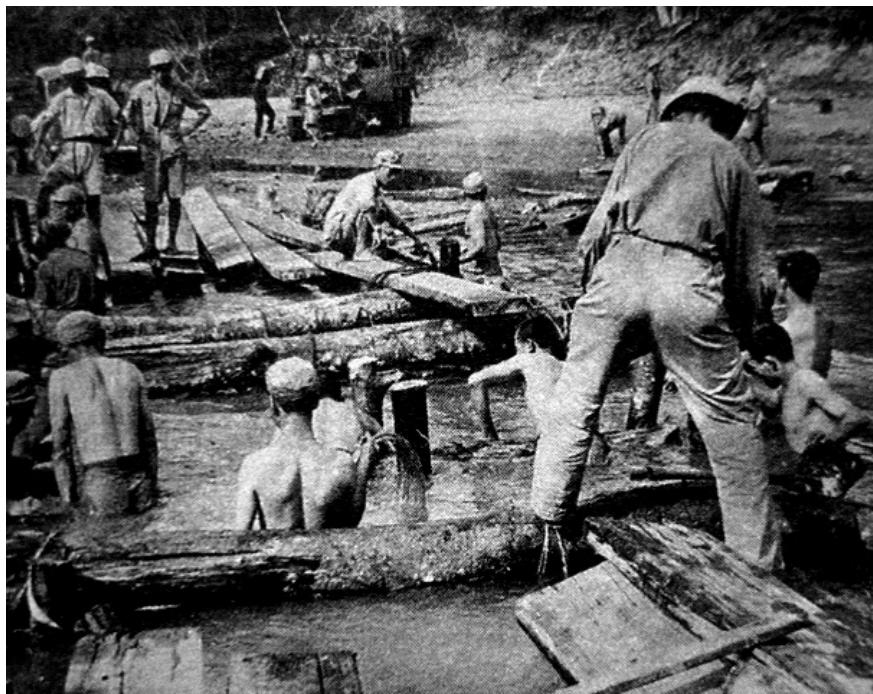
下飞机后，一个个都狼狈不堪，有穿草鞋的，也有光脚的，有光上身的，也有光下身的，很多人站都站不稳。旁边的老外叽里呱啦地一顿乱说，后来听翻译说，他们讲“你们这个样子是什么兵咯，你们哪里打得仗咯，一看就是来送死的”。我们听了心里不舒服，但也无法，只有不理他们。我们待在机场排队领装备，每人一套衣服，一双鞋子，一顶帽子，还有一个蛮漂亮的斜挎包⁷。开餐时，我发现伙食很好，还有牛肉，这个时候心里就好受多了。那美国人真的可以，发那么多东西，就一个人在发，还不搞错，我们部队就不行，就算两个人都不行的。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行军。先坐火车，坐了一天一夜，然后坐船，又是一天一夜，这样来回搞了两次，才到了目的地⁸。下来一问，说这里是蓝姆迦。当时新38师就退守在这里。⁹

我那时年纪小，但个子真的跟那个保长说的一样，长了不少。因为没打过战，分到了师里的工兵营。我们一个营有三个连，我是第二连。整个师一共是三个团，我们就一个工兵连跟一个团。我们连当时配属于112团。

工兵：从这里通向东京



工兵团旗语兵在史迪威公路修筑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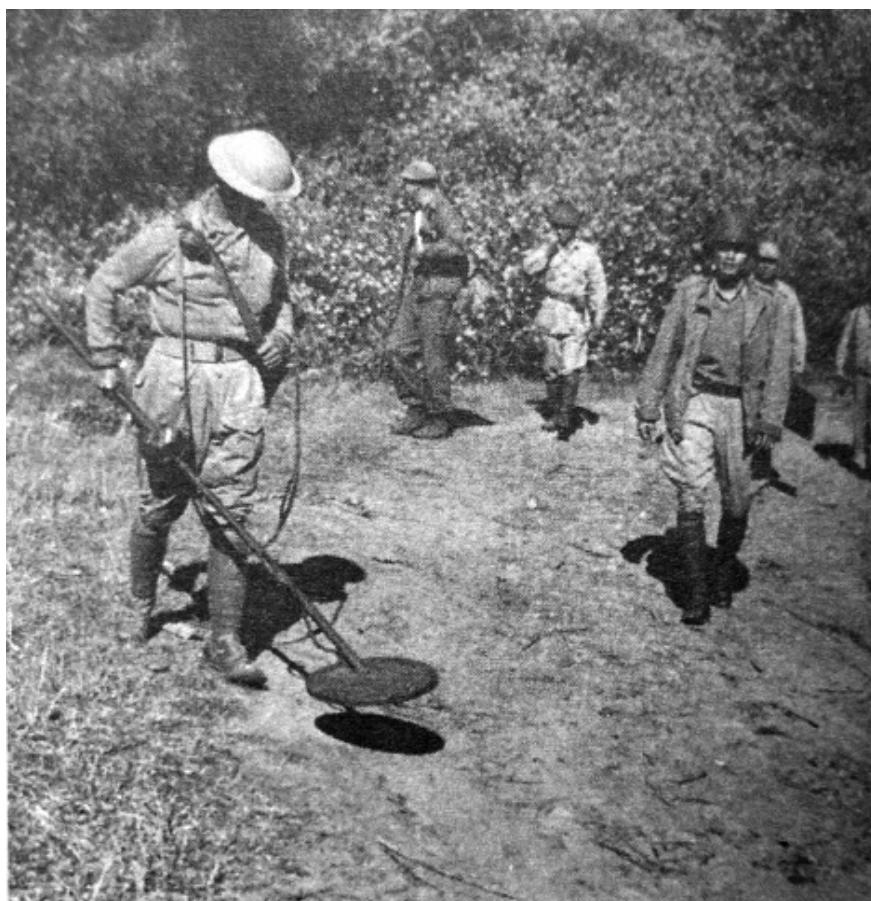
1942年7月30日，缅甸，中国远征军搭起一座浮桥。

蓝姆迦其实不大，但人多，有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我还看见过黑人。我们在印度，是美国出钱、英国出物资、中国出人，因此跟那些外国人关系也还算好。我们在印度发的是卢比，但是没什么东西买，也没地方用钱，出去连坐车都不用钱，只要看见军车是空的，招手就停。休息的时候，我们也出去玩，只是晚上一定要归队，我有一次坐车去了一个寺庙，离开营地有七十多里，听老兵们说，那个寺庙是当年西游记取经的一个庙¹⁰，叫什么不记得了，那个庙也不大，和尚就多了去，怕有一千多个。

“缅甸的那个雨季，很长”

当时印度与缅甸交界的地方没有公路，我们被派过去修路，那个地方叫雷多，我们工兵都叫它卡多。那个时候，工兵营已经升级为兵团，我们就在美国人的配合下开始修路，那条件就差了。到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要体检，那个苦，身体不行的根本吃不消。一是热，夏天很少低于40摄氏度的；二是虫子多，毒蛇多；三是条件实在太差，工程量太大。先要砍树，把树砍倒后，再去找石头，雷多那一段路泥沙多，需要从峡谷里背很多石头去巩固路基。后来美国人的修路机到了后，进度才开始加快。

日本人也知道我们在修路，就来搞破坏。我们是边打边修。那个时候正赶上雨季，受伤了又没有药，就很危险。为了这个，我们还修了一个小型简易机场，每次可以送两个伤兵，带担架的话，就只能送一个。美国飞行员的胆子大，那么小的地方，都敢降落¹¹。



缅甸南坎附近，扫雷的工兵和孙立人将军（右三）。

我们的武器已经算很好了，都是美的，面对面打，日本人搞我们不过，他们就开始搞埋伏。一般都是在洼地里，先埋上地雷，然后人就躲到几百米外的树上，专门打排雷的。因为埋的雷多，连我们工兵也要排雷，我就排过。背上背一个接收器，耳朵上还要戴耳机，胸前还要挂一个表，当探测器探到雷时，那个表上的指针就会归零，耳机里也会传出呜呜的声音。没有探到雷，指针就会两边摆。我就跟乌龟一样，趴在地上，慢慢地爬，不然摸不到。好危险。找到雷后，我就用手摸，是火雷管还是电雷管，不同的雷排除的手法是不一样的。后来我们也学聪明了，用60或80迫击炮吊射树上的日本兵，老兵们把这个叫打“人鸟”。

再后来就到了孟康。日本人在这里有重兵，硬冲肯定不行，又是我们工兵连夜偷偷地在河上架桥。雨季的那个雨好大，工兵那么辛苦，一晚上也就运过去了三个营。我们只管架桥，不敢问别的，到第二天早上枪炮声响了，我们才知道，战斗打响了。

就这样一直修，一直打，一直打，一直修。最后到缅甸时，还搞了个仪式，史迪威也参加了。他们美国人把这条路叫“史迪威之路”，不过我们中国人还是习惯叫“雷多之路”。

我们一直走到南坎才停下来。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回国，我们连留下来修墓，其实都是给那些死去的人收尸。墓有十几米长，七八米宽，三四米深。给我们的时间很短，所以搞得也很简单。尸体堆在路边，用一块大的雨布盖着，那味道好难闻。缅甸的那个雨季很长，好像每天都在下雨，为了不淹着尸体，我们在墓中心挖了一条排水沟。那些尸体，一层层地码放上去，码一层，就用针叶和草隔开，再码一层，又用针叶和草隔开，估计码了有十几层。正中间留了一个洞，用水泥浇筑，用来立碑。旁边还开了一个门，有些后面的尸体要放进去，那进去要戴防毒面具，天气热，闻不得的。本来立碑后还要修栏杆的，但时间不够，就没搞了，那个碑上的字不太记得了，好像是中国远征军阵亡纪念碑。

我们后来是从密支那回到云南的。后来又从云南去了广西南宁。8月15日那天，只听见外面放枪，机枪9发，冲锋枪6发，步枪3发，就这样不停地放，原来是日本投降了。

在南宁也好玩，每天就是游泳，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游了几个月，晚上还要教我们跳交谊舞。后来才听说是要派我们去日本接收冲绳岛，准备从广州出发。但是没多久，就要我们北上，去打内战。¹²

^{1.} 日本投降后，美苏中英等11个同盟国于194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委托美国全权统一办理占领日本事宜。经商议决定，由中国派出一支5万人组成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特别希望派遣由孙立人率领的曾参加过印缅作战的新一军去。但此时内战已经爆发，新一军已派往东北，加之驻军日本所需经费高昂，经与美军协商，最终决定由曾在河内担任受降任务的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成67师前往日本驻军。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当口，蒋介石却下令驻扎在上海的67师开往苏鲁豫边区进攻人民解放军。此后这支部队在内战中遭到重创，再也没有能力前去日本。 ↪

^{2.} 所谓的“三个条件”，据老人回忆是指：第一，所有投诚人员的军衔与官职保留不变；第二，对所有投诚人员实行过往不究，民愤极大者除外；第三，所有投诚人员的家属与私人财产均受保护。 ↪

^{3.} 这个保长名叫唐世章，因为大发国难财，借口买丁，实为中饱私囊，民愤极大，“土改时上吊身亡”，时间大约在1950年前后。 ↪

- ⁴. 打的是卫生防疫针，而不是像谢浦高老人所回忆的是打营养针。在《国家记忆》（章东磐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一书中，美军中缅印164照相连的随军摄影师拍摄有多幅照片，可以确定的是，去印度的士兵都必须体检，不合格的必须淘汰。 ↵
- ⁵. 按《国家记忆》和《在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邓贤主编，五洲传播 2005年）所载资料，因为当时国内物资奇缺，很多士兵入伍后，都没有装备可发。去印度的士兵在印度会接收新的装备。为了不浪费资源，上飞机前，长官会命令登机的士兵脱光，留下装备给国内的士兵。 ↵
- ⁶. 指驼峰航线。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航线全长500英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 ↵
- ⁷. 《在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有描述，盟军给中国士兵配发的装备，当时的标准配置是：毛巾一条，哔叽布衣服一套，胶鞋一双，帽子一顶，蚊帐一顶，油布一张，毯子一条，再加上防虫药一瓶。从这里也可看出当时的作战环境。 ↵
- ⁸. 从印度旁遮普邦的汀江到蓝姆迦直线距离并没有那么远，之所以多次换车，是英国人为了控制印度，人为地将铁轨修得宽窄不一。 ↵
- ⁹.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新38师在孙立人的带领下，没有选择走野人山，而是撤向了印度。经中英两国协商后，新38师在蓝姆迦接受整训。 ↵
- ¹⁰. 蓝姆迦位于印度中部的比哈尔邦，当年玄奘取经时，曾经在此地逗留。
↵
- ¹¹. 1944年，美军就已经将直升机投放到了战场上。1945年，美军从高黎贡山转运阵亡士兵的遗骨就是用的直升机。 ↵
- ¹². 谢浦高后来参加了锦州、四平的战役，“我们南方人在那边打不过北方人。行军负重四十多斤，路上又结冰，走都走不稳，怎么打。后来被围住在长春，再后来就起义了。1954年，进新疆建设兵团，看见有人写申请回老家，就让他代加上我的名字，这样就回来了，回来后日子也不好过，刚好马田煤矿招人，我家里就托人找了个熟人，给他送了些鸡蛋，就这样去了马田煤矿”。 ↵

伞花：不是谁都能从飞机上跳下

采访陈玉龙是盛夏时节，田垄里只有稻子被割后的草蔸，没有风，天空一片湛蓝。70年前，也正是这样的季节，那群男人义无反顾地从天空跳下。记忆已随时光渐渐消散，只剩下一座坟墓。

另一位受访老人谢慈友，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第一批空降兵。他继承了其父善于与人打交道的天赋，人见人爱，在军训班时受到过杜聿明的表扬，“杜聿明是个好人，讲义气，当年他用全家性命来担保马师恭，不然的话，陆军出身的马师恭哪里当得了伞兵的司令咯”。19岁，他率队参加空袭，取胜。20岁，部队从昆明去南京，途径长沙时，他借口母亲生病，回了平江的家。

现在85岁的老人，在平江县城里摆摊卖豆腐和自种的小菜，他面色红润，身板硬朗。个子不高，却身手敏捷。他的平江话说起来跟打机关枪一样快。他说当年在军训班拼刺刀得过第一名。“向前一步，刺！”说完，大喊一声“杀”，然后坐在板凳上哈哈大笑。

在教委家属楼一楼，收拾得很干净的小房间四壁贴满了抗日爱国的口号。问他现在豆腐的行情，老人有点不好意思，“涨了一点，要两块钱一块了”。



口述人 / 谢慈友，1927年农历十月初六生于岳阳市平江县，中国第一支空降兵部队¹60小炮上尉、分队长。因伯父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当团长，谢慈友15岁投军，先在第五军留守处培训班学习汽车修理，后进入第五军干训班，因表现优异被提升为特务排长。1944年底，加入伞兵鸿翔部队，并参与空袭丹竹机场的作战。1946年，借看望母亲之故脱离部队。1950年后一直在家务农。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平江县城关镇卖豆腐与自种小菜为生。2015年9月3日，以抗战老兵身份参加全国阅兵。

采集人 / 李桦 采集时间 / 2016年7月19日

“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你父亲就你一个崽”

伞兵不是谁都能当的，那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太蠢的人当不了，胆子小的人也当不了。就像教官说的，“降落在敌人的后方，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蠢的人反应慢，容易被敌人发现；胆子小的人，一般又不敢进行单兵作战，容易延误战机。

一开始伞兵都是不要考的，基本上都是从第五军里面挑，特别是特务营的人多，其他的也有，反正都是年轻力壮、打仗勇敢的。后来去印度打仗的那些人回国以后，看伞兵的待遇高，也有很多参加了我们的伞兵团。再后来因为伞兵扩充，又从学生兵中挑选了很多。不光要有文化，还要看他们的体格。医官检查通过后的，才能参加笔试跟口试，那挑选是极其严格的。³

我进伞兵团时18岁，别看年纪小，来头可不小。我当时是特务排的排长，而且还受到过杜聿明的当面表彰。后面有几次我去军部办事，军部的那些头头还叫我“小娃娃”。他们之前在军训班见过我。

在军训班⁴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过我会留下来，因为我在曲靖⁴日子过得也还好。训练的时候我很认真，只想快点搞完后，好回曲靖去。没有想到的是，结业考试时，总分我拿了第三名，加上我在受训的时候表现很好，像拼刺刀和班级攻防这两个科目，我都是第一名，所以上面的人就把我留在了军训班教导处当教官。没过多久，接到上面的命令，说是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要来第五军看一看，我们军长杜聿明就安排了军训班的学员做汇报演出。但是时间掐得很紧。我找到的命令是在十五分钟内演示完拼刺刀和班级攻防。我一听就火了，这点时间哪里够，光是整队列、展开队形就要几分钟。我就跟处长说，这点时间，那我搞不好。处长说：“不要紧，他们也就是随便看看，搞得完好多是好多。”我心想，搞就搞，反正是你让搞的，出了问题未必还骂我啊。

演习那天，可能是年纪太小，一点也不晓得紧张。军长介绍完以后，就轮到我们上场表演了。我什么都没想，反正就是按照平时操练的搞起来，先整队列、报数，然后展开队形，接着喊口令，我喊“上前一步，刺”，大家就做动作，然后大家齐喊一声“杀”，那气势真的是吓人的。刚刚搞了几个动作，时间就快到了，我就准备收队，这时执勤官跑过来，要我们继续表演。把全套劈刺的套路做完以后，我看了一下时间，这时执勤官又跑过来，要我们继续演习班级攻防。我反正都无所谓，因为这些东西我太熟了，搞到我的饭碗里来了（方言，指因熟练而胸有成竹）。做完以后，我看了一下时间整整一个小时，蒋介石和何应钦都坐在那里没走，还一个劲地帮我鼓掌。军长就很高兴，特地过来表扬了我，团长当时也在。几天以后团长就把我调到了特务排。“小娃娃”这个外号就是军长喊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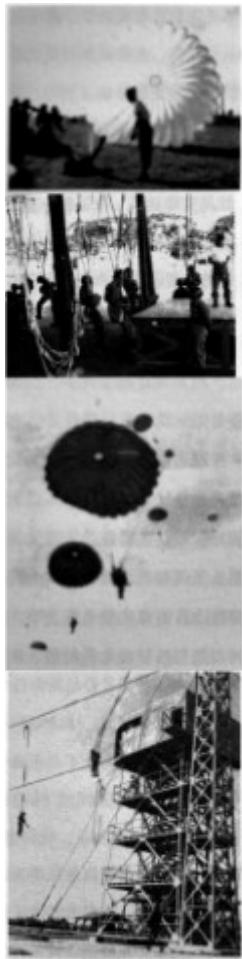
我的亲伯伯⁶是杜聿明的老部下，在第五军当过团长，后来调到了新22师，还当团长。我开始当兵就是冲他来的。当了排长我心里很高兴啊，就告诉了他，本以为会得到几句夸奖，没想到被他一顿臭骂：“你这个细伢子（方言，泛指小孩子、年轻人）懂什么咯，特务排执行的任务要比你在曲靖修汽车危险得多，你要出了事，我怎么跟你父交代？你父京就你一个崽。”刚好，那个时候伞兵团在招人，他就让他们把我招进了伞兵。

“美国人也很干脆，照到后面就是一脚。我是第五个，‘啊’的一声就跳出去了”

在曲靖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伙食就已经很好了，美式罐头也偶尔可以吃个几回，跟那些美国人关系好的话，还可以抽几根美国烟。但到了伞兵团以后才发现，那些根本不算什么，跟伞兵比起来，我们之前在曲靖就跟叫花子差不多。

第一天吃饭我就吓了一跳，每人每天规定要吃四两肉，外加两个鸡蛋。那是什么年月，四两肉让你想你想得到吗？关键是天天都有吃。美式罐头就更不要说了，多得很，吃到后面都不想吃了。而且装备好，每个人都是全美式装备，手枪、钢盔、水壶、手电筒，连药都是美国的。最牛的是还有一把伞兵刀，收在小腿那里，拿在手

上威风得很¹。每次通过大街去野外进行战术训练时，老百姓看见我们戴着美式钢盔，穿着新军装，背着美国的最新装备，唱着《伞兵之歌》，都会跑上来围观，并且大声叫好，那是很骄傲的。



中国第一支伞兵突击队的日常训练，站立、跳塔、伞降等。

当伞兵虽然各方面待遇都很好，但是训练很苦，刚开始美国人的那些训练装备还没有全部过来，所以都是搞体能训练，也就是地面的低级训练。地面训练通过后，才能开始高级训练，也就是空中训练，这一部分就全部是由美国教官负责的了。除了这些，还要搞军事训练，这也是美国人负责的，主要是学习美式装备的性能和使用，还有单兵作战的技巧。反正训练也没别的，就是一个字：苦。到后来改编为陆军伞兵突击总队后，美式装备、洋教练就源源而来了⁷。



C-46运输机

我第一次坐飞机，坐的就是美制的C-46⁸。这东西不比汽车，汽车我还是坐得多，在曲靖时经常坐进口的美国车。这上天还是第一次，所以还是觉得蛮稀奇的。

练习空降那天，一开始大家都好兴奋，那年月不要说跳伞，就是坐一次飞机也是了不得的事情。平时大家都是在地面搞基本训练，那是蛮枯燥的，反正每天都是跳高、跳远、飞环、打翻，基本天天如此。飞机起飞的时候，大家都还有说有笑的，但一到降落点，大家的脸色就变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不作声。特别是预备铃响起的时候，我看到边上的几个云南兵好紧张的，腿抖个不停。到第二声铃响的时候，除了队长和美国教官外，所有的人都不作声了，就跟哑巴一样站在那里。

等教官做完最后的检查——主要是看挂钩挂好没有、装备带齐了没有、姿势是不是正确——然后队长喊口令，大家就排好队跟着他。飞机也慢慢下降，到一千米左右时，教官突然把舱门打开，那风就大啦，吹得眼睛也睁不开，人也站不稳。只听见教官在用英语喊口令：“One Second, Two Seconds, Three Seconds. go！”那个时候所有的人脸都白了，都怕得要死，第一次跳也没什么经验，其实怕来怕去就是一点，都怕伞包后面的挂钩钩不住，但是又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怕丢丑。不过我们队长的胆子还是真的大，听到“go！”的口令，半点犹豫都没得，就跳出去了。后面几个胆子小的，站在那里不敢跳，美国人也很干脆，照到后面就是一脚，人就出去了。我排在第五个，麻着胆子把眼一闭“啊”的一声就跳出去了，那感觉就跟自杀一样，直到伞打开后才敢睁开眼。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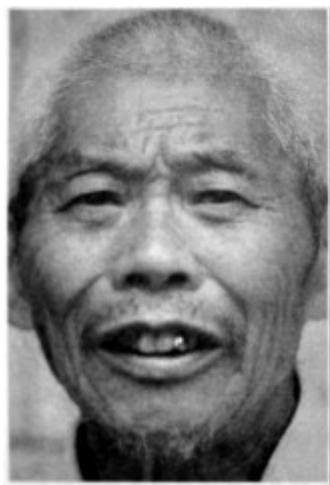
跟空降比起来，其实地面训练要苦得多。那个时候所有的装备都是美国人提供的，飞机数量少。另外就是伞也比较少，都是好珍贵的¹⁰，所以基本上一开始都是跳高塔。先是背着降落伞练站立，站不稳的话，离机的姿势就肯定没得保障，然后每天还要在两米多高的平台上跳沙坑，这是炼腿劲，因为落地的时候那个冲击力很大，腿站不住的话，容易受伤。最后最恐怖的才是跳伞塔，那有几十米高，站在上面脑壳都发晕。其实原理我们都晓得，先在下面把伞用钢圈撑开，再由升降机升上去挂起，跳的时候，绳子一拉，钩就松开了，人就带着张开的伞下来。跟空降不一样的是，跳伞塔的时候眼睛看下面还是看得见的，那个高度，一下没搞好就会出事，不管你胆子有多大，没有不怕死的。

“好巧的是，另外一个湖南人也参加了，他是翻译”

行动我只参加了一次。当时收音机里天天都在说日本人快不行了，不过我们自己也可以猜的到，当时像南宁、柳州还有桂林这些地方，以前是日本人占领的，都被我们抢回来了。出发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要去哪里，飞机起飞以后我们才知道，是要去突袭丹竹机场。那个时候驻广西的日本军队已经不行了，大部分日本兵开始沿西江向广东那边撤退了。丹竹机场刚好就在西江边上，具体位置蛮不好形容，应该在平南县的下游，其实就是一个小型基地，负责补给物资的中转。那个附近修了一个简易机场。

我当时在60小炮分队当分队长，从昆明起飞的时候是7月18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是我们分队第一次出战。总共是3个混合编队，大概有600多人¹¹。坐C-46和C-47去的，一路上还有美国的战斗机护航，经过柳州时还停了一下，然后就直飞丹竹了。当时由于太突然了，日本人根本没得什么防备，到达丹竹机场上空时，中美空军的轰炸机、战斗机首先开火，丹竹机场顿时腾起一片火海。接着由迫击炮分队、机枪分队、工兵分队组成的空降兵突击队跳伞着陆，抢占机场¹²。日军龟缩在机场四周的地堡里用机枪疯狂地对我们扫射，我就指挥我们的分队，用60小炮打死角，没几分钟地堡就被我们的炮摧毁了，没有被炸死的、躲在里面日本兵，也被我们用火焰喷射器烧焦了。

几天后，我们又配合其他的地面部队对守备的日军展开反击歼灭战，日本人那个时候虽然走下坡路了，但反击还是很猛烈的，幸亏我们的火力占有绝对的优势，日本人才没搞出什么名堂来。好巧的是，这次战斗另外一个湖南人也参加了，他是翻译。两年前，我跟他还在长沙见了一次面，聊了很多当年的往事，叫易延绶¹³。



口述人 /陈玉龙，1934年出生，衡阳县礼梓乡加福村人。鸿翔部队在牧云庵驻扎时，11岁的陈玉龙经常在那里玩耍。鸿翔部队墓地就在陈的住房后，紧紧靠着他家的偏厢房，只有三四米远。

采集人 /张映科 **采集时间 /**2015年7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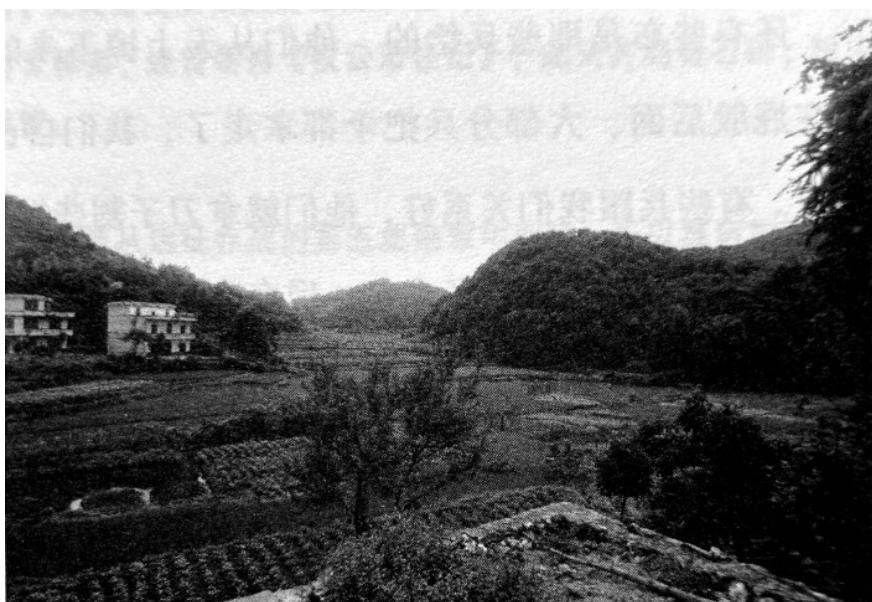
“我们把伞包拿出来做衣服穿，又把骨头埋进去了”

他们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落在我们的田垄里面。落下来的时候，就像树上落花一样的，飘飘洒洒，当时我没有看到，我听别人说的，不过我和我继父老子捡到一个崴了脚的，还送到他们驻扎的牧云庵里。他们啊，都是些非常文气的人，对我们

当地人也非常和气，就像教书先生。打洪市镇，他们死了几个人，埋在我的屋后面，就是这个鸿翔部队的墓地，都几十年了，没有外地人来这里看过，直到前一两年，有好心人（地方史研究者萧培和王辉）才修了墓碑。



2015年重修的鸿翔墓地。



衡阳县礼梓乡加福村。1945年7月2日，中国伞兵降落此地，并驻扎在村里的牧云庵。

我屋里原来住在云华村，土改时，我继父带着我搬到了加福村。我现在的屋，离鸿翔部队的墓地只有三四米远。

那些兵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这里还只有五六户人，是秋天，田里种的是一季稻，禾刚刚被杀了没多久（方言，指利用扮桶的缺口，人力将熟透的稻谷打落），田里是光的¹⁴。伞兵掉了下来，掉在这个马路和牧云庵¹⁵之间的田垄里。这个田垄有百把米长。

他们都穿着军队里的制服，背上背着个包，掉下来就坐在包上面，总共有百把个人，他们喊自己是“远征军”¹⁶。这些人都住在牧云庵最里面那一进的瓦屋里，就是以前方丈住的地方，当时牧云庵蛮大，还有三四个和尚。

以前田垄没这么宽，边上还是树，我看到有一个人掉在树上，脚受伤了，我继父当时也在那里，就把那个人送到庵堂这里来了，我也就跟着来了，在这里耍了几天。

我不晓得哪些人是外国人，但是有几个人眼睛不对，眼珠里有光，像猫的眼珠，有些眼珠是黄的，脸上也有毛，毛一路连到肚子，鼻子还有个微微勾，这样的人有七八个，我看到他们在稻田里耍过几回。¹⁷

这些当兵的驻扎在这里，他们要买鸡买蛋吃，我们当地有很多人就在牧云庵的门口摆摊，还卖烟酒、麻糖、米糖、芝麻糖及一些果子。这些当兵的用的是县里面发的一种法币，这种钱后来我们用也还是用掉了。

我当时还只有十岁出头，这些当兵的对我蛮好，还给衣服给我穿，衣服里还有钱，只是乡长不准我进庵堂里面玩，把我推出去，我就把衣服穿回去了。

第二次我又来了，那些人还认得我，又把我请进去，我要了一天。他们还给我糖吃，给我鸡吃，就是鸡汤不给我喝，他们只喝汤。

他们在这里住了有段时间，打完台元镇¹⁸后，还住了将近两个月了，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这里没一个人看到。¹⁹

打台源镇死了的那几个人，埋在我现在屋的后面，有4个人²⁰，其中有一个个子蛮高。每个人的降落伞也都放在棺材板子里，他们自己挖的土，自己立了个木头碑，我就在边上看着。²¹

我们当地的人以为墓里面有钱，大概是到1951年的时候，就把墓给挖了，墓里什么都没有，就有副板里有双黑牛皮靴子。那些板也都烂了，里面也就剩下骨头，我们把伞包拿出来做衣服穿，又把骨头埋进去了。

我们当地有个叫易伟的已过世了的老师，不准我们直接拿那些伞包来用，说必须要消毒。我们就把这个降落伞放在沟里去洗，水好臭啊，臭好远呢。洗了后我们才拿出来用。

那些布很牢固，烂不了的，有两户人家家里可能还有这个布，一个是陈代铁家里，但他房子后来被山砸了，山垮了，把房子都埋了，蛮多东西都落在那房子里了，估计也没有了。还有个是原先村里的会计，他家用那个布做了被窝的套子，不知道现在还有没？

还有些布是那些兵给的，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伞就垫在屁股后面，大部分兵把伞都拿走了，我们自己去拿是拿不到的。有些兵跟我们关系好，他们就拿刀子割些绳子，拿给我们村里人用，有些人还给了伞包。现在人老的老，死的死，保留以前东西的人少了，以前还是有些人的屋里，有那些降落伞上的东西，那些绳子蛮经得起用。

¹. 1942年初，杜聿明率远征军入缅作战，因英军为求自保而擅自撤退，致使中国远征军侧翼暴露给日军，蒙受了重大损失。突围途中，日军用伞兵空降至伊洛瓦底江右岸的渡口，在远征军从曼德勒向缅北和缅西撤退的路上插了一刀，给中国军队制造了很大的伤亡。

1943年1月，国民革命军第五集团军在昆明成立，杜聿明任总司令，当年12月在第五集团军内组建了一个伞兵团，团长李汉萍少将，副团长简立，部队驻地在昆明北郊岗头村。至此，中国第一支空降兵部队诞生。 ↵

2. 伞兵最初成立时，人员大部分从第五军各师中挑选，特别是从特务营抽调的士兵最多，因为这些士兵的单兵能力较强，同时反应灵活，又较为勇敢。后来因为伞兵扩充，大部分士兵就从驻曲靖沾益的青年军207师的学生兵中挑选。他们有知识，年轻力壮，素质比一般部队士兵要好。 ↵
3. 第五军自己办的一个培训班，全称是第五军军事干部训练班，主要是培训中下级军官的。 ↵
4. 口述中提到曲靖的次数相当多，这与谢慈友本人的经历有关。1942年，15岁的谢慈友首去广西投军，因年纪小，最先被安排在第五军广西留守处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谢慈友不仅学习了文化，如物理、数学、化学等，还学习了汽车修理。1943年，拿到二级技师结业证的谢慈友被分配到了中印缅驻滇干训班，随后进入到设在曲靖的汽车学校，从事技术修理。曲靖离昆明不远，只有160公里，战略位置重要，是昆明的屏障，当时美国的援华军用物资在此地集散。美国的运输机不能运大卡车，只能在美国先拆卸大梁，到中国后再组装，因此曲靖一时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中心。 ↵
5. 谢慈友的亲伯伯谢蔚云，黄埔四期毕业，是远征军第五军新22师66团团长。第五军的骨干师是200师，1940年前后，新38师与新22师均被调入第五军系列，1942年又相继调出。 ↵
6. 伞兵作为一个新兴兵种，又是全美式装备，当时不仅杜聿明看得重，连蒋介石也将其视为掌上明珠。因此伞兵的待遇比其他兵种要好的多，吃得好，也穿得好：平时军官带大沿帽，士兵戴船形帽，穿带帮短腰皮鞋，有时着帆布短腰胶鞋，扎美式带孔的宽腰帆布带，肩章是陆军特种兵，领章为空军小飞机标志，臂章为降落伞标志并有“鸿翔”二字。伞兵军官平时可随身带手枪，士兵可带伞兵刀自由进出各种公共场所。 ↵
7. 1945年4月8日，伞兵正式扩编为陆军伞兵突击总队。在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装备、训练器材及教官相继到位。总队下辖20个伞兵队，为了保密，每个队均有一个代号，大多是古今名将，如“诸葛”“伏波”“世忠”等，对外则统称为“鸿翔部队”。 ↵
8. C-46型运输机是由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生产的活塞式运输机。1940年3月26日原型机CW-20首次试飞，1942年装备美军部队后，命名为C-46，别名“突击队员”，总产量3180架。C-46飞机最大平飞速度424千米/小时，最大航程4140千米，最大装载量4630千克/50名士兵，机组乘员4人。它的发动机装有二速增压器，所以升限比较高，实用升限达7470米或8300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盟国部队曾广泛使用这一机型；在中国，它在1942~1945年间的“驼峰”空运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
9. 伞兵团在扩编为突击总队后，随着装备与器材的完善，在美军顾问团的帮助下，以伞兵学校的名义实施组织，于1945年6月9日首次进行了空中跳伞训练，第一批训练至7月结束。 ↵

10. 当时伞兵所有的装备及训练器材均依赖于美国进口，一顶伞兵伞按照当时的价值估算超过400美元，当时美国对华援助的重点也不在伞兵，伞兵伞的数量相当少，因此相当珍贵。当时中国伞兵部队所用的降落伞都是美国伞兵广泛使用的T-5和T-7型伞兵伞，由引导伞、伞衣套、主伞和捆绑带等主要部件组成，柔性纺织物制成，可在最大飞行速度小于250千米/小时的飞机上使用，采用强制开伞。为了保证伞兵伞的多次使用，还专门设置了折伞组，负责跳后的烘伞、折伞工作，并检查伞绳有无毛病，伞上有无破洞，有无胶着张不开等问题。折伞人员要负责未来跳伞人员生命的安全，折好以后要签名。为了鼓动折伞人员小心负责，还特别发给折伞津贴。 ↵
11. 老人的记忆与相关史料有差异。有资料记载，在这次行动中，应该是出动了3个分队，即陆军突击总队的第八、九、十队各出动一小分队共二百余人，进行了混合编队，乘C-46和C-47型运输机由昆明起飞，经柳州，到丹竹，而不是老人说的600人，由40架C-46运输。 ↵
12. 有资料记载，伞兵突击队抵达丹竹机场后，日军因基本没有防空装备，所以几乎没有作抵抗。伞兵突击队也没有采用伞降，而是采用的机降。 ↵
13. 易延绶是鸿翔部队成员，少校翻译官，1945年7月18日也参加了对丹竹机场的突袭战斗。跟谢慈友不同的是，易延绶是学生兵，是从大学里抽调到鸿翔部队当翻译的。易延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打成“美蒋特务”，剃阴阳头，挨批斗。2013年，在民间志愿者的帮助下，谢慈友与易延绶这两位分别了68年的战友在长沙见了最后一面。2014年，易延绶离世。 ↵
14. 据采集者调查走访，当地村民均认为这个时间应该为1945年6月7日，此说法应较为可信。但在周继厚所著《神秘的“鸿翔部队”——中国首支空降兵部队揭秘》（《环球军事》，2006年）一文以及《兵从天降：二战中的空降作战》（隋治刚，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年）一书中，这个时间为1945年7月2日。 ↵
15. 位于加福村牧云峰下，曾占地千余平方米。明朝末年修建，毁于“文革”，今只余断瓦残垣。据地方史研究者、鸿翔墓碑重立者之一的王辉介绍，牧云庵在清朝时曾是律宗第二祖庭，在南岳出家的和尚都要到牧云庵来受戒。此庙距王船山故居湘西草堂15公里，王船山常来此庙，为酬谢主持楚云禅师，还曾写有《牧云常住记》，此文并刻有石碑，现由县文物局保管。 ↵
16. 鸿翔部队人员主要从远征作战的第五集团军中选拔，所以其自称为“远征军”。 ↵
17. 鸿翔部队降落衡阳的此次突袭行动，有美国顾问还是较为可信的。据衡阳市衡阳县曲兰镇邬求德（1924.8~2015.7）老兵口述，1945年6月，在攻取衡阳县西渡镇的一次战斗中，他趴在地上，被日本人的机枪扫中脚，受伤后被抬到牧云庵，就是被美国医生治疗痊愈的。 ↵

¹⁸. 据《国民党军伞兵部队揭密》记载：1945年6月7日，华兵二队（队长为姜健中校，队副为美军少校）在严格保密情况下，全副战斗装备集结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附近。凌晨乘美空军十四航空队的C-46及C-47运输机15架（每架飞机可载24-27人，即两个组的兵力，15架飞机中，伞兵部队人员乘坐1架，6个伞兵分队人员乘坐9架，另有5架装载重武器、弹药、器材等），在2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于当日上午9时许到达衡阳县洪寺镇附近。6月11日凌晨2点50分，伞兵二队夜行军于4点40分左右到达日军重要据点台元镇的前沿阵地，并向敌发起攻击。其攻击部署是：两个分队迂回到敌后方阵地进攻。两个分队由敌右侧阵地进攻，一个加强分队（含迫击炮、重机枪）正面攻击，一个分队为预备队。当地游击队在敌阵地左侧配合作战。经两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损失惨重，有一个联队被击溃，一个骑兵中队损失过半，近百匹军马被打死、炸死，大批武器弹药被缴获，一两百名日军死伤。伞兵攻占台源寺，切断了日军从衡阳以南沿零陵方向撤退的后路，也打乱了衡阳城内日军原有的战略部署。在此战斗中，伞兵二队阵亡上尉分队长1人，士兵5人，负伤官兵10余人（其中有2名美军顾问）。（资料来源：http://bbs.tiexue.net/post2_5569531-1.html） ↪

¹⁹. 据王辉介绍，日军在长沙投降（1945年9月9日）前几天，鸿翔部队即作为先头部队赶往长沙，准备受降并维持城内秩序。 ↪

²⁰. 另有说法为6人。据王辉及当地关爱老兵志愿者刘小明介绍，6人的说法较为可信。 ↪

²¹. 当时墓里是否埋葬有牺牲的美国顾问，受访者陈玉龙也不能确定，只说到埋葬的人中，有一个人个子很高，像美国人。在一般情况下，美方会把牺牲人员的遗骸运回国内。而据当地村民反映，抗战胜利后至今，并没有美国人来过此地。但据王辉介绍，《衡阳县志》及《兵从天降》一书都相当确定的记载，有两名美国顾问埋骨于此。 ↪

空军：考上第五批留美飞行员

除了交谈中偶然冒出的几个英文单词，在李启炽的身上几乎看不到任何“海归”做派。也许是衣着太过朴素，又或许是屋内的陈设过于简单，让他口中的Arizona（亚利桑那）、Colorado（科罗拉多），这些让人憧憬的远方，更像是是南岳或衡阳的某些地名。

1942年10月，原籍湘乡的李启炽因为训练表现突出，被选为第五批留美飞行学员，从云南驿启程向西南，经孟买、南非、大西洋，最后在纽约上岸时已是1943年。提到打仗，“我只在云南驿用步枪打过日本人的飞机，我好惭愧的”，为此，他甚至否认自己是抗战老兵。

未曾与日军迎面交战的李启炽，最后在南华大学附属三医院退了休。也许是长期在医疗系统工作的原因，老人很注意养生，92岁高龄还能担两桶水下楼浇菜。“尽管儿女条件都不错，但我们还是过我们自己的”，说这话时，李指了指身旁的老伴王菊湘。

在衡山，同龄的两位老人平日里一心事佛。为了证明他食疗的功效，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他去里屋抱出装黄豆的罐子一次，抱出装黑豆的罐子一次，从冰箱里找出焙好的小鱼一次。



口述人 / 李启炽，192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出生，原中央航空学校第五批留美飞行员。1940年考入黄埔成都本校，在军校里学的是工兵科。1941年考入中央航校，因表现突出，被选为第五批留美训练飞行员。1945年归国，1946年为躲避内战主动脱离部队，1949年后，考入湖南医专，后在南华大学附属三医院退休。

采集人 / 李桦 采集时间 / 2015年8月4日

“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有被日本飞机打下来的”

我叫李启炽，“炽热”的“炽”，一个“火”字旁一个“只”，不是“智慧”的“智”。

说起打日本鬼子，那就惭愧得很。跟其他的老兵比起来，我这点事算不得什么，不能算是抗战老兵呢。打仗的事情真的没什么说的，不过当飞行员的事情呢，说起来还是蛮曲折的。

我以前在长沙读书，那个日本鬼子的飞机啊，三天两头来长沙轰炸。你说那书如何能读得成器。后来学校就搬家到了涟源的蓝田¹。当时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湘北，多次向长沙这边发动进攻，就算跑到了涟源书也肯定读不好了。那个时候年轻啊，不读书又没有路搞（长沙方言，无事可做），刚好黄埔军校在涟源招生，我就去报了名，我记得是1939年年底。1940年1月份我就去了成都，在那里入的伍。成都分校是南京搬去的本校²，我入伍以后先分到工兵科，叫工一队。

1941年冬天，昆明航空学校在全国招生。特别是在成都、重庆、贵州到处都贴了招生的告示，我就又动了心思，毕竟工兵比较枯燥啊。跟飞行员比起来，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一看到消息，我毫不犹豫地就去报了考。考试结束后，我的学科啊、体检啊，都符合飞行员的要求。就这样我就到了昆明，在昆明航校第15期。后来因为训练表现好，就被选上了第五批留美飞行员训练班³，讲起来好惭愧的，一直到1944年啊，我都没打过日本人。1944年回到印度时，以为会派我们去打仗，那个蒋介石啊，不知道搞什么名堂，非要把我们留在印度，不让我们回来，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一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才回来。

但是我们中间也有回得早的，他们就参加了抗日。比方说刘英爱，他是武汉人，在武汉跟日本人的飞机对打，把日本人的飞机打下来了以后，自己的飞机也受损，牺牲了。还有的呢，回来以后就参加飞昆明到印度的那个驼峰航线。日本人知道以后，就派飞机从缅甸起飞在中途进行拦截，想把我们的运输机打下来。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有被日本飞机打下来的。老师是我原来在15期培训时的国内教官，东北人，叫闵征杰。我的同学叫夏日升，是湖南益阳人。在驼峰航线上我的同学还死了很多，只不过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了。

惭愧的是我没有参加过抗日，唯一一次打日本人，还是在云南的祥云，当时中国政府在那里修了两个机场：一个叫云南驿机场，另外一个好像叫什么北屯机场⁴。我们的飞机就停在云南驿那边。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派了一个飞行队来，叫志愿飞行队，就是Volunteer，中国人爱喊“飞虎队”。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也停在那里。日本人占领越南以后，想把这条运输线打掉，就经常从越南那边起飞，跑到中国这边来偷袭，他们就是想要搞掉美国人的飞机。为了应对，我们就在机场上放假飞机迷惑敌人。



中美飞行员在P40战机前合影。

有一天下午，警报突然响了，我们就赶快去取武器，当时所有飞行员都配发武器，每人一杆步枪。远远地看见日本人的飞机飞过了前面的山头，然后迅速朝下面俯冲，去打跑道上的木头假飞机。我们就作死地向山上跑，因为山上有保护飞机场的陆军，他们有高射机枪的，一看见飞机飞过来，他们首先开了火。我们一看他们开火了，就都开了枪。日本人的飞机一看中了埋伏，掉头就飞跑了。教官后来同我们讲，那个日本飞机被我们打得冒烟，飞了没好远，就落在弥渡那边的稻田里面去了。

所以，我这个人，从1940年元月份到那个成都军校算起，直到日本人投降，要说抗日，就只有在云南驿这里我是抗日的，其他时候我都没有对日本鬼子打过枪。你们叫我抗战老兵，我真的是不敢当啊，这真的不是谦虚。

“初级飞行是民航教官，到中级飞行才有军航的教官，这点还比不得国内”

我在美国待了有两年多吧。那个时候的日子还是不错的，可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那些相片都搞走了，不然你们可以看看我在那边拍的照片。我们那个飞行训练，整机飞行，毕了业的都会发一个本子的，就跟现在的毕业证一样。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都是罪证啊，我就主动上交了。

在美国的时候，也有一些华侨去慰问我们。不过次数也不是很多，去了也就是给我们带点吃的，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过去的一个省（老人口语，省应为州），叫做Arizona，中文译过来叫亚利桑那省，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学生学飞都是在那里，从初级飞行到中级飞行到高级飞行。在这里培训毕业以后，就要到亚利桑那北面的一个省叫做Colorado，科罗拉多，在科罗拉多那里主要的就是学习战斗机的飞行。像轰炸机那些，也都是在那里学。学完以后才能回国，回国以后就飞战斗机和轰炸机两种。

老实说我的外语水平还是一般，没有你们认为的那么好。但是在美国出门买东西跟人沟通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中国留学生是一批一批来的，我们第五批只来了五十多个人，主要是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海上德国鬼子有潜水艇，船经常被击沉。航空就更不用说了，要过那么多国家，到处都可能会遇到危险。到美国来那就费了八辈子劲。当时我们是从印度的孟买坐的轮船，先要绕道非洲，到了摩洛哥以后，再绕道南非，然后再过好望角，转到大西洋，这才到了纽约上了岸。

在美国的生活跟你们想的也不太一样，其实也就是部队的生活，不是自己在家里过的生活，吃饭都是像现在解放军一样的啦，用铁盘子。美国人的饮食并不很合我们的口味，而且有一样东西吃的非常多，洋芋头，就是土豆，土豆磨成粉，做成面条，就跟我们的方便面一样的，做成一坨坨的用纸盒子装起，吃的时候用牛奶或者什么鬼东西再泡发，这是中午的吃法。晚上会换一些花样，有时土豆杠杠（湘南方言，意指一条条，其实就是土豆条），有时土豆浆糊，好大一缸土豆糊糊放在那里，你经过那个地方炊事员就挖一瓢给你，不管你喜不喜欢。听那些老兵说，一个美国人一年要吃掉一百多斤土豆。所以说土豆还是蛮好的嘞，土豆里面含磷啊。其他的家伙就更没得选了，只能按照美国人的规定搞，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在美国学习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跟美国人在一起玩，就算待在一个飞机舱里面，有美国学生、中国学生、英国学生、法国学生，但是互相之间也是不打交道的。最多互相看一看，点点头就算打了招呼了。平时都是中国学生跟中国学生在一

起玩，外国学生跟外国学生在一起玩。初级培训和中级培训的教官都是美国人，到高级飞行的时候就有几个中国教官了，跟他们交流就亲切得多。初级飞行是民航教官，到中级飞行才有军航的教官，这点还比不得国内，没打仗的时候，在杭州的航校里就都是部队教官，后面到昆明也都是部队的教官，四川一个培训班里连初级飞行都是部队教官。我听他们老兵讲，这些教官都是在新疆由苏联人教的。其实我们的飞行水平还是可以的，主要是飞机不行。

1945年回国以后，第一次开飞机上天，是从印度飞回到成都。回国以后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我们飞行大队就被安排到了上海大昌飞机场。1946年，我们部队有两个飞行员，一个叫刘善本，一个叫张邵怡，他们就开着飞机飞到延安去了。那个时候我也受到了影响，1948年秋天我自动离开上海回了湖南，后来飞行部队到湘潭到处通缉抓人，我就跑到乡下我叔父家里躲了起来，这一躲就是半年。⁵

延伸：我的空中侦察兵经历

文 / 肖伯闻 1915年生于衡阳。1932年，长郡中学毕业后，在药王街裕新公司摄影部学习五年。1937年9月，考入航空委员会（后改为空军委员会）空中侦察摄影班。学成毕业后，任空军军士学校教授科摄影员。现居长沙。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军在华北和上海等地抗日前线浴血苦战，因缺乏当代应有的“空中侦察”，以致不明敌情，攻防处于被动，成了盲目应战，伤亡惨重；因此当局在紧急军事会议上，接受当时在华的德国陆军军事顾问团负责人法肯豪生的建议，尽快建立空中侦察兵种。

当时空中侦察分为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飞机直接在战场上空，由陆军军官中经过训练的侦察员目视正在激烈的战斗情况，侦察敌人的炮火和战车等的布置和整个战场情况，即时直接报告前线指挥官。这种方式得到的情报很粗略，判断难以准确。另一种是空中摄影侦察，在不同时间多次拍摄的照片上，可以具体细致地判断敌情，以及空军出动轰炸战场敌人的技术情况和效果。

德国顾问建议火速建立空中侦察兵种和训练技术人员，并建议请当时在华的意大利空军顾问团帮助。蒋介石命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立即照办，当年九月，航空委员会（后改为空军委员会）组建的空中侦察训练班中的摄影班在南京明故宫飞机场成立，1926年回国的爱国华侨飞行员张子璇被任命为班主任、张学良的东北空军老飞行员孙琰为副主任、留学意大利的航空摄影工程博士钟宝金为教育副官。意大利空军军事顾问团派了六个教官主持授课，翻译教官丁履德（国民党元老丁维汾之子）。

当月在南京、武汉、长沙三地共招学员17名（以执行空中勤务的侦察摄影），和30名学生（以执行冲晒照片的工作）。其中，长沙录取了三名学员（肖伯闻、陈永建、张英煊），10名学生（吴建吾、周国定、吴德明、江仲庸、李寿山、戴光斗、刘南庭、黎润南、余子忠、冉宝）。长沙各照相馆的青年职工，全部都参加了体检和考试。10月中旬，长沙的学员和学生到达武昌，因战线已逼近南京，临时改在武昌石旗营房开学，同时调来的12架道格拉斯和诺司诺甫教练飞机也抵达武昌南湖飞机场。

学员的课程全部按照德国的制式，如空中摄影、照片判读、图片矫正、大幅拼图、漂白制图、空中立体摄影、快速冲洗、光学物理计算和感光化学等学科。空中摄影机实习采用美国一卷胶片能拍200张的10寸“K3B”、6寸“F8”及苏联“衣4”等空中摄影机。原规定两年学习完成，因战争紧迫，急需缩短学习时间，因此取消休假，加之

敌机时来空袭，机场就是前线，时刻准备疏散防空，如是学习和生活以及心情，整天不分日夜均在极度紧张气氛之中。当时值得鼓舞的是苏联空军志愿队，百余架E15和E16型战斗机适时来武汉支援，首次空战即击落日本零式战机十余架，大获全胜，举国欢庆，我们的课程中1938年增加了俄语课，以应在机场内工作的需要。

1937年12月初，日寇进攻南京，立即需要进行保卫武汉，侦查班紧急迁到重庆广阳坝飞机场，同时意大利教官都回国了，由曾留学国外的教官如钟宝金、朱思玉等继续上课。重庆宣布为陪都，开始被敌机频繁轰炸，我班夜里点煤气灯上课，学习日益紧急。

1938年3月，侦查班的另一个班开学，学员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2期刚毕业的军官（黄埔系当时最精锐的）40名，学习了约两个月便分派了；摄影班至1938年10月才毕业，毕业考试时我的成绩是术科第一名，学科第六名，这是因为我在入学之前就已有五年的摄影经历。毕业后的第二天空袭中炸死学员邓其光一名和学生二名，数人受伤，我也险些被炸。

我被分派到四川遂宁县飞机场的轰炸总队见习。当时我国的轰炸机有美国的“马丁”、德国的“姆斯”、苏联的SB与TB等。轰炸机队执行轰炸任务时，除驾驶员外还配备领航员、轰炸员、通信员、摄影员、机枪射手等。见习期满后，1939年2月，转派到新建立的成都太平寺机场的空军军士学校见习，该校为战时训练速成单项战斗机飞行员而设，学期较短以应急用。4月，我被正式委任该校教授科的摄影员，同时建立摄影室，配备整套器材和暗房仓库等，并派技士王开域、林建河、张兴汉三人和士兵五名，主要辅助教学和记录学生学习作战技术资料，如学生使用“摄影枪”以代替实弹机关枪训练攻击，和各飞机场的配备空摄地图，坠机事故的现场记录等。该校校长是蒋介石，第一任教育长是王琮，第二任是王叔铭（黄埔一期，留学苏联），第三任是刘炯光。

1941年3月，我因为胃病住院，久病未愈，只好回家休养，从此脱离空军。我在空军总计服役了三年半。

¹. 蓝田地处湘中，为涟水发源地。抗战时期，因地处后方腹地，因而成为了众多学校的迁徙之地。 ↪

². 文中所指的本校指黄埔军校。该校于1924年6月16日在广州成立，后因北伐迁至武汉，宁汉合流后，又迁至南京。1937年8月，因战事黄埔军校迁出南京，1938年11月，迁抵成都。抗战爆发后，黄埔军校在全国开办了多所分校，为了区分，人们习惯性称成都分校为本校。 ↪

³. 日军占领越南后，经常从越南起飞空袭昆明，起初中国方面还能勉力接战，由航校的教官驾机截击，但我方的飞机多为苏联造的E15、E16型战机，飞行高度不够，无法对抗日军的零式驱逐机。后昆明航校被日军炸毁，制空权为日军掌握。在此情况下，陈纳德返美后，推动美国政府与中国方面的合作，因为当时美日还有外交关系，所以只能通过租借法案进行合作。一方面中国选派航校学员去美国接受培训，培训地点为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城；另一方面，陈纳德组织100架P-40战机援华参战。所有的费用都由租借货款支付。这就是留美飞行员的由来。由于交通及人选问题，留美飞行员是分批次出发的，总共有12期学员，分成两批赴美，每批50人。 ↪

⁴.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经在此修筑了两个机场：云南驿机场和北屯机场。云南驿军用机场在祥云县下川坝云南驿古镇至旧日站村之间，占地约260亩，有用粗石砂铺就的跑道和停机坪。机场建成后，国民党航空部队第38站建立并由守备团、宪兵团、高炮连等三类地勤兵种分工协作，进行机场的维修保护，建制比较完善。1941年，美军第14航空队的25战斗机队和第23运输机队各类飞机两百余架进驻该机场。 ↪

⁵. 抗战后的事情，李启炽自述“我虽然惨，还算是幸运的”。1949年8月，他参加了测量队，后来考上了湖南医专。那个搞了一架飞机飞到延安的刘善本，后面又到东北的航空学校当校长，也死了。1956年肃反运动时，组织上给我下了结论，属于95%以内的好人，就是已经搞清了，我是清白人。”他现在身体不错，还能担两桶水下楼梯，每天都要静坐，常吃鱼，他还说，“这个人啊，就像一盆花，你要浇水，但是不要浇开水”。 ↪

宪兵：他眼中最后的南京

即使用最挑剔的眼光，周义云都绝对是一位标准的美男子，大眼高鼻，坐在小板凳上还是身板挺直，像一尊线条干净有力的雕像。

门前堆着的枯枝和树叶，应该是周义云留着过冬的柴火，他身后的土砖房上开有西个窗，用胶带纸与塑料布紧紧粘着，在冬天微暖的阳光下，像两个陈旧的伤疤。在得知来意后，老人警惕地示意儿子，对我们的身份进行核查¹。在确认无误后，长时间问沉默的老人，终于开始了他的讲述。

作为国民政府的第一代特种宪兵²，周义云通过了纳粹冲锋队王牌教官勃罗姆的残酷训练³。在这次训练中，有4000名士兵被淘汰，剩下的人在1937年全部投入到了南京保卫战。跟以往的认知不同，南京并不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共有6400名宪兵投身这场战斗。1937年12月10日至12日的城外防御战中，曾给日军以重创。城破之后，幸存下来的宪兵只有四百多人⁴。12日晚，从南京跳江突围后，周义云回到长沙太平街做起了生意。因时局不稳，最终再次投身行伍。解放后的事情，老人用一句“那何事（方言：怎么）讲得清”一语带过。



口述人 / 周义云，1918年农历十月初五出生，原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宪兵特务营迫击炮连士兵，现住汨罗三姊桥。说起50多岁的女儿，“跟我年轻时一样，长得几乎一样的，可惜一直单身”，老人一声叹息。

采集人 / 李桦 采集时间 / 2014年1月15日

“他那种想哭买不出，想笑笑不出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会出现在我眼前”

为什么当宪兵啊，不为别的，宪兵威风啊，见官大三级。我从小就喜欢诗词歌赋，小时候上过私塾，读过《幼学》《唐诗》，记性又好，一直到读完初小，都没挨过老师的骂，打就更没有了。后来去湘潭当学徒。16岁时，宪兵学校在湘潭招考，我就去报了名，好多人去考，考上的不多，不过我考上了，那还是很有牛皮的。

1937年，接到撤退的命令时，我还在光华门那里，连长指挥我们沿着马路两边堆沙包，说是准备巷战。还没堆完，我就趴在沙包上睡着了。你要晓得，从9号开始，三天三夜老子就没合过眼，那个困啊，你想都想不到。估计睡下还没有十几分钟，

就听见有好多人在喊：“撤退啦，撤退啦。”那声音跟打雷一样我立马醒了。这时，我就看见营里的传令兵，扯着嗓子，在那里做死地喊，跑得好快就跟有子弹追一样。

奇怪的是，听到撤退，所有的人都不兴奋，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呆呆地站在那里，特别是连长，脸上有一种古怪的表情。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只要一想起他，他那种想哭哭不出，想笑笑不出的样子，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当时也愣了一下，但是脑壳里立马反应了过来，我知道，肯定要出大事了，了不得难了（方言，指解决不了的麻烦）。

为什么这样说啊？因为，我们虽然是宪兵，但是都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培训。对南京的战场态势，我们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明白得很。10号那天，日本人两次用炸药炸破了光华门的城墙，还冲了进来，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后退，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决不能让他们进城。你想啊，整个南京的东、南、西三面都被包围了，只有北面还空着。但北面你敢去啊？那是长江！因此，大家就玩了命地打，因为城一破大家都要死。打到晚上时，我们把冲进来的日本人都消灭了，只有小部分日本人还躲在门洞里向我们打冷枪。我们在上面，枪打不到他们，扔手榴弹又扔不进去，最气人的是，我们的人在上面一露头，他们就开枪。最后，我们搞了两个汽油桶砸下去，把敢死队吊下去扔手榴弹，把那些日本人都烧死了。现在来喊撤退，一定是其他的地方被日本人冲进来了。因为，我们的阵地离市中心还有一段距离，退路很容易被日本人截断，大家反应过来后，立马就开始慌乱了。

“有当兵的脱下自己的绑腿想从城墙上吊下去，跌死好多”

跑到中山北路时，路上就到处是人了，有老百姓，也有士兵。我们宪兵的纪律还是很严的，到鼓楼时，我们都还是排着队的，而且还带着迫击炮。结果一进山西路，那就全部乱了套，我当时都吓住了，只看见数不清的人，像发了疯一样地向下关的方向跑去，就像是一股洪水，你根本不用动，别人就会推着你跑。一眨眼的功夫，整个连队就散了。我跟我们班的几个人，离得近就还跑在一起。

往江边的路上，那情况就稀烂的（长沙方言，指非常糟糕），四路子（长沙方言，指到处都是）都可以看到，被丢弃的来复枪、机枪，军用皮带、军装，甚至还有汽车和迫击炮，到哪里都是火，跟探照灯一样照得好像是白天。好不容易跑到挹江门，这个地方的人就更多了，脚都踩不下地。本来挹江门有三个门洞，现在被封了两个，只剩下中间的一个，而且守备的部队还架设了机枪，不让通过。他们是宋希濂的部队，他们说没有接到上峰要求撤退的命令，就是不肯开门。我的个天，几万人堵在那里，你挤我，我挤你，你推我，我推你。就那样互相挤，互相推，就跟发了疯一样。

我那时只有19岁，人又长得高大，快要挤到门边，我就听见了枪声，是出城的士兵跟守城的36师打了起来⁵。枪一响，人就更乱了，我看到好多人，脱下自己的绑腿想从城墙上吊下去，跌死好多。靠门洞边的好多人被挤倒，爬不起来的就被踩死了，一层又一层，起码有四五层，那恐怕死了有几千人。我们班的几个人，受的训练不一样，比其他的人还是厉害些，都还冲了出来。

跑到码头上一看，冇得（方言，没有的意思）一条船，一条都冇得，那又是冬天，江水好冷勒，冷得刺骨。往回跑，又全部是人，根本跑不动。站在江边，后面的人又会把你挤下长江去。那天晚上的风又大，风大浪就大，胆子小的人，根本不敢下水。江面上日本人的军舰又在开炮，有13艘。天上面，日本人的飞机又在轰炸，又是扫射。那是好惨的，就跟割韭菜一样，人一排排地死。飞机一来，好多人就往长江里面跳，一跳下去浪头一打就没看见人了，有的人就灵泛些，不晓得从哪里搞的

木头盆，木头，还有门板，跳下去顺水漂，班长就是在江边被日本人打死的。我们当时还想帮他报仇，向日本人的军舰开炮，人太多、太乱，没法打嘞，没办法，只好把炮丢到江里去。我们的炮是德国的82迫击炮，好可惜的。我下水的时候，城门那边机枪响得好凶哒。下去之后，我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看到，就只是看到冲天的大火。



日军绘制的南京城攻略图。资料图

我在江边长大的，水性好。我们七个人，搞了两根杉树，泡在水里一直向下漂，漂了有十几里，才到对岸，上岸时只有三个人了，其他的都被日本人的飞机扫射打死了⁷。我上岸后，经平汉铁路，过蚌埠，到徐州，跑到郑州后，又由汉口回了长沙。

回到长沙后，没有事做，我就跟我爷老子学做生意，我爷老子以前也是经商的，后来在太平街开了一间旅馆，叫新长记。1941年前后，长沙时局不稳，生意跨下的（长沙方言，泛指非常糟糕），我最后还是回到了部队，跑到77师做了一名文书。在常德桃源一线守仓库。除了1943年的那次轰炸，那是农历九月，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有二十几架，在常德投了好多旧衣裤、烂棉絮、破毛毯⁸。开始还好，几天以后，好多人得病，说是鼠疫，死了不少人。总体来说，日子还是安逸。

现在的事情就不讲了吧，那何事讲得清，也有办法讲得清啊。就跟唐生智一样，你怪得他啊，他根本没得亲信，指挥不动。哎，你不晓得咧，老子那时打战好猛的嘞，没想过别的，就是想搞死他们一两个日本人，我嫌哒他的娘。

1. 周义云因为国民党士兵的身份，在历次运动中遭受了多次冲击，因此对陌生人有着天生的警惕，直到今天这个习惯依然根深蒂固。 ↵
2. 宪兵是舶来词汇。本质上是陆军的一个兵科，独立运作，但不受陆军管辖，而是由宪兵司令部所管辖。1923年，孙中山正式创建宪兵，并制定了宪兵章程19条，规定宪兵领章为白色，隶属于陆军部。1924年，黄埔军校从第二期开始设立宪兵科。特种宪兵是指当时国民政府的卫戍部队，始成立于1933年。 ↵
3. 1933年国民政府与德国陆军开始紧密合作后，有很多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德军教官来到中国培训国民党军士兵。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大量装备德式师，到1936年时，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及国民党军36D、87D、88D都已换装，卫戍宪兵当然也已经换装了德式装备。在周义云的口述中，他也提到自己用的是德式82迫击炮。不管怎样，这支由德国人训练的卫戍部队，战斗力应是非常强悍。 ↵
4. 南京保卫战中宪兵的伤亡人数有多种版本，中日双方的统计相差近一千人，取台湾出版的《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中国宪兵史略述》里的数字，南京保卫战中，共有6492名宪兵参战。其中死亡1511人，失踪3584人，负伤456人。 ↵
5. 当时36师是宋希濂的部队，负责守卫下关码头。由于缺少必要的组织，导致出城的部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但守城的部队没接到命令。进出双方在当时的形势下，最终爆发了兄弟部队的火拼，酿成惨案。 ↵
6. 南京保卫战前，总司令唐生智为了鼓舞士气，表示死守南京的决心，下令将所有的渡江船只实行军管，有的被烧毁，有的被转移。结果，后来死守不成决定撤退时，下关码头竟然无船可用。这个命令导致很多士兵在冰冷的江水中丧生。 ↵
7. 文中提到的情节，在另一个南京保卫战亲历者陈德兴的回忆录中亦可得到佐证：“南京城下，我军四面楚歌，三军溃散。自古兵败如山倒，其惨败之情，难以形容。临下关江边，轻重武器，抛弃四郊，人山人海，淼淼长江，船只全无，非渡江不能保全性命。于是冒万险，揽独木渡长江，任波浪之漂流，如此危境，共患难官兵漂泊满江，顺流而下，几近镇江。在敌舰机枪扫射下，罹难死于江中，在腊月寒天，冻死殒命者，尚难数计。” ↵
8. 文中提到的这段，其实是指常德会战前，日军在农历九月对常德地区实行的细菌战。 ↵

炮兵：一个炮弹48公斤

叶菊明与父京叶书庭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父京在铜官做了一辈子的窑工，困窘到连6个儿子都无法养活，甚至于30公里外的长沙城“至死都没能去看上一眼”。只上了4年小学的叶菊明，骨子里秉承了父亲的朴实，胆子却大得多，10岁就开始外出“混饭吃”。

叶菊明14岁就自找窍门去了军队，本想“混饭吃”的他，居然“混进”了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支机械化部队之一的重炮第一旅¹。下衡阳、过广西、出贵州、入云南，差一点就出国去了缅甸。

从1941年开始，开着“10个轮子的大卡车”一直游走在西南诸省。在贵州，“看见9字头的车，冇人敢查”。为此叶菊明有时甚至以“一次一万块”的高价帮人走私带“黄鱼”²。

1938年的文夕大火，让14岁的叶菊明开始了自己的抗战。多年的军旅生涯，叶菊明最爱的是抽烟，现在一天一包软白沙，“管得住”，酒也没戒掉，但奇怪的是身板却非常硬朗。“我细时候练过一点把式，前几年家里进了贼。差点被我抓住了，”生性腼腆的叶菊明不愿意当众露两手，不过话却说得非常豪气，“湘雅医院就是我们旅打的”。³



口述人 /叶菊明，1924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出生于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中山村叶家老屋。14岁时因为“混饭吃”去衡阳当了看护兵，后加入野战重炮第一旅，任独立机槭化炮兵第十团第一营副官。内战爆发前，对军旅生涯已觉索然无味的他回乡务农。现在，年过90的叶菊明身板硬朗，烟酒均沾，有时偶尔还下地干点农活。

采集人 /李桦 **采集时间 /**2014年1月2日

“在驾驶连搞了6个月，开的是10个轮子的GMC”

长沙大火（1938年11月13日）那年，我14岁。乡下到处都在抽丁，我那时年纪小，就找了点窍门。刚好在衡阳62兵站医院当医生的同乡叶德宏回老屋探亲，他就跟我爷老倌（长沙方言，父亲）讲，既然家里搞不下地（长沙方言，指一件事虽经多方努力，但仍无法解决），要不就介绍我去当兵，好歹也能混口饭吃。我爷老倌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到衡阳后，在62兵站医院当看护兵，当了两年。我那时年纪小，那些伤兵都不怎么为难我，有时让我帮他们去买东西吃，也让我吃一点。对其他的人，伤兵的态度那是有蛮恶的，动不动就骂人，打人，还摔东西。伤兵主要是从九战区的前线下来的，也不是每天都有，间常子来，一次怕有几十个。搞了两年以后，刚好36步兵处招人，我就偷偷去报了名，因为怕我爷老倌晓得，我屋里虽然弟兄多，但是我爷老倌还是不想我上前线。后来我就被分配在炮兵第一旅的补充营。当时补充营下面有三个连：一个是步兵连，一个是通讯连，一个是驾驶连，我是在驾驶连。

在驾驶连我搞了6个月，开美国的GMC，10个轮子的大卡车。车还好开，就是那里的条件太硕哒（长沙方言，很差）。训练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开20根杆子，就是那种电线杆子，大概一百多米，就要停下来换人。不过在驾驶连玩还是好玩些，比其他连轻松点。新兵连的时候，跟其他连一样，晚上我们也要轮流站岗。有一天轮到我站岗时，我们补充营的营长就过来摸哨，那营长是关外人，长得蛮高大的。我看到有影子，就喊哒一声：“哪个？”那个影子冇出声，我就赶快往旁边一跳。站岗是有套路的，不能呆站在一个地方，我一边跳开，一边把枪上膛。一般喊第二声，还有人答应的话，就可以开枪哒。这时营长就讲是他。第二天开会，他就跟别人表扬我胆子大，反应快，说这个小鬼蛮厉害的，其实我当时也是怕得要死。

当时新兵连也是要考试的，15名以内才能毕业，我考了第13名。考试的时候，上去就要背歌⁴，背不出来就用竹篾片打，前村吴三伢子的爷老子就是被打跑的。毕业后我就去了炮十团，按照当时的规定，前13名直接分到炮十团⁵，其他的人分到其他的团。我们团是直属于炮兵第一旅的，旅长是彭孟缉⁶。还有一个团就是打湘雅医院的炮十四团。

“一个连只配三门炮，三发炮弹打不中，连长就不要搞了”

我们一个团是24门炮，全国这样的炮只有48门⁷。一门炮有六吨半重，每次行军就挂在牵引车后面，用车拖起跑。一个连是三门炮⁸，基本上是一个排一门炮，那炮的口径就大啊！估计有海碗那么粗，那个炮弹一个都有48公斤，96斤重，又打得远，可以打30华里远。我们都是分散的，分到每个战区，比方说九战区就是4连，还有一部分派去打滇缅路去了。那时我们的炮好金贵的，一个连只配三门炮，三发炮弹打不中，连长就不要当了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炮十团的连长还是蛮好搞的，打仗的时候又安全。他们主要是观测，就好像我们现在要打铜官，连长起码要跑到离阵地十几里的地方去设观测哨，那还是难得被打死。最麻烦的是撤退。每次撤退时，步兵要先冲锋攻击30分钟，掩护我们撤退，不过麻烦的是，如果路炸毁了，就撤不出去了¹⁰。一般撤不出去的时候，我们也会炸路，路一炸，别个也拖不走这些炮。岳麓山上的那几门炮，就是路被日本人炸了，结果撤不下来了，后来日本人缴获这些炮后，还用油布把这些炮都裹了起来。抗战胜利后我还去岳麓山上看过。后来那些重炮都搞到镇江、江阴那边去做要塞炮¹¹去了，主要是封锁长江。



“32倍15榴”远程榴弹炮。

我进炮十团的时候，一开始就在团部。后面边打边撤，就退到了贵州，后面又把我调到了炮十四团。打滇缅路时，我主要就是负责运输，从贵阳先到昆明，再从昆明去保山，缅甸我就有去哒。总的来讲我在贵阳待得最久。有一天冇事做，就在街上走，结果碰到了老营长王升，他刚升为炮十团的副团长，他要我到他那里去，我其实行答应，但是他从团部下了调令，就又把我调回了炮十团，在第一营当副官。要讲那时日子也还过得，当时全国只有两支机械化部队，一个是杜聿明的第五军¹²，一个就是我们，我们的车在路上，从来冇人敢查。那个时候，只要是看见7字头和9字头的车，冇人敢碰，第五军杜聿明的是7字头，我们第一旅是9字头，没人敢管的。有时从贵州去云南，路上也带点“黄鱼”，一次就收一万块，出了事算我的。抗战胜利后，又让我去53军，我就不想去了，你想啊，我都当了六年兵了，冇味哒。我就回家了。

¹. 重炮第一旅是国民政府的第一支机械化重炮兵部队。1934年，国民政府开始筹建新型重榴弹炮部队，最后选定了由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生产的“32倍15榴”榴弹炮，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第一支机械化重炮兵团，序列为第十团。1937年，第二批“30倍15榴”到货后，又成立了炮兵第十四团。抗战开始后，因炮兵损失严重，国民政府对炮兵进行了重组，第一旅下辖两个团，一个是第十团，一个是第十四团。 ↪

². “黄鱼”原意指金条，后被广泛引申为走私物品。 ↪

³. 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时，中国守军在长沙城北以湘雅医院为火力支撑点，在麻园岭构筑了外围阵地，战前对长沙周边进行了标尺测量，并制成二万五千分之一的标点图。长沙城北的参照物，是当时的湘雅医院的红楼。攻城战打响后，日军一度攻入城北，并占领了湘雅医院。在守军的请求下，部署在岳麓山上的重榴弹炮，对湘雅医院进行了火力覆盖，日军被逼撤退，伤亡惨重。 ↪

⁴. 教官为了便于士兵记忆，将操作要领编成了歌。 ↪

⁵. 老人这样说是的原因，因为炮兵第十团装备的重炮是“32倍15榴”，比第十四团装备的“30倍15榴”射程要远，因此在缺乏重火力的国军体系里，第十团的地位比第十四团的地位要高，连人选上也要优先。 ↪

⁶. 彭孟缉，近代中国军史上炮兵三杰之一，生于1908年，1926年入黄埔五期，1928年赴日本野战炮兵学校进修。1937年任陆军独立炮兵第十团（机械化重炮团）团长，1943年任炮兵第一旅旅长，1997年在台湾去世。 ↵

⁷. 指从德国进口的重型榴弹炮，全称是：Schwere Feld Haubize18.18表示1918年设计定型，有的也简称SFH18。该炮由德国开发，S是德语中远程的开头字母。这些炮当时花费了国民政府的巨资，由于没有足够的外汇，部分货款是以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的，中国政府为此向德国提供了数量极为庞大的蚕丝、布匹、锡矿等紧俏物资。军政部因此下令，在每门炮的炮身上贴有铭牌，上书：“人民血汗，小心爱护。”第一旅下辖的两个团，分别配属有SFH18/32L和SFH18/30L这两个型号的重型榴弹炮各24门。到1943年，这48门炮就只有20门能打了。1947年，剩下的这些重炮，被运到江阴、镇江一线作要塞炮。现在全中国就仅剩下一门SFH18/32L，保存在南京理工大学的仓库里。 ↵

⁸. 炮兵最初的建制是一个团下辖三个营，一个营下辖两个连，每连四门炮，但随着战事的进行，炮兵损失严重，到抗战中期时，已变成了每连三门炮，到后期时，有时一个连就只有两门炮了。 ↵

⁹. 国民政府最初从德国只采购了2.4万发炮弹，抗战爆发后，虽然通过第三方贸易又向德国采购了6000枚炮弹，但依然不能满足需要，炮弹显得特别金贵。据湖南文史档案记载，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数次攻入城内，情况危急，守军请求岳麓山上的重炮进行炮火压制，因弹药紧缺，直到最后关头，重炮才开了炮。后战事一度胶着，第九战区指挥部急电重庆，要求弹药支援，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弹药尚在途中，待运。”由此可见弹药的珍贵。 ↵

¹⁰. 这些重榴弹炮的确是太重了，没有牵引车的牵引根本没有办法撤出战场。比如，淞沪会战时，彭孟缉率炮十团参战，虽然给予了日军重创，但其在撤退时，因为日军在公路桥上埋了地雷，重炮无法通行，只能忍痛将其推入河中。 ↵

¹¹. 设置在要塞上的重型火炮，能保护重要的永久性工事。抗战胜利后，国军的重炮基本换装为美式火炮，但这些德式重炮，因为火力强大、射程远，也没有被淘汰，而是放在了长江江防要塞上，用来封锁江面。 ↵

¹². 第五军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支机械化兵团。该军在杜聿明率治下表现达到顶峰，200师是其中的核心骨干。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表现出色，后被抽调入缅作战，在缅甸损失惨重。第五军装备精良，主要装备有苏制T-26坦克80余辆、德制“豪须”装甲车100辆、美制福特卡车400多辆、摩托车40多辆。军属重炮团拥有150毫米榴弹炮24门，各师均配有大量的山炮、野炮。这样的装备，在抗战中前期中国军队中是首屈一指的。 ↵

潜伏者：至今不轻易吐露身份

“我的一生充满了宿命的冲突”。语文老师肖若霖说。这位抗战时期的军统¹ 谍报员以不向外人吐露他的秘密身份。“含着金钥匙”在长沙南门口出生，却因战乱四处漂泊。想逃离前线，却鬼使神差去了最前线，搞潜伏、暗杀。1948年春天，背着电台从被解放军包围得水泄不通的临汾城成功出逃，却在一年后潜伏回长沙时，因为喝洒酒叙旧“被同学出卖”束手就擒。一个老牌的军统，潜伏的时间竟然没有超过48小时。而且是在他从小长大的城市。

肖若霖讳莫如深的国民党军统局创立于1938年，由“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人物之一”的戴笠所领导。据军统破译专家迟步洲回忆，专事破译的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最鼎盛时也只不过一百多人；整个抗战期间，经过专业训练的谍报人员仅有三千多人；而真正接受特训潜伏到敌占区的谍报人员就更少了，约五百人左右。

现在只要是出太阳的日子，肖若霖都会让保姆把轮椅推到阳台上，一个人静静地看着远方发呆。透过高楼间稀疏的空隙，远处的田野灰蒙蒙的一片，就像他尘封了九十多年记忆。



口述人 /肖若霖，1924年农历七月初四出生于长沙南门口，生肖属鼠²。1941年，长沙时局紧张，为躲避危险，他报考了远在后方的军令部第二厅无线电培训班。毕业后，通过审核的他，奉命到陕南与豫西一带搞潜伏与情报。抗战胜利后，肖若霖晋升为“临汾站120分台台长”。1948年，临汾战役中，他冒死爬下15米高的城墙，渡汾河得以逃脱。1949年底，回长沙潜伏，被同学举报后投诚。1949年后，“因为我有立功表现，运动中都是正面教材，没受什么冲击。我家里的人，还有单位上的人，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只有政府里的几个人知道”。现由保姆照顾起居的肖若霖，退休前是长沙市㮾梨镇中学语文老师。

采集人 /李桦 **采集时间 /**2015年3月19日

“你不要以为不危险，蛮危险的，敌人也在搜我们”

我爷爷是湘潭的，哪一年到长沙经商的，我倒是记不蛮清了，反正我是正宗的长沙人。小时候住在南门口，家里蛮有钱的。当年长沙只有两个大的建材铺，北门一个，南门一个，南门那个就是我家的。店的名字就叫“肖协泰石灰砖瓦行”，专卖石灰和沙子，那个时候没有水泥。

1938年，文夕大火。我家里背时，烧光了。起火前我们全家就跟丁公和酱园的亲戚一起跑到我外婆家去了，回到长沙后，家里全部家当都烧光了。我记得，废墟上只有一个打糍粑的石臼还在，但也没用了。

1941年，长沙的形势好紧张的，我爷老子（方言，指父亲）就想让我躲到外地去。我爷老子是我屋里的另类，我屋里生意做得蛮大的，但是他从西安的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就进了电报局，后来当了常德电报局的局长。我听他这么说，就想干脆去考学。当时有两所学校招生，一所在湖南衡阳，另一所在重庆綦江。我爷老子跟我讲，长沙如果守不住，衡阳也不安全，到时又要跑，重庆的话就要安全得多，因为日本人离得比较远。我就去考了重庆，当时学无线电外语要好，我外语其实不好，也就是去试一试，没想到，我还考上了，学校叫什么名字不记得啦，只记得是：军令部第二厅无线电培训班。³

先搞了三个月的步兵操典，接着就学习电报的收发。我跟你说，电报机有两种，一种是人工，一种是自动，发送也是两种，一种是有线发送，一种是无线发达。你们不晓得，我跟你说，你就清白（清楚）了。人工电报机就是由人来按动电键，使电键接点开闭，形成“点”“划”和“间隔”信号，经电路传输出去，收报端那一头接到这种信号后，便控制音响振荡器产生出“嘀”“嗒”声，“嘀”声为“点”，“嗒”声为“划”，供收报员收听抄报。无线通信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发报端除有发报电键外，还必须要有发射机，要把电键发出的信号变换成高频载波信号，才能发送出去。在接收那一头，除了耳机外，还一定要有接收机，它将信号接收下来，再供人工收听抄报。



位于昆明的步兵训练中心，学生兵正在操作一台SCR-284战地收发报机。

毕业后，我就分配到了陕南和豫西一带⁴。搞什么啊？搞潜伏。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搜电台，搜日本人的，也搜伪军的。三班倒，全大候的侦测，还要根据侦测到的功率，判断敌后的方位。你不要以为不危险，蛮危险的，敌人也在搜我们，搜到了，就不得了了，那密码就有可能泄密。明码无所谓，关键是密码。

要说我们的功劳，那还是有的，我们有一次端掉了日军在豫西的一个电台，那些电文和资料拖了三车才拖完，拖到西安去破译。还有一次，就是那个盟军的威尔士亲王号军舰，当时我们已截获了日军的电报，还破译出来了，不过时间太紧了，等我们通知到盟军时，日本人的飞机已经起飞到了军舰的上空，后面那艘军舰被日军搞沉了。⁵

除了搞电台，也搞点别的。间常子（偶尔）也去搞一下暗杀⁶。抗战胜利时，我们电台的人最先晓得，那高兴得不行，搞了两个晚上没睡觉。搞什么啊？庆祝啊，喝酒啊。

1949年底，也可能是1950年初，我奉命潜伏回长沙。那就真的没想到，我当时带了一个小电台，一支左轮枪。刚下车，就碰到了我的一个发小，叫陈毓麟⁷。他是地下党，我的情况他都知道，哪里晓得他是共产党，见了面，那就高兴啊。我们还跑到年站边上找了一家小酒馆，喝酒叙旧，连家都没有回。第二天早上，刚起床，他来叫门，我一看后面有两个兵，我就晓得有路哒。我就让他在旅馆等我，说要回去看一下我的母亲。他点了点头，要我12点之前要回来。我把从西安给母亲带的点心送回家，回来就起义了。恨倒是不恨他，时势如此。

¹. 军统（BIS）是中国国民党设立的一个特务组织，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架构体系，一般是五级制，依次是：局、区、站、组、队。组是军统的最基本单位，大致分为：普通组、潜伏组、行动组、策反组、随军组、防谍组。 ↵

². 肖若霖在口述过程中，多次提及命理学说对其一生的影响。他将生命中很多无奈的事归结为宿命。1924年是闰年，岁甲子，五行属海中金，屋上之鼠。按照中国的命理传统，这一年出生的人，为人伶俐聪明，但学业上不会有太多成就，做事往往会有始无终。 ↵

³. 全面抗战之前，戴笠就开始举办小型培训班，如上海附近的青浦班、松训班，湖南的临澧训练班等。肖若霖提到的培训班，从其口述判断，应隶属于渝训班中的特训班。培训班主要分为：情报、行动、警报、外事和电讯等几类。肖若霖参加的是电讯培训班，学员首先要接受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之后被分入四个系：情报系、行动系、警政系和电讯系，特训班会将情报系和行动系合为秘密工作系。他们要学习情报学、化妆术、侦查术、密码、密写、武器使用、爆破、毒物学、测量、筑城学、战术学、擒拿术等科目；专业则以学习电学和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为主。像肖若霖这种负责潜伏的工作人员，是真正的“谍中谍”，挑选尤其严格。第二次深度走访时，肖若霖曾说：“毕业时，教官亲自跟我说，当年学校曾派人到长沙调查过我”。 ↵

⁴. 文中肖若霖提到的这一区域为军统西北局所辖。军统最初活动重点在长江流域东南各省，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之后，军统立即在西安设立了军统局西北局，以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情报活动。以西安为中心，陕西、甘肃两省为主要环节。此后，陆续成立了五个省站一级的组织，其中包括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无线电设备方面，军统局从1935年起在西安设立了无线电支台，各地组织的无线电分台，经常保持在二三十座。 ↵

⁵. 1941年下半年，军统侦测得知日军将在马来西亚登陆。12月4日，军统判定日军发现了抵达新加坡的英舰，但在向英军传递情报时，却受到了日军的疯狂阻截。12月10日通知到盟军时，日海军第22航空战队已在关丹东南的海域发现了英舰，并迅速将其击沉。英国首相丘吉尔接报后哀叹：这是我一生中最沉重和最痛苦的打击。但奇怪的是，二战结束后，日军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坚持认为电报是美军破译的。 ↪

⁶. 暗杀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沦陷区行刺敌伪汉奸等特定目标，二是有时也会对前去延安的进步学生进行绑架和杀害。 ↪

⁷. 陈毓麟是肖若霖的同学，也是富家子弟，两人在学生时代的关系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从学校分开后，肖若霖加入了军统，并潜伏到第一线去抗日：陈毓麟则留在了家乡，加入了地下党。长沙解放时，陈毓麟已是共产党的一名中层干部，后来还当了湖南省的人大代表。“文革”期间，还去梨园中学看望过肖若霖，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两人再无联系。 ↪

防空兵：有些装备，你们见都没见过

也许是在无线电监测站待久了，又或许是因为在监狱里待了28年¹，现在的房可吉总是很安静，大部分时间待在二楼的房间里看书，不太爱下楼。此刻，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全身上下干干净净，清瘦的脸上带着一抹笑容。对于过往，这位年轻时口想“干点大事”的人，也只是淡然地说：“我其实好聪明的，别人都不知道。虽然在监狱待了那么久，但毕竟没有受到外面那样大的冲击，也没有连累家人，特别是肉体上少遭了很多罪。”

相对于房可吉的安静，1949年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刘建白，退休后的爱好与应酬依然很多，志愿者告诉他，抗战老兵有钱发时，他爽快地说：“留给别人吧，给我，我就交党费。”

1938年，武汉空战后，国民政府的空军基本消耗殆尽，侵华日军完全掌握了空中主动权。对国民政府的防空部队而言，这一时期的策略就是消极防空²，最大限度提高空袭预警率，并通过周密的组织，将人员与物资的损失降到最低。房可吉与刘建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们各自的抗战。



口述人 /房可吉，1927年农历五月初九出生，湖南宁远县太平乡新白土村人。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防空情报六总台120分台无线电通信队通信兵，主要职责是在湘黔边界的玉屏，监视飞往“陪都”重庆与“飞虎队”驻地怀化芷江的航线。在长沙市第一监狱待了28年后，房可吉在长沙市近郊的洪山桥安了家。75岁时，房可吉还踩着三轮车去三十几里外的高桥大市场进货。随着万家丽路的扩建，拿到拆迁补偿款的房可吉跟儿子住在月湖大市场的安置房里。

采集人 /李桦 **采集时间 /**2013年12月17日

“国产的这个家伙天线有35米高，一点都不保密”

我是在四分校³学的无线电。当时在41师当师长的大表兄李资⁴，为了我既可以不用上前线去冒险，又可以稳妥地谋到一个前程，在给我的回信中，强烈建议我去考军校，当时湖南武冈有个二分校⁵，主要培训的是步科，但是步科上前线的可能性太大，所以他强烈要求我去投考四分校。

我给他写信大概是在1942年前后，我差不多15岁，离了老屋“司马第”⁶，先是跟着本家大哥房可圣去祁阳黎家坪投靠表哥李直，他在陆军第52野战医院当政治处主任，分管后勤。在医院里干了快3个月，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当时年纪小，一心想

干点大事。就写信给了大表兄，后来他就委托我的表嫂以九战区最高长官薛岳的名义⁷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四分校，就这样我从长沙去了广西，当时四分校已经从桂林迁到了广西的怀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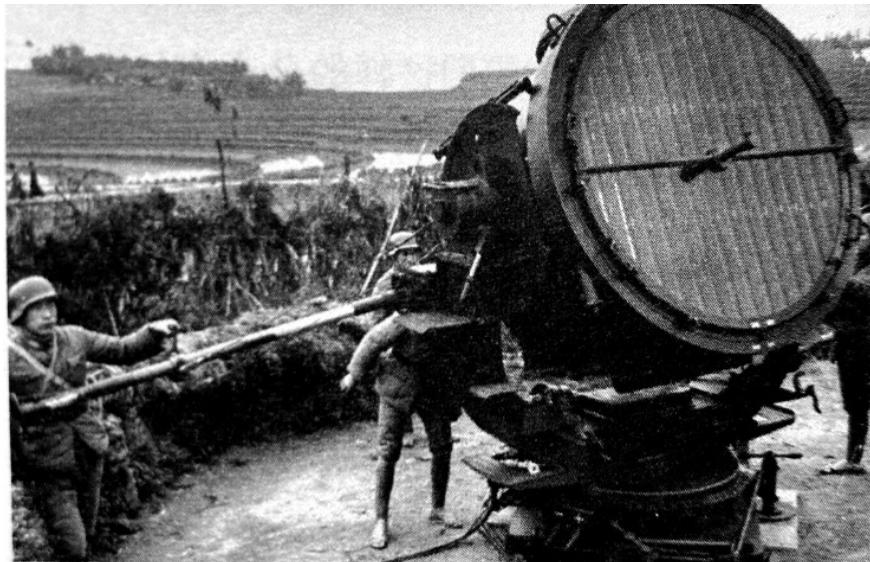
到学校的时候，考试已经结束了。因为我是推荐的，有靠山，所以我是直接入学的。我们那个通讯队有41个人，后来有一个郴州永兴的被淘汰了，就只剩得40个。我们分队主攻的是无线电通讯。当时的队长是宁远人胡振华，副队长是蔡波。学校的条件很艰苦，房子是用竹子盖的，没有瓦，屋顶上全部用杉木皮挡雨，吃得也不好，反正是很艰苦。

虽然不用考入学考试，但是科目考核还是要参加的，考不好照样淘汰。每天有12个小时的课程，训练相当严格，主要学习电报的收发、电译、无线电修理，还有英语简语。比方说，飞机就用一个字母代替，我记得好像是用F。常用的词语我们都能背出来，像东、南、西、北、中国飞机、美国飞机、日本飞机。还有就是飞机的高度、速度、方位，这些我们一看就知道。一分钟要记190个字母才算及格，最快的可以记得400个字母。星期天晚上还要夜间演习，教官在教室发电报，我们就在另外的教室接收，不合格的要淘汰。考试非常严格，三人一组在野外考核，轮流发轮流记，回来老师一看就知道，做不得假的。没有好久，我们就被调到了贵阳的中央防校，防校的条件就比四分校好多了，我们在贵阳的驻地在南厂兵营，那房子在当时就好得很，有好几栋，操场也很大，操场上放了好多设备，你们都不认得的。

那个听音机⁸，操场上好几台，都是德国西门子的，一个好大的喇叭，里面缠了很多线圈，下面还有四个轮子，可以推着跑，也可以用车牵引，一找到敌机就用探照灯照。一般是两个探照灯同时交叉照，那个探照灯也是德国西门子的，里面不是灯泡，是碳棒，两个碳棒一靠近，发出的光好亮，温度也高，人一般不得拢去的。轰炸机最怕探照灯了，一照住，飞行员就看不清了，地上的炮也好打些。



听音机。



防空探照灯。

还有一种装备，你们更是没见过，就是这种四米探测仪⁹，中间是一个观察镜，两头也有两个观测镜，两头的镜子是可以转动的，通过折射就可以看到飞机。管子里面有刻度，通过计算，一下就可以算出飞机的高度和速度。后来我到玉屏时用的没这个大，是小的，可以用两根皮带吊在脖子上追着飞机跑。

我是1944年到的玉屏，一直待到抗战胜利。1944年5月，我们正在分组通报演练，接到总队通知，全部到防空第六总台¹⁰紧急集合。后来点名分台时，我和一位四川同学张英分到了120分台，台长是湖北人葛清。

第二天，我就和张英还有葛清乘车到达了湘黔交界处的玉屏。我们的工作是监视重庆、成都和芷江的航线和天气情况。玉屏是山区，没有米吃，每天吃苞谷。

我们台用的是湘潭电机厂生产的15瓦的小电台，最多只能传60公里，发电还要两个人手摇，没有美国的先进，他们的是汽油发电，还不用天线。我们国产的这个家伙，那天线要35米高，一点都不保密，别人好远就能发现，所以我们一般都躲在深山里。整个六总台像我们这样的分台有好几个，一般都是按品字形分布的¹¹，但对我们对邻台的情况也不清楚，都是保密的。

那个时候，日本人的飞机来得少，因为这边有美国人的飞机。每天我们三个人轮流值班，24小时不间断，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每天都觉得好枯燥的。不过，美国人还算有良心，1945年抗战胜利后，给我们六总台的每一个人都发了一枚胜利金质奖章¹²。领奖的那天我一看，我们六总台的人也不少，估计差不多有300人。那个奖章做得好，两边是翅膀，中间是一个圆圈，里面有字，还有一架小飞机。可惜的是，解放后，被他们抄家搞走了，真的是可惜了。



口述人 / 刘建白，1922年农历五月初八出生，长沙霞凝人。原湖南防空司令部下属防空情报所上尉科员，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地方民众防备日机轰炸。因为是土生土长的老长沙，虽然年岁已高，身体也不行了，但豪气依然，调子（长沙方言，泛指行事高调、张扬）很高。从煤炭厅退休的刘建白，平时热衷书法，跟他的性格一样，刘建白偏爱草书与大字，出身书香门第的妻子是中学老师，写得最多的是小楷。由于文化程度较高，加之参与了湖南的和平解放，一直都当干部的他，目前退休工资有5000多元，日子过得安详而充实。前不久刚从美国的女儿处回来。

采集人 / 李桦 采集时间 / 2014年5月12日

“当时长沙只有三个电动警报站，其他街巷都是敲庙里拆下来的钟”

我是长沙人，但是在湖北开始上学的，因为我父亲刘培元在1927年的“马日事变”中受冲击，全家跑到了汉口，后来1938年初日军逼近黄梅、武穴，武汉告急，我们又冒死跑回了霞凝。

回到长沙时，我已经差不多十六七岁了，我想从军，但家里人不同意，我家就我一个儿子，而且我身体不蛮好，从小就经常生病。最后，我跟我父母打商量，他们同意我去投考湖南省防空司令部的防空训练班¹³，这样就不用上前线了。

当时考试的人也不是很多，我的考试还算顺利，成绩合格，但体质较差，培训了三个月后，把我安排到防空司令部下属的防空情报所，专门搞防空情报。

当时湖南防空最上面是湖南防空司令部，下属有防空情报所，每个县有防空监视队。大的县设大队，小的县就设小队。县下面的乡里都设防空监视哨，每个哨有六七个人，有一个哨长，其余的都是哨兵，他们每天分成几个班，用望远镜日夜轮流对空监视。

当时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湖南，主要目标就是怀化的芷江机场。所以怀化周边我们设了很多队哨，连靖县我们都设了好多人。前哨站设在岳阳与平江一线，像当时的平江、湘阴这些地方都设了哨所。这些哨兵经过培训后都很有经验的，有时候只要一听声音就知道来的是什么飞机。比方说，轰炸机的声音就要比战斗机的声音闷一些，战斗机的声音要尖一些。

哨所一旦发现敌机的情况，立即用乡村电话通知县上的队里，队里按报后通知省里，省里再长途电话通知到部里，部里再根据情况通知到各防空情报总台，总台再用无线电通知下面的各分台，就这样层层传递。我们这边也有代号，比方说4队报

告，4队就是指湘阴，4队5哨报告，就是指湘阴云田发现的敌情，都是有套路的。情报上传到后方后，如果可以接敌，我们的飞机就出动，如果不接，我们的飞机就转场疏散。

哨所一般观测日本飞机的数量、方位、速度、机型。像我们搞多了就很熟，轰炸机就是用F-B代替，侦察机就用F-X代替。日本飞机的出动其实也是有规律的，每逢农历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都是高峰期。一般三架一小队，九架一中队，十八架一大队。

长沙这边，在防空司令部下面还设有防空防护团，这个团主要的工作就是防空善后和拉警报。他们的组成比较复杂，有负责救人的医生、负责灭火的消防，还有负责疏散的军警。长沙的每一条小街小巷都设有专人负责。

当时长沙只有三个电动警报站，一个是在中山路的国货陈列馆，一个是在南门的天心阁，还有一个是裕湘纱厂的汽笛。其他的街巷都是用庙里拆下来的钟。一听到空袭警报，每个负责的人就敲钟，大家就在防护团的指挥下进行疏散。当时薛岳在文艺路的司令部开会，就是派我坐在电话机旁边。一接到电话，就要中断会议进行疏散。

我们的设备很差，但责任心很强。所以日本飞机每次临空时，我们的人都疏散了，我们虽然没上前线，还是有功劳的。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受命回国，在回国前，为了感谢中国防空情报人员的工作，特意给每人赠送了一枚镀金的勋章。



佩戴襟翼勋章的刘建白。

1. 房可吉因“历史问题”在1951年被判入狱，1954年获释，但他为了不连累家人，自愿要求留在监狱，直到1978年平反后才离开监狱。 ↵

2. 消极防空是以对空隐蔽、防护和消除空袭后果为主要手段的防空，目的在于将敌空袭造成的损害减小到最低程度，有效地保存人力、物力资源，迅速恢复作战力量和正常生活秩序。在地方防空中，各地民众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方法，比如重庆的“红灯坝”，国军防空部队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挂上不同个数的红灯笼，灯笼越多表示日机越近，市民在远处就能判断危险程度。 ↵

3. 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军校一共设立了九所分校。广州分校1938年1月改称中央军校第四分校，抗战爆发后该校多次迁移，最终确定以贵州独山为校址。分校主任韩汉英。该分校从1936年到1945年共毕业学员25212人。 ↵

- ⁴. 李资是国民革命军41师师长，与其弟李直及其妻三人皆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渡江战役前死在镇江。系房可吉的远房表哥。 ↵
- 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原中央军校武汉分校，迁往湖南省武冈，改为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分校主任为李明灏。该分校从1938年至1944年共毕业学员23487人。 ↵
- ⁶. 老屋名“司马第”。房可吉据此推断祖上应有人为官。 ↵
- ⁷. 以薛岳的名义写信是有可能的。李资是41师师长，划归9战区，为薛岳所领导，他的妻子清华毕业后投身教职，薛岳在湖南大办教育时，双方关系很好。 ↵
- ⁸. 听音机是早期地面防空设备的一种，主要与探照灯、高射炮等装备配合使用。一般的程序是，先用听音机辨别敌机来袭的方位，然后再用探照灯指明方位，最后由高炮射击。 ↵
- ⁹. 当时一种地面防空设备。 ↵
- ¹⁰. 抗战期间，为了应对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建设了不少防空情报无线电台。因为无线电设备的功率决定了信息传输的距离，因此国民政府一般是在重点区域先设一个总台，然后再围绕总台按照传输距离设立相应的分台。 ↵
- ¹¹. 抗战时期，大功率的电台多需要进口，在军队装备中非常少。一般基层部队中装备的多是国产小功率电台，以15瓦的为常见，这种设备的传输距离非常有限，一般不会超过60公里。为保证信息通畅，多以60公里为基准建设分台，同时为了保证联络与信息备份的需要，均以品字型分布。 ↵
- ¹². 此处老人的记忆有误，应是“襟翼勋章”，是陈纳德为感谢防空情报员对飞虎队的帮助，给每位中国防空情报员所颁发的纪念奖章。房可吉称其为“胜利金质奖章”。刘建白看到报道后辗转联系上我们，指出房老记忆的偏差，并出示了一张自己戴着襟翼勋章的照片，照片中勋章的模样与房老手绘的图案完全一致。 ↵
- ¹³. 抗战中期，随着战事的深入，国民政府逐步丧失了制空权，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日机轰炸的损失，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地方防空组织，一是培养防空人才，二是宣传防空，提高民众的防空意识。文中所指的防空训练班，当时隶属于第九战区。 ↵

汽车兵：我们开车不配枪，每人背一把大刀

躺在病床上的李祖元病情很严重，气喘得厉害，但眼睛直视着你的时候，眼神却清亮得很，而且毫不避让。为了要把自己的故事完整地讲述出来，李祖元拒绝了子女善意的关心，那种决绝的气势，带有家长特有的粗暴。

他的经历和故事与其他老兵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个时代里这样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但他平常的经历却让人印象深刻，也许是因为老人急于表述的急迫，让这种表述看起来有一种告别的姿态，跟自己，也是跟过往。

“我不想把这些事情都带到棺材里去”，他说。



口述人 / 李祖元，1921年生，湖南嘉禾人，原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五军辎重兵团三营二连汽车兵。1938年，李祖元在衡阳志愿入伍。昆仑关战役后随军入缅，缅甸战事失利后，走野人山回国。此后一直服役于第五军，淮海战役中阵前起义。1949年后，因起义身份，由政府安排在镇政府工作。现住永州市蓝山县国土局大院。

采集人 / 李桦 采集时间 / 2014年9月11日

“有报纸报道了大刀队，说我们‘刀光映月，杀气冲天’”

我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妹妹。37年的时候，我大哥就抽丁走了，直到常德会战受伤后，才回到家里。我父亲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去世的，生前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人啊，还是要多读一点书才好”，就这样，我才能够读到高小。在学校里，我参加了抗日宣传队，主要是谴责日本人的暴行。赶集的时候，到市场上给老百姓讲南京大屠杀，讲上海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的英雄事迹。大量国土沦陷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为国家出力。

1938年的时候，我考取了桂阳县的广德中学，不过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没有办法负担学费。刚好我在《大公报》上看到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在衡阳招考，我就和几个同学说，反正家里也交不起学费，不如我们去当兵吧。于是我和另外四个同学一起，穿个破草鞋，从桂阳徒步到郴州，再偷偷爬上粤汉铁路去往衡阳的火车。

到了衡阳后，我们在一个老乡开的小饭店里吃饭休息了一下。老乡问我们来衡阳做什么，我们说是来报考陆军第五军机械化学校¹。老乡一听就很惊讶地说：“那个学校去不得呀，那是去打仗的呀。人家抓兵都抓不到，你们自己还跑过去当炮灰！”

我们那时年轻，没有听他的话。第二天在衡阳“进步”电影院参加招考，经过五官、体型等方面的检查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被录取了。被第五军录取后，我就和另外两个同伴一起搭乘部队的“铁篷子”火车从衡阳西站到达广西。当时应该是在柳州，开始了驾驶训练，学习开汽车。两个月培训结束后，我就当了“副驾驶员”。第五军当时就驻扎在广西，在广西境内设了好几个大的军需仓库，我就在各个军需仓库之间送物资。没有好久，应该是38年底，39年初，昆仑关战役就开打了，我们第五军是主力，我就不停地向柳州、南宁方向送弹药。

我们第五军的装备是很好的，我开的第一台车就是十个轮子的奔驰。不过我们开车的是不配枪的，每人背一把大刀，带四个手榴弹。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也上前线杀敌。昆仑关战役的时候，我们往前方送弹药时，在路上，看到我们的人跟日本人在拼刺刀，我们就下车，拿着刀去帮忙，当时有家报纸还专门报道了我们“大刀队”，说我们“刀光映月，杀气冲天”。

“走野人山时，上面命令汽车坦克能过就过，过不了就丢”

奔驰车是好车，当时都是烧柴油的。柴油困难时，我们就自己提炼的桐油，代替柴油²。不过，我们提炼的桐油，对车的损害还是很大的，奔驰车修起来还不麻烦，就是配件难得搞。没有那个配件，有时光修是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德国人不给我们配件，我们就找美国人，美国人的配件装上去，没有德国人的好用，就拿点火器来说，美国人的一打，火都是红的，德国人的一打，就是蓝幽幽的。而且经得搞。

昆仑关之后，我们修整了一段时间，我们辎重团也补充了不少美国的吉普车，这个车也很好开。当时我们第五军号称是机械化部队，连战车都给我们配了。

再后来，就是从云南入缅甸，我们也是过的惠通桥³。到缅甸之后，我们被英国人坑了。先是打同古，死了不少人。后来那个仗就越打越难了，打了没多久，说日本人已经穿插到了腊戌⁴，这个仗就没法打了。

打同古的时候，我们打头阵。结果英国人撤退了，搞得我们的部队被敌人包围了。现在，又让我们护送英国人到印度去，杜聿明不同意，让我们撤回云南来，这就要过野人山。我那个时候是在军部汽车队，搞通信联络的，负责往各师各团送命令。走野人山时，上面命令汽车坦克什么的，能过就过，过不了就丢。坦克和汽车我们都还是炸毁了，其他的小东西就随便扔了。

为了防蚊虫、蚂蝗，我们都是戴着面罩，打着绑腿。有一次我们装甲部队宿营，打好帐篷，正挖厕所的时候发现一条蟒蛇盘在那儿，人去赶也赶不走，没有办法，就报告了连长，连长下令调动两部坦克，对着蟒蛇交替着打，那蟒蛇一下就被打成了稀泥。好奇怪的是，我们走到哪里，日本人的飞机就炸到哪里。原始丛林，大山里头，我们又没用无线电，敌人怎么知道我们在哪儿。后来才发现同行的当地和尚是“日本鬼子”装的，他们还带有电台。害得我们长官差点把带路的华侨给毙了。后来，车子都丢掉了，开车的病死的也有，饿死的也有。到达云南交界的地方时，我们这拨人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

回到云南后就是休整，也没太多的事，当时惠通桥已经被炸毁了，物资运输就很困难了，主要是靠美国人的飞机运送，我们汽车队就是在云南的各个机场跑。

在云南我印象最深的就只有三件事，第一件是个大事，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蒋介石给我们下命令，要我们第五军就地解决龙云，要他下台。龙云当时是云南的主席，对中央的话，他一般都不听，想搞自己的一套。围攻龙云时，我们的装甲部

队，还有炮兵都出动了，为了突然袭击，连伞兵都用了，把龙云团团围住在城里，没有开枪，就是请龙云去重庆开会。龙云本来不想去，一看这个架势，没办法，只好坐派来的飞机去了重庆。后来就是卢汉管事了。

第二件是小事，我们当时经常在云南和贵州之间来回跑，有一次在路上，我们的车队碰到南洋华侨志愿队，他们也开着车，堵在路上不肯让，非要他们先走，那我就不管那些，下去就骂，让他们看看车牌，他们看到7字头的车，才明白是第五军，就让开了，我们第五军的车，哪个敢拦。我的车牌照是77712，是美国的GMC十轮大卡，那时很威风的。



行进在滇缅公路上的运输卡车。



一辆威利斯吉普前的驾驶兵和维修人员。

第三件其实是私事，当时我们经常要去印度拖油料，那个距离太远了，拖一次，来回要烧掉快一半油，不合算，而且美国车也容易坏，经常要修。我们大修一般都跑到曲靖的修理厂去搞，那个厂里有一个小官也是我们嘉禾人，好像是叫王勇，看我

也是嘉禾的，对我就很好，有一次他问我，想不想回老家，说这个兵没什么当头了，想的话，他就给钱给我回去。我当时在部队里，长官很器重，我就回绝了。后来美国人从加尔各答修了一条输油管道到昆明，我们就很少去拖油了。也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同乡了。前年清明我到他的乡里打听他，他们说有这个人，不过已经死了。

抗战胜利后，我才第一次回到湖南，当时要我去芷江接美国人留下的好车，我接到车后，就跟参谋长一起开车翻越了雪峰山，后来从武汉去到南京，参加日军受降。

再后来，去的地方就多了，记都记不清。我去过东北，开始一直打胜仗，后来就一直打败仗。后来我又去了徐州，在陈官庄时，我们被包围了，下着大雪，交通壕里堆满了家伙，车根本开不出去。后来，连长要我们把车破坏掉，我们也没听，第二天我们就投诚了，因为我们保护了车，还受到了表扬。

¹. 文中所说的机械化学校实际上是第五军内部直属的培训学校。第五军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军，其核心是第200师，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机械化师。全班人马都是以1935年成立的交通兵学校（机械化学校）为班底构建的。后于1937年3月，以200师为基础组建国民党军第一支机械化兵团。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湖南湘潭地区组建新编第十一军，后改为第五军，隶属军委会直辖，于广西全州整训。由于成立之初，军部所在地设在湖南，因此部队中以湘籍子弟居多，尤以湘南的衡阳、郴州、永州等地为甚。第五军虽然号称是装甲部队，但抗战初期的装备依然很差，只有少量的苏制坦克和德式战车，主要的装备还是以汽车为主。 ↵

². 文中所指这一描述当时是客观存在的，由于抗战初期军事上的失利，导致战略物资极其匮乏，所有的作战物资都必须依赖进口，而作为机械化部队的第五军，对油料的需求更是迫切。为此，国民政府组织以高国恕总工程师为首的研发团队，进行研发。1944年3月15日的重庆《中央日报》头版报道：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创桐油发动机行驶汽车成功。 ↵

³. 惠通桥始建于明朝末年，初为铁链索桥。它位于滇缅公路（中国段）六百公里处，是连接怒江两岸的唯一通道，在滇缅战役中有独特的战略地位。 ↵

⁴. 腊戌为缅北重镇，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时，因日军派出小股部队快速穿插占领腊戌，导致远征军归国的道路被切断。 ↵

遗存



湖南抗战遗存地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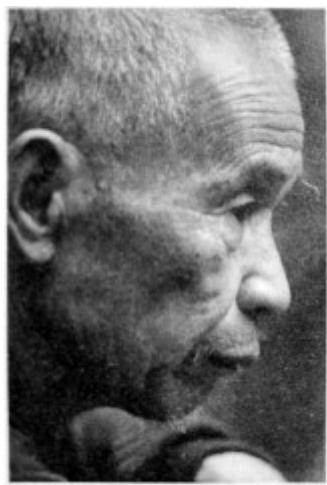
春华山：四次长沙会战都争过这里

这里有小小的山、小小的河、小小的原野、小小的村子和市集，小小的山上生长着小小的山茶树。

春华山¹位于长沙市区东北，在长沙城区“东拓”后拉通的开元东路东沿线上。以“世界之窗”出发，走大约二十公里就到了镇上。春华大桥旁的河边逢一、五集市，摊贩们的货物有些摆在地上，有些摆在架好的木板上，吆喝声小小的，捞刀河水的呜咽声也是小小的。

这是一片安静的土地，其南边就是捞刀河和浏阳河冲积平原²，一马平川。春华山是长沙的“门”，太平天国打过这里，抗战时期的四次长沙会战也打过这里，尤其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的春华山阻击战更是惨烈无比。时至今日，战争的痕迹隐约还在。

2015年4月1日，从山脚到爬到最高处白马岭航标处，一路坑坑洼洼，仅用时八分钟。想起战时，山岭低矮，让人揪心。两三米高的山茶树把一座山覆盖得郁郁葱葱，透过林木间隙，浅到膝盖，深至大腿的简陋战壕绵延于山腰，达一千余米。它们就是70多年前保卫长沙的那场战事的一处重要遗存，除那些战壕外，还留下了四块墓碑。



口述人 / 刘金国，1948年出生，春华镇春华新街居民，从2009年清明起一直义务为烈士扫墓，被称为“春华山抗日英烈守墓人”。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5年4月2日

“老百姓在他身上翻到了身份牌，所以留下了这块墓碑”

由于土地贫瘠，1949年后，春华山村吴寺冲组的人在春华山的白马岭只种了些山茶树。如果把这些山茶树砍了，完全可以复原当时的战场。

保存得蛮好的，还有墓地。由于当时到处都是当兵的人的遗体，只能选择就地掩埋，墓地就是战场，这样的坟墓我估计有百把处。我找到了一些，把坟墓上的山茶树都砍了，那些坟肯定不是我们当地人的坟，明显要大很多，每个墓坑里，都要埋差不多十个人。

这些坟墓基本上都没有立碑，我搜集到的抗战英烈的墓碑只有六块，跟春华山阻击战有关的只有四块。我最早发现的是正面刻有“中央阵亡将士”，背面为“此干长约十四丈 民国三十年公刊”。那还是1965年。

我是春华镇上的人，父亲是镇上的理发师，我子承父业，是吃国家粮的，后来知青下放到春华山村的吴寺冲组，就在白马岭山脚下。那一年我在田坎上锄草皮，发现一块碑被人搭在田间的渠上作铺路石，我一看，是打日本阵亡将士的墓碑。都是姆妈（方言，指妈妈）生的崽，他们抛骨异乡，碑还要让千人踩万人过的，我心痛。我就悄悄把它挪开到路边，用青草覆起，偷偷保存起来。我谁都不敢告诉，藏在心里，沉甸甸的，要是被人知道，肯定会被打成反革命，我就全完了。

直到2009年5月4日，我在墓碑的原址处立了碑，同时立的还有当时阵亡的邱世宦连长的墓碑³，“陆军七四军五八师一七三团一营一连邱世宦之墓/阵亡连长/山东人/民国三十年八月六日立”。这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为长沙交通学院（今长沙理工大学）修建春华山教学基地打基脚发现的，这是目前唯一一块有姓名的碑，埋他的时候，老百姓在他身上翻到了身份牌，所以留下了这块墓碑。

我们这边一直在找邱连长的后人，给山东省民政部门打了多个电话，找了当地报纸，还托会上网的在一些论坛到处发，但是大海捞针，没有查到什么消息。只是听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邱连长的后人曾经来找过一次。

但其实有更多的烈士估计再也找不到了⁴，他们的墓也没有了。白马岭是当时的主要战场，东边山坡保存完好，但以白马岭最高点黄花机场航标界石为界的西边山坡，现在整个属于长沙理工大学春华山教学基地，还有更西南边的铁马驾校、春华山镇政府一带，一直到最西端的燕山岭以及山南河岸边金潭渡口、春华新街等地，估计还有很多的烈士安眠处，因为当时选择的是就地掩埋。现在，大家都修房子，墓都被破坏了。

我还记得1977年，镇政府盖楼，我在大门口挖基脚，我们参加劳动的十多个人，一共挖出了很多遗骨，还有金戒指、皮带和手表，还有皮带扣子和铜扣子，扣子都是崭新的，几角钱一斤的废铜，我一个人的就卖了几块钱。当时我也没有那个心，想到这些都是烈士的遗物。



茶树下，过去的战壕依然清晰。



刘金国在春华山发现的赵文华墓碑。



口述人 / 章暑林，1926年出生，春华镇桂花村村民，春华山阻击战见证者，当时是一个16岁的农家少年。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5年4月2日

“都是就近挖坑一筒一筒埋的，就像码园木那样”

现在电视里打日本的戏，完全看不得，太假了，鬼子哪有那么温和。我看到捞刀河里冲下来一个女的，冇穿衣服，年纪还细得很，脑壳和奶子都冇得了，还抱着个嫩毛毛（方言，指婴儿），靠现在的桥那个地方，在水面上打转转。我还看到，三个民伕，是江西还是浏阳那边过来的，被一个鬼子兵押着，我在黄花那边看到的，饿得实在走不动了，鬼子兵就三刺刀下去，全都刺死了，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爷爷被鬼子飞机炸死，屋也炸得不看见了，我父亲被掳后，一直让他挑担，又不给吃的，饿坏了，就得病死了，我也被掳了三次。你问我为什么不跑，到处都是鬼子兵，还有哨卡，哪里都没有地方躲，跑哪里去？就只能在这里打转转。

行程短，三四天到了就放了，还好咯；行程长，就肯定有得活路。我有次被捉了，挑了三支步枪三口锅，还有米，六七十斤重，走了差不多四天，饿得脚都在打摆子，我想，这下子要被鬼子刺死了。到了夜里，我们靠着墙睡，鬼子守在门口，抱着枪打瞌睡。夜蛮深了，一起被捉的两个人偷偷摸摸把土墙挖通了，看我年轻，就想救我，约我一起跑，在我手臂上掐了一把，我还以为是蚊子咬，就拍了一下，他们又指了我一下，我就醒了，跟着他们跑，他们救了我一命呢。

那天是丁丑日（1941年9月26日），74军也就是王耀武的兵来的时候，我正躲在田里挖红薯，我远远地看着，来了蛮多，密密麻麻的，从上面渡口到下面渡口。鬼子祸害这里，家家都死了人，我想，王耀武的兵来了这么多，终于有安生日子可以过了。

可哪晓得，日本鬼子的飞机也来了，“呜呜呜呜”地飞了一夜，也扔了一夜的炸弹⁵，炮火也猛，对门有座水王庙，三炮下去，一个水王庙就炸没了。

听人讲，阵地没有守住，中央要王耀武的兵突围。日本鬼子不留活口，见人就杀，仗打完了，到了傍晚那个时候，在燕子岭到白马岭山脚之间，鬼子兵排成横列单排千把米长的人墙，向捞刀河北岸齐步走，遇见我们受伤或躲在草丛中的兵，什么话都没有，就用刺刀刺死。

渡船码头、河两岸，中央军的遗体到处是一堆一堆的，尤其是河里更多，密密麻麻都浮在水面上。到了壬午年（1942），捞刀河发大水，还冲出了好多遗骨，大家怎么捡都捡不完。

我还记得，就那几天，我看到有一个穿着高木鞋子，腰上系着个布带，光着屁股，挂着个罩卵布（应是相扑装），左腰上挎着把剑，右手拿手枪的鬼子，耀武扬威地从街上走过。

日本鬼子撤走时，把他们死了的兵堆在一起一把火烧了，日本鬼子死了多少？鬼晓得了，现在烧灰的地方都还在，都还有蛮厚的灰。鬼子撤走后，我们不忍心那些兵死了没人埋，就组织劳力挖坑掩埋，我也是其中之一。都是就近挖坑，一筒一筒埋的，一筒一筒，就是像码圆木那样的。我埋的时候看到，蛮多尸休上，不晓得么子原因，脸上手上都生满了泡泡（这是芥子气中毒的症状）。

我的亲戚王月楼，是他组织埋人的，他还组织徐石匠等人刻了碑，就是现在立在白马岭上的那几块没有刻姓名的碑。

后来，我们这边又过了几次兵⁶，但没有打过仗了。



春华山，隐没于乔木和灌丛中的阵亡将士坟茔。

延伸 我参加了春华山战役

口述 / 何元言 1918年11月2日~2012年7月21日，浙江省天台县街头镇张家桐村人，亲历春华山阻击战时，属74军58师173团，是当时找到的唯一一个春华山阻击战的幸存者。此篇口述文字由林华强整理。

18岁那年，还没抽到我的丁，我就自愿去当了兵。我被分到顾祝同部队修旗头山海防，驻地在永嘉，后来到了浙江驻宁（宁波）游击队。第三年的时候，日本人侵占杭州，后攻到萧山，当时人心惶惶，我趁机跑回了家。回到家正好过春节。下半年我又被抽了壮丁，这次被送到江西鹰潭，部队番号为74军58师173团，几营几连几排想不起来了。听说该部队曾是蒋介石外甥的部队，只记得一个长官的名字叫张灵甫，后来当到军长。

部队几乎每年都要打仗，也打了不少恶仗，先后转战过江西、湘桂铁路、湖南洞口等地，也曾到过浙江。在部队往浙江行军的时候，我正受伤，跟随师里的医院走，我坐的是担架，抬我的是老百姓（民工）。没想到半路上碰到日本人，被打散了。后辗转到收容所，才回到原来部队。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在春华山打的，那时我已经当了班长。当时日本人攻势很猛，上面有飞机大炮助阵，子弹就如下雨般打过来。打了一天后，部队伤亡很大，地上几乎全是尸体。第二天，阵地实在守不住了，日本人好多人冲了上来，我们就插上刺刀和日本人拼刺刀。拼刺刀前，长官就对我们宣布过下山后的集合地点。我提枪从山上往下冲，见到日本人就打，没人就拼命跑，好不容易冲到山脚下，却被一条河（捞刀河）挡住了去路。这条河深浅不一，我又不会游泳，为了活命，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横竖都是死。可能是运气好吧，我很顺利地趟过了河，过河后就直奔会合的地点。春华山战斗打了两天，战友死伤无数，日本人打死的也很多。我也在那场战斗中负伤——右肩不知什么时候中了一枪，战斗结束后我才在医院里取出子弹。

- ¹. 春华山位于长沙县境内，为幕阜山脉最南端余脉，东西走向。最东端的白马岭为春华山最高峰，山高不足50米，从西端的燕子岭（又称燕山岭）到此，蜿蜒起伏长约一公里，属今春华山村吴寺冲组。从长沙黄花机场起落的客机，引擎轰鸣声刺耳，宽大的机翼好像是擦着山顶而过。入夜时分，长沙城的璀璨灯火，经常映得春华山南边的天空一片通红。 ↵
- ². 浏阳河的支流捞刀河在春华山以南蜿蜒向西流去，北岸离山脚约200米。捞刀河冲积平原一马平川，直抵浏阳永安、长沙黄花。这一片长约20公里，宽约10多公里的大田野，平坦、静美。如果没有春华山这些低矮的小山包，长沙北郊的整个捞刀河冲积平原将毫无遮拦，在战争中敌军可长驱而入城市，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它是长沙市的最后一道屏障。太平天国打长沙，四次长沙会战，春华山都是攻守双方必争之地。 ↵
- ³. 春华山一役中，58师173团几乎全部罹难，邱世宦墓碑是至今发现的唯一一块有烈士名字、籍贯的墓碑，其余均为无名烈士合葬。刘金国还找到了两块正面刻有“中央阵亡将士”的墓碑，反面不同，一块刻有“计十四名中央阵亡将士 民国三十一年公刊”，被发现时是春华山村章宽云家猪楼屋的垫板，另一块刻有“此干长约十四丈 民国三十年公刊”，是金鼎山村章金泉家老屋塘下水管台面。刘金国“跟村民说了很多好话，也答应他们以后就在白马岭上把碑立起来，我不能用这些墓碑谋利，他们才答应的，我们还签字画了押”。刘金国说：“估计今年（2015年）底，这些墓碑就都能立起来了。我希望烈士的后人能到春华山来祭奠他们的亲人，来看一看他们的先辈牺牲的地方。” ↵
- ⁴. 74军是1937年在浙江建立编制的，当时下辖的三个师当中，以58师拥有最多的浙江籍将士。找人的工作主要是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春华山镇东林小学的梁学平老师在做，他在浙江省档案馆旗下的浙江档案网查询“民国浙江阵亡将士名录”数据库资料，通过对比资料中标注的所属部队及死亡时间，确定有83位浙江籍阵亡将士是牺牲在春华山。英烈们的籍贯具体对应到了每一个县，目前已经搜集到的家属在持续增加，在截稿日止，已经有8位英烈找到亲属。2015年7月18日，由浙江方面组织的春华山抗战阵亡将士公祭暨“接英灵回家”启灵仪式在春华镇举行，烈士忠魂被安放于浙江省杭州市安贤陵园内。 ↵
- ⁵. 应是9月27日拂晓，据当地老人陈建良、石浦秀、章暑林等回忆，应该没有连续一夜，数十架飞机猛烈轰炸，两个波次，将阵地犁过两遍。 ↵
- ⁶. 春华山阻击战后，依然有中国军队在这里布防。据抗战老兵孔定安2013年1月23日口述：1941年冬，我们部队奉命从江西修水开往平江县南方向，在春华山附近驻扎。那是一个大晴天，我从战壕里爬出来晒太阳。不远处，另外一个当兵的也出来晒太阳，我们看了对方一眼，都没有说话。正当我有点昏昏欲睡时，敌人的一颗炮弹朝那个人的位置打过去，落在他身边，不过没有爆炸，是个哑炮。那人先是吓呆了，回过神后抱着那颗炮弹大哭起来。看他的滑稽样，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

野猫坡：一个埋人的故事

我本想听张景讲当时野战医院是如何救人的，可是我听到的，却是一个埋人的故事。

“我们这里把当兵的叫做‘粮子’。从湘北前线退下来受伤的73军‘粮子’，好幸运地没有死在前线，能撤回后方，但到了冯家大屋后方医院，却因为国家太穷，缺医少粮，一个个都拖死了，实在是让我……”

“我爷爷在世时，每年农历七月半鬼节给老祖宗烧纸钱时，都还会绘那些‘粮子’们也烧一份。经历过那些事的老人，也都会绘那些‘粮子’们烧一份。可惜当时在野战医院帮过忙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走了。”

“我爷爷叫张炳坤，小时候总是抱我坐在他膝盖上，跟一些老爹爹老奶奶们聊天，聊着聊着，就都扯到冯家大屋野战医院的那些‘粮子’。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们都还说得出那些‘粮子’的名字，我后来把他们当时讲的故事都记了下来。也幸亏有一个叫做谭昆山¹的抗战老兵，他曾做过73军的作战参谋，副团级军官，他多次来此悼念过，每次都哭得非常伤心，如今走不动了，每逢清明和‘8·15’，还要家人打电话给我问这里的情况。”

在一个大热天的中午，刚见到张景时，他骑着一辆城管局为巡查而配发的旧电动摩托车，满头大汗。“我先带你们去天顶公园看看，长沙扩建，2008年这里修楼盘，挖土机挖到很多骨头，都移到天顶公园去了。那里就是个纪念性的陵墓，没什么看头，看完后，我再带你去野猫坡看看。”

我坐在张景的摩托车后座上，经过岳麓大道的望安路口时，他开始指着路旁闪过的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这里，这里，这里……”就是曾经的野猫坡冯家大屋野战医院旧址所在，现在都埋在高楼大厦底下了。

“没有岳麓大道的时候，这里好安静啊，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谁会想到这里以前是偏僻的小丘陵，人烟罕至，杂草丛生，只有孤零零的几座屋。野猫坡，连我们这里很多老人都不晓得这个地名了，但是野猫坡一直都在。我经常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这个野猫坡，也就是看一看罢了。”

“野猫坡也没什么看头。”他说。



口述人 / 张景，1975年生，长沙市岳麓区麓谷一普通城管队员，原长沙市东方红镇延农村人。他生在抗战时曾征用为野战医院的冯家大屋，在冯家大屋长大，是当地抗战史料的热心收集者。冯家大屋征用为野战医院时，张景的爷爷曾在医院帮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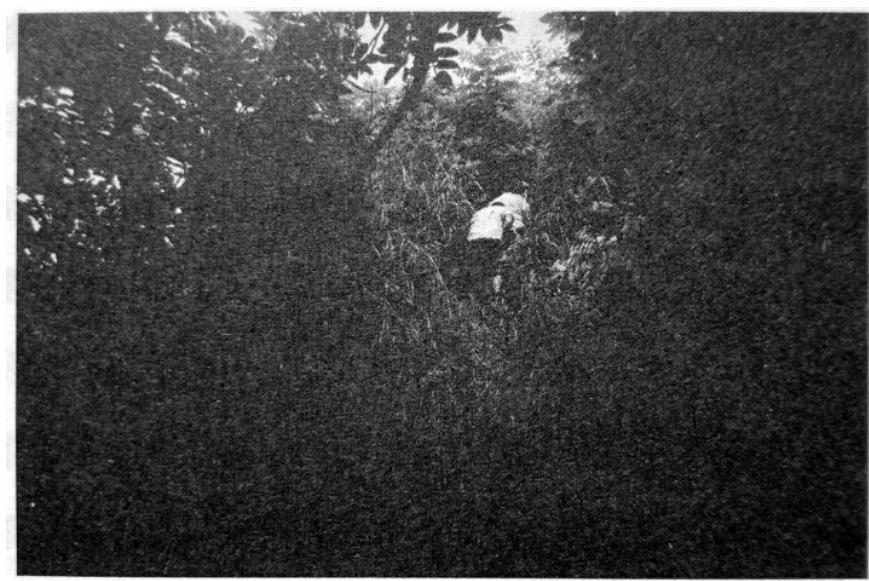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5年7月25日

“来的伤兵几乎都是小病拖重，重的拖死，基本上全死了，死掉了三四百人”

以前长沙麓谷这一片没有马路，只有一条古道，麻石板路。1940年上半年开春以来²，这里走兵不断，在湘北打日本退下来的73军受了伤的一批批的“粮子”，还有医官、医疗设备和油、盐、米等，一船一船地运到麓谷来了。他们从龙王港上岸，十多公里的路，一路上人络绎不绝，扶的扶，走的走，抬的抬担架，挂的拄拐棍，前头的到了这里赶早饭，后头的还在路上。

一路都是毛毛细雨，正是二三月份的时候，那一年的上半年也怪，雨水特别多。73军临时驻扎在这里³，军里绝大部分受伤的就被送到冯家大屋野战医院，这冯家大屋位于原东方红镇延农村和天顶乡永安村的交界处，具体位置应该就是现在荣盛·花语鑫苑楼盘正在修的幼儿园那里。冯家大屋和它东边的这一片都喊做野猫坡，野猫坡的中心位置在现在的中电软件园9号楼附近。野猫坡当时荒凉得很，只有野猫在那里活动。那座大屋占地面积蛮大，有三进，第一进住佃农，第二进住仆人，第三进住家人。清末民初，一个叫做冯八老爷的富商到这里安家落户，打日本的时候，兵荒马乱，又加上他两个儿子都夭折了，就把屋空了，人走了，只留几个佃农帮他守屋，我爷爷就是其中一个。

大屋门前的山背那栋魏氏墓庐屋里驻扎着专门埋人的掩埋班，只有七八个人，本来是些看护兵，野猫坡死人太多了，就专门干埋人的事了。大屋西侧一华里处杨溪冲的龚氏草堂住着卫生班，大概也就这么点人的样子，他们都是些学生和随军志愿者，没有军籍的，也没有工资，有些还是富家千金小姐，她们还用嘴巴去吸伤兵伤口的脓血，我爷爷亲眼看到。医疗班住在东南侧的泉塘李氏大屋，医官的人数也不到十个。那么点人，要照顾四百多伤兵，这点人是完全不够的。



去往阵亡官兵墓的山路，已茅草丛生。



天顶公园，迁葬后的73军阵亡官兵墓。

在望麓桥附近现在的清水塘中学里，73军还有个野战医院，住的是营级以上的军官，以及在岳麓山炮兵阵地死守不退，被日本鬼子的飞机投燃烧弹烧得乌焦墨黑的炮兵们。清水塘野战医院和当时的省法院在一起，当官的来往得多，医药粮食基本能到位，但还是死掉蛮多人，埋在清水塘中学后面，埋了一个坪。这冯家大屋野战医院，由于交通音讯都不怎么好，情况就更加看不到了。

那些“粮子”以为到了医院就能治好伤，然后再上战场，或者复员回家。哪知一来，除了看到一块一尺来宽，三尺来高上书“野战医院”的牌匾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西药，就靠我们老百姓到山里挖点草药。每天两餐糙米粥，还经常断供。床呢，也没有，就把冯家大屋的谷仓给拆了，拆下来的土砖码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格子里铺点稻草，就当成了床。

刚来的时候那些伤兵精神状态都还好，那些能动的还出来操练，一吹号，周围的老百姓都围过来看。刚来时有些伤兵还能走来走去，过了几天就只能坐起或翻身，再过不了几天，就都动不了了。天天下雨，地面上铺的稻草全部起了潮，洗了的衣服也不得干，那些伤兵又不能动，更不用提翻身了，虱子在他们脸上爬来爬去，像芝麻点点一样。没有西药，医护人员每天过来换换纱布，用井水加点盐洗伤口，把那些臭气洗掉。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就是平常人得个感冒都受不了的。

伤兵们整夜整夜地喊“哎哟，哎哟”，声音太凄惨了，本来大屋前的驿道日夜不断人的，可那段时间没有人敢从那里走夜路。周围的老乡看到这种情况，也刚好是农闲时候，那个时候的人良心好，反正闲下来也都闲不住，有些空的就过来白帮忙，用土灰和草药敷伤兵的伤口，趁着天大晴的时候把衣服都洗了拿出来晒，铺满了东边山坡上晒湘粉（湖南特产，又称南粉，以蚕豆、绿豆、豌豆、川豆、四季豆等豆类为原料做成）的木架子。那个时候又经常落雨，老乡们就把冯八老爷家的大甑拿出来，烧起火来蒸衣衫，把虱子蒸死，比起用水洗，衣衫也容易干一些，挂在过道晾两天就能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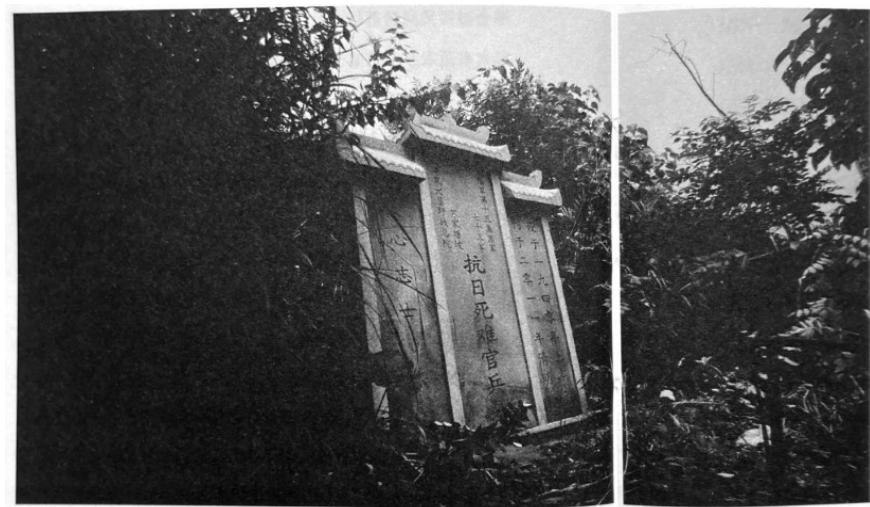
可是那些虱子哪那么容易搞干净！

来的伤兵几乎都是小病拖重，重的拖死，饿死的，痛死的，基本上全死了，总共死掉了三四百人，特别轻伤的零星活了几个，还有伤快好了从别的地方转过来暂时住一下的，这些人也活了一些。

当然也有“八字”特别硬的，有个人，一颗子弹笔直打了过来，打在他嘴巴里，嘴巴里全烂了，舌头肿起好大，吊在外面吓死个人，没人敢去动他，当他是死人了。我爷爷于心不忍，就用竹管子插在他嘴巴里，喂他粥，喂了几天，他醒了，自己就用手去抠嘴里，把子弹给抠了出来，活过来了。



野猫坡，如今已不复过去墓地的样貌。



苏家坡，冯家大屋野战医院墓碑，2011年立。

“那些伤兵也都晓得自己要死了，向老乡委托屋里的事”

快死和死了的就抬到冯家大屋的磨房里，每天上午和下午，掩埋班的人都会过来。先前还到老乡屋里搞点木板钉些匣子埋人，后来匣子做不赢（方言，指来不及做）了，就把死人的手捆起，用根杆担从手中间穿过去，像吊狗崽子一样把死人吊起，抬到坟山里挖个坑埋了。后来幸亏来了个参谋，看这个样子太不像话，就向上面打了个报告，上面就从码头运来了一些寸把厚的木板，包给当地几个木匠，钉好一副薄木板子就给一块大洋。

可能因为码头离冯家大屋距离远，加上每天死人太多，木匠师傅忙不过来。那个领头的木匠，叫做吴七爹，是个单身汉，就想了个办法，趁着夜里将白天埋下的棺材板子又偷偷摸摸地挖出来，第二天又混到新板子中去凑数，后来被发现了，打了个

半死，要不是当地在那里帮忙的老乡求情，差一点就给枪毙了。

那些伤兵也都晓得自己要死了，就预先把身上的小东西全部送给了在那里帮忙的老乡，向老乡委托屋里的事，托口信啊，请他们帮忙去探望屋里的亲人，等等，主要是一些皮带、水壶和打火机。

每一个大屋的老乡几乎都收到过这样的委托，老乡们也只能诚惶诚恐地点头答应，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帮他们完成一件遗愿。主要是老乡们收的委托太多了，又都不识字，就不能做任何笔录和记载，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到哪里去找人啊？这些事情就全都耽误了下来，直到他们自己临终时都还在忏悔这些事。

我爷爷1982年过世的时候，讲起这些事情，蛮伤心，他有几件委托都没完成，他遗愿未了啊。

他得到了三个打火机和一个水壶，水壶现在还在我屋里，只可惜丢了那三个打火机，其中有一个质量蛮好，看着表面有点黑乎乎的，擦一下，又白又锃亮，里面的弹簧一直没变形，也没生锈。这三个打火机我都放在冯家大屋的老屋里的一个旧木桌的抽屉里面，上世纪90年代拆迁改造，冯家大屋要修小区了，我搬了家，东西全忘记搬了，三个打火机也都丢了。

“院长金华昆走出来给每一个重伤员磕了一个响头，还烧了一炷香”

1940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太阳快落山了，一个骑马的传令兵来到了这里，急得很，信直接就是从马上甩到地上来的，讲日本鬼子又打过来了，必须马上撤，耽误不得。这冇得办法了，煮饭的铜锅，吃饭的碗盏都可以扔，就扔在了屋前的井里面，但是还有二十多个人伤得太重，抬的人少，带不走，这些重伤员也很难活过来，几个医官在牛栏里开了一个紧急会，野战医院的院长金华昆走出来给每一个重伤员磕了一个响头，还烧了一炷香，“你们已无回天之力，然军令必行！众军们！就请在这安息就义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一再保证抗战胜利后会回来给他们建陵墓之后，就把他们抬进野猫坡的当地村民挖的地窑里，封了土。

第二天，有老乡去那里培土时，还听到窑洞里面喊“哎哟，哎哟”。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从那儿过路了。

除这二十多个人，野猫坡还埋了百把副板子，就在冯家大屋东侧以前中央军做过靶场的一个山坳内，现在在中电软件园九号楼的那个位置，那是苏家塘坡埋满了后埋不下了才埋过来的。抗战一胜利，政府还来过几批人马规划建陵园。我小时候听过大人讲起这个事，可是马上又接着打内战了，忙着打仗，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个事，野猫坡就变成了一个荒凉的红土坡，草都不长，生满了荆棘，柴也没有人去那儿砍，一直到2008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个别墓穴被野猫打了洞，头骨叼出来了，我们不懂事，就把头骨当足球踢来踢去地玩，大人们看到了，骂我们，又把这些头骨封好土，埋到土里去了。

更西边的苏家塘坡，更加的荒凉，最早死的那一两百个烈士，都埋在那里，因为那里不挡风，也没有人住，位置在冯家大屋西边差不多快有一华里处，即今中电软件园的西侧、明德麓谷学校的西北侧，旺龙路与岳麓大道交汇口北边的旺龙路上及其两边。原先苏家塘坡那里有个小山窝，山窝之间有两口塘，坟墓围着这两口塘，一排排的，埋了一个圈，“大跃进”时那里搞开发，栽树、种茶，所有的封土都推平了，有一个姓段的在那里打地基修屋，还挖出了很多烈士遗骨，装了两大缸子，遗

骨上还有弹头、弹片，敲了下来，装了有一麻袋。那个时候工业不发达，废铜烂铁还蛮值钱，酒只有几分钱一斤，五斤废铜可以换一斤酒，他在供销社还兑到了几坛酒。

“我斗起胆子向外面讲起这个事，社会上才有了反响”

2005年8月份的时候，抗战胜利60周年，我斗起胆子向外面讲起这个事，社会上才有了反响⁴。当时野猫坡上坟丘一排排，还都是非常清晰的，只是到处生满了荆棘，我加上二十多个志愿者，用了一个星期才砍出道路，坟场的原貌保存得非常好，我们还立了石碑。此后就经常有人来这里祭拜，当地政府部门也组织了几次公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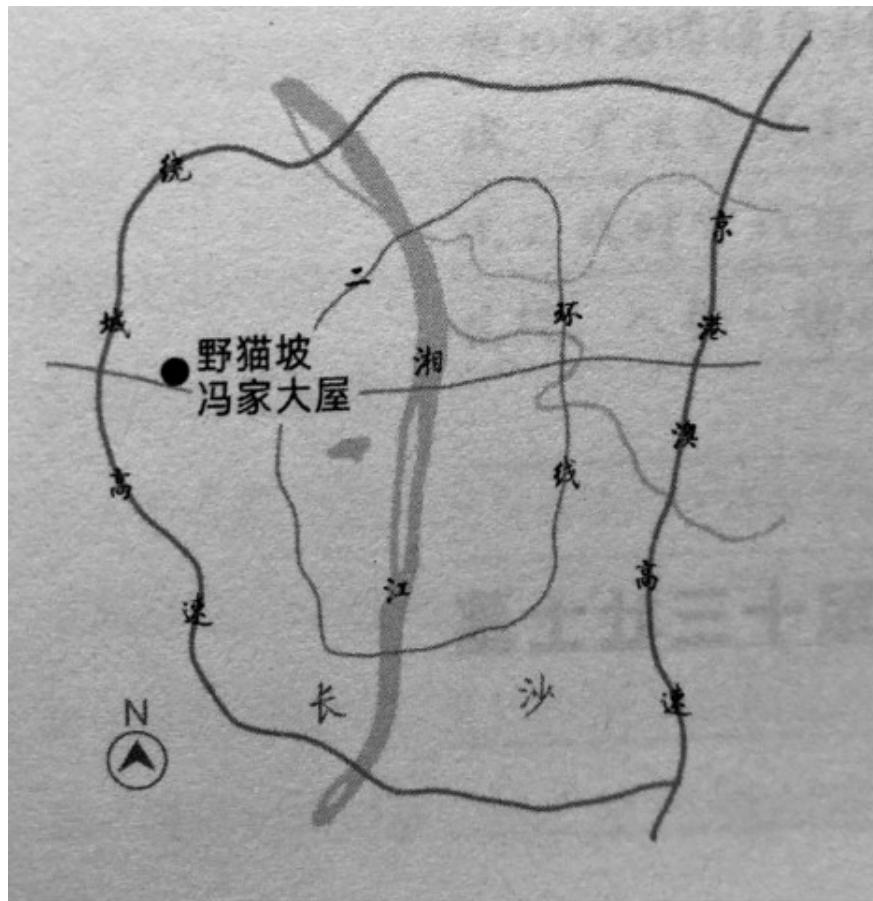
版刻《无奈的祝福》，卢万学作。

2008年麓谷搞拆迁开发，烈士遗骸只能进行异地保护，因为野猫坡以前就已经划到了天顶乡，天顶乡政府那边就把烈士遗骸全部都移到了规划中的天顶公园内，还新刻了碑，也有碑文，只是没有落款。苏塘坡这边的工程方找到我，要我想办法把那块鬼子屠杀的十二村民纪念碑⁵一起迁移，当地政府部门也同意了这个事。我就同一些志愿者在那儿挖遗骸，挖了尺把深，就挖到了。我们尽可能地收集全，将能找到的，都移到旺龙路与岳麓大道交汇口南边与苏塘坡相邻的门山岭上。我自己还花了十多万元在山上修墓庐，也就是一个小小的纪念馆，但不合流程，上面手续办不下来，作为违建拆了，相关部门也如实补了我的损失，只可惜动拆令下得太快了，上山的路和墓坪拜台都没有修好，到处都是草，现在还经常起山火，还好墓冢和碑还在。

相比清水塘，这两个地方保存都还算蛮好了。清水塘死了42个人，当时死的时候都有薄木棺材，埋在清水塘中学后面，埋得也很规范，每人坟头上还有一块木制墓碑，上书番号官阶、出身籍贯、姓名等，都是“陆军七十三军某师某团某营营长某某”，以及“某某军校某期毕业”“长沙会战为国捐躯”，等等。除这些营长外，还有两个旅长，埋在山头上，按照其生前要求，墓正对着南京城，还有碑文，但可惜现在没有人记得了。其实当时本来有规定，营以上军官要将遗骨送到指定地点埋的，估计当时条件不好，说是抗战胜利后再移的，后来也没有移了。到上个世纪80年代，乡里修毛马路时，一条简易公路从那些坟墓上压了过去，现在也仍然有马路从那些坟墓上压了过去。当时又由于有人在旁边打地基建房，泥巴堆了成了一大土丘，两个旅长的坟墓也全给堆了，沧海桑田，这些坟墓现在怕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们志愿者也组织了多次祭扫，现在也只能看到一个一丈多宽的大坪。

我们当地人一直想查找出这些烈士们的姓名以及来历，也很想找到他们的后人，想要他们落叶归根，或者叫他们的后人来祭拜一下，于是就找到当时在冯家大屋的一个姓戴的医官头上，他是湖南新化人，当时与我们这里的一个姓彭的妹子偷偷摸摸谈恋爱，那妹子就随军跟着他私奔了，一去就再无音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个戴医官到长沙肿瘤医院来治病，千方百计与我们当地人接上了话，姓彭的妹子也变成了老姨驰（湖南北部方言，[āijié]指老奶奶）了，她也第一次回娘屋里省了亲。戴医官于是就到了野猫坡冯家大屋原址和苏家塘坡，来做悼念。他还记得哪片墓坑里埋了哪些人，还记得其中二十多个人的名字，可惜当时没有人想到要记下来。

他来野猫坡本来是要祭拜一个叫余排长的人，生前与他关系很好，他记得是第一批埋在野猫坡的，就在前面三五个坟墓里面。可当他到了野猫坡的时候，到处都是荆棘，寸步难行，他又年老体弱，只能算了。他说这这些兵大多是他新化老乡，应该是新化太平铺以及邻近一个水库边上的人，有父子、有兄弟，大多是为粮饷糊口而出来当兵的。他离开的时候，说会发动一些烈士的后人来这里祭扫，可后来不晓得什么原因，一去就是再无音信。后来我找到彭姨驰她娘屋里的侄儿子问情况，只晓得他住在新化太平铺小火车站边上不远，他留下来的电话一个也打不通。



长沙野猫坡区位图。

¹. 谭昆山，1921年出生于衡阳祁东县，16岁到长沙一所小学任教职。“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先后隶属陆军第90师政训处，74军58师172旅，在74军期间参加南昌会战因作战勇猛，升任该旅343团2营中尉副官，在上高会战中代理第5连连长，并出任敢死队长，在74军中有“谭猛子”之称，战后被廖龄奇旅长推荐，考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第18期，毕业后不忿廖龄奇被处决而进入73军任作战参谋，参加过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在常德会战期间受伤退役，在家乡祁东县任祁东自卫区总部中校参谋，率游击队与日军打游击至抗战胜利。 ↵

². 《七十三军抗日战史》（曹湘陵著、长沙市文物局主编，海南出版社2011年）的作者认为，时间应该是1942年二三月份，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从湘北退下来的73军在此地整编，军部和77师驻扎在桃花岭，此时军部才配备有野战医院；1942年二三月份，也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73军军长彭位仁在株洲视察时，曾发动军人和军属自力更生，种地养菜做手工活，并请医生给家属作讲座，号召去医院照顾伤员；另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岳麓山炮兵阵地炮兵遭受燃烧弹伤害惨重，清水塘野战医院才有很多受伤炮兵。但据采集者调查走访以及张景复述，当地人说到的几乎都能确定时间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1940年二三月左右，故采用此时间。 ↵

³. 据张景说，在一份《岳麓区文史》上有记载，当时73军第15师驻扎在天顶乡永安村小龚家湾，第77师在大龚家湾，暂五师驻扎在天顶乡清水塘，但都不是主力作战部队，都是些新编和待编的，整编后就移防了，驻扎时间很短。 ↵

⁴. 有一个叫骆昌国的，是当地民革党员，还有一个人叫雷键敏，是雷锋中学退休校长，还有雨花区原政协主席李炎坤，他们也非常关注野猫坡的烈士坟墓，并且写了很多文字，也向相关部门反应过情况。 ↪

⁵. 据张景讲述：“第三次长沙会战长沙被围后，有日军在冯家大屋驿道上设卡征夫，有13个村民，只有一张难民证，他们以为是游击队的便衣侦察，就全部抓了关在冯家大屋里。第三天早上日军做饭时，商讨准备枪杀那被俘的13个村民后就撤退。一张姓村民听出其中意思，吃完饭乘其不备，爬入冯家大屋的猪粪池，潜入粪中用一马桶扣在头上。日军捆人时发现少了一个，对关在猪栏的12个人进行询问并开枪警示，枪响引起猪发狂又掉下去几头猪。问不出个所以然，就搜索一番，将那12个人牵到野猫坡西侧的山坡上用机枪射杀了。日军撤走后，我爷爷在猪粪池中打捞小猪仔时才发现张某，已浸泡得奄奄一息了。我爷爷于是灌姜汤、喂米粥，他休养了三天才活了过来。抗战胜利50周年庆典时，当地政府请来了那个死里逃生的张老倌做报告，并树了一个纪念碑。” ↪

花桥：泰山军十三壮士墓

衡南县花桥镇竹镇村清远组，那栋土坯旁是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谢治义拄着根自制的拐杖，每天木木地坐在门口，木木地望着那块墓地。

泰山军¹十三烈士墓地离他家只有70米，这短短的70米，便是他与他的袍泽70年的阴阳相隔和守候。

老人不识字，双耳失聪，记忆衰退，已完全无法交流。他是我们受访者中唯一一个“无言”的，然而他的目光，却最让人动容，尤其是在他望向烈士墓地的时候，饱含了悲伤，却又透露出一份澄澈。

所幸，墓还在，守候它的人还在。

谢治义原名梁守好，1921年11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丽水县江河乡光河村。1939年被抓丁入伍，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预10师28团通信排，参加过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等。在衡阳保卫战时曾代理排长，战后流落于衡南花桥，入赘一谢姓人家，更名谢治义。



口述人 / 易成秋，1954年出生，衡南县花桥镇竹镇村易家组组长，谢治义的至交好友，泰山军十三烈士墓碑的发现者和墓地重修者。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5年7月8日

“我管这些兵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只晓得，他们打了日本”

墓是从1945年端午（6月14日）开始修的，抗战胜利后，刻碑、修亭子，慢慢细细搞了七个月才搞完。当时逃到这里的第十军的兵和罗国璋的皇协军²发生冲突，当时死了21个人，第十军预10师28团第3营的李若栋李营长³，他在碑文里写埋了10个人，实际上埋了13个，李营长他记错了，也有可能是那另外三个他不晓得名字就不写了。李营长他们后来散了场，李营长也离开花桥，还有四个兵伤太重了，没救活，后来也埋在那里面，他不晓得这个事，墓里总共埋了17个。不埋在这里的还有四个，一个埋在藤冲村、一个埋在高新村、一个埋在蒋家大屋，还有一个埋到冠市镇去了。埋人的时候我父亲去挖了土，他叫易积谱，是我们这里一个明事理的读书人，他亲口跟我讲起这个事。

当时给那17口棺材挖了一个蛮大的坑，有一个蛮大的土堆，在重修前长满了茅草，有两三米高。边上有一个亭子，有六块碑，其中一块主碑就是这十三烈士的碑，那五块副碑上面密密麻麻全部是名字，是李营长当时打衡阳保卫战守湘江码头时，他营里牺牲的兵的名字。

亭子是一个六角亭子，木栏杆全部刷了朱红大漆。亭子上挂了副对联，写的是“上为日星，下为河岳，炎黄有子孙，天地流正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兄弟已在望，生死何足论”。本来我只晓得有副对联，但是写了什么我不晓得，这还是后来我特意去问了文化局的人，他们就去查档案，翻到了唐铁庵⁴的档案，从他的资料里翻出来的。

墓修好后，留了两个人在这里守墓，除了梁排长（指谢治义），还有个叫史天林，也是浙江的，入赘了一唐姓人家，改名唐天林。五几年就过世了，当时儿子还只两岁，他婆娘后来一直没有改嫁，他儿子大了后，还去找了老家，到浙江统战部去问了，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1958年“大跃进”，大修水利，石丘村的谢红增以前是罗国璋的副手，是皇协军的一个头子。他讲要把这些墓碑全部拖去修水利，没有谁敢阻拦，阻拦是要挨斗的。亭子就被拆了，那几块碑全部被拖到水库做了排水沟的底板。

1991年，我背起喷雾器到田里去杀稻螟虫，在水库边上，那块主碑，被沙子泥巴埋住了，我一脚踩在上面，它是平的，有点滑脚，我就把它翻出来，放在我们这里大王庙里，做拜石，就是祭神的时候用来拜的石头。到1997年，大王庙倒了，我就把它移到我们易家祠堂做拜石。我不是有意去留这块碑，但是也没有想着去把它丢了。到2014年5月份的时候，那块碑才移了回来。

以前听过梁排长打仗的事，我也就上了心，1996年的时候，我就想把墓地重修一下，打报告给衡阳市文化局，一个局长，姓谢，当时他还是办公室主任，说这些人是为国家牺牲的，墓是应该要修一下。文化局最终点了脑壳，同意了，我们才得以去搞这个事。

现在县里付我劳力工资，我每天都在这里，挖排水渠，修护坎，贴瓷砖。有人不要我搞，但是我晓得这墓我是一定要修的，我不管他是哪里人，我只晓得，他们打了日本，抵御外敌洒了血，还保了我们这一方的平安。



2015年7月8日，衡南县花桥镇竹镇村易家组，正在重修泰山军墓地。

“李营长拿出把快慢机，指着梁排长，逼着他走，梁排长不得不走”

梁排长只有三个孙女，都嫁出去了，没一个在身边，早几年要是能生出个孙子就好了。

打完衡阳后梁排长一直在这里，从来就没有回过他的浙江老家，只托人写过一两封信回去过，他老家还有亲人。他做事手脚非常勤快，就晓得死死地做工，天不亮就扛把锄头出来做工了，天全黑了才回去，不爱跟人讲话，有点善（当地方言，指为人懦弱本分），打日本鬼子的事，他只跟合得来的人讲过一点。他身上受的伤，脱了衣服也只给我们几个相处得好的人看过，有四处伤很明显，炮片伤和弹伤，在背上肩胛骨和屁股上，还有两处火伤，在膝盖窝上的，是在守衡阳的时候，日本鬼子用喷火器喷的。

他还打过长沙和常德，这两个地方打仗的情况，他没有跟我讲，就只说过，打常德打得蛮累，本来部队要休一个月，但是只休了七天，就开往衡阳了。

整个衡阳打仗过程，他说就是白天休息，晚上开打。

开始时白天也偶尔打的，打了一个星期后，习惯就成自然了，两边就像签了协议一样，吃了晚饭，6点钟的样子，互相间喊起来了，就准时开火，打到早上八九点钟太阳大了的时候，就熄火，白天就在汇丰银行的地下室里休息。⁵

梁排长原来是李若栋李营长的警卫兵，跟李营长的关系特别好，守衡阳时，升到通信排一个班当了班长。仗打到后头，他们排跟28团第3营一起去守离铁路桥不远的湘江渡口码头，跟日本鬼子翻了五番（当地方言，阵地彼此交换了五次的意思），杀得营里只剩下三百个人了，通信排的排长负了重伤，梁排长就代理了排长。

城被攻破后，大家都逃生，李营长右腿负了伤走不动，梁排长都逃走了，他又走回去背李营长，李营长就发脾气，要梁排长先走，梁排长舍不得他，李营长就拿出把快慢机，指着梁排长，逼着他走，他不得不走了。

“他的头被打破了，流下来的血把短裤全染湿了”

梁排长离开衡阳后，1944年8月中下旬的样子，就流落到我们花桥来了，流落到我们这里来的兵蛮多，有两三百人⁶，就搞了个收容所，叫衡东收容所。⁷

梁排长到这里半个月后，李营长才来，拄着根拐棍，一瘸一瘸的。原来他被捉住后，鬼子不晓得他是个官，看管不严，他就趁着夜里偷偷捡了根木头，跳了湘江，水流一直把他冲到衡山，他又从衡山一路过来，到了这里。⁸

李营长到这里后，就组织那两三百人跟日本人打游击，不准日本鬼子祸害乡下。有次日本人来了三个侦察兵，在我们镇南村刘家组的一间大堂屋里强奸妇女，妇女们哭声震天。李营长和梁排长两个人刚从花桥镇上买青菜回来，走在路上。我父亲亲眼见着，他俩听到哭声，就把青菜往路边地上一扔，抄起枪就冲了过去。日本鬼子打死了两个，跑了一个，从欧东村那边山上跑到石丘村去了，跑回去的日本鬼子报告了这里有第十军，这个鬼子联队连夜就跑回衡阳城了，他们打衡阳时输得很惨，怕了第十军。

到1945年的时候，罗国璋管行署⁹，他跟李营长是唱对台戏的，不肯给李营长他们军饷，还说要把这一片血洗。石丘村的谢红增是副司令，组织了两三千人，从我们村易家组和清远组后面的两边山上围了过来，谢红增的那两三千人是皇协军，鬼子扫荡乡里时，那个连队就驻扎在石丘，谢红增的那些人也一直驻在石丘，都驻扎在一起，不是皇协军是什么？

他们围过来时，李营长得到了消息，就对我们老百姓讲：“明天12点以前，你们要是没听到我们吹号，就全部逃，躲到山里去。”没吹号就表示日本人有大部队来了，他们只有三百多个人就只能跑，是搞不赢日本人的大部队的。第二天他们吹了号，我们就没跑。他们在这里干了一仗，打死皇协军七百多人¹⁰，这些事情我都是听梁排长讲的。

我们这边就只死了21个，仗打完后就立了碑，1945年端午节，李营长的部队散了场，李营长也离开了这里¹¹。梁排长留了下来，他到花桥后一直是住在谢治莲屋里，到1948年上半年，倒插门，就跟谢治莲结了婚。

延伸：花桥“泰山军十三壮士墓”主碑碑铭

虾夷猾夏，举国同仇，遂迫衡阳，师达卅万，本军奉命固守，全体誓以身殉。鏖战五旬，歼寇三师，不徒敌胆为寒，鬼神亦为饮泣。方之史丹林格勒之役，艰难不知万几。虽弹尽援绝，致陷城中，犹不为敌所屈。毅然突围东来，为保国家元气，用是设所收容，期再杀敌，还我河山，一点丹心，可质天日。承湘东士绅爱护，行署廖公补给官兵，得以戮力保卫地方，军民相安无事。谁料三月初，罗国璋接长行署，别具野心，排除异己，停发给养，制我死命，任意摧残，遂其诡随令之僚然在墓者，均遭暗杀之厄运，其中钱军需向璋请粮，被害尤惨。复敢甘为戎首，三月文日，倾巢围攻本所，企图一网打尽，以快其私，幸天夺其魄，被我击溃，民害未清，犹有余憾。呜呼，大敌当前，阋墙之诫，璋竟充耳无闻，倒行若此，心尚可问乎？爰记之勒石，以明忠奸之判，而慰壮士之灵。壮士者谁？江苏钱海文，龙游雷鸣荣，西平夏得河，湖北萧石安，永嘉包岳鹤，山东吕鸿轩，广西王得文，诸暨江士英，安徽岳时提，湖南马森林也。

上饶 郑华轩 撰书（郑华轩印章）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五日 泰山军衡东收容所

李若栋 谢业彬暨全体官兵

1. 1939年夏，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军长李玉堂的率领下，参加武汉会战的南浔线战斗，因战功卓著，李玉堂被蒋介石授予华胄勋章，指挥南浔作战的薛岳则赠送第八军“泰山军”锦旗一面，“泰山军”之名由此而来。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李玉堂调任第十军军长，“泰山军”之名也随之被带到了第十军。 ↵
2. 易成秋以及当地村民称罗部东乡游击队为皇协军，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下同，不一一纠正。据湖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萧培研究报告《浴血孤城——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湘南行署指挥部与之前成立的南乡抗日游击指挥部“共与日军发生大小战斗47次，击毙400人，并且营救了飞行员吴国栋、塔佩（TAPE）等4人脱险”。游击队有过对敌战斗，并不是伪军，只是彼此之间也会因利益关系或者有汉奸在推波助澜而发生火拼。民革衡阳市委范林说，“地方上国军游击队成分复杂，当时衡阳被日军占据，参加游击队的人，地痞流氓汉奸啥人都有，又没有办法具体甄别。罗国璋在台湾去世，写有回忆录，提到了这些。” ↵
3. 李若栋后来参加过内战，后被俘。1949年后，曾任长沙县政协委员。 ↵
4. 据萧培考证，唐铁庵是墓碑对联的撰写者。唐铁庵又名唐达一，衡南县花桥镇赤水村人，曾任国民政府湖南省省长唐生智幕僚，后回到衡阳市咸益中学当语文教师。 ↵
5. 谢治义所在的通信排为非战斗兵种，直到战争的中后期，兵源因伤亡匮乏，通信排才进入战斗序列。其白天躲在汇丰银行地下室里，与李若栋营长的自述吻合。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谢治义曾跟67岁的竹镇村清远组村民谢云楚说过一件事：预备第10师工兵连连长黄化仁牺牲以后，部下在废墟中找了一口棺材将他收殓。第二天夜晚，棺材被敌人重炮击中，遗体飞散烧毁，部下仍然捡回部分尸骨，用瓦罐装好，不料当晚又遭炮击，尸骨最后一点都找不到了。李若栋在其回忆录中也记有此事。 ↵
6. 关于具体人数有较大的争议，谢治义和当地村民认为，人数有两三百人，但李若栋在其回忆中称，只有一百来人。 ↵
7. 收容所所长为第十军第3师谢业彬营长，但因他在普通士兵中的威望没有李若栋高，李到了花桥后，成为了收容所事实上的领导者。 ↵
8. 据李若栋回忆，“第二天拂晓我靠岸爬上沙滩时已失去知觉。待醒来时我睡在一个农民家里，原来是衡山县吴集镇（今属衡东县）的曾见过我的一位叫刘洪烈的伯伯救了我。后来他请人抬我回到他家休养，并请土郎中用山草药给我治疗枪伤，约半月我便能勉强行走。正当我准备潜回敌后长沙寻觅妻子时，在衡阳战役负伤而伤愈的第十军官兵十余人找到我，并要我为他们解决衣食问题。部属关系责无旁贷。这样，我不得不放弃个人私愿，带他们回到衡阳东乡蒋家大屋、塘湾、庙前一带求当地保甲施舍。” ↵
9. 自1945年3月罗国璋担任衡阳县行署长官后，罗认为李部游击队人数多，地方上不堪重负，且李若栋只愿带部游击，不愿意接受整编或指挥，两边遂爆发矛盾。 ↵
10. 衡阳市石鼓区江霞村二组的曾志立，曾参加东乡游击队。据其回忆，游击队里很少有枪，只有刀棍，缴获到的枪也要上交。罗部的东乡游击队是根本无法抗衡装备较为齐全的李部游击队的。 ↵

11. 离开花桥的情况，李若栋回忆，“我本想潜回长沙寻觅妻子。不料行抵衡山将军庙时，原第十军连排级军官20余人追上来要随我解决他们生活。这样，我又不得不拖着一条残腿和他们西渡湘江，经湘乡、安化、新化、芷江，再转黔阳、会同，过着边赶路边讨饭的生活。到会同县找到了第十军老军长李玉堂，此时他已是集团军总司令。把20余下级军官安置好后，我和第3师的谢业彬营长，预备第10师的李振武营长再步行经三穗、遵义、贵阳到重庆，在重庆见到军长方先觉，向他汇报后，他要我到陕西汉中新编第3师任营长，我拒绝了他的任命，又和李振武（他原是我营的连长、副营长，我俩感情好）从重庆步行经黔江、泸溪、沅陵、常德回到长沙。不久日军宣告投降，我总算结束了九个月的讨饭生涯，但在胜利的凯歌、鞭炮声中，我还流落在长沙街头。”[←](#)

铁路桥：南方交通线上的痛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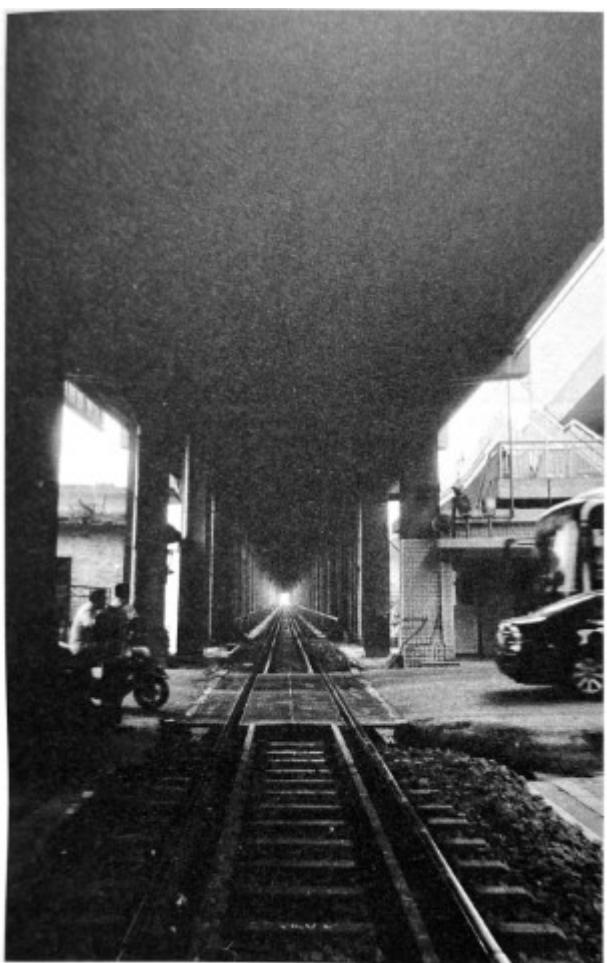
衡阳铁路桥¹横跨湘江，东岸为粤汉铁路，西岸为湘桂铁路，当时南方最重要的沟通南北和东西的两条铁路在此相交，它就是“肚脐眼”。

1944年6月23日，日军猛攻东岸飞机场，为防止日军利用此桥，第四军工兵营陆伯皋中校奉令炸毁此桥，而此桥因资金问题断断续续修了七年，此时通车才刚刚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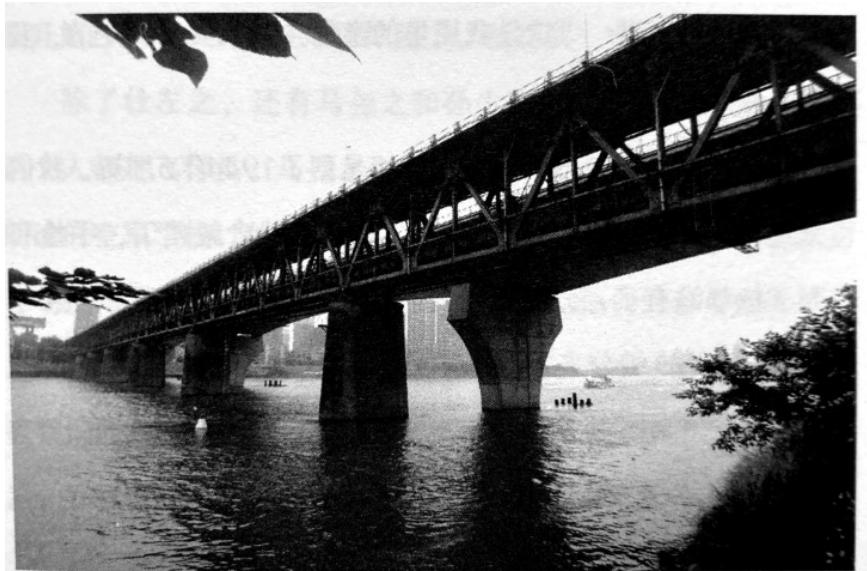
1944年6月24日，以铁路桥西岸据点为中心，衡阳保卫战，第十军以一万八千余人，捐躯七千四百人的代价，对抗十一万日军，至1944年8月8日，致敌死伤七万余人，击毙四万八千人。

很难想象，在断桥处阻击日军进攻的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来自哪里？部队离散后，他们中好不容易活下来的，像蒲公英一样，又飘向哪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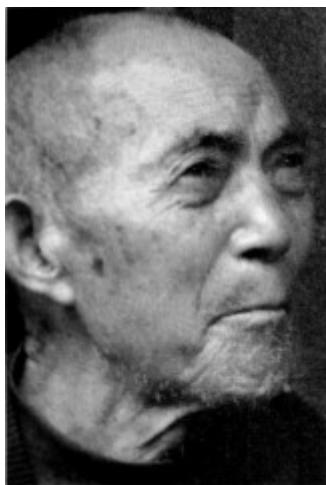
曾经蹲在桥头的人，现在，只找到杜学义和马如龙。他们所蹲守的断桥，13年后迎来了重生，原来被炸掉的桥墩得以修复，并扩修成公铁大桥，这是我国第二座公路铁路双用大桥，铁路桥亦改称湘公铁大桥²。2012年初，又扩修成衡州大道湘江大桥，全长2.62公里，其中跨越湘江的主桥493米。



2015年7月9日，衡阳铁路桥下，7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战事已少有人知。



2009年重建的衡州大道跨湘江大桥。原位置抗战时期曾为衡阳铁路桥，1944年被炸毁，1957年重修为衡湘公铁大桥。



口述人 / 杜学义，1925年农历十月十三日生，武冈县邓家铺镇杨木村人，1975年因居住地建水库，移居邓家铺镇黄塘村。1944年农历正月初八入伍，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暂54师直属特务连。参加过衡阳保卫战和湘西会战。湖南和平解放后回家务农，农余也兼做点木工活。现在仍然住在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老旧木房中，衣食也简朴得有些寒酸，但身体健康。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5年7月9日

“我们族里12个姓杜的，就回来了我一个”

我现在一餐还能吃个三四两酒，可是我太老了，都老糊涂了，前几天我去镇上，在路边店子里坐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了我的屋在哪里。可有个地方我一直记得的，在衡阳，那个铁路桥，我们跟日本人对着杀，一说起这个地方，我现在都好像还听到子弹在飞，发出的“啾啾啾”的声音，在我耳边响成了一片。

带我去衡阳的是我满满（湘西南方言，指小叔，或者泛指叔叔）。他叫杜鸿基³，比我大38岁，北伐就在蒋介石身边当侍卫，一直管警卫团，重庆中央派他到衡阳指挥打仗⁴。过年的时候，他回来看他的老父亲，顺便就把我带到部队去了。

我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农历正月初八去的衡阳，中学毕了业还只一个月⁵。我屋里有四弟兄，我晓得我要去当兵，在读书时就天天练力气，我满满家里有枪、棍、斧头和长刀，我经常拿那些东西玩。我力气蛮大，红砖半边搁在门槛上，我用力一拍，就能打断；一块大石头，别个后生满身是汗地抱起，我抛起有屋那么高，还能用手接住。有次我用手指插我一个婶娘屋里的土夯墙，蛮硬的，别个奈何不，我一插进去就是五个洞，我那个婶娘看见了，拿着根竹枝，赶得我满院子飞。

我晓得练习没有蛮大的名堂，可练了总归还是好一点。为什么没有蛮大的用呢？因为去当兵，练不练反正都是要死的。在我们这里，经常听到这个或者那个屋子里的人讲，他屋里的崽，去当兵打仗打死了，总之，就是没有听到有活着当兵回来的。我们族里12个姓杜的，就回来了我一个，我屋隔壁杜正解家里学文、学武、学富三弟兄，一个都没回来。当了兵，就是这种味，吃了早饭，就不要再去想吃中饭，我也就当自己以后再也回不来了。

我也不是蛮怕死，我有后的，一个崽，去当兵的时候他有一岁多了。我结婚早，13岁结的婚，我婆娘比我大七岁，她最照顾我了，我爹娘没钱，读高中的学费都是她到她娘屋里讨来的，我去当兵，她也没有讲蛮多乱七八糟的话。

我舍不得的是我的学业，我成绩是班上前几名，不管什么书，我读一遍内容都记得。看薛仁贵、薛丁山的戏，他们一出场，我因为读过他们的书，就晓得他们以后的事，就忍不住眼泪水。打江山的，没一个有好下场，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飞，还有我满满，我晓得这个道理。

我下场还好，解放后没有遭过罪，现在过的日子也蛮好。就我当兵那个时候，人都不当做自己是个人。我记得以前有三个逃兵，过我们邓家铺，被过路部队捉到了，推到田坎下面，挖田坎上面的土，就这样理，人都还是活的，在那土里面拱，拱了好久才不拱了。

“我大哥是个木匠，我帮他弹过墨线，开枪就用这个方法”

我去部队后倒没受过什么苦，因为是我满满带我去部队的，别个发的是两件烂完了的打着补丁的旧咔叽布单衣，我拿的是新衣服。吃呢我跟着满满在师部里吃，我饭量大，有两三个后生的饭量，师部里那些军官他们吃好的，吃不完剩下的就全给我吃了。酒一餐我能喝五斤，我满满出公差，经常带着我，别人把他碗里倒满酒，我就帮他喝，趁人不注意，就换了碗盏，把碗端起，“咕嘟”一口就喝了。

军训也没吃过很多苦，只搞了没多久，我就过关了，以前在学校里每天都要练操，正步走齐步走我熟，我读过书，别人讲什么要我做什么，我一听就懂。新兵枪法比赛，我从没摸过枪呢，我大哥是个木匠，我帮他弹过墨线，开枪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方法，枪尖尖靠到靶子，扯成一根线，我心里念叨着“靠到靠到”，一扣板机，报靶的就喊“中了中了”。我打了五发，中了四发，成绩是一个优，老兵都没有这个成绩，军训完后我就被评为上士了。

我被分到第四军的暂54师直属特务连，师长是饶少伟，副师长尹立言，我满满在暂54师是参谋官，他是蒋介石派到第四军的钦差大臣，见官大三级，是直接指挥打仗的。我们连驻防在湘江东岸的飞机坪⁶，专门负责放哨和守卫。我们师部也在那里，那个时候炮弹飞了来，飞了去，就是不打我，我旁边人都出事了我都没事，几次都是这样，我满满就笑我：“炮子都不打你，你就是个打不死的程咬金。”

他勤务兵都不带，专门把我带在身边，我还管着师部里的钱，当时我两边裤腰上别着两把木壳子枪，都是25发子弹的，左边胸兜上还插了一把手枪，两边开弓，都能百发百中。有其他的将官见了，就跟我满满讲：“你这个兵，送给我做勤务兵算

了。”我满满就讲：“这是我屋里的亲侄儿，我要带着走的，我要靠他保命呢。”

我跟着我满满，日子过得好，但是到了1944年6月初，我们特务连调到衡阳城内⁷，我又回到了连队，伙食就差了，手枪和木壳子枪都没有了，分了一把美国造的步枪给我。6月二十几号的样子，我们连被分去守铁路桥，还没两日，日本人就来了。⁸

“我在桥头一直开枪，死人越堆越多，把我活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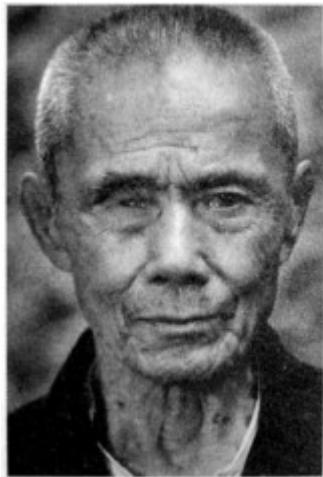
来的是人山人海，有些是飞机运来的，一飞机能运五十多个人，⁹有些是坐卡车过来，一车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吧，一下车就往我们阵地这边涌了过来。

我们这边的人也都涌了过去，大家都尖起喉咙喊杀啊杀啊。两边的人都搅合在一起，飞机和大炮都不敢开火，怕误伤了自己人，我看到对面的日本人，就像风过草地一样，一排排的，呼啦啦全部都倒了。我枪法好，我就单腿跪地射击，子弹在我耳朵边“啾啾啾”飞个不停，我什么事都不想，就想着多杀一个算一个。我就一直开枪，我身边死的人越来越多，都堆起来了，越堆越高，我就被死人堆了，我扣了好久的扳机，虚了力，翻不出来了，我被活埋了。

后来我们这边的人打扫战场，我被人翻出来全身被血湿透了，一身的红，那都是别人的血，我身上一个伤都没有，我真是个打不死的程咬金。那次守铁路桥，连里一个叫杜左之的排长，刚开始打仗没多久就被炸弹炸死了，他跟我一个族上的人。

除了杜左之，还有马尧之和孙少尉，也都是我认得的，这两个人都是飞行员。马尧之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是我满满资助读的空军学校，他跟我满满还是远房亲戚。这两个人都是我在守飞机坪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在地下对杀，他们开着飞机就在天上跟日本人的飞机对杀，经常有飞机被打了下来，有他们的，也有我们的，打到后来，我们的飞机慢慢地就来得少了。日本投降后，我再也没得到那两个人的讯息，那肯定就是死了。

铁路桥被炸后¹⁰，又被调到花药寺¹¹，也守过其他地方，都不记得了。衡阳失守后，我们特务连逃出来的只有一二十个人。在道县重新整编，我们师只有一千五百来人，又在那里重新征兵，编起了三千来人，移到洞口石板塘，驻扎过一段时间。日本人打了衡阳后，一直在后面赶着我们，我们就把他们引到包围圈里面来，在武冈县荆竹铺赖皮岭¹²，又过来了另外两个师¹³，把他们堵住了。我们在两边坳上（方言，指山头）¹⁴挖了壕沟，架起机枪，那个时候我满满还没有当师长，还是尹立言，尹立言是我们武冈的人¹⁵，他讲：“这些日本鬼子就是当初在衡阳打我们的人，这次还敢打到我屋里来，我要把他们全部搞死。”日本人打到赖皮岭的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火了（湘西南方言，指没有火力没有弹药），冲了几次坳上又冲不上，就只能双手举起空枪拜在地上投降，我们只管往下开机枪，投降的也把他们打死了。这次打仗不惊险，没有什么讲头。



口述人 / 马如龙，1924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原名马兴龙，重庆铜梁县人，孤儿，16岁被抓壮丁入伍，后被整编到第十军预10师第33团1营2连当理发兵。衡阳保卫战时，守过铁路桥和张家山阵地，三次负伤。退伍后居郴州市临武县万水乡上横村7组。1960年左右，马如龙与当地的一位寡妇成亲，将三位继子女视如己出。后来马如龙也有了自己的三个儿女，都孝顺。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2年7月2日

“从战俘营逃出来后，我一直帮人剃头”

我是第十军预10师第3团1营2连的一个理发兵¹⁶，我们部队负责守衡阳城里的铁路桥。在端午节接的火，老蒋下了命令，要死守衡阳，打了20多天，就对杀，整个军死到都没有一个团的人了，所有理发的、烧火做饭的不打仗的兵也都要上战场，我也就上了战场。第一次是在衡阳城里的铁路桥，碰到一个鬼子兵，我们拼刺刀，他伤了我的右腿，现在膝盖骨这个地方还有点点印子，我也没让他占到便宜，一枪扎了他的大腿。我休息了三天。

我第二次受伤是左边屁股，子弹卡在那个骨头里，开刀取的，现在还有个洞，那次我伤得蛮重，休息了一个礼拜。

第三次受伤是在张家山¹⁷，仗已经打了30多天了，一个子弹从我的侧面贴着我的脸飞了过来，穿过了我的右眼眶，把我右眼打坏了，坏了眼睛后我就一直待在伤兵医院，没有再上火线了。

我伤一次比一次严重，可现在让我烦的是第一次。我腿脚还没好全我就又去打仗了，打了48天仗（实为47天），我也没有好好睡过。右腿落了疾，现在就有蛮重的风湿，痛得很，拄棍子都走不动。

人打光了，上头就要我们投降，日本人缴了我们的械，把我关在战俘营¹⁸。日本人把我们的枪栓卸下，就让我们背个空枪筒筒。我呢因为眼睛坏了，就把我调到跟一个江西籍的兵在一起，跟他搭脚，负责挑水、烧火、煮饭、送饭。在战俘营停了一个礼拜。有一天半夜，我就跟那个江西的兵逃了出来，从衡阳逃到白凤（耒阳市永济镇白凤村，耒河岸边），没钱过河，我们两个人就拜在撑船的人面前，跟他讲我们是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的，要回家，他看见我们穿着队伍上的衣服，就说：“要得，我帮你们撑过去。”

过了河我们就分开了，我一直往南边走，到了常宁县桐梓坪，跟山里的一个老百姓讨饭吃。我跟他讲，我一个孤儿，在重庆铜梁县城当徒弟学理发，16岁就被抓了壮丁，分到第二军。走到云南，要被卖兵卖到印度去，他们嫌我年龄小，连里就留了我，从云南、贵州、广西又一路走回来，又被搞到第十军，到衡阳打仗，讲起这些事我就哭，边吃饭边哭。

那个老乡就说：“你到我家里做事，跟我一起看牛，割草。”我呢就在他家里停了半年，从农历七月份开始，还在他家里过了个年。过完年后我就跟那个老乡说：“叔权，我要回家。”他就说：“你回去，身上又没有钱。”没有钱，我就跟一个挑豆油的走，我帮他挑豆油，走了三天，到了蓝山。

然后我又到林里村（属临武县万水乡）找了个老师傅学理发，我以前不会用剪刀，只会用剃刀剃光头。后来，我就在蓝山县新圩镇下清涵、龙家坊一带，帮那老师傅做了一年，一年只两百担谷子，我就不肯做了，就跟他讲：“唐哥哥哎，我要回去了，我不做了。”他不准我走。林里山下有一个老人家人蛮好，帮我讨工钱，那老板才又给了我两百斤谷子。

结清账了我就走了，到万水乡黄祖江，我又帮一个老师傅做了一年，一年是四百担谷子，在蓝山县新圩镇下清涵、楼下这两个地方帮人剃头。我就在蓝山睡，剃完那两三百个头，我才回黄祖江我老师傅屋里睡。第二年，1946年，我就搬到万水乡上横村，自己给自己做，在下横、上横，剃两百多个人的头，我就在这里落脚了。¹⁹

1963年我回过铜梁，经过衡阳时，我还到铁路桥那里看了一下，铁路桥又有了。我回了铜梁，两个姐姐早嫁人了，我们相互也都不认得，我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铜梁。

¹. 衡阳铁路桥1937年动工，翌年10月仅建好数个桥墩，就因资金不足停工。后由于要联通粤汉、湘桂两铁路，在其上游380米处修建便桥，但屡遭洪水，交通经常中断，最长的一次达五个月之久，又屡毁屡建。1942年12月又决定续修正桥，翌年8月开工，设计为公铁两用桥，但铁路和公路位于同一桥面。建桥本需60.2米的下承华伦式钢梁七孔，后由于广州被日军攻陷，只运到六孔，其余一孔滞留香港。只得修建成为一八孔桥，长427米，两岸均有公路引桥，总共耗资法币166.62万元，并于1943年底竣工，翌年元旦通车。 ↵

². 衡湘公铁大桥1957年12月30日举行通车典礼。本桥下层铁路桥全长426.97米，上层公路桥全长643.15米。桥梁由7孔60.5米的下承桁梁组成，其中第1、2及第3、4孔为两跨连续梁，第5至7孔为三跨连续梁。下层为单线湘桂铁路，右侧有人行道。上层宽10米，有两车道公路，公路宽7米，两侧均有1.5米宽的人行道，两侧有引桥，东岸引桥长130.91米，西岸引桥长85.27米。共计浇筑混凝土5176立方米，安装钢梁2048吨，总投资510.1万元人民币。公铁大桥建成后，拆除便桥，如今在枯水季节仍能看到便桥桥墩。 ↵

³. 杜鸿基，武冈县邓家铺镇杨木村人，1887年生，保定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九连毕业，其余不详。对1949年后的杜鸿基，杜学义也有口述：“1949年4月，湖南和平解放，我满满倾向于和平，他就把部队解散了，带着我回老家务农。他是个大善人，对谁都很和善，一口笑，讲道理，哪个屋里没钱吃饭了他就资助，解放后也过了几年好日子。到1953年，“土改”复查，我们村里下来了一个工作队，查到村上一个叫杜学章的，他以前当过土匪，后来又当过国民党的兵，晓得我满满的底细，就跟工作队的人讲：“搞我不应该，我们这里有大鱼（湘西南方言，指大角色）还没砍。”本来以前打仗都是过去的事，解放后都不追究了，他脱不开身，又讲起我满满以前曾枪毙过两个勤务兵，我一直在我满满身边，我还不晓得，完全没有这个事，完全是信口开河，但工作队的人还是把他打了，那是1953年农历正月初六。他以前有个大老婆，早就死了，大老婆有两个崽，跟日本人打仗也都打死了，又娶了个小老婆，叫莫祖秀，1953年时还只32岁，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带着我满满的两个嫩崽改嫁给她一个烧木炭的堂表哥，去了绥宁县长铺子镇茶山坳李家塘。这两个崽后来又给我满满生了两个孙，都考上了清华，一个还在中央直属部委管财政，做很高的官。”[←](#)

⁴. 第四次长沙会战中，第四军仅守一天就败退衡阳，蒋介石对第四军的指挥系统很不满，特派“身边人”杜鸿基到暂54师当作战参谋，湘西会战胜利后，杜鸿基又接任暂54师师长。[←](#)

⁵. 民国时期的教育，入学时间有春季班和秋季班，杜学义读的是春季班，在放寒假前毕业。[←](#)

⁶. 暂54师虽然被第十军方先觉调配守卫衡阳，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并不愿暂54师此时投入衡阳战场，师长饶少伟追随薛岳，在此两难之境，只得将暂54师师本部以及所属第1团留在衡阳，负责湘江东岸以及飞机场的守卫。1944年6月23日，日军开始猛攻湘江东岸各地，第1团不支，饶少伟决定由第1团长陈朝章带领所属第2、第3两个营撤离衡阳，自带师直部队和第1团第1营共一千余人留守飞机场。[←](#)

⁷. 杜学义记忆有偏差，据《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团结出版社 2007年）及萧培研究两书记载，不是6月初，应是6月25日。此日黄昏，日军猛攻衡阳机场，交战不久唯一能够接受空军补给的衡阳机场被日军独立第64大队占领。饶少伟带着所属残部退守衡阳。[←](#)

⁸. 据《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6月27日拂晓，敌两个师团，附属野战炮兵第122联队，共计山野炮六十余门，猛攻西岸阵地，置重点于城南。[←](#)

⁹. 日军用飞机运兵，此处口述无处考证。[←](#)

¹⁰. 衡阳保卫战爆发之前，衡阳守军将两节装满炸药的火车车厢推至大桥中央引爆，炸毁大桥。2009年12月1日，在修建衡州大道跨湘江大桥时，此货车车体一节车厢被施工队在江中打捞出，已锈迹斑斑。[←](#)

¹¹. 花药寺位于现衡阳市岳屏公园的西南面，始建于南宋景祐五年（1257），当时名为报恩光孝禅寺。该寺后殿毁于日军战火，幸存的前殿1966年7月毁于“文革”，后被拆除建衡阳展览馆。[←](#)

- ¹². 1945年5月12日清晨，第94军121师攻击驻扎在洞口县高沙镇的日军116师团109联队，至午后4时，毙敌500余名。日军残部3000余人向东逃窜至洞口县高沙镇冷水桥、马鞍山、明月寨、峰形寨、仙人桥等地，沿途烧杀抢掠。第94军第5师、121师各一部紧紧追击，敌多次欲渡廖湄河而不逞。战至13日晨，中国军在峰形寨毙敌300余人，余敌夺路关家桥（三元桥）、鲤鱼渡，部分逃窜至荆竹铺、茶铺子、大塘等地又遭中国军截击，部分强渡廖湄河，部分躲藏于当地山中。1945年5月26日，一股日军败兵50多人，遭遇驻守回马山的121师一部和驻守赖皮岭的第四军暂54师一部，被全歼。 ↵
- ¹³. 指第94军第121师和第5师。第121师是黔军，军官多为黔籍黄埔军校毕业生，士兵也多为贵州人，湘西会战前驻守于湘黔边境。第5师驻地和番号均变换很大，士兵多来自四川，湘西会战前由湖北开往贵州镇远。两师均在贵州改换美械装备后投入湘西会战南线战场。 ↵
- ¹⁴. 回马山是一坐孤山，临靠资水的支流，与马鞍山隔江相望，与赖皮岭东、西相夹，两山中间是低矮谷底，便于围歼作战。 ↵
- ¹⁵. 部队驻地洞口县毓兰镇石板塘，离尹立言老家毓兰镇石大托村很近，洞口县直到1951年才由武冈县分拆出来，故杜学义说尹立言是“我们武冈的人”。尹立言（1906年~1994年），黄埔军校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二期毕业，曾留学于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和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后定居台湾，并在台湾牵头成立“洪门会”，是台湾黑社会的创始人之一。蒋经国上台后封他为陆军上将，后患脑溢血病故于台北。 ↵
- ¹⁶. 马如龙说他的番号为第3团应有误，当时驻守衡阳的没有第3团。与此说法最为接近的为预备第10师第33团，他还说到曾在张家山负伤，而驻守过张家山的，只有第33团。 ↵
- ¹⁷. 张家山阵地，是衡阳保卫战战事最为惨烈的地点之一。据《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记载：张家山阵地，高出地平面约六十余公尺，位于火车西站背后，为全师阵地之中央突出点，乃30团团长陈德生上校守备区。有两次夜间，伸手不见五指，敌人冲上张家山。我官兵无一后退者，敌我混杂其间，彼此惟恐暴露位置，不敢弄出一点音响，敌我皆用手摸，穿棉布军衣者为自己人，穿卡其布军衣者为敌人，是敌人则以刺刀刺杀，一阵阵枪枝撞击声，乒乒乓乓通宵达旦，惨叫声时有所闻。敌之后续部队被我左右翼猛烈交叉火网，及密集迫击炮炮弹封锁，不能进入缺口。而我增援部队，因天暗分不出敌我，亦停止于半山之间。俟天将拂晓，微有阳光时，才冲上山头，将敌人悉数歼灭。在总计十余次拉锯战中，敌我伤亡共计约七千人。一个月之后，该地工事被敌炮火全毁，遍地集尸，增加了山之高度。腐尸臭气熏天难忍，乃令陈团长放弃，改守后面高地。 ↵
- ¹⁸. 实为运输队。据《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衡阳保卫战后，日军将放下武器的第十军官兵三百余人编组为一个运输大队，为其运送物资。 ↵

¹⁹. 1949年后的事情，马如龙亦有口述：“快到1960年的时候，镇南乡到上横搞清查工作的人，把我捉到镇南乡马上村，关了两日，我碰到县里下来了一个干部，他叫黄泽通，是镇南乡茶山村的人，他问我：‘师傅，你是哪个抓来的？’我说是徐中，工作队的徐中把我捉来的，说我是‘远路人’（外乡人），要查我底细。黄泽通就讲：‘回去，哪个说的？’我就回去了。后来又因为我是‘远路人’，我又被捉到县里，关了29天，临武县城的城墙，还有那个大前门，就是我在被关的时候担的土，是我一担一担担出来的。从县里回来后，我就再也没有事了，我就同他（继子黄井富）的母亲结了婚，那个时候我已经三十六七了。”[←](#)

烟堆岭：湘西会战在这里拉开序幕

“班长，想不到我向本全还能来看你，你讲了打完仗要送我回去的。”

2015年5月24日，向本全在孙女的搀扶下爬上了邵阳县岩口铺¹烟堆岭²，烧着纸钱，他嚎啕大哭。茅草深处，是他班长的埋骨之地，当年，他是抬棺者之一。

这是他第二次走在去岩口铺的邵榆公路（湘黔公路，即今320国道）上。

1945年4月16日拂晓，驻扎在邵阳的日军主力116师团120联队先遣部队第1、2大队2000余人，由邵阳市北塔区茶元头乡枫林铺村，沿邵榆公路向西南方向进军，与驻扎于岩口铺烟堆岭的100军19师57团的3营第9加强连196名官兵遭遇³，湘西会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岩口铺村村民陈林华说，“我十四五岁的时候，那些兵都住在山顶上，你说的那个向本全，我第一次见，就在前几天。我认得的人只有罗连长。我那时候在岩口铺看到了好多飞机，还听到枪声整夜在响，后来我还漫山遍野地去捡铜壳子（指弹壳），捡了好多天。这个老兵当时打枪后落下的铜壳子，肯定有被我捡到的。我捡了他们的铜壳子，换到几袋米，我愿意讲岩口铺他们打仗的事。”



口述人 / 陈林华，1930年出生，岩口铺镇岩口铺村村民，岩口铺阻击战时，十四五岁的陈林华并没有远离家。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5年5月31日

“仗都是摸黑打的，仗打完后，我们大伢子就去捡铜壳子”

清朝的时候，岩口铺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老街。在烟堆岭南边山脚下面有很多抽鸦片烟的，到了民国要禁烟，就把那些收缴的鸦片烟全都堆在这山岭上，一把火烧了，所以这座山岭就叫烟堆岭。山脚下有个岩口（当地方言，指山洞），岩口铺就是这样叫起来的。以前这山脚下有三口井，井旁有个水塘，跨过这个水塘，就到了老街。“大跃进”时，水塘被填了，变成了现在看到的这两块田。

这座山只有八十多米高，宽我估计八百米的样子。从这里往西北方走，都是起起伏伏的，越往西北这些起起伏伏就越来越厉害，更远就到雪峰山了。往西南走，可以到周旺铺、到隆回去，一路都蛮平。往正东边偏北一点点走，就可以到邵阳市，一路都是平地，日本鬼子要是从邵阳打过来，那肯定是蛮快的。

这一片的岭子都喊成烟堆岭，也讲得通。烟堆岭东北边偏东有个院子（当地方言，指自然村），叫白山王家，以前是蛮大的一个村，鬼子打岩口铺的时候，人被祸害死了蛮多，现在成不了一村，归东北边的白山村管。

沿着东西走向越来越偏向北方的320国道（邵榆公路）走，可以到岩口铺的白山村。现在的新街就是以国道作为街道，后来建起来的，与老街并排，两条路只隔了几座屋宽。这条国道的南边有个岭，喊作铁丝岭，紧挨着铁丝岭的东边，对着烟堆岭，也有个岭，喊作百弓坨，以前日本鬼子打到这里来的时候，最早是在那两个岭上打起来的，那边没驻着多少人，打了有几天的样子，兵都退到烟堆岭那边去了。

以前的烟堆岭哪有这么深的茅草，现在都埋我腰了，我有十多年没有爬这个岭，这里变化太大了。以前这里的草浅得很，有一点草也被牛羊给吃光了。到“大跃进”时，山全部被开发成了坏（方言，指旱田或者菜土），一层一层的，用来种点小菜。现在呢，人越来越懒，这些坏绝大多数都荒了，长满了草。

就是这些茅草，打仗时的壕沟完全看不到了，印迹也变得蛮浅，不有心的话，怕是根本找不到。以前壕沟倒是蛮大的。有一个半人肩宽；高呢，低着头猫着腰，能把你完全遮住，每个岭子之间，都被壕沟连通了的。在烟堆岭最高的地方有一个三角碉堡，约二十个平方米，可以躲一两个班的人，哪个面都可以向外面打枪，现在在原位置修了个蓄水塔，建了差不多快十年了。

我屋在这山的南边，看得清这个碉堡，打仗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十四五岁的伢子（方言，指小孩子），我不怕死，走日本的时候，我就经常跑回来看，我有次看到，碉堡前面有个兵，手里拿根竹竿子，竿子上绑了个旗子，他在转那根竿子，天上我们的飞机也跟着他的竿子转圈子，当竿子猛地一沉，沉到哪个方向时，机就猛地俯冲下来，向那个方向“突突突”地打机枪。那次我没看到飞机打死日本人，也可能是太远了没看清。

白天，经常有飞机过，都不是鬼子的飞机。

仗都是摸黑打的，我没看到过。仗打完后，我们大伢子都去捡铜壳子卖，烟堆岭上铜壳子最多，我都去那捡了好几次。



2015年5月31日，老街与烟堆岭之间。这里以前是池塘，现在是几块小田，步行五六分钟就到了烟堆岭的山顶，这里过去是整个湘西会战的最前线。

那些兵呢我也不记得了，我对国民党地兵印象不好，这些人从对面山里退到烟堆岭，又从烟堆岭退到芙蓉山，打仗就晓得退，要是他们能赶走鬼子，白山也就不会被祸害得这么惨。他们还爱到乡下面去打鸡打狗，打起仗来，就只想到当逃兵，兵头头（当地方言，指军官）都不敢管。我听到有人讲，岩口铺的兵，连兵头头都敢打。

但是我对那个连长（指第九加强连连长罗文生）印象蛮好，和气。他是这里的兵头头，指挥部就设在山脚下，靠岩口西边一点点的那座孤零零的老木屋里，现在都还住着人。我经常在那个屋的屋门前玩，记得天气是要热不热要冻不冻的样子，好像还落着个毛毛雨，是特别容易得感冒的，我正在玩，那个连长估计也得了感冒，他把我喊住：“喂，小鬼，你们这里有医师吗？”我哪晓得医师是什么意思咯，他就改口，问：“有郎中吗？”我记得七里村好像有一个，就帮他去喊。那个郎中谈条件，讲诊完了如果不扣人，他就答应来。连长答应了，诊完了，我看到那个连长还客客气气地送郎中出门。



口述人 / 向本全，1926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武冈县马坪乡兰清村六组人，户口本上错写为向本金。1944年春末被抽丁入伍，分至第99军197师590团3营9连机枪班，负责装填子弹，曾参与岩口铺阻击战。战后一直在家务农，老人身矮力弱，加上先后两任妻子都早早离世，一生困苦不堪，儿子和儿媳均是农民，有个孙女在东莞打工，唯一的孙子数年前溺水身亡。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5年6月11日

“我也跟着举手参加敢死队，我实在不想天天被关着了”

我是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刚吃完立夏粑粑后⁴，农历四月中旬，一个当兵的熟人带我入的伍。我们马坪、荆竹这一线当时当兵去的有八百多个人，当时抽丁蛮猛的，除非是独生子，壮劳动力捉到都要入伍，有些人屋里四弟兄，都抽走三个了，它保到你屋里有一个，不绝蔸（当地方言，指绝后）。我屋里四弟兄，我老大，老二还只12岁，我必须要去当兵的。也没想着去当逃兵，捉到还是要编回部队，我们连里以前捉到个逃兵，每个人都要上去打三棍子，他整整一个月都下不来床。

我们部队番号是99军197师59团3营9连，我们先是在武冈荆竹铺杨家祠堂集合，后拉到洞口黄桥，再到安江，在洪江下面的沙栗湾训练了一个月，后来又转到洞口江口。在江口，本来安排要到北方打仗的，衡阳失守了，北方都还有兵退回来，过不去，就转回到绥宁武阳，在那里集训过了冬。

过冬时，只发两件单咔叽布上衣，一条单裤子，都是旧衣服，两根裤管膝盖骨位置都剪断，裤管要用来背口粮的，我们把它灌满粮食，两端扎好，搭在背上。腿上打着绑腿，绑到大腿处，穿的是自己打的草鞋。这一身衣服冻得人死啊，好多人的脚上都生了冻疮。睡就在地上打通铺，睡猪仔一样，一排排一个挨一个。天天被关着训练，关狗一样的，训练就是打人，不照做，或者做不到位，不跟你讲多的，拿起皮带就用皮带抽，摸起棍子就用棍子打。我同营的小炮第三排排长，那个该砍脑壳的，就最喜欢打人，整个排的人都鼻青脸肿，他们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

吃呢是十七两米（旧制，约为634克）一天，一天两餐，完全吃不饱，菜没油，还都是青菜，我们都是骨瘦如柴一个个的。蒋介石的兵，是天底下最可怜、最悲惨的人，比叫花子都不如，打完仗还都回不来，我们这里去了一坪一坪的人（方言，一大群的意思）⁵，我就光讲我认得的那七八个人，回来了也就两三个。

过完年后，我们又被拉回江口训练，过了惊蛰节，我入伍已经有十个月了，部队就给我们发了根步枪，我晓得我要上战场了。到辰溪搞完野外训练后，部队被拉到洞口县木瓜乡马渡村，营里搞集训，要组织敢死队，编到岩口铺最前线去，愿意去的自己举手。一个叫丘中胡的，是个上士班长，第一个举了手，他是武汉人，打过五六个仗的老兵，我也跟着马上举了手，我实在不想天天被关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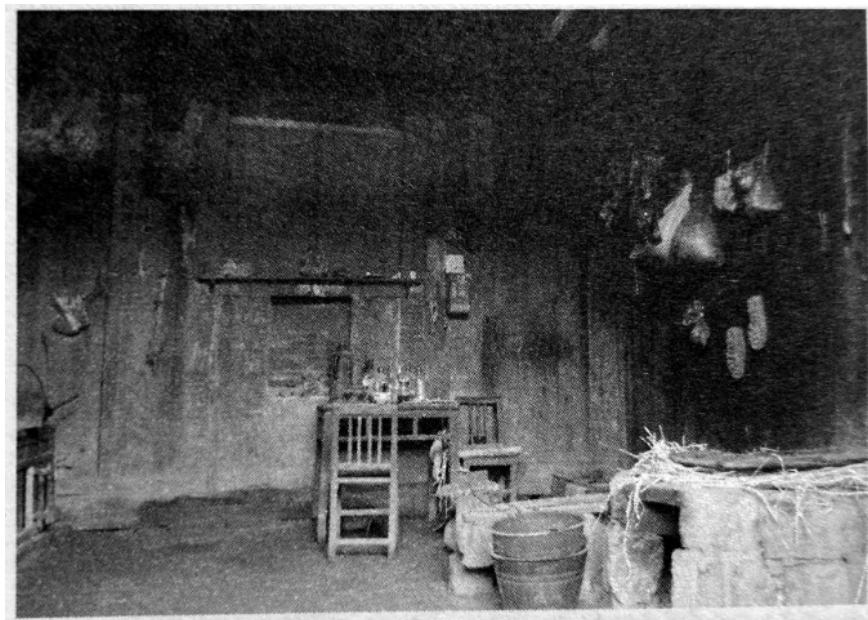
“他的腰被机枪打穿了，整个人差不多被打成了两截”

我们去了两个排，编成了一个加强排，有三个老兵班，六个新兵班。老兵班一班的班长是丘中胡，二班是运输班，三班的班长是荆少山，就是后来我的班长，也是武汉人，他跟丘中胡应该是同时入的伍，老兵里有蛮多湖北的。我们六个新兵班的人都是武冈荆竹铺、洞口黄桥、高沙这一片的人。我们全部被打散，叫老兵带新兵，每个班分的还是14个人，分到八杆步枪，六挺轻机关枪。同时把我们划到100军19师57团去了，团长姓钟⁶。为什么要划到100军去？我听人讲，这个99军的197师，以前在湖北吃过大败仗⁷，拉出去打仗日本人不怕，名声不响，100军的名声镇得住场一些。

大概是惊蛰过了半个月，正是开桃花的时候，我们到了岩口铺，马路（指邵榆公路）对面的山已经失守了。我们那个班分到了离烟堆岭最远的最靠近白山的那个山头（西北端）上，那里有五个山尖，每个山尖上都放了一两个班的人，壕堑和工事都事先挖好了的，武器弹药都有，我们来了只管守。刚到的那天，日本鬼子打炮炸了山脚下的指挥部，我们存在那里的粮食，被炸得谷啊米啊满山飘起。



烟堆岭山脚，营部指挥所旧址。战时被炸掉了部分，在炸掉的位置现砌了红砖。



指挥所没炸的部分，木房子保留至今。

到了第二天，又调了个副营长（袁楚俊）过来了，第三天晚上，芙蓉山调来了机枪连的一个排，只有两个班，没满编，每个班都只有十个人，带来了一挺重机枪（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这个枪我们当兵的和老百姓都喊“水管子”，开火的时候要经常加水降温，打仗时要整整一个班的人照拂，不比轻机枪，只需要一两个人。但是呢，重机枪的火力最猛，当晚就开火，一个山坡上日本鬼子都被打穿了。

第四天（4月21日），我们的排长过来了，他叫陈登应，个性强得很，爱打骂士兵，本来我们59团部是不肯放他来岩口铺的，他到团里拿了委任状，硬要来。他最可怜了，刚来就被炸弹炸死了，最不值得。我们才刚刚吃了夜饭，他到了这里，夜饭都还没吃，鬼子发动猛攻，他当时是在掩体里面，掩体是两根大腿一样粗的木头绑在一起，成一根柱子，中间留个架枪的缝，这些柱子密密麻麻一个挨一个，斜斜地靠着陡坡上，子弹是完全打不进的，他运气不好，一颗炸弹从脑壳顶上掉了下来。本来连长还打算派他带兵去支援第一个山尖尖，也就是烟堆岭的那个山尖尖的，那边有两个山尖尖，听说都拼了刺刀了。

日本鬼子那个晚上下了死力气，连修路架桥的兵都派出来了，要夺我们的阵地，我们就一直“哒哒哒”往下面开机枪，我的班长也在那个晚上战死了，他的腰被机枪打穿了，整个人差不多被打成了两截，死的时候眼睛鼓起好大一只。哪个班长都打人，我的班长他就从不打人，他跟我讲，仗打完了就送我回去，我蛮舍不得他。班长是我们埋的，埋在他死的地方，没有立石碑，他的棺材是我们从山下老百姓屋里找到的，我们是拿来直接用了，没有给钱，我们也没钱给，打日本，我们都为国家走了死路，老百姓也应该要做贡献。

日本人的尸身我们就不管了，我们有“水管子”，日本人死得那就多了，上山的小路边上全部都铺满了。我们把尸身上的衣服剥了，东西全部拿走，光溜溜的尸身就扔在山脚下面，摊开摆在那里，也不管。

仗差不多打了快二十个日子，白天警戒，在阵地里不出来，一直是摸着夜打仗，日本鬼子白天哪敢打？我们有飞机，他也怕飞机炸，我们的飞机每天都来⁸，少的时候一两架，多的时候12架，有人告诉我，芷江机场那边有五十多架飞机呢。日本飞机来过一两次，马上就被赶跑了。说起来也怪，到了战场上，我倒不想着去当逃兵

了，一个呢是战场伙食过得好，每餐都有肉，二个呢，脑壳上面每天都有我们自己的飞机飞来飞去，仗打到后面，就算被日本鬼子围死了，脑壳上面有飞机，心里也是个安逸。

我还记得，烟堆岭山顶上的那个小坪坪，我们飞机来的时候，就有个哨兵出来，拿着个锄头旋圈子，飞机也跟着旋圈子，当他的锄头指向那个方向猛地停下来时，飞机就向他锄头停的那个方向扔炸弹。⁹

“打完岩口铺，只剩下六七十人，打完芙蓉山，就只剩下二三十个人”

仗打完的时候，（罗）连长要我们把打坏的枪和空了的子弹盒子都埋了，我们懒得很，不管那么多，就全部扔到山脚下的那个池塘里去了。连长说（5月2日）晚上撤退，大家在岩口铺的老车站集合，再往南边走，去支援芙蓉山阵地，他会打信号枪指路，看他的信号弹飞向哪里，就向哪个方向走。

我们一两个队的人晚上集合的时候，没看到信号弹。等了一会，丘中胡就讲：“我们再打他一仗，日本鬼子以为我们撤退了，绝对想不到我们还会冲上去，肯定没做好准备。”他是上士班长，也是（军衔）最大的，他讲话就是军令，他要反攻，好，我们就又端着枪冲了回来，就又把烟堆岭抢了回来了。冲的时候，我看到日本鬼子在杀一个俘虏，可惜我们慢了一步，没救到那个人。冲到山尖上时，我们班里的阮必章被鬼子的刺刀砍死了，应该是砍在脑壳上面，他是贵州人。

到芙蓉山¹⁰后，我们的阵地分在狮子山¹¹。我第一天晚上到，第二天清早，连长就要我送七个伤兵到芷江去，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偏偏要我去。我就从隆回荷香桥动了身，回来后，听说芙蓉山的仗打完了，其他地方也都不打仗了，我就回了屋。

我们去岩口铺的有9个班，126个人，打完岩口铺的仗，只剩下六七十个人了¹²。不在的，大部分都被打死了，也有逃兵，我记得隔壁班上，夜里那两个人都还在放哨，第二天清早，就只看到两把枪扔在地上。逃走的具体人数我不晓得。剩下那六七十个人，接着又去守狮子山，打到只剩下二三十个人，快死光了，连阵地都没有人守了，这是我听向南顺和段班陆讲的。

向南顺以前跟我一个大队的，1951年洞口设县，他屋在蓼水河对岸，划到洞口县洪茂乡双江村去了；段班陆是隔壁花桥村的人，他跟我打过岩口铺，不是一个班。我们这里打仗回来的，就我们三个，他俩都打过芙蓉山，我问起班长丘中胡的情况，段班陆告诉我，有一次鬼子偷袭，对面山里（指芙蓉山）急急忙忙喊话报警，丘中胡把碗一摔，就去开机枪。鬼子狡猾得很，早瞄准了打机枪的位置，丘中胡好像是头部中弹死的。段班陆告诉我，丘中胡死的时候，就在他身边，他看到情况不好，端起机枪马上偏了下位置，要不，他也要“交代”在那里了。我还问起他们可晓得一个叫曾桂安的人，他是洞口县山门的人，当时只有十五岁，（罗）连长把他拢在屁股后面，专门吹号子的那个，他们两个都讲在芙蓉山没看到那个人，解放后我托熟人到山门去问，也没有问到他的消息。



口述人 / 唐亮，1935年生，岩口铺镇岩口铺村村民，岩口铺阻击战发生时，只有九岁多一点。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6年12月5日

“罗连长犯了警惕心，摸着黑就把武器弹药全部搬到山上了”

我八字蛮丑的，半岁无娘，一岁没爹，全靠我那个孤寡奶奶盘大我，她在街上卖小菜，屋背后还有几棵李子树，李子熟了就顺便卖点李子。

1945年农历三月初八，国民党在这里打死几十个日本鬼子，死的人数我们都不清楚，鬼子又不摆尸身，他们把尸货运到狮子庵，一把火烧了的。鬼子死了很多，他们要报复，农历三月十二，下着个细细雨，来了一个团（指116师团120联队），千把人的样子，围起了烟堆岭，准备攻山。农历三月十四，天气比较凉，岩口铺的人都逃难了，只有我奶奶，是小腿脚女人，走不动路，又挂念屋里，就没走远，和一个叫肖桂大娘的，两个都是四十七八岁的女人，躲在山脚下的岩洞里。那个岩洞又不深，百把米的样子，我奶奶她们被搜出来，背靠背捆起。有一个汉奸，我奶奶老死的时候都还记得他的样子，又高又壮，穿着蒙古袍子，满脸横肉，留着个络腮胡子，扔了个炸弹。我奶奶屁股全被炸烂了，肖桂大娘被炸断了脚，痛了一个多小时，死的时候喊我奶奶：“满娘哎，我不行了，要我崽女莫哭。”喊了几声，才不喊了。我奶奶就蛮急，我要是死在这里如何得了，我还有个孤孙没人带啊，她就念岩口铺边上皇觉寺庵堂里菩萨的名号，念完后一摸绳子，绳子就脱了，那真是菩萨保佑。我奶奶一步一磨，磨了四里路，到了杨岩我姑妈家里，才捡了那条命。

在我们老街，有三十多个人被杀了，都是逃难没走脱的，有一户人家不舍得走，祖孙三代人，被杀得干干净净。尸身全部扔在烟堆岭山脚下的那个水塘里，都漂满了。那个上次回来探访的老兵（指向本全）也讲起这件事，我们这里的人都晓得。

农历三月中旬的样子，夜里六点钟左右，鬼子放火，我们这里一里多路长的老街，被烧得干干净净，时不时有屋柱被烧断，屋顶塌下来，“轰嗒轰嗒”响声震天。我挂念我屋背后墙上冬瓜藤上结起的三个大冬瓜，清早赶回来看，都变成一片瓦渣场了。

那个时候我年龄小，蛮多的事我不记得。不过我记得一个驻扎在这里的姓罗的连长，个子很矮，只有那个老兵（指向本全）那么高，一米五多一点点，他看我屋里穷，每次都给我饭吃，每餐还有肉，不是鸡肉就是狗肉。他是个良心好的人，也是

个大能干人。日本鬼子要打这里，他们起先偷偷派汉奸到这里侦察地形，侦查到我们的军械弹药都放在老街往东边的那个过路亭子里，罗连长是个蛮稳重的能干人，他犯了警惕心，摸着黑就把武器弹药全部搬到山上去。第二天清早，日本鬼子来了，起手就炸了那个亭子，结果“轰隆隆”放了一个好大的空炮，亭子半边全都被掀到天上去。我们这里好多的人都晓得这个半边亭子的事，这是我们这里的传奇故事，大家传领了好久。

延伸：1945年岩口铺阻击战进程表

参考《邵阳文史》（钟敦礼编）、向本全和当地老人口述、湘西会战时来往电文等

4月15日14时 日军120联队300余人携炮一门来犯。轰炸过路亭，战斗打响。

4月15日~21日 敌攻打铁丝岭、百弓坨，守军以手榴弹守卫，至21日晚撤离至邵榆公路对面之烟堆岭。

4月21日凌晨 芙蓉山一机枪排来援，守军侧击烟堆岭围敌，敌不支，向东溃散。

4月（21日晚~22日6时） 敌调集其赶修邵榆公路的独立工兵四十联队第一大队数百人，携炮两门由东、南、北三面围攻岩口铺烟堆岭，守军官兵自副连长钟蔚文以下伤亡极重。守军即派守备西端的孟宪章排长率兵一班绕入敌后，向敌侧背以手榴弹猛袭，继以白刃拼杀。至6时，敌遗尸52具，纷纷向东溃退，守军夺步枪12支及大批军用品。

4月24日 敌又以300余人由东、南、北三面围攻烟堆岭。后来又增山炮一门、迫击炮两门，于25日晚猛攻烟堆岭阵地。

4月28日 敌公路已修至岩口铺东北5华里的狮子庵附近，北部白山村、南端鸡笼山各增兵200人，围攻烟堆岭之敌已达500人。敌人并将烟堆岭所抓的老百姓以窝藏罪全部杀害。

4月29日中午 敌增兵至800人，四面围攻烟堆岭阵地，炮击300余发，致守军工事全毁。黄昏后，敌蜂拥突进，为守军手榴弹所阻击。拂晓后守军空军飞临助战，敌势稍挫。

5月2日 100军19师57团奉军长李天霞令：芙蓉山守备部队奖银元3万元，岩口铺守备部队奖银元2万元，并命令指挥芙蓉山、桃花坪战斗的伍副团长转告岩口铺守备部队于3日黄昏后将残余工事摧毁，午夜由西南方突围，4日归队芙蓉山。当晚，守军集合传令兵、炊事兵扼守核心工事，抽调精兵10余人，向危急的西北据点增援，且利用暗夜潜入敌侧背猛烈冲杀。

¹. 岩口铺，位于衡邵盆地和湘西南丘陵地带的分界线上，湘西会战期间，离日军第二十军战役总指挥部驻扎地邵阳仅22千米，是整个湘西会战期间最前沿的阵地。岩口铺阻击战，一共歼敌田丁由五郎大尉以下两百余人。 ↵

². 在很多官方史料上被称作烟袋岭，系以讹传讹。现仍以当地村民称呼烟堆岭为准。 ↵

³. 这支部队当时已划归74军57师调配。另据向本全所述，他原属部队参战士数有126人，加上1945年4月21日从芙蓉山调来的一个20人的没有满编的排和岩口铺原有驻守部队，总数为196名官兵应当是较为可信的。湘西会战中，正是这196名官兵的成功阻击，为后方赢得了时间。撤退后，所剩兵力补充到了兵力严重不足的芙蓉山据守部队。 ↵

- ⁴. 湘西南民俗，在立夏节这一日，吃糖油米粑或汤圆。晚辈带着礼物去看望家中长辈，长辈则赠予吃食。 ↪
- ⁵. 据向本全回忆，当时武冈一起征召去的有一个团一两千人，全部补充到了受损较大的197师。 ↪
- ⁶. 钟雄飞，中央军校高教班三期毕业，湖南新邵县洪溪乡人，1908年5月17日出生。抗战时期，其参加了几大主要会战。湘西会战期间，钟雄飞做为团长亲自指挥江口青岩阻击战。1951年其病故于长沙。 ↪
- ⁷. 此师系1938年1月由丁炳权在长沙组建，承担长沙铁路段护路任务。抗战前中期，一直活动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带，也曾参加过武汉会战、鄂南游击战和南昌会战。在湖北有过几次驻扎，期间与日军也发生过数次交火。向本全所说的“在湖北吃的大败仗”，具体是哪一仗，难以考证。 ↪
- ⁸. 空军中美混合团第5大队。仅在1945年4月19日一天之内，就先后出动58架次，直接配合地面部队战斗。又于4月20日出动战机32架次，直接支援岩口铺守军，并攻击敌新占的桃花坪阵地及后方设施等，计毙敌200余人，马15匹，炸毁仓库5所，弹药库1所及阵地多处。 ↪
- ⁹. 向本全和陈林华两人均说到地面哨兵旋转标示物给飞机指示方位，此事真实性应确凿无疑。只是一个说用的是竹竿，一个说用的是锄头。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哨兵选择了不同的标示物。 ↪
- ¹⁰. 芙蓉山，位于隆回县城以西5公里的双井村，海拔529.7米，扼湘黔公路咽喉，是日军西进必倾全力争夺的要塞。整个湘西会战期间，日军始终不能突破芙蓉山而利用邵榆公路，兵员、辎重输送必须绕山区崎岖小路，时间及精力耗费严重，补给线延长，极大影响了其战力发挥，也阻碍了其溃逃路线。岩口铺、芙蓉山阻击战的胜利，正是湘西会战得以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
- ¹¹. 狮子山位于芙蓉山东，西为辰江岸边，是芙蓉山阻击战重要阵地。1945年5月22日拂晓，日军217联队在芙蓉山东西线的曾家坳乡大洲村安设迫击炮，向辰江对岸的狮子山守军工事轰击。第9连配合中美空军第5大队重创敌军。后狮子山阵地被日军攻占后，连长罗文生率第9连残部退守芙蓉山。 ↪
- ¹². 此役中国军队亦阵亡副连长钟蔚文以下官兵17人，伤31人。 ↪

龙潭：最后的战场

溆浦县龙潭镇，是抗日战场中的最后一地。1945年4月18日，109联队第一大队饭岛挺进队1000余人在英雄山¹，与国民革命军74军接火，打响了龙潭战役。4月22日，109联队本部，加上炮兵、特种部队约5000人占领木敦洞²，同时，湘西会战中其它各路日军，无论掉头东进、北上、西进，都将龙潭做为其进攻目的地，其作战意图，都是为了会师于龙潭，再以龙潭为跳板，图谋芷江。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的日军，至此开始孤注一掷。

74军51师，100军19师和63师在此拼死抵抗，日军撤离大小黄沙时，被歼3000余人，撤离马颈骨时，又被歼2000余人。

龙潭战场至今也是国内面积最大的战场遗址地³。其地为雪峰山西麓，是沅水和资水的分水岭，如果把雪峰山比喻成一条巨龙，龙潭战场遗址就位于这条龙的腹部。雪峰山在这里变厚，也变得更高，其中蜡烛岭海拔1000米、红岩岭海拔1363米，遗址所在地的山峰，海拔很多接近或者超过一千米。这里云雾缭绕，松树茂密，灌木丛生，你有多赞美这大自然的美不胜收，当初翻越这些山岭的日军也就有多恐惧这里的寸步难行。



口述人 /张传成，张传美，张富堂，均为溆浦县龙潭镇大华乡小黄村第一组村民，龙潭战役时分别为16岁、13岁、6岁。张氏三兄弟住在英雄山脚下，口述以张传成为主，张传美、张富堂为辅，张富堂是当地退休民办教师，一直致力于当地抗战史料搜集，整理有《抗战最后一枪——英雄山决战》的小册子。

采集人 /张映科 **采集时间 /**2015年8月5日

“两边人马隔得特别近，估计都没有一百米”

民国三十四年（1945）三月初六，早晨六点钟的样子，日本鬼子打来了。

来的是他们的先遣队，叫饭岛挺进队，有千把人，经过隆回白马山、麻塘山，过油溪坪，就到了这里。都是高头大马一个个的，这个先头部队是精选的人，不是后来的娃娃兵可以比的。他们由隆回小沙江过来的汉奸⁴带路，第一天来，就上了英雄山。日本人好狡猾的，摆了个架势，都以为他们要去打桥江机场⁵，把中央军都引到北边桥江那边去了，其实呢，他们的目标是大小黄沙。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集合

呢？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很好，往东北方向，翻过山就到了隆回，小沙江、司门前；往东方向，翻过山就到了洞口的山门；往南，是洪江和洞口的江口；往西边走，过活水、铁托，就到了怀化。鬼子一到怀化，芷江就没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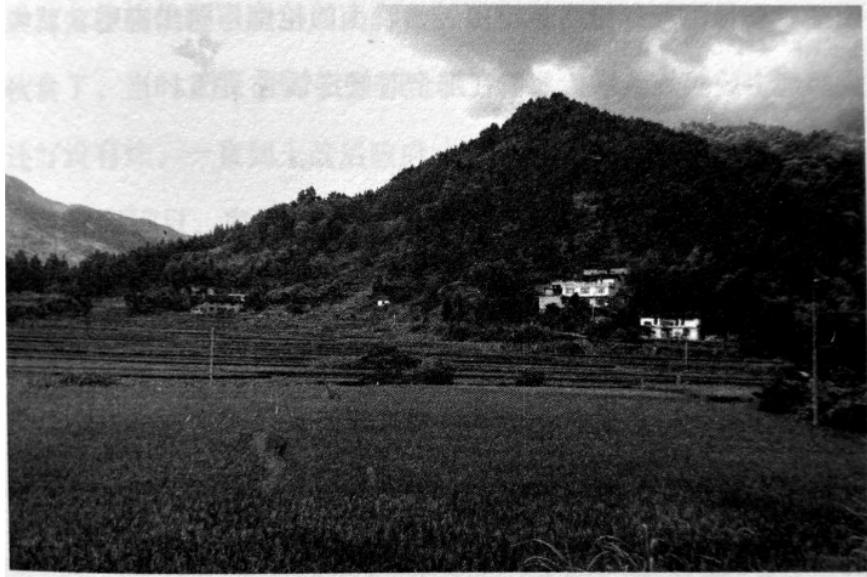
还好，地方上报了信，中央军连夜就调兵回来了，在这里把日本人堵住了，只迟来了几个钟头。晚上十点多就在我们小黄沙布防，是74军51师的153团，团长叫王梦庚，团指挥部设在我们院子（当地方言，指自然村）后面竹山山脚下的张家祠堂里，两座山的直线距离差不多只有四百米，机枪都能互相打得到的，中间只隔了个小溪。中央军一到这里，第二天早上7点钟左右，153团第七机枪连文成海的部队，就跟敌人接上了火。

竹山和英雄山都是山窝窝里面的平地陡山，一个海拔740米左右，一个海拔763米。日本人只占着英雄山的主岭，山顶上有个岩屋（当地方言，指岩洞），叫做豹子岩屋，里面七拐八拐的，有几层通道，能住一两百个人，日本人躲在岩屋里，把它作为指挥部，相当难攻。

我原来帮地主屋里放牛的，屋里穷，买不起难民证出外逃难，只能躲在屋里，打仗的时候我也去了部队里帮忙。我参加了搬运组，专门给守军送饭送水送弹药，有空还帮挖战壕。还有后勤组，他们就在张家祠堂的团指挥部里做伙食，听他们说在那里碰到过周志道⁶师长，王耀武军长也来住过两日，他住的房间现在还在，只可惜我当时不认得他们。

交接组是最危险的，我们死了两个传奇人物，都是前后两任交接组的组长：一个是袁杆子，5月4日，受了重伤抬往湘潭医疗站，刚抬到文昌阁路上时，突然从英雄山打来一枪，正中肚子，当场就死了；另一个镜和尚是5月7日牺牲的，他们参加第一火线只打了两天，后来编入第二火线（位于枫树坳、英雄山左侧一带），估计他是在第二火线牺牲的。

我也差点死了，子弹打在我的左手小指上，当时我正担着五六十斤的担子，给英雄山半山腰上的守军送饭。我左手搭在扁担上，山顶一颗子弹打来，打在扁担上，把我搭在扁担上的小指打掉了一截，那个时候已经过了4月23日了。4月20、21日我们发动过两次冲锋，文臣海连队的人打得就只剩下了7个人了，连长也死了，到我们院子里抬了一副棺材去埋，当时差不多已经把半山腰占了。到了4月23日，又调来了援军，接着打，打到快到山顶了，从那天起枪声就没停过，晚上的枪炮声噼里啪啦，就像大年晚上放鞭炮一样，我就在那个时候送饭受了伤。



2015年8月5日，英雄山下的稻禾已开始抽穗。

“捡尸队搞了九天都没搞完”

日本人的战壕是一个圆窝窝，只伏了一个人在里面，把半截头露在外面，我们部队的战壕是一一线的，纵横交错，像蜘蛛扯的丝网，两边人马隔得特别近，估计都没有一百米，两边人马都有机枪。中央军还带了电台⁷，一根电线扯好长，扯到半山腰，只跟飞机上的人讲话。

地面上也有给飞机做标示的哨兵，他们在地上给飞机标记号，要么是用草绳绳扯个“井”字形，要么用白布扯个“十”字形，要么是摇红旗，要么是烧秧草，点起一堆火，这个记号经常变，有记号的地方，飞机就不投弹。飞机也经常来，但是没法在英雄山上投弹，两边人马挨得太近了，怕误伤自己人。到了5月6日，飞机跟守在山腰上的中央军商量好了，中央军退50米，用烧秧草为记号，没有烟的地方就是鬼子的阵地，于是来了六架飞机，投弹，炸得个天翻地覆，树都全部没有了。我看一颗炸弹落在石头上，“嘣”的一声，小石头到处飞，飞得天高。同一天迟一点儿的时候，51师侦查排的高排长，侦查到曾家坳屋后树林里埋伏有很多鬼子，于是插个红旗做记号，飞机接着又把那个地方炸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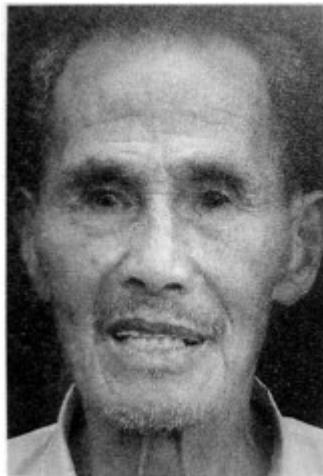
我还记得，有一颗哑弹还没到英雄山，就从飞机上掉了下来，落在我们院子边上后面竹山的山脚下。我手受伤后就不去送伙食了，当时正躲在院子里看到了，吓了好大一跳，这颗炸弹还好没有炸，一直到土改后政府才派人取走了。

到5月7日，鬼子就往西边退到木敖洞那边去了。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剩下的日本人摸黑抄小路走的，我们都不晓得。听说黄连江关圣殿庵堂是日本人的一个伤兵医院，也都被他们自己一把火烧了，差不多烧了有五百多个人，我们这里上了年纪的都讲过这个事。

仗打完后，上面要求我们捡尸，这个事是没有报酬的，我们想着那些兵也是中国人，保里就成立了个捡尸队，有30多个人，将英雄山满山的死人根据衣服，稍微分了一下，都捡起来了。被土埋了没找到的就算了，日本兵一小堆，大概有四五百个人，中央军一大堆，大概有一千多人⁸，然后一担担地都担到弓形山⁹。三个小时一

趟，从5月12日，搞了九天都没搞定。有些人已经死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了，烂尸和骨架分不清，也就不管了，就统统用畚箕一担担地送到弓形山，我们自己的人埋了一个大堆，立了碑，日本人就埋在北面一点，那些人肯定不会给他们立碑。

我到豹子岩屋打扫战场的时候，捡到一个日本人的医疗盒，还有两颗子弹壳，一直放在我屋里，刚刚还拿出来，现在被我婆娘收到柜子里去了。



口述人 /向梦瑞，土家族，1924年7月生，现居于溆浦县龙潭镇金厂村九组，地方抗日武装第六挺进纵队第四支队部上士文书兼管印员。1945年4月入伍，曾参加过湘西会战龙潭战役，抗战胜利后退伍。

采集人 /张映科 **采集时间 /**2015年8月5日

“周师长突然站起来，‘等我死了，再说’”

你一来就突然告诉我，周志道师长他死了，还讲他在台湾1984年就死了，搞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还在想，这么多年了，他怎么就不来我们龙潭看一下呢。

我跟他谈过几次话，他脑壳方方的，一米七零左右。当时我是第四支队支队长向承祖¹⁰的文书，专门管印的。人死印在，印我随身拿着，放在胸前口袋里，来了军报我就读，支队长写了字，我就盖印。我随向承祖天天去横板桥的岩湾村周师长那里汇报工作，他在那里坐着，听着我们汇报工作，不多说话，说话很慢，从不谈吃酒谈呷烟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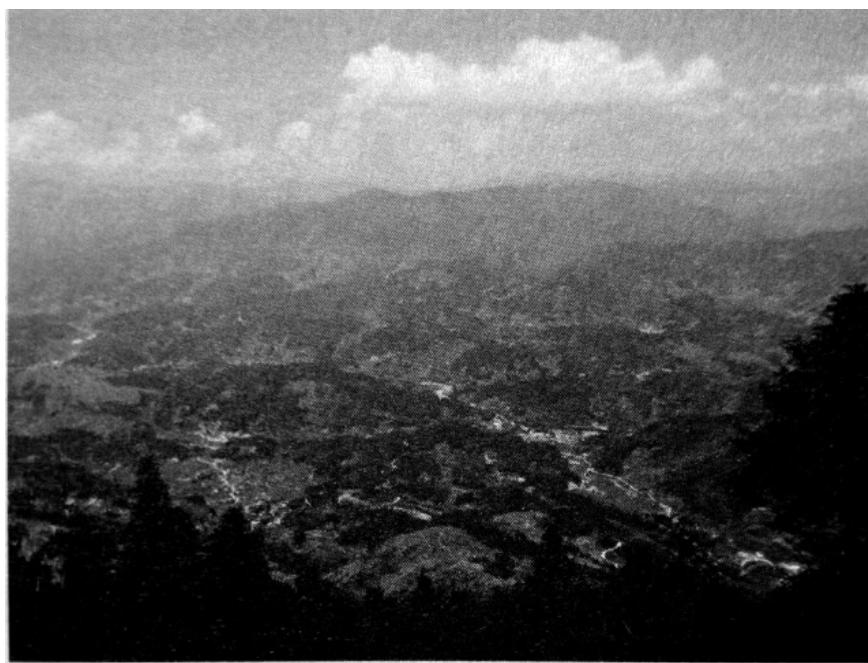
有一天，从山门过来了两匹马，是两个副官，肩膀上有三颗红星子¹¹，马蛮高，他们是远征军的代表，远征军有两三万人呢，一进门就放下了军报：“让我们来打，周师长，您辛苦了。”周师长突然站起来：“等我死了，再说。”过了几天，又来了两个副官，我是文书，这次我就看了他们的名字，他们一个姓吴，一个姓张，这两个人也是远征军派来向周师长抢战的，周师长还是没同意。

我能当上向承祖的文书，是因为我小学毕业了，能写能读，算文化人。我是自愿当兵的，日本搞南京大屠杀，又在长沙和邵阳杀过蛮多人，现在打到龙潭我家了，我就是独生子，我也愿意和他们去打一仗，打死算了。1945年阴历二月份我就去当兵了，部队刚成立，炮就响了，日本人打山门偷偷摸摸过来了，他们运气不好，一来就跟我们谌志锦¹²的部队在油溪坪碰到了，谌志锦就马上报了信。

向承祖是我们龙潭的名人，一般的人喊他向老高，他有一米八七，比我还高四寸，人蛮威武霸气。他晓得日本要过来了，就在龙潭成立了一个卫戍临时部队，全部是我们龙潭七金片¹³这一带姓向的，打仗不过父子兵，这就是我们向家的父子兵。来了就登记一个名字，领一杆长枪，最差的枪是汉阳造，也有中正式。我们也没有搞过训练，发枪的时候，会开枪的就告诉不会开枪的。中央军装备比我们要好，他们每个人还有两颗手榴弹，还有轻机枪和重机枪，机枪都摆在山顶上，我们的机枪是“砰砰砰砰”连着响，日本人也有机枪，是“高膨高嘭”两响连着响的，他们的三八式步枪也是一枪两响。

我们支队跟着中央100军19师，在青山界，打过一些仗，但是听说最惨的是在英雄山，周师长的第三营，叫姜期永营，攻了三次都没攻上去，500多人只剩下十多人，后来来了飞机帮忙，才攻上去的。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看守俘虏，只要来了报捷文书，我就晓得，又捉到日本兵了，送来的就放在屋门前的坪里，吊起捆起。我们就守在山下的据点里，一般是躲在中央军后面。有次日本人打到我们支队部门口了，这个情况很少，在前方放哨的中央军先开枪，我也跟着开枪，我发的是一把快慢机，只能打近的，不能打远的，来的日本人都被打死了，我不晓得有没有被我打死的。打完后我看下左边，有人被打死了，我看下我右边，也有人被打死了，只有我没有受伤。



青山界。



弓形山阵亡将士墓园。

“现在这个部队除我外没有一个活人了”

上战场，横竖准备死，大家都不管了，只晓得吃饭，平常吃三碗，现在能吃五碗。

日本人也蛮多不怕死的，缴枪后，就有很多人自杀。如果有三个人是一起的，有两个人死了，一个人伤了手伤了脚，他自己就会拿刀捅自己的肚子。但是一般的日本兵个子都蛮小，十五岁左右的日本人多得很，都不高，枪都比他们的脑壳还高一个脑壳。队伍碰到了，我们只要喊一声“不许动”，他们就把枪举起，投降。我们也不杀他，蒋介石不准我们杀俘虏，捉到的我们就三个五个捆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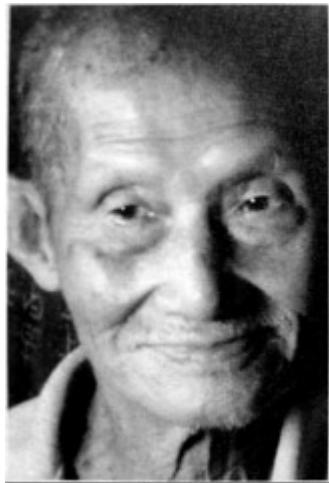
平常他们都躲在战壕里，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埋头不出来。我们走路也都是跟着土坎坎走，或者俯倒在地上走，只要一抬头，对面机枪就响了，他们都穿一双靴子，我们穿草鞋，在山路上，他们是走不赢我们的，但是他们拼刺刀比我们厉害蛮多，这些跟电视里放的，都完全不一样。

有个时候我们在山弯弯处，转出来，突然碰到了，就互相用刺刀刺。要是在夜里，看不清，就互相摸一下，日本人穿的是黄呢子衣服，我们穿的是麻纱布，摸起来是不相同的，然后就互相刺。[14](#)

日本人被打败后，剩下一点点人，我们就追他们，追到邵阳的黄安冲（位于邵阳县小溪市镇），他们躲在碉堡里不出来，我们也不攻，都没力气了。过了四个月，日本人投降，上面就把我们部队解散，每个人发了两块光洋，愿回家的就回去，不愿回去的还可以继续当兵。我就回家了，过山门马颈骨[15](#)时，从龙潭退出来的日本人在那里当野猪一样的被打了，满山满谷的尸骨，七八个堆在一坨，都烂了没人收[16](#)，都是个子蛮矮的日本人，也有蛮高大的蒙古人，我算了下有十多二十个，他们每个连队都配有三五个的。我认得蒙古人，他们都是络腮胡子，手长脚短，脚还有点弯，死一个人身边就跟着死一匹马，他们是骑兵。

我们部队有三千多人，到解散前，就只跑了二十多个人，他们都是金屏村向家冲姓向的，到了部队里十多天。就从隆回金谭魏家塅跑回来了，把枪藏在屋里，佯装打了日本。按照当时的军纪，这是要杀头的，但是向承祖没有处理这个事，他也不好

处理，因为这些人跟向承祖都是我们向家同一支的。我们组里跟我一路去一路回的，只有个叫向延本的，他回来后就一直没有结婚，死了有38年了，现在这个部队除我外没有一个活人了。



口述人 / 曾锡贤，1922年农历五月出生，洞口县高沙镇石堰村人。1940年考入湖南军医预备团第二分团（邵阳）速成班学习，同年毕业分配至74军51师152团第2营，1942年由衡山去昆明进修，毕业后参加龙潭战役，任第二营战场救护站主官。解放战争时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平潭岛战役，数次被俘又数次逃脱。解放后进了江西中南军政大学江西分校（第23步兵学校）第一大队任主治医生，遭人构陷贴反动标语入狱五年，1956年出狱后回乡务农至今。老人耳聰目明，车子还没进村口，他就出来迎接了，记忆力也非常好，非常风趣幽默。他很自豪地说他一分钱都没花，就把婆娘领回屋了。我们齐声问他婆娘漂亮么？他不做声，丢过来一个“你懂的”眼神。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5年8月6日

“伤兵拿着我贴的伤票，去任何医院都要收容的”

我在安化大麓中学读的高中，但是读再多的书有个屁用，我还是去当了兵。

先在邵阳读军医学校，1942年被调到昆明参加美国人办的干部训练团，学战场急救。学完回来，部队已经打完常德了，就到了衡阳。站不住脚，日本人跟着来了，就又到了邵阳、隆回，再到洞口县黄桥镇五里牌的车轮铺。

我当时向团长请假回家，回家干什么？哈哈，结婚。我是四年前订的婚，这回就单身一个去了我岳父家，什么东西都没带，部队里又没发我工资，也没跟我岳父岳母商量，就用两个人抬的轿子，把她接进了我屋里。回来还只一个礼拜，我的卫生兵就跑来了：“医官，马上回去，敌人来了，敌人打到（隆回）荷香桥了，你快走。”

当时我们部队驻在资江这边，就号召老百姓去挖马路，全部挖烂，日本人的汽车和坦克就过不来了。后来我们又回了黄桥，再后来部队拉到了龙潭，在龙潭正式开始打。

第二营副营长伍雄才带着第五连守一个山头，对面的山头被日本鬼子占了，两座山之间只隔一条路，一块田。我和营长周亚求在山下。山下有条小小的街，我住在街上一栋木房子里，部队指挥部设在一个庙里（紫云宫，又名泗神庙，位于龙潭镇圭

洞村）。我负责给伤兵打针吃药、包扎，也给伤兵贴伤票，伤票上面写姓名、籍贯、职位、哪个地方受伤、几等伤这样的，拿着我的伤票，去任何医院都要收容的。

有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日本人下山偷袭，虽然我们预料到他们会来，派了一个班守卫，但是没想到日本人不放枪，只带了大刀，把那个班几乎全部剁死了，加排长只剩下三个人。排长吓哑了，围着山脚下走，他要是向山上报警就好了，他没尽到自己的责任。

日本人爬到山上面，哨兵喊：“谁啊？哪一部分的？”，日本人不接话，一枪打过去。我们五连的连长还在说：“谁乱打枪啊？不准乱打枪！”说着他就被日本人近距离一枪打在喉咙上。这时候，已经有一百多个日本人上来了。

伍（副）营长就大喊：“不准退，大家给我打。”手榴弹、机枪一窝蜂都响了。幸亏了这个伍雄才，他不准任何人退，要不队伍一下子就被打垮了。第五连又叫第四连过来帮忙，打了一个小时，日本人打死了七八十多个，只剩下二十个人，就又退下去了。¹⁷

第五连有个黄排长，是我们黄桥乡下的人，行军我们都是走在一起的。他之前跟我说：“医官啊，这次打，我看危险啊。”我就说：“不要紧的呢。”哪个晓得啊，这次却正好打死了他。伍（副）营长不准退，他就拿着轻机枪往前扫，这是美国人的新式枪，每个排长发了一把，他扳着板着扳不动了，就喊：“报告伍（副）营长，我的枪扳不动了。”“扳不动你去修啊！”他原先是卧倒的，这时下意识地站起来，一站起来，就被日本人一枪打倒了，当时还没死，从山顶上一滚动到山腰，才死的。



湘西会战中，被200米外日军迫击炮炮弹炸伤的中国士兵。

我有15副担架，有一个排专门抬人，抬到我这里来，已经落气了，血还从担架往地上流。他胸前的衣服口袋被翻了出来，我估计抬担架的人以为他是个军官，有钱，就搜了他的口袋。我把口袋放进去，里面还有张照片，是他婆娘，我认得他婆娘，部队驻在黄桥的时候，他带着他的爱人。

这次总共打死了四个排长，除了五连的黄排长，还有四连的三个排长。四连的连长是小小个子，他喊着口号冲在最前面，三个排长紧跟着他身后，结果日本人一枪一个，把他身后的三个排长都打死了，连长个子矮，他没事。

“美国人上完课问问题，答错答对他都喊你坐下”

仗打到吃早饭的时候打完了，我就安排人挖了四个洞，在急救所屋后面的空坪上，排长要单独埋，其他的集体埋。没有棺材，我就用行军毯盖着他们，这已经算特别礼遇了。我还写了木板子，怕亲属过来找。过了不几天，黄排长的岳父带着他的婆娘就来了，他们以为战争结束了，结果一来就听到他死了。

那天天亮停了火后，我以为没事了，就到山上去检查，看还有没有伤兵，看埋的人是不是都埋好了，我还管埋人的事，不埋会臭得很。走了十多分钟到山上，我晓得山上还驻着一百多人，但到了一看，一个都没得。为什么呢？他们都挖了壕沟，头上戴了草做伪装，我看不到，其实他们都在我周围。我还在想人都到哪去了呢，一个排长，就在我脚下面喊：“医官，蹲下！你上来干什么？赶快卧倒！赶快卧倒！”我才蹲下去，对面山上连发三颗子弹打了过来。

我没被打死，要谢谢这个排长。后来我慢慢细细地下山，跟着我溜下来的还有几个兵，他们被周营长带的一个班长堵住了，“上去，谁叫你们下来的”。

龙潭的仗打完后，部队到山门去赶鬼子，我被调到洪江沙湾寨头，美国人在74军开了一个训练班¹⁸，51师要派两个医官去，他们不要文盲，152团就派了我，151团派的是他们的卫生队长傅宝龙。教官都是美国人，60个学员，我45号。美国人上完课问问题，答错答对他都喊你坐下。他只要喊：“45号”，我就举手，站起来，他问哪个病是哪个原因，我以前学了的，还学了两次，我都能答出来，结业时，把我算作第一名。毕业典礼，一排桌椅，我坐第一个。

回来的时候，给我发了两箱子药，一米长，一尺宽高的箱子，不好担，我就用马驮着，药是那个时候最新式的药品，吃了最管效的。你要是痛，我就拿治痛的药，你要是出血，我就拿止血的药，给兵用一个，好一个，都不用第二次，他们都说我很能干。我哪里有什么能干，完全是药起的作用。¹⁹

¹. 英雄山原称为鹰形山，抗战胜利后改名，位于小黄村。 ↵

². 木敖洞，包括现已改名为栗山村的木敖洞村、红丰村、梁家洞村。狭义的木敖洞仅仅指的是栗山村，周围高山耸立，这是一片被高山包围的比较平坦的山间谷地。 ↵

³. 龙潭战场遗址，包括大华乡所管辖的木敖洞、小黄村及整个龙潭镇大华乡，龙潭镇的圭洞村（松木坳阵地所在地），溆浦县葛竹坪镇（龙竹湾村青山界阵地和方竹村红岩岭阵地所在地），甚至更远一点的洞口县山门镇铜山乡的马颈骨，隆回麻塘山乡的白马山。除了蜡烛岭、1450高地，以及青山界的羊角山被石材商滥采破坏外，战场遗址地风貌保留尚完整。 ↵

- ⁴. 此人姓王，不能说是汉奸。据《龙潭战役史简编》（韩赛君，溆浦县志办）记载，为了自卫和防止土匪，1945年4月16日深夜，小黄村村民谌贻位端着步枪在村口巡逻。突然有人叫他：“满老板，您还带着枪在这里干什么？日本人已经上了鹰形山，天亮了要下来搞早饭哩。”谌贻位一看，原来是他家曾经的一个王姓佃户。谌贻位立即绕村呼喊要求大家快躲，但无人相信。所幸，日军到了英雄山后，又要急忙去占领附近相关高地，并挖掘工事，随后中央军赶来，小黄村村民免遭屠戮。 ↵
- ⁵. 在溆浦县城东郊，战时曾有芷江过来的飞机在这里临时停靠。该机场现已废弃。 ↵
- ⁶. 周志道（1900~1984），江西永新太崦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毕业。1926年底参加北伐，后参与了抗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重大战事。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所部被全歼，只身逃脱。同年到台湾，任“国防部”中将参议、陆军总司令部高参室主任等职。1959年退役，任台湾糖业公司顾问，1984年5月10日在台北病故。 ↵
- ⁷. 由于日军占领了英雄山等高地，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在工事伪装下，空中很难发现目标。因此，中国军队特由空军地勤部队芷江航空站指派地对空联络小组四人，携带美制通信装置，安放电台，与航空站进行联络，从而使空军有效地配合了地面部队作战。 ↵
- ⁸. 中国军队在此牺牲的将士，有名有姓的就有740名，还有无名烈士，一千余人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 ↵
- ⁹. 弓形山烈士陵园，建于龙潭镇郊外一个山头上，从山脚到山顶有297级花岗石台阶，整个陵园占地8300平方米。进门是一座三门四柱的高大牌坊，其上刻着“陆军第四方面军74军51师湘西会战龙潭战役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有国民党军政要员题写的12块石碑。陵园最顶部是一座直径12.5、高2米的花岗石墓碑，此陵园“文革”中被毁，今已重修，12块题词碑也找到了11块。 ↵
- ¹⁰. 向承祖（1895~1968），字楫中，溆浦县龙潭镇金厂村人。1918年考入张学良所辖湘西靖国联军在沅陵的第二军军官研究所，毕业后参加过北伐战争，1936年所在部队改为地方保安团，任团长，1938年11月任溆浦县县长，因与谌元章交厚次年被开职，此后一直在家乡任教。湘西会战爆发后，积极联系旧部以及游击队，并担任抗日挺进队第六纵队第四支队支队长。1949年春向在湘西收编民团武装4000余人，任湖南雪峰山区自卫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二总队队长，同年10月率部起义，溆浦和平解放。 ↵
- ¹¹. 北伐胜利后，国民革命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军衔大小以领章上横线条数和立体三角星的数量表示，不同兵种领章的底色有区别，步兵为红色。向梦瑞观察远征军的副官领章为三颗红星，应是记忆有误，实应为红底三颗黄星，军衔为步兵上士。 ↵
- ¹². 谌志锦（1907~1955），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人，谌志锦早先为当地石匠，曾短暂参加过当地军阀组织的北伐部队，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与向承祖交厚。退伍后与其弟谌志华加入陈月红部当土匪，后与其弟又独自组织地方匪兵武装，是龙潭地区最大的匪兵团伙。他们不会主动骚扰当地民众，明里给地主富户看庄护院，或为行商武装护行，暗地里的所作所为就无从知晓了。1944年至1945年任王耀武抗日游击队大队长，1949年率部参加溆浦和平解放，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土改”期间去世。 ↵

¹³. 指的是溆浦龙潭金洲、金燕、金厂、小金厂、金牛、金黄、金屏七村所在的一片地区。 ↪

¹⁴. 据《雪峰落日1945》（谌谋盾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向梦瑞说的应该是此次夜战：1945年4月28日，为夺取青山界，国民革命军第19师55团组织200余名敢死队员，趁月色朦胧之时袭击山顶守敌，接近敌军后肉搏，随后连破三道防线，但我敢死队员遭受敌机枪扫射，牺牲过半，幸亏有63师一部赶来增援，敌109联队第12中队几乎被全歼。此战过后，木敖洞的日军唯一的退路被截断。 ↪

¹⁵. 据《雪峰落日1945》及其他相关资料记载，1945年5月5日，被包围在木敖洞的日军109联队余部深夜突围后，与赶来增援的133联队一部分、116联队运输队在龙潭黄连江村会师。为躲避我军飞机轰炸和74军以及100军19师衔尾追击，109联队丢掉辎重，于同日清晨由山间小路，从洞口县山门镇桐山乡望乡山向山门镇方向逃窜。由于山里人猎户居多，几乎家家都有鸟铳，瑶民兰春达组织的游击队对逃跑的日军骚扰不断。在望乡山殿后的日军116联队运输队四百余人被全歼，日军109联队两千三百余人进入了雪峰山的天罗地网，只能以杂草和水充饥，其伤员纷纷剖腹自杀。5月14日，这路日军刚好又被赶过来增援的18军11师，堵在山门桐山乡马颈骨深山峡谷之间，加上有飞机轰炸，除两百余脱离大部队进入深山逃走外，其部包括联队长在内被全歼。此战中，18军牺牲四百余人，葬于山门镇桐山乡鸡公岭（由于当初这里骨骼很多，后村民将此岭喊作“骨骼岭”），原有纪念牌坊和纪念碑，今只余一圆形坟茔。 ↪

¹⁶. 由于当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追击的部队又急忙赶去追敌，致使日军尸首无人掩埋，臭气熏天。在1945年，此地还因此爆发过瘟疫。 ↪

¹⁷. 进攻部队为日军109联队第九中队，被全歼。步兵109联队饭岛挺进队第二中队的森川善一在《芷江作战》一诗中记录了松山高地守卫战的惨烈战况：“红岩圭洞龙潭司，夜袭松山冷彼肝。一骑守城成铁壁，全军攻敌为弹丸。前后错纵白兵膻，左右分崩青血酸。食尽无弹只有刃，勇战空百九兵团。”诗中的“九兵团”，就是第九中队。 ↪

¹⁸. 这个医官进修学校，教官为远征军随军美军医官，生源应该是各军抽调，校部位于沙湾寨头向氏宗祠，其也曾为中国陆军机械化学校校部旧址。1936年3月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组建陆军交辎学校，以培养装甲兵骨干，中国装甲兵之父徐庭瑶任教育长。1938年整编为中国陆军机械化学校，校址改驻湖南长沙，后迁广西柳州。1940年迁址湖南安江沙湾寨头，至1944年秋迁址四川潼南，整个校舍绵延长达十余公里，在抗战时期，这个规模算得上壮观。“文革”期间向氏宗祠成了寨头村的榨油厂，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宗祠的建筑大部分保存完好。 ↪

¹⁹. 74军152团打完松山高地后，又去进攻红岩岭，曾锡贤此时已被调离，没有关于红岩岭的回忆，但是对74军152团在抗战胜利后一些情况，曾锡贤曾有亲历，“上面突然就来了个通知，日本人投降了。大家都很欢喜：‘回去哦回去！’谢恺堂团长就劝我们：‘大家莫回去，到大地方去看看哦。到上海、南京去看看哦。’然后就来了命令，要我们到南京去受降，接受日本人的武器弹药。队伍就开往岳阳，再坐船到南京去。

南京到处都是空的，没看到一个老百姓，我坐了两个火车站，到我们51师的驻地栖霞山后才慢慢看到老百姓。我就感到奇怪，南京原来有那么多的人，既然都被日本鬼子打了，死了都有个埋身的，要有个坟，可我没看到一个坟。我就问在栖霞山赶场的老百姓，有人告诉我‘哪里看得到尸体，打死的那些人啊，统统都丢到长江里面去喽’。

“到南京待了一两年，国共谈判破裂，两边翻了脸，要打内战了。74军换了军长张灵甫，他就来栖霞山训话，从我身边过，我不敢看他，我怕呢。他戴着美国人的钢盔，他是个瘸子，蛮高蛮大，大概一米七八。

“训完话后，部队开到了苏北。孟良崮，那是座光溜溜的石头山，我们被围住了，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他们七个人，都跑到山顶上，躲到一块很大的石头下面。队伍全部打散了，人到处乱走，只有山顶上那七个人的周围还围着百多个警卫。我跑到他们附近，他们不准我进去，我就从边上走过去了。

“我有两天没吃饭，也找不到水喝，我看到有块石头，就钻到石头底下去睡了一两个钟头，醒了跟着一队溃兵逃难，可是我没有搞过军事训练，我走不动，逃难的兵都走到了我的前面，有三四十个人，结果一个炮弹打来，一阵黑烟，我前面三四十个人都不见了。天上掉下坨东西，掉在我身上，是柔和的，是软的，我拿起来看一下，是一个人的肠子。

“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不晓得走到哪里去。我累了，就在山腰上休息。我坐下来，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到山上面的人，都举起了手，我就往我身后一看，结果我就看到一个人，拿把上了刺刀的长枪，他向我大喊一声：‘缴枪！’我没有枪，我就赶快举起了手，我不赶快，他会一枪打过来的。‘过来！’我就过去了，结果我到那一看，有一百多个人在那儿坐着，我想，干脆我也到那儿坐着算了。” ↪

纪念章：这一枚编号No.283822

“你是怎么有这个抗战纪念章的？”

“其实，我没有上过战场。我随部队去受降，日本人不肯缴械，双方起了争执，有流弹打着我了，我受伤了，我又是中尉军官，就有了这个纪念章¹。只有当官的才有，当兵的是没有的”

“那你是怎么当上中尉军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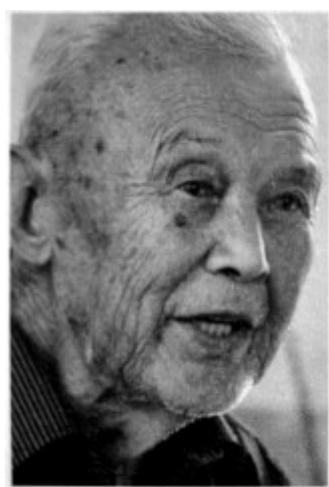
“那是因为我爱看戏。”

周绍耿的一生有着一次次意外的反转。不想当兵，所以娶亲，却因为妻子的亲戚关系入了伍。他稚气未脱，在路边看戏玩耍，又因前来视察的蒋介石的临时起意，被推荐上了军校，人生拐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尽管命运一次次地转折，他终归还是老于田舍间，一生平凡之至，没有什么感天动地的生离死别，也没有什么震天动地的儿女情长。他只是对回忆中的那些人，有一份份淡淡的不舍，然而却正是因为蕴含在这平凡之中的不舍，才拥有了感人至深的真实力量。

他其实是湘北当时许许多多的行伍青年中的最平凡的一员。

只是他多了一个纪念章罢了



口述人 / 周绍耿，1922年农历九月出生，浏阳市古港镇古城村巫塘组人，1942年入伍，隶属国民革命军第99师，任师部参谋部少尉书记，负责处理公文往来。同年插班就读黄埔三分校²，系16期学员。毕业后重回第99师，担任直属炮兵营中尉书记官。日本投降后，在江西缴械，遇日军反抗，手掌被弹片擦伤感染而复员。“土改”时曾被关押过三个月。老人现在乐享天年，不过在口述中，他总是重复其自从当兵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父母了，这可能是他一生最解不开的心结。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4年7月23日

“‘不成功便成仁，与党国同存亡’，我没有做到”

我是因公负伤，部队里给我发的这个“奖章”。

日本投降，我们去缴他们械³，日本人不愿意，他们的番号是“阿布旅团”⁴，这支部队都不肯缴枪，就打起来了，我们打赢了。我的手受了伤，首先送十四兵团医院，后来伤口感染，说要截肢，我就被送到安庆二十二后方医院去了。

负伤后，发了奖章，还发了钱，不知道多少，搞不清。在医院养伤，医药都有，我拿中尉薪水，待遇蛮好的，我就请假回家把我老婆接来了，我的大女儿就是在这个医生生的。住了两年左右，由于我是湖南人，他们就把我转回湖南耒阳第七教养院⁵。

把我所有的东西，包括证件、纪念章，还有一把枪，放在小孩包裹里，带回了耒阳，那把枪是根手枪，没多长，我一般塞在屁股后面，本来不想从部队里带出来的，那个时候“顿竿子”（当地方言，指土匪）多，我冇得办法。

教养院就是养点“空人”（当地方言，指闲人），每个月都有薪水，有几十块法币，跟部队里一样。后来在那里没有人理了，管的人都跑了，我就自己回来了。有个当连长的，他是浏阳高坪的人，那连长脚被打了，他比我后到教养院，也比我后离开教养院，我后来在浏阳碰到他，问他教养院我走后的情况，他说他也搞不清了。

教养院的院长是黄建龙，也是复员的，他只有一只手，是洞庭湖的人，不知道他还

在不在。



周绍耿的纪念章，编号NO.283822。



周绍耿纪念章的正面。

我五月初三回来，工作队的五月初四夜里就来了，他们问我有没有带东西回来，要没收。我没那么蠢，还带证件回来，我就说我没有。他们问我有没有一根枪，我带枪回来干什么，那根枪以前有，但被搞掉了，走的时候，在耒阳，14个银花边（银元），卖给一个叫伍国华的连长。他们总说我有根枪，带着我到茶山里面到处转，把我屋子拆了，都没搞清，后来他们还去耒阳调查，也都没搞清。

那个奖章是部队里发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打过仗当官的才有，特殊的才有。他们没有找到，我已经收好了，放在屋墩上（当地方言，指房梁上，或者房梁上架木板铺成的小阁层），后来房子倒了，就埋到土里去了。

还有把黄埔军校的匕首⁶，“土改”时，我怕有人晓得，就把那把匕首丢水塘里去了。学校给我们这把匕首，是要我们“不成功便成仁，与党国同存亡”，我没有做到。只有这个奖章还留着，这个是我用命换回来的，我要带到土里去。

“蒋介石摸了下我的脑壳：‘小伢子到部队里干什么？部队是要命的。’”

我初中刚毕业，也不晓得死啊活啊，就去当兵了，觉得好玩一样。99师师部⁷当时驻扎在浏阳。我老婆姓林⁸，有个军医处长也姓林，就搞熟了，这个熟人介绍我去了师部当书记。我初中毕业，能写，负责抄录往来的公文，不是管密码的，密码不归我管，那是机要，不能公开的。

我们师长叫朱志席⁹，四川人，最信任我了，随便到哪里开会，都带着我去。

民国三十一年（1942），蒋介石把所有的部队拉到南昌开会¹⁰，几个兵团，几十万部队¹¹。我碰到个营长，对我蛮好的，他们在路边唱戏，我就在那里耍，蒋介石正好坐着车子从那儿过，来了六张（当地方言，辆）车子，他坐在第四张，我怎么会晓得啊？我看见他从第四张车子里出来，他把那个营长喊过去问话：“你那个营里有个小伢子，是哪里的？”营长回答说：“是我们部队的。”蒋介石就说：“这种学生伢子你也收，打仗怎么搞？是你部队的你喊他来。”蒋介石把我喊了去。我那个时候有二十岁了，但看起来小，像个十七岁的伢子。他摸了下我的脑壳，跟我讲：“你这小伢子到部队里干什么？部队里是要命的，不要到部队，打仗要命，你怕不怕？”

他头上没头发，只有周围这里（左额上和头顶偏右位置）有点，戴着个圆眼镜，个子比我高，蛮“煞”（浏阳当地方言，指为人很厉害，有时候也指为人很嚣张）的，不简单，随便走到哪里，哪个碰到都要敬礼。我也算见了一回大脑壳了（浏阳当地方言，指大人物）。他讲话我不太懂，不晓得他讲什么，那个时候我胆子蛮大的，我不怕死，见到蒋介石我也不怕。他问我，我就摇脑壳。

这是个机会，营长他们被蒋介石训斥了一顿，本来打算是要把我送回老家的，但蒋介石在上车之前说了一句：“这么小的伢子，送他去读书吧。”他们就把我直接送到黄埔军校（指黄埔军校三分校）读书了，别个去都要考，我去就没考，委员长开了口，哪个还敢有话说？

学校在江西瑞金，我是16期，李默庵当校长，他长得蛮周正，个子不高，还算胖。那个时候他真蛮恶，不认得人，你迟到，他就是一脚踢，不管你是哪个。只有他知道我是蒋介石送来的，也特别照顾我，他不晓得我和蒋介石什么关系，他也怕塌场（当地方言，指落了别人面子，或者指出现场尴尬）。

我读了不到一年，那几个月我真的受了蛮多的苦。只要一下雨，就吹哨子出操，夜里正准备睡觉时，他也吹哨子，只能去集合。每个晚上都是那样的。我们晚上睡觉，都不敢解绑腿，怕搞不赢。教官最喜欢打人，他根本不跟你笑，就是一脚踢过来，没什么客气讲。我现在讲起这个事情就愁人，我那几个月，真是吐了舌头（浏阳当地方言，形容很累），每个月给我数不清的钱，我都不想去搞这个事。后来到了真正的黄埔军校¹²受训，就没这么苦。

毕业后，我就当教官去训练别人了，那个时候不是少尉了，不知道是中尉还是上尉，没有牌子（指佩戴的军衔标志），都不记得了。

后来我又被调回99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道理讲，让你上天就上天，下地就下地。我回到99师炮兵营，还是做书记，中尉书记。我随部队到过黄桥，还有如皋。我在江西负的伤，我记得还没过长江，具体哪里我也不记得了。

我回来后就跟我岳父、岳母一起住，“土改”时，我被关了三个月。后来把我调到公社的石灰厂卖石灰，一直卖石灰，后来石灰厂布搞了，我也老了。

从我20岁起，我去部队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我的父母了。我是独子，他们是我家里的叔伯兄弟们帮忙埋的。

1. 周绍耿获得的抗战纪念章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背文：抗战纪念章，合作五金公司制。根据该纪念章颁授条例，该章颁给标准是：(1)在抗战时期之陆、海、空三军军官佐属，曾参加战役三次以上，或在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连续任职五年以上者；(2)非陆、海、空三军军官佐属，在抗战期间曾致力于军用器材之制造、运输等工作达五年以上，著有效绩，经证明属实者；(3)来华参战五年以上，具有光荣合作之盟军军官及同盟国家之军官或非军官，或虽未直接来华参战但于训练或运输之上援助著效绩者。纪念章有编号，周绍耿的纪念章编号为NO.283822。 ↵
2. 1938年9月在江西瑞金成立，又称西南干训班，李默庵任校长，校址在今瑞金市杨家祠堂。据瑞金市红土地文化研究会会长严帆编著的《抗战岁月在瑞金创办的黄埔军校第三分校》记载，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共毕业学生7430名，毕业学员5961名。 ↵
3. 江西具体受降地点在九江一带。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梁汉明驻江西九江，以99军军长兼江西受降官的身份，接受日军投降。周绍耿所在的99师，隶属于99军。 ↵
4. 阿布，根据浏阳东乡话音译，具体不详。根据其投降地判断，或估测属日军第十一军团。 ↵
5. 长沙沦陷后，做为湖南省临时省会的耒阳，是当时国民政府军政建设的重点所在，故设有较多复员伤病军人教养院等机构。 ↵
6. 指中正剑，是蒋介石赠给黄埔军校毕业生、得力部将及有功人员的随身短剑，因在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而得名“中正剑”。其制式无一定规格，剑柄上一般刻有“黄埔志工无往不胜”“中正”“校长蒋中正赠”等字样。 ↵
7. 该师从1936年成军，一直驻扎在贵州，有很浓重的“黔军”色彩。1939年春，始由贵州调往湖南，并参入湖南抗日战场。此后，湖南成为其兵源主要所在地。 ↵
8. 周绍耿是家中独子，父母怕他被抽丁，安排他在17岁就结婚成家。 ↵
9. 朱志席，黄埔军校四期步科毕业，别号上珍，四川资中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一生战功赫赫。1946年8月26日在苏中战役中被粟裕部俘虏，后一直关在旅顺监狱，并在狱中去世。 ↵
10. 1942年夏，蒋介石在南昌开的这次军事会议，应是为浙赣会战备战。 ↵
11. 周绍耿指的是参战部队人数。在南昌开会的应为各部所属军事长官以及当地驻扎部队。 ↵
12. 黄埔军校本部，其于1938年11月时迁至成都，周绍耿临毕业时，在那儿接受过短期训练。 ↵

木箧：它们都是有故事的

粟翼航的卧房里有一个民国式样的木箧，放满了写着钢笔字、毛笔字或者没写字的花花绿绿的纸，有信纸、面条和烟壳包装纸、政府过时的宣传单、银行的业务单和移动公司的宣传单。“背后还能写字”，他说。

叠得整整齐齐的还有厚厚一册，用缝衣服的线装订的《醒公沉思录》，封面是工工整整的毛笔字，写在香烟外包装内纸页上，翻开，那是他整个一生的回忆。此外，还有他发的一些议论，谈为政，谈做人，还有他为自己写的、为春华山公祭写的悼词。还有他和妻子的情书，又譬如这句：“我们夫妻之间的人生和生活，好像热水瓶一样，外表冰冷，里面滚烫。我们的热情，不是露在表面，而是藏在内心。”譬如这句话：“我想国家存亡之秋，我还年轻，无牵无挂，正好保家卫国，先把鬼子消灭干净，才好衣锦还乡，再来处理终身大事可好？爱情虽可贵，抗日价更高。”

除此之外，这个木箧里，还有民国时的识字本、手写的结婚证，做保长时的收粮单，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本，还有一支黑色的钢笔。“它们都是有故事的，尤其是那支钢笔。”

我呢现在都蛮好，每天两顿，每顿三两米，不吃肉，只吃点小菜。还能活几年呢？已经94岁了。明年的今天，如果你们还能来这里采访，我还能坐在这里，再讲我的那支钢笔、那两杆步枪的故事，那就是锦上添花。”

他生下来开始回忆，他的回忆，是从木箧里并没有的两支步枪开始的。



口述人 / 粟翼航，1922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日出生，曾用名粟俊、粟数南。长沙县路口镇万年桥村人，在他八岁时父亲过世，母子相依为命。1939年入伍，被分配至第99军99师军需处做译电员，1941年，调入师部做师长的警卫员，长沙第二次会战时，调入99军99师295团一营三连第一排，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升为中尉排长。1942年6月，进入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学习，后回家务农至今。1958年，母亲和他的两个儿子饿死，今只有一儿一女。妻子在上世纪80年代去世。不肯挪窝，粟翼航一直住在上世纪70年代修筑的土坯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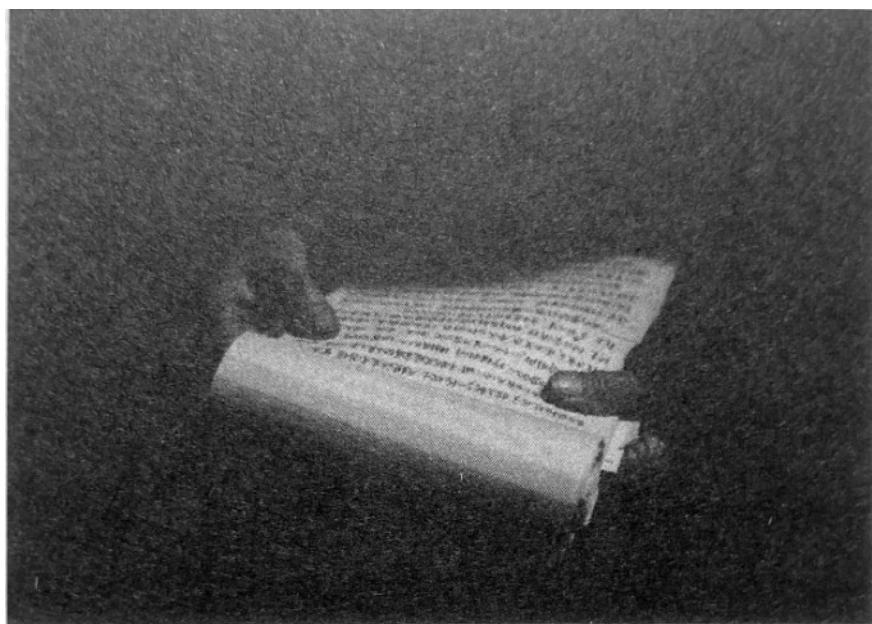
采集人 / 张映科 采集时间 / 2015年6月28日

“当时在我这里躲土匪的有五六百人，后来这些人都很感激我”

1944年，我从广西的部队里回屋里（方言，指家里）结婚，家里沦陷了，马路边上到处都是日本鬼子，设了卡，我想回部队也没办法。山冲冲里，到处都是躲兵的难民，那些难民好造孽，只带了几升米，一点油盐。逃难到这里，其实也要得，这里比较安静，日本鬼子只到大公路上去，不到这山里面来。可是地方上不三不四的人，流氓、地痞，不务正业的人太多了，这些人，脚上穿着油鞋，把脸上擦黑，没有谁认得，在这里耀武扬威，抢东西，甚至强奸，土匪头子有张天泉、毕翰卿、危中杰、周化龙、平江廖义华等人，他们自称挺进军，都是国军被打散的残兵逃亡下来的，自动组合，拉起的土匪，横行霸道。看到这个情况，又没有人管地方上的治安，我就组织了个自卫队，队员是由当地人组成的，有吴鑑、罗桂福、袁义成、张春生、熊斌、谭和生等20个人。

我不怕那些鬼，我是部队里出来的，个把两个人我奈得何，我要保一方平安，对他们不客气，我要他们原形毕露。当时躲在我家里的，有五六百人，后来这些人都很感激我，说我是救命恩人。搞了三四个月，地方上没人当保长，群众就推举我，我就是这样当了这个保长，花果乡（1949年后撤销，所管各村大部分划入路口镇，小部分划入果园镇）第六保保长，也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第六分队队长，一个分队有七八个团员，每个乡有个区队，我记得我们区队的区队长叫刘德华，跟一个香港明星同名同姓。

这个自卫队后来改成了抗日后方游击队，我这个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好带，没受过军事训练，你要他们这样，他们偏要那样做。我记得我有个团员，叫刘思忠，是我们花果乡的人，原籍不知道是哪里的。我们有一次埋伏在（春华）江边，刘思忠偏要伸出个头去看，被鬼子发现了，一枪打在头上，只有十六岁，有个对象都还没结婚。开了个追悼会，“刘君思忠之墓”，现在立在春华山，碑文是我写的¹，碑是我用一担谷请人刻的。



粟翼航相信“文以载道”，他甚至留有民国时期的识字本。

“你们也去搞啊，日本鬼子的枪那么多，问我要什么？”

1944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日本鬼子下乡到处“打捞”，猖狂得很。青山乡麻林（今属长沙路口镇）自卫队的队长陈重林，是我堂客（方言，指妻子）的老表，就邀我去青山乡早耕坝（今属青山铺镇）去打游击。我们这边只有十四五个人，没一根枪，

我们就去了，加起来有六十来个人。日本鬼子在早耕坝的据点有四五十个人，上午在堂屋里吃饭，据点里有围墙。

我们有一个人叫陈满，三十四五岁，在部队里当过连长的，他这个连长我估计是运输连，没有一点作战能力。他手里拿着两个手榴弹，一翻进围墙，到了饭堂，就扔了手榴弹，可能是慌张，没扯导火索，手榴弹没响，日本鬼子不晓得怎么突然进来了一个人，就一枪在陈满脑壳上打了个洞，陈满一声都没叫出来。打死陈满后，日本鬼子尸体也没捡，留了两个人看门，又继续吃饭。我们打草惊蛇了，只有撤回来。

到下午两点，有四个鬼子到蝴蝶湾一带抢东西，又到了砖土坡（蝴蝶湾和砖土坡，均属长沙县青山铺镇），在河边上，还带着三四个伙子。我们有十几个人，乡里发了一根枪给我们，我们个个都有手榴弹，把那四个鬼子围在一个屋里。日本鬼子不晓得我们来了，两个在屋里的灶上炒鸡吃，炒了一锅鸡，两个守在外面堂屋。这次机会来了，我和熊斌两人从后背摸了过去，各执一颗手榴弹，从瓦沟里投了进去，落在灶上，炸死了两个，我随手就把他们的两杆枪提走了，是三八式步枪。在堂屋里的那两个日本鬼子怕死，就跑了，我们就继续打，追了上去，路上碰到些群众，有一个叫汤忠林的，就说：“少队长你们再也莫打了，我们脱不了身，他们明天回来烧我们的屋，你们赔不赔？你们打死了日本鬼子，就是害了我们地方。”我一听就来了脾气，我讲我一定要打，来好多我打好多，我就不信鬼。后来这几个日本鬼子再也没有来过，他们是过路部队。

我缴到的这两杆枪，并没有交给当时的政府。有一个土匪想谋我们的枪，他叫危中杰，原名彭经纶，春华山人。他在大河塘（今属长沙县跳马乡）设下了鸿门宴，请我们花果乡自卫大队全部到大河塘去集中检阅，合作打游击。我晓得这个诡计，就把队伍埋伏在刘公庙（今属长沙县果园镇），一个人去了大河塘。我说：“你这个鸿门宴，项伯还没有死。想谋我的枪，请放马过来，我在刘公庙等你。”他不敢去。

这两杆枪从民国三十四年放到我屋里，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长沙县政府来了我也没给，谁来我都不给。他们说我这枪是从日本鬼子那里搞来的，哦，你们既然晓得那你们也去搞啊，日本鬼子的枪那么多，问我要什么？他们缴不到，这两杆枪在我屋里放了蛮久，就出了名，乡里的人都晓得。

“我后来用那两杆三八式，兑了两杆中正式”

到1945年八九月份的样子，我这保长就脱了身，我有堂客，有妈妈，部队回来身上只有几块钱，做保长只有担把谷（方言，指一担谷）一个月。我就在我堂屋里教私塾，十五六个学生，每个一年担把谷，我养得起一家人了。这两杆枪我还是放在我屋里，我枪法好，就用这两杆枪打打麂子打下貂。

后来这两杆枪又跑到了县里，有一个人叫黄千骥，是管部队的，我请他吃了一桌饭。七搞八搞，我用那两杆三八式步枪跟他兑到两杆中正式步枪。我为什么要这个中正式步枪呢？因为我有子弹。我多的是子弹，当时中央军从这里过路，子弹丢在塘里，丢一箱我就捡一箱，子弹是打不完的。

后来快解放的时候，花果乡的乡长换了，换到我们姓粟的当，叫粟炳煌，从云南回来的，住在花果乡九家坝，是我叔伯哥哥。花果乡和石门乡两乡成立联防队，有70杆枪，他还想要我这两杆枪。他写信给我，要我去当副官，加上地方上后来也有人

劝我，我就去那交了枪，当了十多天副官后，他就要我回来当保长，当时长沙快要和平解放了，别个当保长吃不消不肯当，我就只有又当保长了，花果乡第六保的保长，后来两保划成一保，我又成了花果乡第二保的保长，这个是末代保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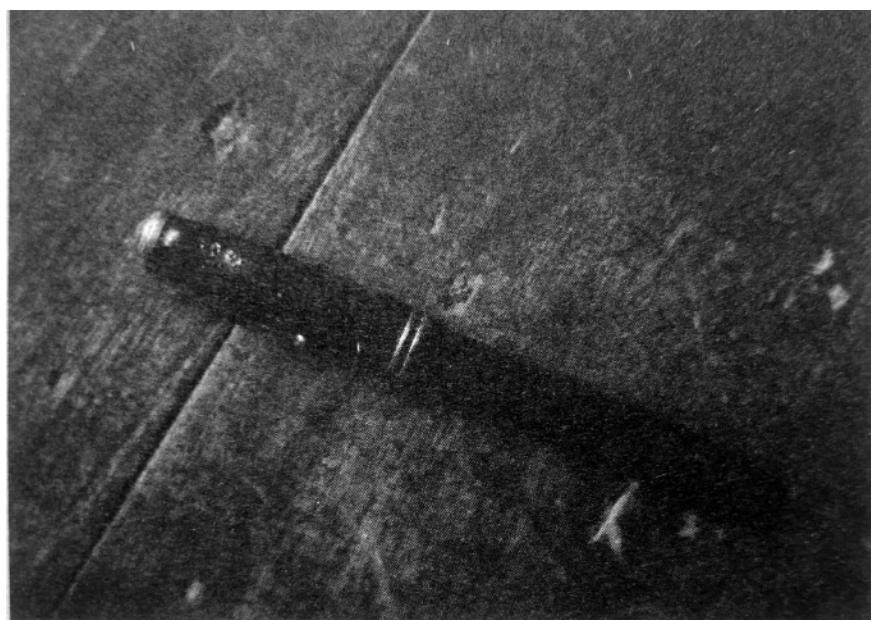
粟炯煌投诚起义，也是受到我的影响。当时我和粟炯煌在羊鹿咀介湘酒店里吃酒，我说炯哥，现在时局不好了，解放军会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北京傅作义，那么大的官，几十万正规军，他都投诚起义，何况我们这小小的联防队，加起我那两杆也只有72杆步枪，我们赶紧起义。他说：“老弟唉，如何去摘咯？”还好碰到一个叫黄锡璋的人，在这里教书，是个老地下党员，解放后还当了长沙县民政科科长、长沙市副市长，当时他也在酒店里吃酒，他说：“你们这么说是目中无人啊，如果出于真心。老伯我愿意搭桥。”他帮我们把这72杆步枪送到高桥人民政府手里去了。

解放后到了“土改”，我在地方上杀过两个日本鬼子，怕被说成是杀了两个好人，还好汤忠林可以作证。也因为那两杆枪，又说我是土匪头子，圈子大爷，国民党三青团头子、恶霸、伪保长和反动军官，给了我一大堆的帽子。多亏有“联防队今收到粟骏交来中正式步枪两支”的收条，我才脱了身。

但我还是被关了四个月。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何佩钦，是个外地人，听了粟庆恒一个人的意见，说我在地方上是打鼓吹唢呐的，还说什么“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其他村都有反面典型，我们村也要抓一个出来。乡长左学武，农会主席陈绍恒、村长谭和清、村农会主席谭汉云，都为我讲好话，尤其是村干部马永建，他是捞刀河（今属长沙县）的人，爱找群众谈话，为人直爽，办事细心扎实，当场就顶住说：“只听信粟庆恒一个人，不听群众的声音，恐怕说不过去，这份材料不实，是给白人戴一个黑帽子，把好人往死路上逼，判他两年，我不盖章，我宁愿头上这顶乌纱帽不戴了。他最多只关几天了事。”最后也就没有关我两年，从1952年正月关到五月初七，就放我回去了。

“我要是不放这个地下党员，就不会有这支钢笔”

再说那支钢笔，我保存七十多年了，我用它写我的《醒公沉思录》。这支钢笔呢，跟一个叫王占兴的人有关，要不因为他，也就没有我后来这许许多多的事。



1940年，王占兴送给粟翼航的钢笔。

那还要从我第一次去部队讲起。1939年，我被抓了壮丁，送到浏阳普迹训练了六个月，后来又说我年龄细，放我回来，我就到上马田杨家里（今属路口镇麻林村）看牛，看牛的那个老板的恩叫杨纵珏，在部队里，第二年元月，他介绍我又去了部队，分到了陆军99师师部军需处，在湘阴乔口镇（今属长沙市望城区）。住了几天后，由于我读过四年私塾，来往文书我都读得懂，一个叫黄本英的科长就给我写了介绍信，又把我分到第99师师部驻衡阳鸡窝山通讯处，做译电员，任准尉司书，掌管整个师部里的密码。

99师有两个电台，一个在衡阳鸡窝山（原属衡阳和平乡第九保），一个在贵州。通讯处处长叫蓝文博，台长叫黄卓夫，副台长叫刘光远，我们留守处除了这五六个通信兵，还有一个上尉军士，管钱粮的，给我们发饷，一个叫邱作云的，少尉书记，一个叫王占兴的，上尉副官，这三个人和我经常一起吃饭。

我记得时间应该还是1940年，八九月份的样子，下午5点钟吃完饭，6点钟就收到一封电报，师长给我的，他说要处长马上把这个王占兴解送到衡阳第九战区司令部去。当时天有点毛毛黑了，我在马路边上碰到王占兴，我说老王，电报还在我身上，还没送处长看，我首先告诉了你，你赶快走。

他走之前，就把身上带的那只钢笔送给了我。此后我们一直没有联系，我也查不到这个人，只晓得他是河北滦州人。他后来找过我，我的户口在长沙市北大路的雅礼中学，我哥哥以前在那里做事，当工人，但我人不在那里，那个户口是个假住址，他找到雅礼中学，是找不到我这个人的。

后来我看到报纸，据说是粟裕将军和罗荣桓元帅的两万部队在衡阳²，是维护国共合作，保护衡阳的，后来国共关系破裂，薛岳要搞共产党的人。这个王占兴肯定是衡阳地下党支部的，他给外界发电报，被和平乡乡公所发现了，乡公所报告了师部，师部再发电报要捉拿他的。

我为什么要放王占兴以及后来我闹学潮，也是因为受到我舅父的影响，他是一个地下党员，在1927年被国民党捉到，在我们这里的桥头路口杀了，打了三枪，他屋里就绝了户。我在屋里读书时，受过他训导。他们杀了我舅舅，我心里是不服气的。

也是因为我放走王占兴的事，师长不要我管电报了，把我调去给师长做警卫员，三个多月以后又把我放到295团1营3连第一排当少尉排长，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去了岳阳新墙河河西。

从1941年农历八月份（10月3日）开始打，打了十多天。跟我们一起打的还有99军92师296团，团长好像姓谢，他屋里住在我屋上面，只有几十里路远。那一仗我们打得好，还缴了步枪两三支，机关枪两挺，步话机一台。就是伤亡有点重，我看到第七排就死了六个，伤了四个。打完那次仗，我升了中尉排长，连长徐展豹也升了。

三个月后的农历十一月十三号（1941年12月30日），打第三次长沙会战，我们驻扎在芦林场（湘阴县城北的湘江河畔）。师部参谋总长发命令我们死守卢陵潭，敌人要是过来了，那常德、宁乡就麻烦了。

我们就死守，打得蛮恶劣，不称心，徐连长在一次死守反攻中身负重伤，没有救活。我代理连长指挥，机关枪“哒哒哒”地响，我躲在战壕里，头露在外面，有一发迫击炮打在地上开花，弹片擦过我的头，擦掉好大一块头皮，我流了一头的血。

我见不得血，人就晕倒在地上，送到医院里过了三四天就好了。看望我的战士跟我说，我一点事都没有，再送到战场去，还可以再杀几个日本鬼子，就像杀几只鸡鸭一样。³

¹. 此碑文为“刘君思忠，任职桑梓，阖里同称，容夏，敌犯长沙，烧杀奸掠，民鲜维生，刘君义愤填膺，竟能自动从众，荷枪与敌相遇于黄狮渡口，经几时激烈战斗，敌不逞败退，乃先入追剿，卒以勇敢殉职，斯人原属xxx（三字模糊）农夫，国难当头，深明大义，终能慷慨成仁，为田舍翁杀敌之先导，同人等愧以身免，爱纪以碑。三民主义青年团湖南支团长沙分团第十三区，全体团员敬卒，民国三十四年元月吉日刊。”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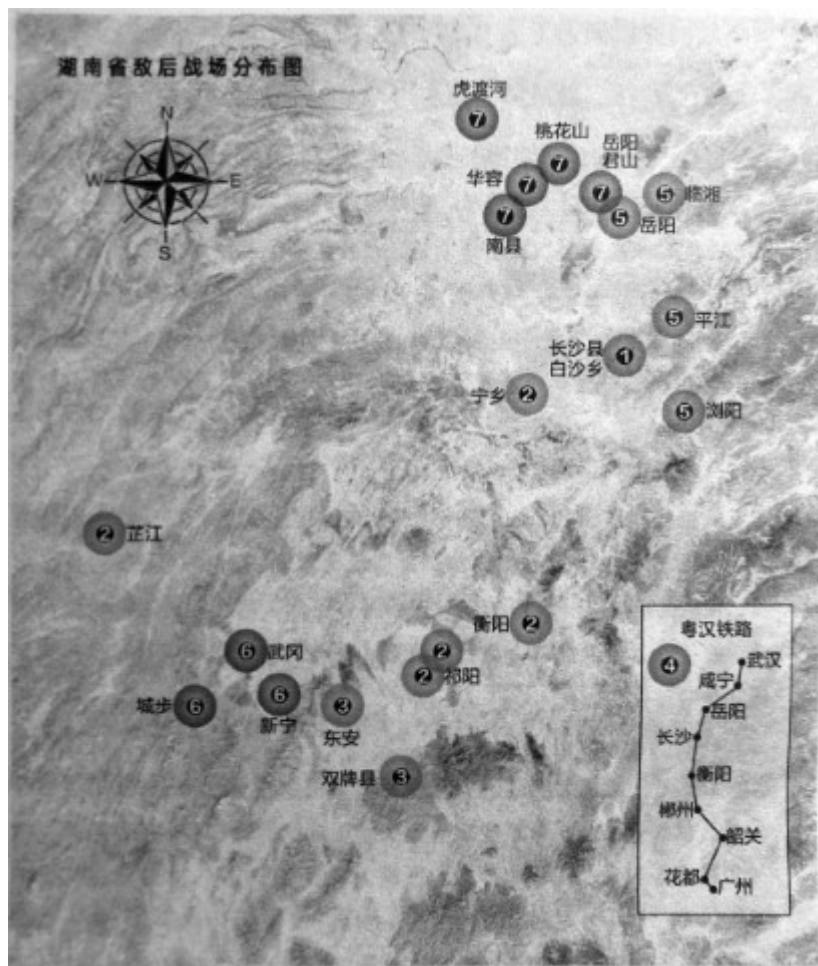
². 老人此处回忆或有出入。1937年冬，中共中央派遣曾担任过湘南特委书记的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王涛以新四军中校秘书的身份来到湘南，先后与坚持斗争的中共湘南特委负责人周礼和游击队领导人李林、谷子元、谢竹峰等人取得了联系，整编游击武装，仅有两百余人，后开赴前线抗日。⁵

³. 在其自传中，粟翼航描述其受伤情形非常形象：“湘水一片迷茫，寂静无声，我的背上似乎有许多蚂蚁爬上爬下成队而行，匆促的痛叫声，惊飞了宿在芦林场畔的湖鸟，拍起翅膀，冲向晦暗苍穹。哦，我是负伤了倒在阵地，心中乱极了，想起战士们的伤亡，天上月色朦胧，地上黑影幢幢，东北风刮了一整天，堤上泥灰随风而飘，只有附近的枪声还在耳边经过，第二天早上东方日出，幸遇上当地好心人姜荆树将我救回他家。”

这次战役后，因作战有功，粟翼航被师长高魁元推荐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武冈二分校），毕业时因不满被分配至200师，曾聚合部分同学闹意见而被学校开除。回乡后，粟翼航曾到第五军当了不到三个月的兵，之后返乡结婚。

⁴

敌后



湖南省敌后战场分布图

1. 长沙县国民抗日自卫团
2. 别动军第四纵队（宁乡）
 - 第三、第六中队（芷江）
 - 第七纵队（衡阳、祁阳）
3. 零陵游击区
 - 祁阳游击区
 - 东安游击区
4. 粤汉铁路敌区铁道破坏大队
5. 鄂赣边区抗日根据地
6. 新宁、武冈、城步三县自卫大队
7. 桃花山抗日根据地

自卫团：警察和游击队组成的抗日队伍

警察，平时维护治安，开战了，有的变成老百姓或难民，有的被编入部队抗日。在湖南临武、新邵、新化，都有警察在自发战斗。长沙县国民抗日自卫团是以长沙县公安局警察为主，整合地方游击队成立的抗日部队。王有恒在这里呆了一年后，去了警察中的“老大”——内政部第一警察总队。

现在的王有恒虽然右肩受过伤，总耷拉着右手，但他还是喜欢叼着烟到处串门。埋藏在心中几十年的过往，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扯一扯”了。只是儿子限制他抽烟，一天只许抽五根。

90岁的老自卫队员柳元青则透着一股书卷气，他头发全白，坐在板凳上不等发问就一个劲地说下去，说到高兴处，会仰头大笑两声。16岁时身高超过1.7米的他，算是军中的高个子，一直扛着“搞来的歪巴子”在自卫队里做机枪手。

黄明德也开朗，但记性不太好，问一句答一句，虽然他在游击队也是个“官”，却似乎不大关心战事，“上头要我们配合正规军，我们就去打，没事我们就啥也不管”。

他们的游击队生涯何其相似：在家门口种田，打仗，接着当农民。



口述人 / 王有恒，1924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出生，长沙县人，1932年～1936年在老家金华村新学堂读书，1936年后在长沙望城坡和北门等地与父亲一起做小买卖、收废品。1944年参加长沙县国民抗日自卫团¹一大队，1945年考入内政部第一警察总队，警卫总统府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等地，1950年在四川随部队起义，后因伤复员，回家务农至今。

采集人 / 刘见华 采集时间 / 2015年7月19日

“看到马倒在地上，我撒开腿就跑，一口气跑到望城乌山”

1944年农历八月的一天，我到长沙找我老子（方言，父亲），他在北门那边收废品，我去要点钱呷饭。回来的路上碰到日本人，他们叫我两只手举起来，看有没有武器，一个人搜我身，一个人拿钢刀要杀我，吓唬我。我被他们抓到望城坡喂马，每个人每天喂七八匹马。天蒙蒙亮就起来，割草喂马、打扫马厩，夜里睡在马厩里，那马粪味臭死，还有马虱子咬人，只要一停下来，他们就拿鞭子抽我。常常没

饭吃，只有在他们心情好的时候，才会给我盐泡饭。他们每天吃抢来的大鱼大肉，还故意在我面前吃，我瞪了他们几眼，有个军官就抽我，还把刀拔出来，嚓嚓响。我很怕啊，说不定哪天也把我杀了啊。

这样过了十来天，我趁着他们出去“打捞”（下乡抢劫）的时候，早早地割了两大筐野芋头喂马。那马我喂了几天，跟我有感情了，我喂什么，它吃什么，毒草它也吃。马吃了野芋头就死了。看到马倒在地上，我撒开腿就跑，一口气跑到望城的乌山，在山上躲了两天，又到白若铺的山上躲了两天，就吃野果、树皮，甚至蚂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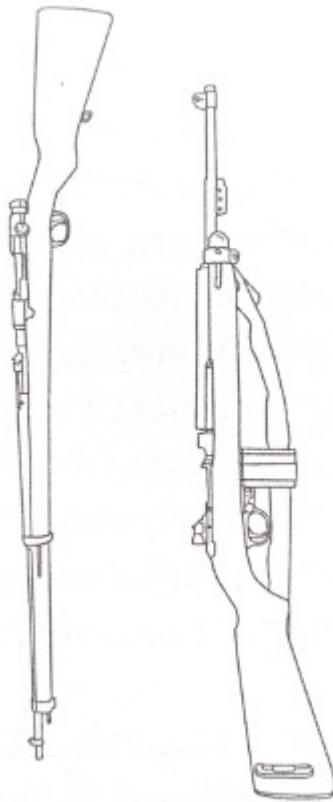
等我回到家，发现家里驻扎了游击队，司令叫邓如灿，是原来长沙县长、警察局长²。驻扎在我家的是一大队，大队长李芳，有个中队长姓徐，长沙县金井人，他跟邓司令说了我毒死日本人马的事，邓司令夸我干得漂亮，就这样我加入了游击队。

邓司令的直属部队是原来他手下的警察，其他各支游击队一般都是乡政府搞的，自愿参加。本地人除了我，还有一个麻田来的刘光荣，他是重机枪手。给我发的手枪、手榴弹，不过队里其他人都是卡宾枪，还有轻重机枪。训练时，徐队长教我用手枪，什么队列之类的根本不学，就直接练打枪。

没过几天日本人就打来了，大概有一个营。他们还先到一个庙里拜了佛³，那庙里现在还有一个和尚呢。拜佛之后，他们就在这山里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杀猪、呷饭。很多老百姓，包括我老子（方言，指父亲）、母亲、两个姐妹、一个哥哥，都躲到山里去了，没走的几乎都被打死了。

日本人是来打我们县政府的，那时长沙县政府在望城卯田乡，离我们这10多里，我们的口号就是“保卫县政府，保卫邓司令”。除了我们本地人以外，游击队其他人都是外乡的，还有几个乡的联防队员、邓司令手下的警察，乱七八糟有千把人。他们不认得路，我呢，就带路，找到狮子桥一个山坑里，事先埋伏了起来。

我们武器比日本人好，他们用三八式，我们很多人拿的是卡宾枪。我不才训练了两天嘛，啥都不会，徐队长跟我说，我打哪里，你就打哪里。我们很多人都是乱打，嗨，我还真打死了一个。我也是趴在坡上的草丛里，日本人在下面几十米，有个倒霉蛋蹲在那打枪，也不躲，就被我打死了。邓司令在卯田后山指挥，守住山头，架了轻重机枪。从早晨打到中午，邓司令还派人在鬼子两边包抄，到下午的时候，日本人看到地形不利，捞不着便宜，就分成好几队，一边打一边退。



三八式枪和卡宾枪。

这一仗我们死的不多，伤的多，但我们本地也死了两个。日本人呢，不晓得他死了多少，他们撤退了，还用马把死的、伤的都运走了。日本人来了这一次后，呷了亏，就再没来过，我们后面就没打过仗了。⁴

我们的卡宾枪是美国人给的，美国人空投我还看过一次，几架飞机用降落伞把东西丢下来，里面都是美国枪。我们没有军装，也没军饷，但是吃得好，有专门的伙夫，白米饭吃饱，有时还有肉。就为这吃得好，打起仗来就有劲，没一个怕死的，端着枪就往前冲。

我们邓司令，看是看见过咯，但没印象，晓得他是黄埔的。他就住在县政府，我去过那很多次，办公的都是民房，邓司令也是住老屋，还有警卫兵，但也不多，一个重机枪连守在对面的山头上。

他们这些个警察，鬼子来之前搞治安，鬼子来了后，他们一边打鬼子，一边还要搞治安。邓司令不还是县长、警察局长嘛，原来县政府的那一堆事还归他管。就是地盘小了点，很多被鬼子占了，有的乡被鬼子隔开，他又管不了。不打仗的时候，我们就种田。

在游击队待了不到一年，日本人就投降了。1945年9月，国民党内政部的第一警察总队在望城竹马塘招警察，邓司令推荐我考了去。开始就在这里的莲花桥训练，除了用枪，还学了用身边的木棍、树杈等防身。训练后，我到南京当了总统府的传令警长，一个大队只有两个名额，24小时值班。后来又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当传令警长。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南京天王寺、茅山、丹阳、汤山往返，送信、送回执。警察

总队待遇好，比一般的军队工资高两倍。晚上我们就和蒋经国、蒋纬国同住一个大院，偶尔还在一起玩玩，打篮球、乒乓球，哈，我那时也学了打球。蒋经国那人个子不高，戴个眼镜。

1949年李宗仁代理总统的时候，我们跟着政府南迁，到广州、贵阳、重庆、成都。1950年在四川的大邑县起义，参加解放军。当年我就因为军训受伤，右肩肩胛骨粉碎性骨折，以伤残复员回家，还是在长沙潘家坪军人招待所登记的。

我们那邓司令⁵，对我是不错喽，但我去了南京后就没和他联系了，后来太乱了，我要不是因为受伤，还回不来，不晓得会跑到哪里去。



口述人 / 柳元青，1925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出生，现住长沙县金井镇脱甲村，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加入当地的自卫队，当机枪手。1945年抗战结束后进入73军，1948年在济南被解放军收编，1950年入朝。当了那么多年兵，因为婶子的一句“家里就都指望你了”，退伍后回家务农至今。

采集人 / 刘见华 采集时间 / 2014年8月28日

“他们把枪扔在一边去抓鸡，我跑过去背了枪就跑”

打仗啊，好多记不起了，70多年了。记得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人逃回岳阳，大部队跑了，后面还有据点嘛，我们就去搞他的据点。有两次，我们把他们外头那机关枪给搞回来了，还有三十几条三八式，哈哈。日本人在福临铺的据点就是我们的人修的，平时我们穿老百姓的衣服，借着给“维持会”送菜，顺便就搞了他们的枪，主要是偷。有一回被发现了，我做死地往山上跑，背了好多枪嘛，背上被挂得稀烂的，跑了10多里路，跑慢一点就被打死了。

这么危险为什么还参加自卫队？那还不是没办法。家里穷得要死，书没读几天，他们还把我的名字搞错了。我以前叫柳元清，有三点水的，结果到学堂里变成了柳元青，少了三点水，这不好，我还是喜欢有水的。

我12岁到织房学徒，14岁学泥瓦匠，15岁帮人种田，16岁就到乡公所的自卫队去报了名。我个子高嘛，他们就让我当机枪手，扛“歪巴子”。家里条件好的都不得去搞那个路，我是走投无路了。我不知道的是，我这一走，就再也没见过我奶奶了。

当时自卫队里大多数是外地人，四川、河南、云南、贵州，有逃难过来的，也有打散的兵。老大叫周应龙，就是我们金井人，他屋里头有资本，不是一般的人咯，自卫队不发饷，他自己想办法筹钱，至少让我们吃饱，不亏待弟兄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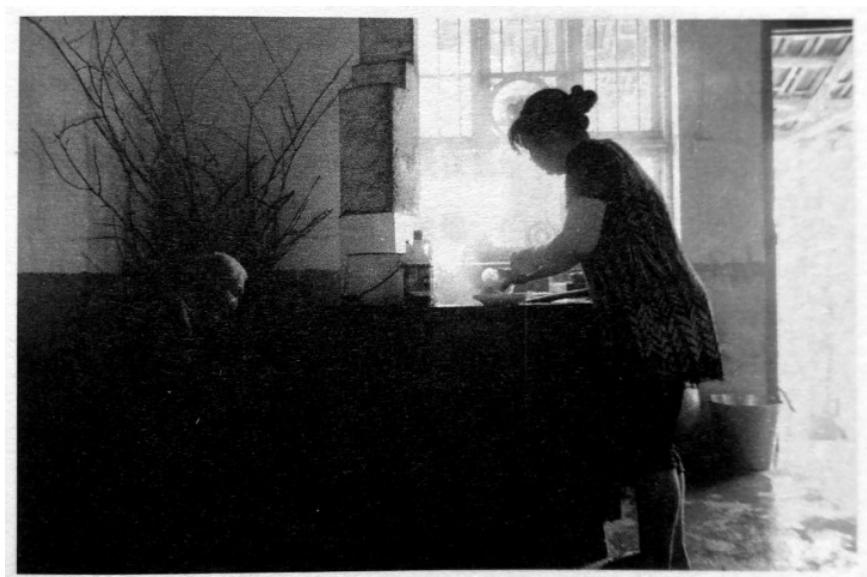
我们主要是搞游击，都是偷偷摸摸，没有几回正式地打，哈哈，你要是跟我打，我就跑了。日本人下乡来搞老百姓的猪啊、鸡啊，人一少，我们就打他们的伏击，主要是为了抢枪。有一回几个日本兵，也蛮大意啊，几只枪一扔就去抓鸡，我赶快跑过去，背了枪就跑，哈哈。

护路和毁路也搞。就在金井这一带，有时候也跑到星沙那边去一下。再后来，日本鬼子搞报复，周应龙就把我们带到浏阳去了，加入廖义华的抗日挺进军。那个人了不得，从几条枪、几十个人做到了2000多个人，连美国人都相信他。廖义华可能呷鸦片烟，家里那个烟味喷香的。但是他做人呢没有周应龙好，只想着自己拉队伍、占地盘，不管我们的死活。⁶

日本人投降那会儿，我还打死过一个。我看到两个日本人牵着马往河边走，就用那机关枪打死了一个，另一个跑了。后面有人过来说，日本人都投降了，你还打什么咯。

抗战胜利后，我们划归73军，军长是韩浚。他们来了一群参谋，跟我们各个自卫队的负责人讲，日本鬼子投降了，到我那里去，穿咔叽布军服、穿皮鞋，实在不愿意的呢，就发三个月军饷，回去种田。好多人都不去，但我家里没有人了，又不想回家种田，我就留了下来，还是机枪手，重机枪连的。⁷

我们司令周应龙是个好人，他没做啥坏事，后来也被当作反革命枪毙了。廖义华那个老地主，不晓得他后来怎么样了。



2014年8月28日，长沙县金井镇脱甲村，闲不住的柳元青在帮厨。



口述人 / 黄德明，1922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出生，长沙县人，1940年参加长沙县白沙乡抗日自卫队，参加了第二、三次长沙会战。1942年到江苏当工兵，破坏铁路、修铁路，抗战胜利后回乡任白沙乡副乡长，1949年后在家务农至今。

采集人 / 刘见华 采集时间 / 2015年7月15日

“仗不打了，游击队就分散，各回各家，种田”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我在长沙县白沙乡抗日自卫队当副，日本人到了新墙河就开始放炮，估计要往长沙来了。游击队员就从各人家里跑出来，在白沙乡这边集合，还有其他乡的游击队，好几百人，往西走，先到古华山，再到影珠山。鬼子已经占了影珠山，他们人蛮多，我们没具体情报，不晓得他们到底有多少，反正是跟正规军一起打。从山下往上面打，那就很吃亏，死了好多人，25师的师长也被打死在这里⁸，还是我们把他埋在古华山，也就是挖个坑，没有碑，还有很多兵，就都埋在一起。

鬼子从影珠山又打到长沙，我们就一路跟过去打。我们在路上挖一个个的大坑，鬼子的汽车就过不了，又把稻田里放满水，弄得都跟塘似的，人和马都很难走。在长沙这次打得不错，伴着湘江，我们从中山路打到了南门口，打死了蛮多鬼子，就在河边挖万人坑埋他们。我们用铁钩把尸体往坑里拖，4个大坑，每一个大概几米长，埋200多个。咳，坑在哪地方我也记不起了，那以后就没去过。

不打仗的时候，游击队的就各回各家，种田啊，搞搞地方治安啊，还跟土匪打过一次，没看到他们多少人，但火力肯定比我们差咯。

我是1940年8月抽丁入的伍，我们白沙乡自卫队有48个弟兄，都是本地人，穿黄军装，带五发子弹的步枪，还有马枪、轻机枪，手榴弹也多，但那些长官我都不记得了。伙食上呢，白米饭管饱，钱也有一点。

到1942年，我一个弟兄跑到江苏去当兵，把我和刘振芳、高甲连、缪红贵都拉了过去，到那边分在第7连，全连148人，每人一支步枪、一支手枪，主要是在日本人进攻时破坏铁路，自己人反攻时修复铁路。没用炸药，怎么弄呢？铁轨上不是有螺丝嘛，把它拧开，然后把铁轨搬开，就是这样，在南京、蚌埠、徐州到济南那条线上搞了一年多。我也是在南京结的婚，老婆是衡山人。日本人投降后，我就回来当了白沙乡的副乡长。1949年，共产党来了，就又回来种田了。⁹

¹. 在日本人未到长沙以前，长沙县就先后成立过两支自卫武装。有署名李伏波的文章《长沙县抗日自卫团小记》，作者曾是其中一支自卫队的中队长。据李伏波回忆，长沙县第一支抗日自卫团于1937年冬成立，由县长兼任团长，著名武侠小说家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当副团长。自卫团买下50师的200支破旧步枪，有汉阳造、日本村田式，还有俄国造步枪。向恺然会武术，曾在湖南省国术馆训练所工作，他邀请一批国术训练所的学生，每个乡中队分一个，给士兵进行武术训练。但这个自卫团因日军当时并未进攻长沙，加上经费困难，于1938年春解散。

1938年冬，曾任湖南《国民日报》总编辑的罗尔瞻任长沙县长，又重组了抗日自卫团。在名义上是每乡一个大队，实际每个大队只有常备兵员20人、破旧步枪13支，其他没有枪的队员，就用大刀、梭标。 ↵

². 邓如灿的自卫团于1944年成立。据现居台湾的邓如灿侄子邓家祎讲述，邓如灿为湖南郴县（现郴州市苏仙区）人，黄埔军校毕业，淞沪抗战时，任薛岳将军的上校作战参谋；部队退却时，曾游泳保护薛岳一同撤退，后随薛岳参加长沙会战。1944年日军占领长沙后，时任长沙县长兼警察局长的邓如灿带领所部警察，将县政府迁往望城县印田乡，并组织抗日自卫团。

有署名史锋、史铎的文章《望城境内抗日战争路述》（邓如灿的长沙县政府迁址在望城县境内），文章记述，此时邓如灿的自卫团是师级单位，下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李芳，第二大队队长龙恒盈。长沙县各乡也建立抗日自卫大队，由乡长兼任大队长，归自卫团司令部统一调遣，协同作战。 ↵

³. 老人用“营”来称呼日军的编制，是指大概这么多兵力，实际上日军中并没有“营”的编制。关于日军求神拜佛等“迷信”现象，在当地还有其他传闻，据传有次日军突袭，抓了一个老百姓带路，日军问路线，这个人就编了一首歌谣：出大洞进小洞，搭楼梯到天上。大洞、小洞、楼梯岭、天上山，都是当地的地名，但日军觉得“到天上”是不祥之兆，就掉头走了。 ↵

⁴. 口述者此处记忆可能有误。日军对长沙县政府的进攻有三次，在此前后各有一次。据《望城境内抗日战争略述》所记，第一次进攻是1944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当时驻长沙河西的日军千余人突袭卯田，因为自卫团分散设防在莲花桥、小洞一带，仅有少数兵力占领山头，印田被日军攻陷。日军在卯田烧杀之后，于当天下午从原路撤退。

第三次进攻是在1945年四月下旬，日军千余人来扫荡。自卫团第一、二大队和机枪中队、突击队等都守在山上，用机枪多次打退日军冲锋。另一股日军进攻自卫团据点石灰窑，警察大队长温培梧率两个中队阻击，因与司令部联系中断，阵地被日军攻破，温培梧被俘，在遭受酷刑后被杀害。这次战斗打死日军官兵二十余人，其中有日军中队长一名，自卫团阵亡数十人。 ↵

⁵. 王有恒有个妹夫在军队中当技师，“修飞机的”，后来一家去了台湾。上世纪80年代，他们来信，王有恒还不敢要。

自卫团司令邓如灿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与长沙市市长及第四方面军高级幕僚等50余人，在湖南大学参加了受降仪式，后任衡阳县长、长沙市警察局长等职。据邓家祎讲述，邓如灿在任衡山县长期间，曾镇压过手下警察的起义。1949年，他改行从商，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仍被杀，上世纪80年代平反，列为抗日军人。 ↵

⁶. 我们没能在史料中找到廖义华的更多细节。在湖北鄂州的中共鄂南抗日根据地旧址，有碑文介绍说明，1944年3月，国民党鄂南挺进军马钦武部、廖义华部，趁新四军主力部队撤到江北、鄂南根据地兵力空虚之机，联合出兵1500余众，进攻鄂南根据地，根据地进行反击，打死打伤顽军100多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至少廖义华部曾有过“鄂南挺进军”的正式名称，其时，他们有着另一种称谓——“顽军”。

浏阳县政协文史委编撰的《浏阳古今谈》一书中提到，浏阳土布商人罗贵生组织了一支七支枪的游击队，先后截击零散日军十余人，缴到步枪十余支，后被廖义华吞并。一个名叫叶贵吾的老共产党员、老红军，赤手空拳夺了日本人机枪两挺，但后来枪被廖义华“匪部”缴去，人也被他们杀了。 ↵

⁷. 抗战胜利后，柳元青随部队到山东，在济南被解放军收编，还参加过渡江战役。因为婶子讲过一句“退伍回来帮你找个堂客，家里就都指望你了”，柳元青1954年回到老家，结婚，再婚，第二个老婆过世得早，留下他和儿子。

↵

⁸. 口述者此处回忆可能有误。据《悲歌三湘——湖南五次会战》（黄勇、余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年）等史料记载，国民革命军25师只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是25军，但也没有师长阵亡的记录。这里阵亡的“师长”可能是副师长或其他级别将领。 ↵

⁹. 现在老人与儿子一起生活，身体不好，有冠心病、前列腺炎，“尿不出，天天呷药”。一个女儿在三岁时发高烧，导致智力低下，至今也和他一起生活。

↵

别动军：装备比嫡系、王牌都还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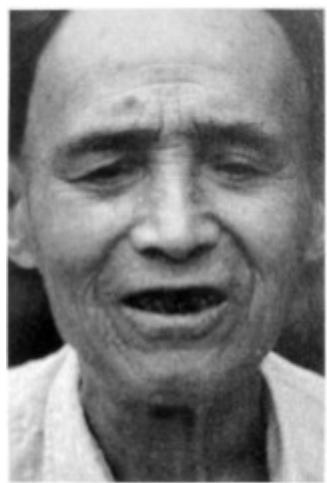
别动军¹第四纵队是一支军统下属的武装，是游击队，装备却可能比那些嫡系、王牌都要好，前后抓俘虏一千二百余人的战果也算得上“辉煌”。

2014年6月7日，宁乡县老粮仓新光村狭窄的村道上，白衬衣外罩着灰色薄背心，手臂上搭件黑色外套，腰背挺直地朝我们走过来的何月祥不像个当兵的，他戴着眼镜，看起来更像个教书先生。他思维清晰，性格直爽、客气，热情大方，礼数周到，精神状况也不错，但记忆力稍有退化，一些人名地名“堵住了”，想不起来。

这支部队的司令，湖南宁乡人、少将何际元²也很少有资料记载。其子何衡生对于父亲的生平及活动，跟我们一样，也只能从档案里了解。

“听姑姑说，他很爱干净，姑姑帮他洗军人的那种白衬衣，没有肥皂，就用淘米水反复洗。他身体强健，作息规律。每天早起，双手往前平伸，提两大桶水，在三根木头做的桥上，走四个来回，锻炼体力和平衡力”。当时的湖南，除了别动军第四纵队，在衡阳、祁阳一带还有别动军第七纵队，在怀化芷江有第三、第六纵队。

其中数何际元的四纵队最为出名，他本人也有“湘中抗日名将”的名号。七十多年前，这支队伍在湘北、湘中的山林、水泽、小道旁打游击，抓掉队的日本兵，用麻袋套俘虏。抗战结束后，队伍随即被解散。



口述人 / 何振球，1929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出生，宁乡县人，1944年加入别动军第四纵队，任特务队副官。现居宁乡县老粮仓镇新光村。1950年何际元被枪毙后，受牵连被判刑到青海改造18年。1983年平反后回宁乡，现与哥哥的遗孀及子侄辈一起生活。

采集人 / 刘见华 采集时间 / 2014年6月8日

“我们哭哭啼啼地回去报告，何司令发了很大的火”

我呢，对于打日本人，对于战争的看法，也没什么好多说的。只知道老百姓很苦，到了1944年，日本人也很困难了，他们经常在村子里扫荡，搜刮粮食，还抓老百姓去给他们做挑夫干杂务。那时我们上宁乡还没有被鬼子占领，老百姓都往这跑。

何际元在宁乡招青年学生还有退伍的官兵抗日，我父亲在何际元的部队，我就和一百五十多个宁乡学生一起，参加了三个月的“宁乡沦陷区青年训练班”。后来又去了宁乡田坪里，分到中美特训班第5期学生队，武器都是美式的，我们学习武器的使

用、装卸、养护等³。

田坪里那地方都是山，中间有一块开阔地，是陈家祠堂，有七八间屋子，除了每年祭祀以外，大部分时间闲着。地主庄园和民房也不少，住几百号人不成问题。我们每个队驻扎一个祠堂，屋子很宽敞，都有小操场，场内搭指挥台，让司令训话、阅兵，还有军乐队表演。每天早上，何际元会登台训话，有时也由他的参谋代劳。然后，一起唱班歌，也就是军统局的局歌。

何际元爱体面，他的兵马刚开到宁乡的时候，要经过草冲河的木桥，他就让警卫队骑着马绕着圈子来回过木桥，马蹄“得得得”响了一夜，第二天就有人传开了：何际元回来啦！过了一夜的兵马，不知道他带了多少人回来了！为了扩大影响，显示威风，何际元又在这边的林山学校摆宴席，宴请这地方所有的乡长、保长、甲长、族长，摆上几十桌。何际元穿着高级黄制服，咔叽布做的，戴了少将领章，金质的，摆够了面子。



何际元全家福，1948年摄于宁乡大宅。（从右至左，后排为何际元、次子何宁生、妻李素梅；前排为长子何衡生、次女何舜珍、三子何蒲生。长女何碧茹在外上学，小女儿何寄婧尚未出生。）

毕业后，我到了特务队。别动军主要就是抓俘虏⁴，方法很多，日本人走路的时候，有少数掉队的，我们就从树林中突然冲出来，截住尾巴上的几个，抓了就跑！有的据点日本人不多，搞伙食的、挑水打杂的，常常找中国人效劳。游击队员就装成老实农民，混进去当伙夫，表面上老老实实，一看时候到了，跟外面的队员一起，十多个鬼子的据点就连锅端了。

除了日本兵，其他日本人也抓。其中一个叫春堂芳子的，是三井洋行的，常常自己出去买菜，游击队就派一个队员装扮成卖菜的，故意挑一些晒黄的菜叶，还有烂菜，她嫌菜烂了，那队员就说他的菜园子离这不远，可以让她挑。然后把她带到菜园子，她刚弯腰拣菜，队员就从菜担子下取出麻袋，兜头一罩，背起她就进了林子⁵。

抓的俘虏都统一在别动军总部，就是宁乡这边看管。我们特务队都是小队员，任务除了警卫总部，就是看俘虏。在长塘湾的屋后有一口大鱼塘，到了夏天，我们就荷枪实弹押着日本俘虏在塘里洗澡。对于当地百姓来说，看着鬼子赤身裸体在中国人的枪口下洗澡，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快的，村民们常常往塘里撒尿，向鬼子身上投石头、吐口水，戏弄日本鬼子。

关押的俘虏大多很老实，但也出现过意外。1945年的一天，我跟另外三名队员，谢迪佳、彭沅浜等押送十二名俘虏。我们几个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兵，警惕性不高，途中突然四个俘虏分别上来抱住我们，其余的一齐上来夺枪，然后一溜烟往山里逃走了。

我们哭哭啼啼地回去报告，何司令发了很大的火，让特务队长戴模宗马上去追，但这地方全是深山老林，哪里找得到？只好在四周设卡，封锁出路。

后来，其中一个俘虏受伤后在池塘边喝水淹死了；有两个被老百姓包围打死；还有一个到老百姓的红薯地偷吃红薯，被农民发现，叫来乡丁就地枪毙，农民还把他的头割下去领赏。至于其余的，也许都饿死在深山野林了。

何际元性格比较严谨，治下很严，发起脾气来大家都怕他。但他写得一手好字，也讲道理，喜欢穿白衬衣，并不是什么草莽武夫。

抗战胜利后，我开始当何际元的副官，以后一直跟着他，到现在与他的后代家属还有联系。⁶



口述人 / 何月祥，1923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出生，宁乡县人，1944年在乡参加别动军，编入第四纵队第一支队第二大队，任上士副官。他像个教书先生一样，把自己的一生娓娓道来：当学生，当老师，然后是当兵，再然后是当修房子的犯人。他现在住在宁乡县老粮仓镇新光村，还能干些简单农活。

采集人 / 刘见华 采集时间 / 2014年6月7日

“抓到鬼子俘虏，马上就要把他们的鞋子脱了”

民国的好大学啊？北大、清华、复旦、中山，这些吧。哦，还有医学院。我呀？我没上大学。因为学费便宜，我初中毕业就去了职业学校，在“精炼高职”⁷读土木科。没去上普通高中，要听父亲的，土木学了出来有工作。如果读个普通高中，那没工作，那还得去读大学。我父亲就负担不起了。上大学，那是幻想，那我不想。只想着早点高职毕业，能够自己谋生活。

我高职没有读完，日本鬼子就来了，屋里也没有钱了，我父亲就讲，“算了，你莫出去了”。保上的人看我读书多点，让我在地方上教书，教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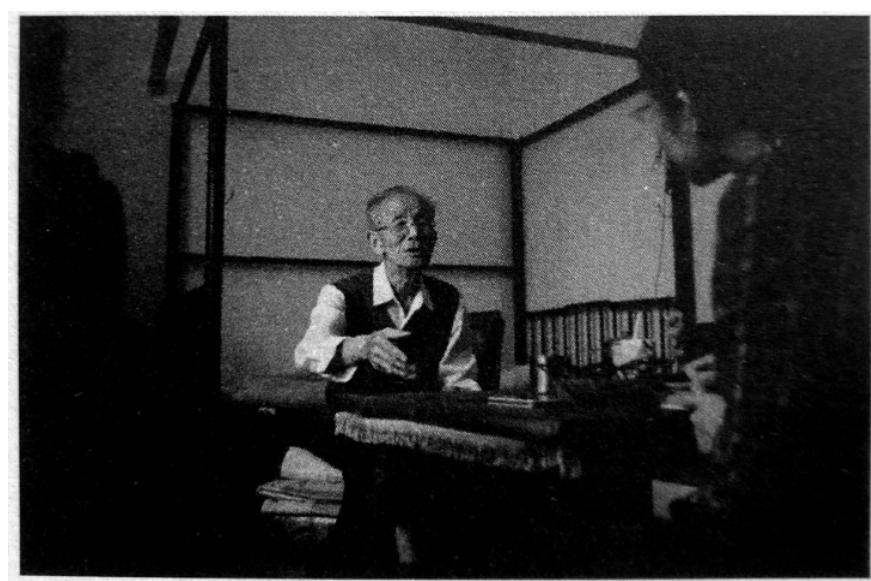
才教了一个月书，日本鬼子来了宁乡。我不愿意再在乡下当老师，认为当老师没有出息，打不得日本鬼子。那时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是很深的。我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九·一八”，1937年打卢沟桥，“八·一三”又打上海。搞得我们书也读不成，老百姓也苦，恨死了日本鬼子。

我要报名去当兵，父亲不同意。他说，别人抓壮丁都不去，你却要自己跑去？我母亲很怕，但也不说什么，就是一个劲哭。我上过几年学，比一般农民要开化点。我们读书的时候有宣传，保家卫国、匹大有责！这次我没有听父亲的，参加了别动军。

到1944年6月间，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石潭，就在湘潭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们负责在后面阻击日军，友军还有73军、74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织我们这几个军在石潭阻击日军，要拖缓敌人向株洲、衡阳方向的进攻。在石潭打了两天两晚，日本鬼子的伤亡很重，我们伤亡还不见得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这里等着他们来的。但是，因为日本鬼子实在太多，结果我们还是没有守得住。他们虽然有消耗，但还是通过了。⁸

8月，日本人占领衡阳后，湖南只剩下湘西还在中国人手里，湘东、湘北、湘南都沦陷了。我们的部队，没地方撤，就在衡山到岳阳的铁路沿线打游击。打游击，那就和大规模作战不同。打得赢，我们就打，打不赢的时候，我们也不去送死。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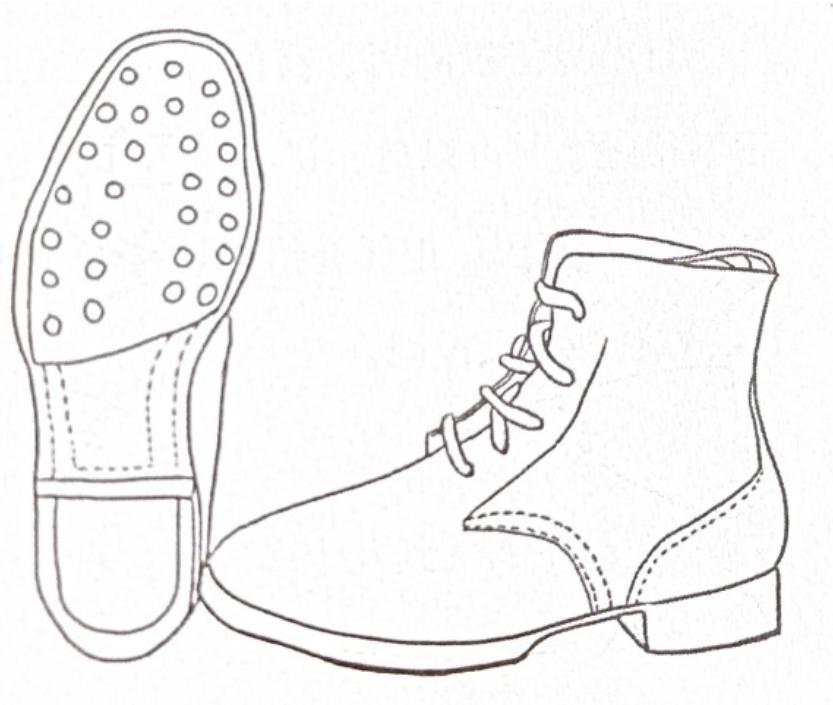
1944年底，日本人的火车也开不动了，没有煤。我记得那时火车都烧柴火，一般的步兵都是靠走路。他们走路，地形也不熟悉，我们躲在隐蔽的地方，看到日本鬼子来得少的时候，就冲上去抓他们。一次我们抓到五个人，有两个人我现在还记得名字：玄板德三郎、金井四郎。



2014年6月7日，何月祥接受采访。

冬天，我们一个大队在长沙周边打日本鬼子。那个时候其实日本鬼子也好打，他们补给跟不上，已经没有饭吃了，老要派人到外面“打捞”，就是去老百姓家搜刮粮食，抢吃的，抢穿的。

有一次，在长沙跳马的石门村，我们看到一个日本鬼子出来“打捞”。就一个人，拿一条手枪，押着五个老百姓，让他们担着东西。那天下着雨，他们正从一个水塘边经过。塘边黄土溜滑溜滑的，“啪”的一声，那个日本鬼子脚下打滑，摔倒在泥潭边，弄得一手的泥水。他把枪放在脚边上，弯腰够水塘里的水洗手。这五个民伕站在边上，望着，不动一点儿。我们在远处看着，真是急死个人。打，怕打到老百姓，不打，又实在太可惜。这几个人就是太老实了！随便哪个从后面给一脚，就能把那日本鬼子踹塘里去。可他们就只望着，结果那个日本鬼子洗完手，拿上枪，又押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日军军靴。

我们一路跟着走，后来他们进了大路边上一个茅草屋，里面有十几个日本鬼子，那里大概是他们集合放东西的地方。我们从外面把他们团团包围住了，喊话让他们投降。但他们就是打死不投降，我们就把那屋子点了火。他们受不了往外跑，那就更好打了。他们出来的时候，一个个蒙着脑袋，哭的哭叫的叫，实在是痛快。这次12个鬼子，我们通通都抓住了。哈哈！

抓到鬼子俘虏，要特别注意，马上就要把他们的鞋子脱了，他们鞋子上有铁钉，踢起人来也是武器呀。而且，抓到俘虏，要走在他们后面。如果走前面，你就危险。他随时可能跑上来掐住你的脖子，日本鬼子训练有素，那都是学了武功的嘞，身手厉害得很。

那个时候国民党讲人道，俘虏不杀。但是日本鬼子就不像我们呢！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国的俘虏基本有得。他们如果有俘虏，就让做劳工做苦工，任务完成了就集体消灭。日本鬼子真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人。我们中国人呢，抓到日本俘虏，如果有病还要给他们治病，要给他吃的，还要吃好。[10](#)

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们放肆庆祝，那个热闹，敲锣敲碗，下不得地。¹¹再以后，讲起来就不怎么光荣了。我被编入新六军169师505团，担任补给副官，在东北打共产党。后来回到湖南，在长沙起义投诚。

我后来受的磨难多了，可是，人呀，受到那些苦，却是越磨难越不得死。我活到九十多岁了，我无怨无悔。

延伸：四纵队及何际元的结局

别动军为戴笠所控制，抗战胜利后，陈诚力主裁撤别动军，1946年戴笠死后，别动军即与交通警察部队以及汪伪税警总团，合并成立了交通警察总局，别动军至此完成了它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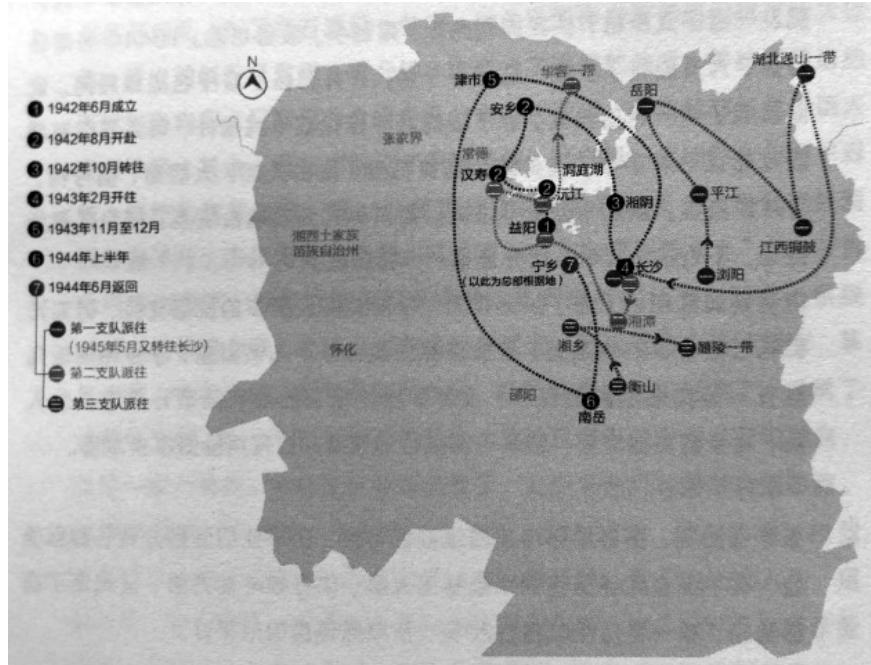
宁乡县流沙河镇政府编写的《少将何际元》一书（未刊行）记载，别动军解散后，作为四纵队司令的何际元，辗转到东北，后任79师少将师长。当解放军反攻时，何际元认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假借母亲病危，请假回家省亲，并辞去了师长之职。1949年春，何际元下决心“反水”，脱离国民党。他组织部队起义，建立“湖南人民自救军湘中纵队”，自任纵队司令，与他接头的共产党党员汤菊中当了政委。

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交战中，何振球与他的司令何际元生死与共，“何司令曾肋下中了两枪，逃到一家牛棚顶上，才没被发现”。有一次在战斗中被冲散，国民党军队追了过来，那时何振球19岁，“我也背不动司令，只好拖着他跑，看到路边民房有一个厕所，我掀开厕所的木板，一起跳进粪坑里，再盖上木板。敌人把民房、猪圈、牛棚都搜了个遍，就是没到厕所里来”。敌人走后，何际元还告诉何振球，“这件事跟谁都不要说，影响人的尊严”，何振球小声答了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何际元一下子气急了，“不是败在厕所里！”

1949年秋，何际元回到宁乡老家，做起了开明绅士。1950年9月25日，湖南省人民法院判处何际元死刑。罪名有十几条之多，“地主出身”“参加反革命集团”“军统特务”“盘踞一方”“勾结白匪”等。

行刑地点就在今天的烈士公园内，家人当时不在场，他们是后来才知道。“听说，第一枪打了后，没打死，求生的本能，使他又跑了七八百米，行刑队的另外两个人又各补了一枪，才打死，致命的一枪打在后脑勺”，何志辉说。

何际元死后，他的妻子李素梅带着几个孩子回宁乡，想开个小店自谋生路。“但到了宁乡，地方上就说她跟着何际元，又有文化，上过高小，那肯定也搞过特务工作。就让民兵给逮捕了，关在我们村子的一个破庙里”。何际元有个遗腹子，刚出生，取名何寄婧，也跟妈妈一起关在庙里，夭折于襁褓之中。不久后，李素梅被判处死刑，枪毙的地点在宁乡盘石湾。



別動軍第四纵队的驻地分布图

1. 1942年，军统局与美国合办了一支敌后抗战武装，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他们主要活动于广东、广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和山东等地，以搜集情报，袭扰日军为主。其中，别动军第四纵队驻扎湖南。 ↪
2. 何际元，1908年农历二月十八日出生于宁乡草冲，1925年冬经谢觉哉、何叔衡介绍，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9月入国民革命军第22师，历任排长、连长，1933年1月经人引荐，加入军统。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粤汉铁路防空护路大队队长，参与抢修被日军炸毁的铁路、公路和桥梁等。1940年在军统下属的忠义救国军任团长，1941年7月，任湘鄂路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部调查室少将主任。1942年6月，在戴笠的保荐下，何际元出任第四纵队指挥，直到1946年别动军解散。 ↪
3. 曾在第四纵队任军需主任的张季任撰文（《何际元与別動軍第四纵队》，《湖南文史资料》第32辑）回忆，初期全纵队只有四百多个人，配发一百多支步枪，少数的驳壳枪，建制小，装备也差。1944年到南岳特训，人员进行了扩编，达到一千余人，并配备了若干名盟军顾问。武器换成了清一色的美式，除了汤姆森冲锋枪或卡宾枪外，每人还配有威逊左轮或马牌手枪，此外还有马铃机枪、重机关炮、火箭筒、信号枪、TNT炸药等。纵队与各支队之间，都有美式无线电台联系。四纵队重新整编，下设三个支队，此外还有一个特务队。
南岳受训结束后，为了扩充实力，争取美国人更多的武器支持，何际元又在老家宁乡办训练班。学员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条渠道：宁乡和附近几县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没有参加过培训的部队陆续补充进来的人员；在乡的失业军官；部队干部推荐的亲戚；较有声望的本乡军官。 ↪
4. 张季任回忆，抓日本俘虏是四纵队的特点，由于他们驻地分散，都穿便服，有不少是久经历练的军统特工人，单打独斗能力强，又规定了高额奖励，抓一名日俘奖稻谷20担，所以抓俘虏的效果好。 ↪

- ⁵. 春堂芳子的下落，老兵口述中没有提到，宁乡县政府编印的《少将何际元》一书（未出版）提到，春堂芳子在抗战结束后随其他俘虏被一起移交到重庆，但不知后事如何。 ↵
- ⁶. 1946年别动军裁撤后，何振球随何际元去东北，1949年又回湖南，于长沙起义，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1949年底至广州军区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何际元被枪毙后，何振球受到牵连被判刑送至青海劳动改造18年。1983年平反后回到宁乡，直接离休，后与哥哥的遗孀及子侄辈一起在老家生活。 ↵
- ⁷. 据《民国教育史》（李华兴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当时的高职也即高等职业学校接收初中毕业生，属于中等教育，与今天属于高等教育的高职不同。 ↵
- ⁸. 张季任回忆，到了打石潭那一仗时，别动军的作战素养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派出的侦查员只用十来分钟，就摸清了周围的地形，并找到了当地百姓作为向导。何际元命令特务队分成前后两组，将指挥部包括美国人夹在中间，其余人马由支队长卢国璜带领，驻守另一个山头，与日军对峙，掩护指挥部撤退。这11个美国教官其实没打过仗，一听说被包围就吓得不行，不知道怎么指挥，只是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在当地向导指引下，特务队和指挥部借着山脉和树林的掩护，沿着一条狭长的山沟快速南撤。特务队多数生长在湖南，对这里的山路很适应，草鞋走路，悄无声息。但对于美国大兵，这草鞋就让他们受苦了。习惯了皮鞋的他们，在从南岳到湘潭的路上，早已把脚弄的满是水泡和血泡，走路一瘸一拐的。特务队长戴模宗急了，只好把他们连搀带背拖着跑。特务队翻过一个山头，将指挥部和美国人向西送出，随后折返，绕到日军背后。日军的注意力在前面的山头，想不到后面杀出一彪人马，招架不及，败下阵来。汤姆森和卡宾枪发挥了优势，与日军的三八式步枪对比，武器上占了绝对上风。日军仓皇逃窜，丢下了将近两百具尸体。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何际元不敢恋战，见好就收，指挥部迅速撤离。时近黄昏，日军也摸不清别动队的底细，害怕有埋伏，不敢追击。但战斗结束后，美国兵又神气起来，吹嘘他们训练出来的部队是过硬的，急忙用无线电向中美合作所和美国海军司令部报捷。消息甚至传到了美国白宫，美国方面对中国军人能保护“美国朋友”很满意。后来还由美国教官转来一份纪念品，是罗斯福夫妇赠送给何际元夫妇的。其中一件是罗斯福的一帧照片，一尺多高，上面用英文题字，写的是“何际元将军纪念”，总统亲笔签名；另一件是一个精致的化妆用品手提箱，内有十多样化妆品，如口红、胭脂、眉笔之类，说是总统夫人赠给何际元夫人的。何际元的妻子李素梅爱好梳妆打扮，得了这个箱子，特别惬意，来了客人都要打开看看，借此炫耀。
- ↵

⁹. 四纵队的作战水平虽不错，但军纪却很糟糕，同样参加过第四纵队的老兵廖湘述就承认，四纵队通通着便装，不拿军饷，吃穿住行都靠当地百姓供给。核心队员大多数是军统特工，训练有素，但是核心队员远远没有外国人员多。因为军饷自筹，直接就地取用，所以队员发展得很快，且鱼龙混杂。建制混乱导致纪律败坏，别动军又称正义军，宁乡一带的百姓就叫他们“正义军伯伯”，意思是惹不得的。

张季任在回忆文章中总结道，造成纪律差、作风坏的原因有这样几个：部队建制特殊，没有士兵，一般成员都称为组员，级别为准尉、少尉，因而骄傲自大，如果待他们稍有怠慢，就把胸膛一拍，“老子见官大三级”；他们分布广，达十多个县，隔指挥部远，奈何不了，虽然何际元也曾约法三章，但鞭长莫及，很难贯彻执行；他们都穿便衣，没有番号，闯了祸，犯了法，弄不清单位，更不知道姓名，受害者只好忍气吞声，不去计较。

张季任也说：第四纵队在沦陷区是分散驻扎的，驻地的房子不但要选好的，一切生活物资都要当地供应；有事去指挥部，或是队与队之间联络，他们都要坐轿子，借轿子、派轿夫，都不能延误片刻；称呼他们的家属都要叫“太太”，要选择最安全的地方住下，并需好好招待，常常都不给钱，对他们的各种索求必须千依百顺，稍有不如意，轻则恶语咒骂、拳脚相加，重则强加一个汉奸罪名，整得你要死不活。 ↪

¹⁰. 何际元之子何志辉曾查阅关于父亲的一些档案，在他提供的一份湖南省档案馆馆藏的《何际元自述》（全宗0-目录6-卷号45）中，何际元称四纵队“三年之久，大小千余战役，除毙伤日寇不计外，生俘日寇亦有一千二百余，名，计解送重庆二百余，名，解交六、九战区及四方面军共九百余，名。” ↪

¹¹. 张季任回忆，日本投降的当天晚上，宁乡田坪里的指挥部人员从美制收音机里听到消息，跑到特务队告诉日本俘虏，开始他们根本不信，认为他们的大日本帝国是打不垮的，随后押了几名俘虏到指挥部亲自收听，虽然播的是中国普通话，他们听不全懂，但明白大意。听罢，鬼子们一个个捶胸顿足，号陶大哭，令在场的中国人解恨不已。

何际元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率部迅速开赴长沙。他命令各支队、各教导营向长沙靠拢，于郊外集中，一起整装入城。还有三十多名俘虏，都移交给宁乡县政府收押，后来双方交换战俘时遣送回日本。美国人则回归自己的海军陆战队，没有同行。 ↪

游击区：在潇水和湘水间打游击

1944年，衡阳失陷。日军继续攻陷了永州等地，打通湘桂铁路，这是他们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一部分。永州在这时成立了祁阳、零陵、东安三个游击区，但往往又各自为战。

曾兴湘、蒋大洁，一个是零陵游击区¹总部的文书，一个归属游击区的乡村小队；一个因为父母被鬼子刺伤、家被洗劫，为了报仇而打仗，一个则为保家，也为“吃口饱饭”参和自卫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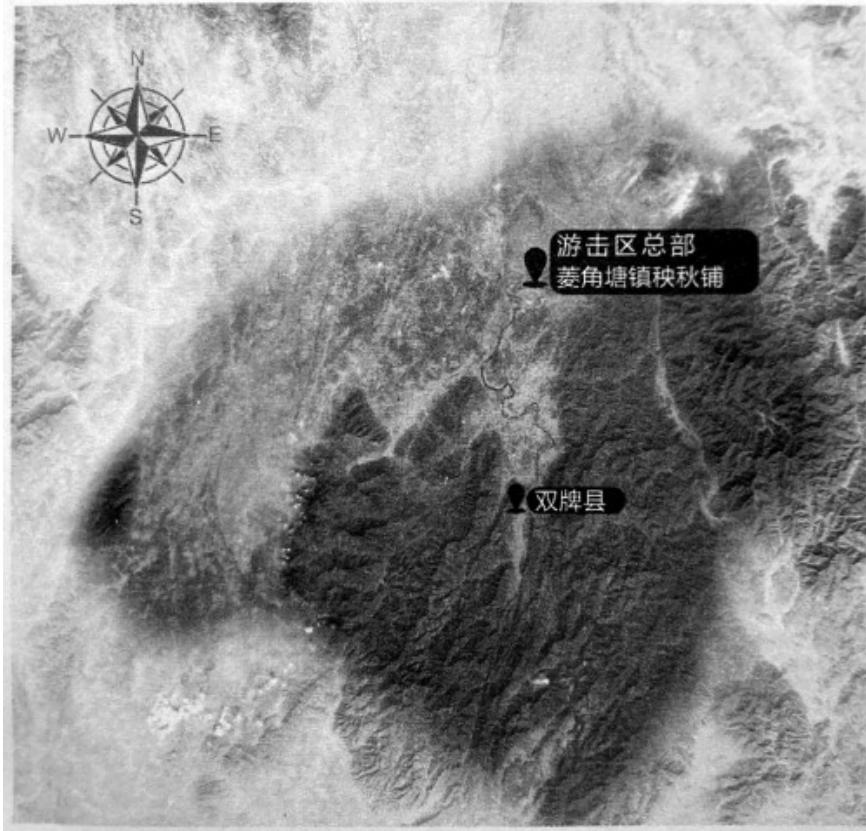
约了采访后，曾兴湘就把很多东西写好了，面谈时拿出来。他写的东西，会联系当前时事、中日关系来表达。或许是做了多年干部的原因，交谈中他会有意识地用一些书面语，总是把“爸妈”改为“父母”，还时不时冒出一些成语。在讲当年的战斗时，喜欢用“毛主席”的话来做点评、总结。

老人头脑清晰，各种书面语中仍不时有70年前的精彩细节出现。如说起母亲给剁手指的壮丁治伤，记得“草药是后园子里跟菜一起种的，捣药用的还是剁手的菜刀，包扎的布是床单上撕下的”。采访结束后，很是得意他带我看他偷偷在楼下公共花圃里种的草药，把当年治伤的四种药描绘我看。

而蒋大洁身体已经很糟糕，2005年得了前列腺增生，开始时家人没在意，等到发现问题严重时已经不能治疗。从那时起，老人身上就插了个管子排小便，每月还要到医院换三次管子。现在蒋的身体天晴的时候好一点，落雨时就坏一点。老人只能每天待在屋里看武侠小说，他喜欢里面的“侠气”“忠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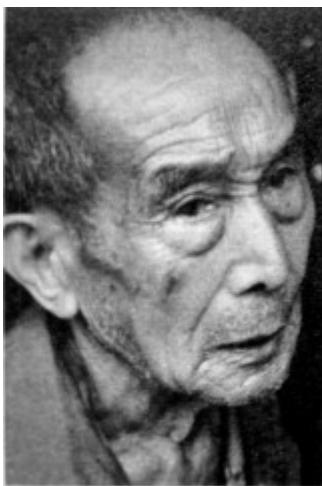
但这已是如今幸存的近十位零陵游击区老兵中情况最好的了。情况差一些的老人，要家人用方言在耳边吼才能听见，说的话又前后矛盾，有的还会在正谈话时突然说“我困了，要睡觉了。”

70多年前，在海上航线已被美军切断之时，“大陆交通线”是维系日军存亡的大动脉，湖南永州这些为“保家”而战的游击队一直对其进行骚扰，直到日军最后投降。



零陵游击区范围分布图 /零陵游击区最初由零陵县地方武装编为一个纵队，辖五个支队，由原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任纵队司令，陆军少将唐步陶为北区指挥所主任，辖三个支队。当时零陵县包括今天双牌县的北部地区。

袁机任游击区司令时，总部设在零陵菱角塘镇的秧秋铺，总部直属队分布在菱角塘镇周围。收编的各地自卫队则遍布零陵全境，今双牌县城是其中一个自卫队较多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些不接受改编的乡村自卫队，各自为战。



口述人 /蒋大洁，1925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湖南省双牌县人，在家中三兄弟里排行“老满”（方言，指年龄最小），哥哥1941年被抽丁后“不知死活”，他18岁报名参加了保里蒋载文组织的自卫队，后并入袁机²的零陵游击区第四大队。现住双牌县城关镇九甲村。

采集人 /刘见华 **采集时间 /**2015年6月4日

“以麻雀战为主，鬼子来到村里我们就去搞一下，不来就没事”

我们垸子³里参加自卫队的人很多，前后有60多个人，都是自愿的，自卫队不抽丁⁴。参加的主要是年轻人、穷人，年纪大的不去，有钱人也不去，他们都读书去了，当什么兵啊。

也不是一个村里的人就到一支部队，随便，你想去哪个就去哪个，去了后想回来也行，来去自由。那你说为啥很多人还想去？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当时很多人家里都吃不上饭，自卫队没有军饷，但管饭。所以很多人都去了，像我们村里的蒋大祥、蒋大秀、蒋智贤、唐德清，等等。但他们现在都不在了，这个村（参加自卫队的人）就我还没死。

当时我们这有两个自卫队，除了我们外，另一个叫湘警抗日自卫队，跟警察没关系，湘是湖南嘛，警是警戒，他们就叫了这个名字。

日本人来了后，老百姓都躲到山里了。我们这北面是挂面山，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在两座大山中间的空地上，老百姓搭了棚子，没有雨布，就是茅草盖的，然后老百姓、自卫队就都住那里。鬼子不在的时候老百姓会跑出来种田，但不回村子里住，这样一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大家才回到村里。

我们不发军装，都是穿着老百姓的衣服⁵，也没有皮鞋、胶鞋，好一点的，家里做了布鞋，一般都穿草鞋。平时还是种田，但白天要站岗，晚上要放哨。武器嘛，有中正式、汉阳棒棒，还有一挺捷克机枪，但全队只有10多条枪，有些人只能带砍刀、梭镖、土铳。我拿的汉阳造，打一枪就要重新上子弹，每个人也就七八发子弹。

平时的训练，就是小队长教我们射击、上子弹、退子弹，其他也没什么内容。枪上也没刺刀，不用练刺杀；也没手榴弹，不用练投弹。小队长叫蒋正平，没当过兵，但会打枪，力气大，他一个能拌倒三四个，就因为这些，当了小队长。

大队还有人去澧河里捞鬼子扔下的坏枪⁶，日本人烧了很多中国部队的枪支，扔到河里，枪上的铁没烧坏，木头烧没了，我们就换了木头安上。

后来我们与双河守备司令部联系上，拜了码头⁷，但袁司令只给了我们一个名号，叫第四自卫大队，还有一点武器弹药。按照他们的编制，一个大队九十多个人，下面还有中队、分队（小队），分队有三十多人，再下面就是班，十来个人。一般大队长要军校毕业，小队长要当过兵的，进过正规军，懂点军事技术。

白卫队以麻雀战为主，鬼子来到村里我们就去搞一下，不来就没事。鬼子经常搜山、打捞，搞吃的、也搞女人。来的多时，我们就躲开，来的少，我们就去打。我就打死过一个日本人。那次他们只来了三个，我们一个班就去找机会搞他们。我们趴在山坡上的草里，他们从下面的路上走过来，也就十来米近，但看不到我们。等他们走过去了，我对准后面的那个，“嘭”的一枪就打倒了。然后我们就跑，钻到山里去。后面日本人就来了很多，要报复，那个被我打中的鬼子估计是死了，尸体被他们抬过来，放在我们垸子前面的狮子坳，那个小山坡上。但是他们找不到我们的人，山这么大，他找哪个？

有时我们也听袁司令号令，统一行动⁸。还得跑到五十多里路远的守备司令部去领枪，有时自卫队单独行动武器不够时，也会去找司令部借枪用，袁司令都会同意。我只见过袁机一次，那是他带部队过来，训话时我看不见的，蛮魁梧，其他没什么印象了。此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当兵的，哪容易看得见司令？

我参加自卫队前后也就一年多。民国三十四年（1945）有次我们去打回龙山（现属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我半路上打摆子（方言，寒热病，表现为间歇性的寒颤，高热），被人送了回来，就再也没去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那个自卫队被袁司令正式收编，至于袁司令，听说他1950年去了台湾。⁹



2013年8月30日，双牌县城关镇九甲村，孤独和病痛折磨着蒋大洁



口述人 / 曾兴湘，1928年农历正月初七出生，祖上为江华瑶族，出生在湖南零陵。
1944年因为父母被鬼子刺伤，家被洗劫，与哥哥一起到零陵游击区总部，哥哥当上尉秘书，他当上士文书。后来加入解放军，到广西追剿白崇禧残部和地方土匪，转业后在交通部各地方单位调来调去，武汉、徐州、南京、成都，最后回到长沙。

采集人 / 刘见华 采集时间 / 2015年7月8日

“我母亲看见了，喊我小名：‘友根，快，把手指头捡起来’”

抗战开始后，我们这抓丁也多起来了。很多人都不想当兵，就自残，剁手剁脚的，最常见的是剁掉右手食指，这样就不能扣扳机、不能打枪了。有一次，一个卖盐巴的到我们街上，过去山里面都是小贩子挑着挑子走街串巷卖盐的，他也是倒霉，到这里碰到抓丁的，就抓他。他呢，就跑，跑到我们家里，话也不说，抢到伙房里，拿了菜刀就剁手指头。我看的清咧，那半截手指掉到地上还蹦了一下，跟活的一样。那些抓丁的跑来一看，这个人没法当兵了，就“啪啪”打了他两巴掌，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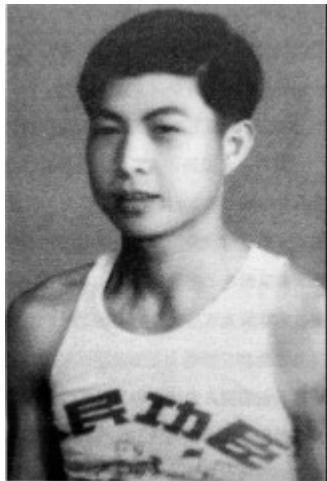
我母亲看见了，喊我小名：“友根，快，把手指头捡起来”。她呢，就跑到后园子，我们那园子里有菜，有草药，她找了两种草药，一种叶子圆圆的，一种叶子长条子的像海带的，把根挖出来，那根像疙瘩一样。她心急火燎的，就用那剁手的菜刀，用菜刀把，把那些“疙瘩”捣烂，把剁掉的指头在盐贩手指上对好，用那些捣烂的草药裹了一圈，再从我家床单上撕下一块布包上，扎起来。母亲告诉他，过一个礼拜后再过来看看。一个星期后，那个人来了，竟然这么快好了！他就给我母亲磕头，千恩万谢。他那个指头刚剁下来，肉是新鲜的，没有污染，药用得好，能接上。哎呀，现在不管中药西药，谁还有这个能耐？那两种药草，当时我不认识，后来我也自学中药，想想，圆叶子的可能是姜黄，像海带的可能是昆布。¹⁰

1944年春天的时候，军校毕业的哥哥回家来探亲。没想到他还没走呢，日本人就来了。当然咯，首先过来的是难民，逃难的不光是本地的，还有南京、上海的。当时，永州东边是原始森林，南北一条大路，很多人要顺路往广西去¹¹。什么叫人心惶惶？我们家就住在街上，你看你门前大路上到处是难民，一天到晚喊着“日本鬼子来了”，是谁都得慌吧？那我父母也待不住了，急急忙忙卷了一些衣服和吃的，带着我们姐弟就往山里逃，回我爷爷奶奶盖的老屋曾家。

那老屋一直没人住的。我们家本来是瑶族，爷爷奶奶从江华的瑶区迁到零陵的桐梓坪乡朱家村，打长工，到山上砍柴，几十年攒了点钱，就在山脚下买了几亩地，那些地都是没人要的；木材呢，又到处都是，就陆陆续续盖了七八栋两层楼的木房子，像鸟扒窝一样，一年年盖起来的。然后还在桐子坪的街口上买了两间店铺，卖豆腐、做小买卖，算是有两处房产了，哈哈。

逃回老屋不久，街上有个邻居叫朱庆元的，他信天主教，看上了我们家大屋，就把他们教堂的神父、修女还有收养的女孩，一百来号人都介绍到我家来避难了。大屋房间多，能住下，父亲就没说什么。然后还有一些难民，也住进来了。他们往广西跑，有些贵重东西怕路上丢了，或抢了，就存在我们这。有个江苏口音的，在我们家存了一箱子好衣裳，丝绸、弱皮袄之类，结果后来也没来拿，估计是路上死在哪里了。那年头人穷，这东西都好贵重的嘞，要是人还活着，肯定回来找了。

一对江西的兄妹俩，那哥哥看我们人好，就跟我爸爸说，“我还要逃难，我这个妹妹是没钱养活了，就送给你们吧。”这个叫秋秀的女娃后来就成了我妹妹，当时十来岁，我们把她养大，解放后又在村里找个人家把她嫁了。我们一直都还联系呢，她去年才死。至于她哥哥，始终没回来过，可能早就死了。



年轻时的曾兴湘。

我们在老屋躲了几天，看风声不大紧了，就回到桐子坪街上看。咳，整条街都是烂糟糟的，门窗被砸烂了，墙头也给推倒了，家里值钱的、有用的都弄走了，连五十多个腌菜坛子里的腌菜都给捞走了，最气人的，菜坛子里还拉了尿、撒了尿！看路上，逃难的人还是成群结队的，算了算了，我们又回老屋去了。

没想到，那狗日的日本人，又来了第二批。这次还有几个蒙古兵，那蒙古人从长相上可以看出来，我不懂，但有的老百姓懂，他们还说蒙古话¹²。有两个鬼子还跑到山里，跑到我们大屋来了。就是早晨来的，很突然，人都来不及跑。我就钻到后屋侧门的粮柜底下。清清楚楚地看到，两个鬼子手里拿着指挥刀，穿着大军靴，“咯噔咯噔”向后园子跑了过去。先抓到那些神父、修女，不知怎么的，估计看他们是外国人，没把他们怎么样。然后就抓着我父母，可怜呐，我父母跪在他们面前，磕头，鬼子一声喊“啊——嘿”，就用刺刀把他们一人捅了一刀，我父母“啊”地一声惨叫，就倒在那里了。鬼子还带着军犬，那东西似乎闻到了什么，一下子就扑到柜子前面，我真吓得要死，柜子下面有一根木扁担，我拿起扁担就捅了过去，那狗“汪”叫了一声，也是命大啊，我家两只小猪，不知怎么吓得跑了出来，那狗就追小猪去了。两个鬼子“杀”了我爸妈，又抓走我哥哥当挑夫，还跑到爸妈的卧室，把两块银元也收走了。

我父母也是命不该死，他们是跪着被捅了刺刀的，一个扎到了腰上，一个扎着了腿，都没伤到要害。后来，他们就用自己的药草，治自己。那年头兵荒马乱的，医院早没了，有医院也没钱治，自己治了几个月，居然都好了。¹³

“不光枪炮声，连前面拼刺刀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我那被抓去的哥哥进过军校，当过兵嘛，还有点本事，几天后，他就逃回来了，拉着我的手对父母说：“我们只有去当兵，打败日本鬼子，才有好日子过。”这样，我们两个就告别父母，连夜摸黑赶路，到零陵秧秋铺，找到袁机的抗日自卫大队。我们一路上提心吊胆，是爬着去的。为啥是爬呢，因为我们要经过一个叫菱角塘的地方，那里有鬼子的据点，怕日本人发现啊，很多时候要猫着腰，趴在地上。

袁机的大队有3000多人，还有炮兵连、机枪连、特务连，哥哥有个好朋友吕学望在那当副官，就介绍我们参加自卫队了。哥哥是打过仗的军官，跑回来没回部队嘛，怕查出来，他本来叫曾兴华，就改名曾汉屏，留在大队部任上尉秘书。我虚岁才15岁，打不了仗，但哥哥说我从小进私塾，念古文、会书法，还经常给邻居抄写对

联，他们也把我安排在特务连当上士文书。在连队就是抄抄写写、打报告、发放通知、整理档案，当然也要起早摸黑操练，夜里要守哨，还得搞大队部的卫生。大队部是一个地主的庄园，现在估计没了。

我们那旁边还有个蔡家铺机场，有时夜里守哨，只要听到日本飞机的声音，就能看到地上有人发信号弹指示目标，信号弹是交叉形的，这些都是汉奸干的，无耻之徒！

我们主要活动在零陵、道县、双牌、东安那一带，穿统一的粗布灰军装，配备的主要是轻武器，很少有重装备。打仗呢，主要是伏击、游击。部队的长官经常派人秘密联络附近的弟兄们，调兵，因为我们和鬼子的地盘都是交叉的嘛，怕鬼子发现，所以上下联系都是秘密的。常干的活就是围攻鬼子的哨所，哨所里人少，我们就去很多人，打下来，把他们抢的老百姓的粮食啊、鸡鸭啊、猪啊、牛啊，统统再抢回来，变成我们的军需了。

我只有偶尔几次投到火线上，但也没来得及杀上去。鬼子一支小部队跑到我们大队部秧秋铺来了，就离了两公里，那也是情况危急，搞近战、拼刺刀了。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鬼子在那一带有两个哨所，人不多；我们人很多，但都是分散在各个村的，大队部只有特务连、勤务兵，结果就被鬼子偷袭了。我们那时也有冲锋号的，号一吹，前面的就冲上去了。我本来在最后，但估计是前面打败了，我亲眼看到两个人被鬼子刺伤了脚和胸膛，抬下来，那血像喷泉一样，“咕咕”往外冒。不光枪炮声，连前面拼刺刀的声音，“杀——杀”的声音，都可以听见。前面的败了，没办法，我们勤务兵也准备干了，拼个你死我活！就在这时候，我们大队部的增援来了，把鬼子包围，“哗啦啦”地把他们解决了。这个增援是从旁边村子调来的，来得还真及时。用毛主席的话说，我们每次都是绝对优势，就是要把你小股敌人吃掉！

我们这些兵以当地人为主，都是自己家里人啊，所以很少害老百姓。伙食差，吃糙米饭，别说油盐，几乎没有什幺菜，连青菜也很难见到。打胜仗的时候，老百姓会有慰问，才吃的好点。

1945年抗战胜利，我们部队要北上整编，路过家门口，被父亲拦下。连长就同意我在家照顾父母，哥哥继续北上裹入内战，后随部队起义。¹⁴

¹. 接受采访的当地亲历者一般称零陵游击区为双河守备司令部，“双河”指潇水、湘水，二水在零陵交汇，“潇湘八景”之一的“潇湘夜雨”即在此处。 ↩

². 袁机（1904~1973），字定一，双牌县塘底乡塘底村人（原属道县），在家乡的名字叫袁大统。从长沙岳云中学毕业后，于1929年5月入黄埔军校（武汉），1930年7月毕业，任少尉排长。1939年10月任军令部通信参谋、副科长等职，1941年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参谋处第二科上校课长。据现居广州的袁机曾外孙易雄斌回忆，袁机于1944年6月任零道师管区军官大队少将大队长，负责收留当地的军官和部队流散人员，1945年3月调祁（阳）东（安）自卫区零陵游击区任少将司令。 ↩

³. 垠子，湖南、湖北等地沿江沿湖地带围绕田地、房屋修建，用来挡水的堤圩，亦指其所围住的地区。在当地方言中，约相当于现在的村民组。 ↩

⁴. 零陵游击区其他自卫队有抽丁的情况，当地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唐颂走访了双牌县境内的许多老兵，根据他的整理，有的自卫队规定家中有两弟兄没被抓过丁的，必须有一人参加。这也说明，对于人员补充，当时的各地自卫队并没有统一的规制。 ↩

5. 当时，零陵游击区总部直属队有统一着装，在曾兴湘的回忆中就是这样，而乡村自卫队都是寻常百姓着装。 ↵
6. 即潇水。到河里捞枪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亲历者的证实，但对于潇水中有这么多枪的原因，据志愿者唐领的走访，1944年衡阳陷落后，大批中国军队撤至永州，他们沿途打了败仗时，会把带不走的枪械毁掉，并投入河中。 ↵
7. 唐领介绍，在当地老一辈人的眼里，袁大统是个“土霸王”。据说，到袁机那拜码头，是要送见面礼的。拜了码头之后，就算是袁司令的人了，司令会“罩”着他们。
- 但也有不拜码头的，当地有一支奇特的“师爷”自卫队即是如此。这支自卫队虽然有队长，但还设了一个“师爷”，行动谋划都是听一个李姓师爷的。师爷在头一天晚上会看天象，预测天气，算一下打哪支日军、从哪里进攻比较有利，还要看士兵的生辰八字，只派八字合的人去打。这样的谋划，“居然次次顺利，前后一年多，只有一个人在撤退时扭了脚，此外没有任何死伤”。队员们都很感激这个师爷，上世纪50年代师爷去世时，很多队员都去送行。 ↵
8. 蒋大洁已记不起统一行动的细节。根据唐颂整理的走访材料显示，各种乡村自卫队归属袁司令后，好几次去河里烧了鬼子运输军需物资的帆船，缴了很多三八长枪；还去摸点，有个鬼子被连人带枪抓了回来，本来要送司令部的，结果没保护好，“被老百姓用锄头挖死了”；还有一次在零陵富家桥油山岭与鬼子作战，自卫队出动了好几百人，包围了隔河的鬼子据点，到晚上，“钢炮和机枪打得没停”，等河对面据点里鬼子不再回击时，自卫队坐船冲了过去，发现鬼子逃跑了，据点内留下很多新鲜血迹，却没有发现鬼子尸体。
- ↵
9. 蒋大洁1947年结婚，1951年儿子出生，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因为在山上放牛丢了根烟头，失火烧了山，被送到内蒙劳改八年。八年劳改生涯结束后，又被留在农场里，继续当了十年农场工人，直到1969年才回到双牌。据易雄斌讲述，袁机1950年3月经缅甸、越南海防、香港去台湾，此后曾返香港接应去台人员，后脱离军界，从事教育工作。1973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歿于台湾高雄。 ↵
10.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国家药典委员会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年）记载，姜黄“性味：辛、苦、温。主治：破血行气”；昆布“性味：咸，寒。主治：软坚散结，消痰，利水”。 ↵
11. 抗战开始后，湖南境内聚集了来自江浙及全国各地的大量难民。第四次长沙会战后，长沙、衡阳失守，很多难民沿湘桂铁路及公路，经湖南永州逃往广西。永州东部属九嶷山区，自古以来为瑶民居住区，却不都是原始森林，“原始森林”是曾兴湘的口头说法。 ↵
12. 关于日军中的朝鲜兵、台湾兵，史料中有不少记载，对蒙古兵的记载却比较少见，在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有相关内容。如《老河口屠城纪实》（《老河口文史资料》第29辑）一文，其中提到，日军中除了有朝鲜“二道毛”和台湾“二皇军”外，还有蒙古“二道毛”，他们长着“草包胡子傻大个子”，这些人都是屠杀我同胞和残害我女同胞的“活鬼”。 ↵

13. 曾兴湘的父亲曾德元是零陵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当过地方团总，懂中药，给人看病也不要钱，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1934年，曾德元因为收留红军住在家里，被以“私通共匪”的罪名判刑七年，曾兴湘的母亲变卖了家中田产才把他赎了出来。1950年，七十多岁的曾德元被当成富农抓起来，最后死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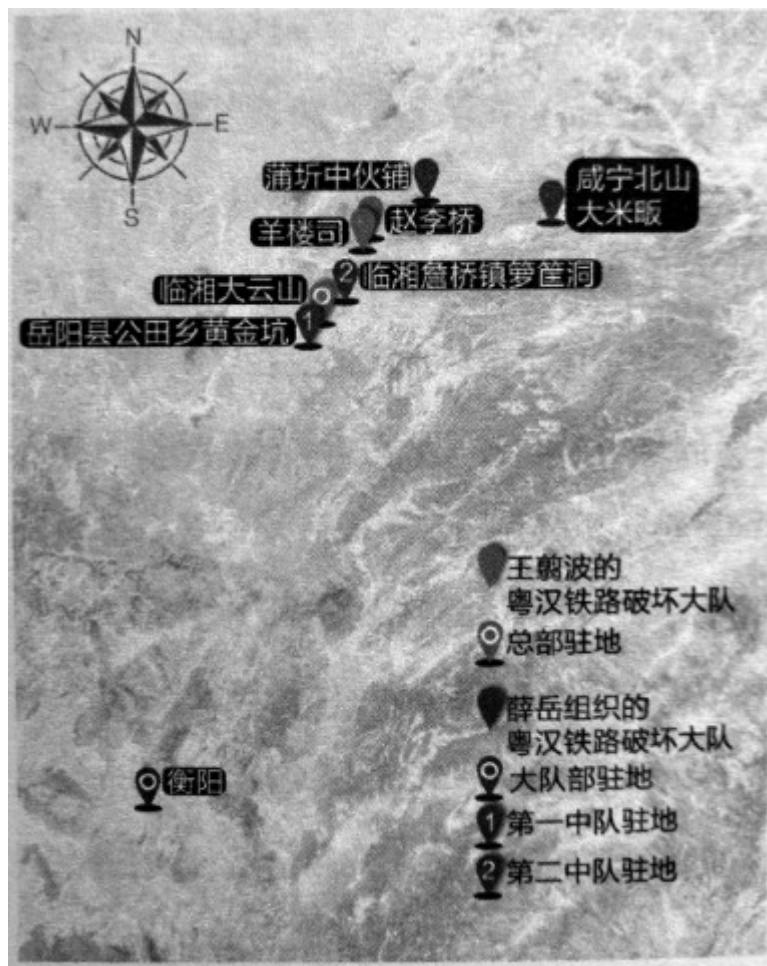
14. 曾兴湘的哥哥曾兴华后来请假回家，但被当敌人对待。他东躲西藏，“家里弄得鸡飞狗跳的”，后来跑到东北，到大庆石油五厂当临时工，在水泥厂里干了几年，得了鼻癌。他发现病情时已经晚了，1966年到长沙找曾兴湘借钱动手术，只是不久后还是去世了。 ↵

铁道线：粤汉铁路上的铁道游击队

有高血压和血吸虫病的易信贤，却烟酒不沾，“酒每次不到一两，烟呷得多”。开朗、随和的老人，听力也还不错，能听懂说得很快的普通话。采访中总是说自己不安分，喜欢到处跑，“现在只要身体好，就心满意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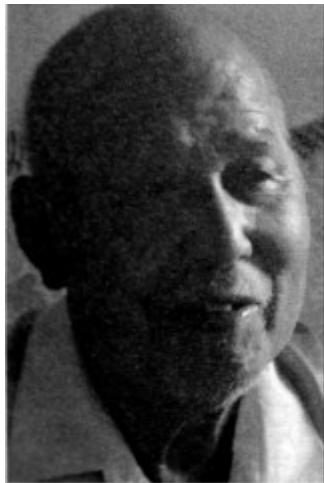
打鬼子的时候，老人在岳阳的铁道破坏大队，却因为年龄小，只能打掩护。那时在粤汉铁路沿线有几支专门炸铁路、炸桥的“铁道游击队”¹。有的是在日军来之前炸桥破路，部队反攻时抓紧修桥修路，有的则长期在敌后，能炸多少是多少。

易信贤现在“出名”了，村里有人问，今年（2015）9月3号也到北京去么？老人笑笑说，“那想还是想，估计没我的机会”。



湖南“铁道游击队”驻地分布图 / 现在较确信湖南境内的“铁道游击队”，有两支，一支是王翦波的粤汉铁路敌区铁道破坏大队，总部在临湘大云山，主要在临湘境内活动，如赵李桥、羊楼司等地。

另一支是薛岳下令组织的粤汉路破坏大队，活动范围更为广泛，大队部驻衡阳，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驻岳阳县公田乡黄金坑；第二中队驻临湘詹桥镇箩筐洞；第三中队驻地不明。仅第二中队的活动地点，就有湖北咸宁北山大米畈、湖南临湘的羊楼司、湖北蒲圻的中伙铺等地。



口述人 /易信贤，1929年生，湖南岳阳人，14岁时在家乡加入粤汉铁路敌区铁道破坏大队，1944年参加青年军，抗战胜利后到台湾，因为想家又跑回大陆。1958年被打成“美蒋特务”，在劳改农场14年，后返乡务农至今。

采集人 /刘见华 **采集时间 /**2015年7月11日

“不跑就会饿死，跑或许还有条活路”

1939年鬼子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死了。几个鬼子抓住我娘老子（方言，指母亲），把她打得要死，他们把她围着，一个人从这边打一下，推过去、用脚踹过去，另一个人接着打。打完了，一个鬼子要把她摔死，被他们班长劝住，才留了娘老子一命，但鬼子还是把我们家房子拆掉，去修他们的炮楼了。我那娘老子能活哎，大概是1991年才死，活了98岁。

我们家穷，解放后“土改”定成分，就是“下中农”。日本人来了后，那全都乱了，没的饭吃，我就去逃难、乞讨，跟胡春台的侄子一起，他比我大一些。胡春台当过兵，人厉害，后来也搞了自卫队²。那不跑就会饿死，跑或许还有条活路。我家七个兄弟，两个姐姐，我娘老子带着几个小的娃娃，跑到岳阳县的乡下。后来搞了维持会，治安好一点了，她就回来了。我们大的呢，就自己出去逃难。我是走到衡山的，那儿有个“儿童教养所”，名字起的好听，就是“难民学校”，在南岳山底下，分两个大队。在那经常要躲空袭，鬼子飞机来了，就往山上跑。学校还教了我们《难民歌》，我现在还会唱，“日本鬼子的大炮，杀了爸爸又杀了妈妈……打了鬼子，才能建设新中华。”难民学校管饭，糙米饭每人每天一斤，但吃不饱，我很能吃，十一二岁的娃娃，又是长个子的时候。还有饿死的娃娃，看到呷不饱，我也就跑了，不能在那等死啊，我就又跑回来了，在那只待了两个月。跑回来在岳阳县那边的朱家桥，还是乞讨。

我一个哥哥，还是黄埔九期毕业的，都没的活了。他毕业后，本来当岳阳警备队的队长，日本人一来，政府都垮了，他也跟着跑，到湖北沔阳，又到一个什么地方当副乡长，弄口饭呷。

1943年我去了铁路破坏队，正式名字叫“粤汉铁路敌区铁道破坏大队”，大队长是胡戬少将，他就是我们这边人，我进这个大队还靠了他一点关系，我们有一点亲戚，但也不是很亲。这个大队上面还有个总司令叫王翦波，他是临湘县的县长，除了铁路破坏队，手下还有好几千人马。³

“游击队没军饷，但饭管饱，还是白米饭”

我们大队下面有三个中队，总共五六百人。我年纪太小，就是打掩护的，其实从没亲自炸过桥、炸过路。不过我们装备好，我拿的都是冲锋枪，加拿大的，但我也搞不清是加拿大生产的还是加拿大援助的，后面一个铁把子当枪托，前面一个梭子，当手柄⁴。我们主要是在临湘那边搞鬼子的公路、铁路，还有桥。大队部在临湘大云山⁵的车廖家、庙湾里、刘正阁，也换了好几个地方，行动的时候还是各中队自己搞自己的，分头打嘛。

炸临湘赵李桥那次，我去了。也不知道那桥下面是什么河，桥有什么战略价值，反正是见了铁路桥就炸。一个中队，两三百游击队员埋伏，打掩护，一二十人上桥，用箩筐担着黄色炸药。炸药有圆的、方的两种，性能上没区别，圆的小一些，三四两重；方的大一些，半斤多，一块块像肥皂一样的，用的时候要把它们捆起来，一次捆几十上百个，有几十斤重，用导火索连起来。我没上去过，也不知道他们把炸药安在桥的哪里，放的位置、用多少药，这个是有讲究的。我们去的时候没有鬼子守桥，那桥就被炸断了。

在临湘羊楼司炸了日本人的铁路。炸桥呢，是炸断就好，炸路是能炸多长炸多长，不是炸一段、火车不能跑了就完事。炸掉的越多，鬼子修路就越费事。但我们没炸过、也没爬过火车，那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去，就是趁日本人不在的时候搞，日本人的车来了，我们就跑了，哪还敢去炸它？所以我们很少跟鬼子干起来，在铁路破坏队，我实际上从来没打过仗。

我们那炸药，还有一个用处，就是洗澡，可以治皮肤病，把那东西弄一点放在水里，洗了几次，身上就不痒了。这个，可能是炸药里有硫磺的缘故。

在游击队没军饷，但饭管饱，还都是白米饭，比在家里好多了；军装嘛，也没有，我们都还是穿老百姓的衣裳。听说总司令王剪波那边，每人每天有8分钱、3升谷，穿的都是灰军装，比我们又阔气多了。

那时老百姓中间也会流传一些关于蒋介石、宋美龄的传闻，除了说宋美龄很漂亮外，还有说蒋介石本来姓郑，叫“郑三发子”，老家不是浙江奉化，是河南许昌的⁶。不打仗的时候，闲得挺闷的，我们也会聊这些。

我们大队长胡戬，个子高，力气大，人漂亮。他老婆是城陵矶的，也长的好看，很般配的两个人。夫妻俩很和气，从来没见过他们吵架、红过脸⁷。

总司令王剪波，也到我们大队部来过，样子很威武，司令嘛，总要有个厉害的样子。听说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不赌博，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

“日月潭的部落头头的女儿，我们叫她公主”

1944年底，我15岁，听说长沙招考青年军，我们就到长沙的广益中学，跟学生一起报名参加青年军，我分到第205师1旅2团1营2连。我是蛮调皮的，看到哪里好就往哪里跑。青年军是要知识青年的，大中专学生才可以加入。好多人学历都是假的，听说青年军待遇好，都想混进来。

青年军几个长官我记的蛮清楚，205师师长覃异之，旅长邓文禧，团长叫张文元，营长是鲁继龙，连长叫车振工。招兵以后，我们就到广东韶关军训，搞了大半年。205师都是一流的装备，军官配的加拿大造的手枪，士兵配的铁把子冲锋枪，脚上穿的是美式胶鞋。当时，我们没事时也会议论，青年军不是蒋经国搞的嘛，我们就觉得他厉害；蒋纬国不行，那时才是一个营长。

没想到那么快日本人就投降了，我们接到命令去接收台湾。在香港登上美国的招商船，先到台湾基隆港，再到台北，后来又到了屏东、嘉义、台中。我们还坐汽艇到日月潭，日月潭的高山族，那时还有部落，但他们都能听懂、也能说一点汉语。部落头头的女儿，我们叫她“公主”，我也调皮噻，就问她：“你是公主，那附马是哪个喽？”她就笑一笑：“驸马不就是你嘛。”在台湾，刚好赶上“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军队本来纪律差，在老百姓中印象很坏，前一支部队去了，台湾的老百姓就打他们。我们青年军的纪律不错，换了我们，老百姓就不打了。

老实讲，我不安分，到台湾没多久，我又没在军队里干了。进过警察学校，毕业了去警务处，后来想家了，又想跑回大陆。警长不放我走，我就要赖，威胁他，你不放我走，等我偷偷跑了，就把你们这里的枪全部偷走，他就放我走了。我在码头，是趁帮人背货装船的机会逃回来的，到上海，再坐船到南京、武汉，回岳阳老家。跑了一大圈，还是回来了。⁸

¹. 据《湖南省志》，湖南境内最早成立的“铁道游击队”，是1939年11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下令成立的粤汉铁路破坏大队，成员从铁道工人中招募，任岳为大队长。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辖运输、爆破两个班，每班约十人，他们身穿便服，专门在夜间秘密行动。破坏大队成立以后，仅第二中队就先后在湖北咸宁的北山、蒲圻的中伙铺、湖南临湘羊楼司等地炸坏铁路桥五座、日军装甲车三辆、军运车六辆、巡逻车两辆，炸死炸伤日军二百余人。 ↪

². 胡春台（1905~1950），岳阳县人，他后来组织游击队，接受县政府收编，任中队长。这个游击队曾在公路上埋伏，炸日军军车；夜袭筻口日军弹药场，夺了山炮弹三百余发，烧毁炮弹一万余箱。日军将胡春台兄嫂捉去，要挟他投降，他回信给长兄：“兄可为国家正义死，弟不能因骨肉私情降”。1950年，胡春台率旧部在岳阳县窃取枪支后，杀害中共区政府干部十人、农民一人，被逮捕后枪决。 ↪

³. 王翦波（1901~1958），临湘人，读过军校，在日军入侵时，临危受命代理县长，并组织游击队抗日。据《临湘县志》载，铁路破坏队只是他的附属武装，他的主力叫挺进纵队，有1500人的兵力，还有保安队维护社会治安，特务排警卫县政府。这支游击队主要配合国军正规军在湘北抗击日军，同时镇压一些铁杆汉奸、维持会长等。 ↪

⁴. 根据老人回忆，结合相关资料如《轻兵器》1995年第2期中关于司登冲锋枪的描述，推测他们配备的可能是“司登冲锋枪”。该冲锋枪是英国1941年研制的一种威力高、成本低但容易走火的冲锋枪。抗日战争期间，英国在加拿大的朗·布奇兵工厂为中国军队也生产了一批，枪上刻有“司登手提机枪·加拿大造”等字样，造价较为低廉，一支枪资费为9美元。 ↪

⁵. 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退休干部谢雄宇撰有《王翦波在大云山地区抗战纪实》一文。据文中所述，大云山是王翦波抗日游击队和铁路破坏队的总部，也是迁址后的临湘县政府所在地。除了抗日外，王翦波在这里办纸厂、纺织厂，从江西运来食盐，解决军需民食，将其建设成一个根据地。1942年8月，为纪念三次长沙会战，国民革命军第27集团军司令杨森与王翦波同上大云山，题写了“三战三捷”碑和65字碑文，现已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⁶. 关于蒋介石的身世，民国时期确实有一些传闻。老兵易信贤对这些传闻的回忆说明，当时游击队的组织纪律和思想控制可能不是很强，很难制止这样的传闻蔓延。 ↵

⁷. 1950年，易信贤结婚的时候，胡猷还来过，送了一副对联，“信仰结良缘，银河喜渡嫦娥女；贤德成佳偶，珍重新风处事佳”，把易信贤和他妻子的名字——“信贤”“银珍”，都用上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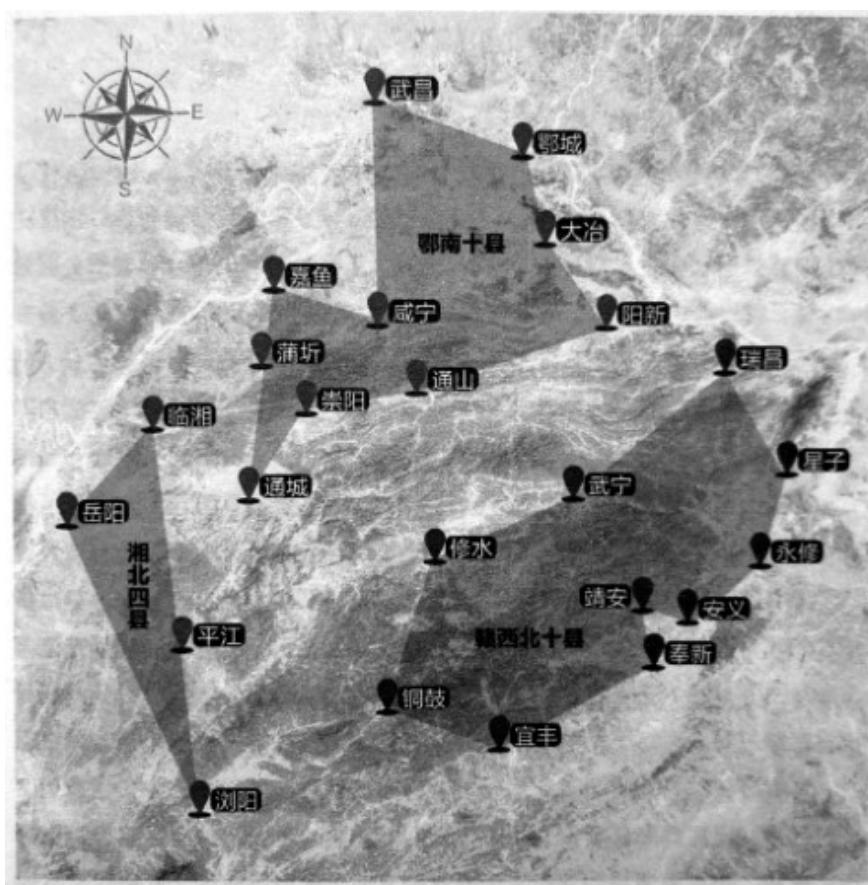
⁸. 1958年，易信贤被打成“美蒋特务”，判刑15年。在岳阳建新农场，易信贤种田、打谷，“力气大，挑河泥时别人挑三方，我挑十方”。刚开始饭也吃不饱，后来军管了，军队里说，“让犯人把饭吃饱，也好干活嘛”。 ↵

边区：国民党在湖南唯一的抗日根据地

长沙的“文艺兵”易唯诚现在还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说话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古文、英文都很不错，1954年后还当了多年古文老师，只是现在“背不出了”。

70多年前，在湘鄂赣边区¹这个国民党在湖南唯一的抗日根据地，易唯诚是很讨厌“文艺兵”这个身份的。这里有几万正规军，也像游击队那样，专门在三省交界处的日军占领区搞破坏，袭扰、破路、抓俘虏²。正规军打游击，本来就窝囊，作为“文艺兵”，易唯诚更牢骚满腹，“当只不打仗，有什么意思”，仅有的几次战斗，抓了俘虏，却同样是个“文化人”，两个人还聊得“蛮开心”。

老老实本分的“地主少爷”易唯诚后来娶了一个泼辣的“川妹子”，“文革”时有人要斗他，“我那老婆保护了我，她是贫下中农嘛，又是共产党的干部，根正苗红，她厉害起来，没有人敢惹她”。



湘鄂赣边区范围图 / 湘鄂赣边区自成立后，虽然收编了大量地方武装，但没有明确的管辖界限。1940年2月，第33军团军团长李默庵任总指挥后，正式划定湘北四县（临湘、岳阳、平江、浏阳）、鄂南十县（武昌、大冶、嘉鱼、阳新、鄂城、咸宁、蒲圻、崇阳、通城、通山）、赣西北十县（修水、武宁、铜鼓、宜丰、靖安、奉新、永修、安义、星子、瑞昌）为边区管辖范围，共计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00万。（资料来源：刘公武，《抗日时期国民党的“湘鄂赣边区”》，载于《湖南文史资料》第3辑。）



口述人 / 易唯诚，1921年农历十一月五日出生，长沙铜官镇人，生于新疆，长于北京、长沙。抗战期间在国民革命军19师做了两年文艺兵，又在99军做团部参谋兼连训导员，随部队在湘鄂赣边区打游击。

采集人 / 刘见华 采集时间 / 2013年11月20日

“和日本俘虏用英语、日语、汉语交流”

我嘛，现在身体没病没灾，还是活的不错的。就是一两年前，记性开始差了，十多分钟前的事，转眼就忘了。但对当年呢，还模模糊糊记得一些，像那个被我抓的日本工程师的名字，荒木虎雄，是不会忘的。

1940年，我到99军197师590团，啊，这个我还记得。我是上尉连训导员，相当于今天的指导员，还是团部参谋。我们这个连是军士连，军士嘛，就是部队里的“官”，所以我们每个兵都是班长级别。部队里很多都是农民嘛，我们有点文化的，就都当官了。上头把我们这些“官”编成一个连，其实是对我们的爱护，很少让我们跟那些大头兵一起打仗。

其实呢，我很讨厌这样。来99军之前，我本来当了两年文艺兵了，在19师。1938年我17岁的时候，19师在长沙招兵，我与广益中学的同学陈泽纯去投军。我们家共有八姐弟，当时我妈妈很开明的咧，她就跟几个孩子说：“你们啊，想去哪就去哪，也别管它是什么党的，去当政府的兵也好，去共产党那边也好，反正国家都这样了”。于是我二姐就去了延安，读了抗大；一个哥哥呢，在铁路上当工程师；我呢，就当了国民党的兵。

当时要我们穿西装短裤，那好羞人的。我们被分到政工队演话剧、搞宣传，演过很多次《放下你的鞭子》《流亡泪》，此外就是讲时事啊，作报告啊。后来我就烦了，这兵当的，多没意思，我就又投了99军，没想到还是文职。唉，我就是长得太书生了，到哪里都把我当文化兵。所以呢，别看我当了那么多年兵，其实没打什么仗，就是偶尔带队搞点袭击，袭击完了，我们又回到团部，被“供”着了。

我们主要在湘鄂赣边区打游击，经常活动的地方，像通山、九宫山、太阳山；县嘛，江西的修水、铜鼓啊，湖北的通城啊，我们湖南的平江啊。

1940年的一次夜袭，我抓了前面说的那个荒木虎雄。当时我带了十几个人，摸到了日本人在大冶的兵工厂。他们也没啥防备，没有什么警卫部队的，都没有打起来。那个日本工程师，晚上没事，在外面散步，就被我们碰上了。他没带枪，但穿了军装，我看他的军衔，两杠两星，该是中佐。我们要他跟我们走，他也不反抗，也

不用绑，大大方方地答应了。路上啊，我就和他聊起天来了，那时我们也没专门的翻译，但因为打日本，每个人都会几句日语。同时呢，我还会点英语，我在教会学校待过嘛，荒木虎雄他是工程师嘛，读过大学的，也会英语，我们就用英语交流，再加上中文、日语，聊得还不错。这不能叫审问，根本没问什么军事机密啊，就是聊聊家常，他讲他的大学生活，我说我的经历。具体他说的什么，那不记得了。带回来后，就把他送到99军军部了，也不知他后来是死是活，有没有回到日本。

“右手握拳，竖起大拇指，胳膊平伸出去，眯着眼睛看”

1941年10月，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197师奉命在洞庭湖一带“策应”³，590团守在资江南岸，我们连也分了好几个小队，这一点那一点。我是指导员嘛，当时我就带着七个人，一挺重机枪，马克沁的，一千多子弹，守一个叫临资口的地方，就是临着资水的入口，在湘阴。

那里有个河堤，我们在大堤后面趴着，我就是机枪手。那日本人呢，两艘汽艇过来了。头一次他们大摇大摆地来，我噼里啪啦打了一通，他们就跑了，也没还手。我们趴着没动。过一会儿，他们又来了，这次聪明了点，没走大河了，从一个小汊子里过来的，两边都是草。我又噼里啪啦打了过去，他们看还捞不着便宜，又跑了。有没有打死人我们不知道，只看到他跑了。这一下我们就兴奋了，大意了，就说这日本人也蛮好打的嘛。我站起来，手叉着腰在那看。我那几个手下呢，也围着我探头探脑地望。这不是活靶子嘛，结果呢，日本人就用那钢炮，一炮打了过来，我那几个兵，把我扑倒了，我倒是没事，连伤也没得，他们就惨了，日本人打了两炮，我们七个人，死的伤的有四五个。⁴除了偶尔打点仗，更多的时候，我就是当参谋，主要的活是做沙盘。每次打仗前，长官会带我们看地形，跟我们说，“你们都看清楚了，回去要做好”。我们呢，就记下，这是山，这是路，那是河，然后要看距离，右手握拳，竖起大拇指，胳膊平伸出去，眯着眼睛看，这就是目测距离了。有时两手都伸出去，校正一下。咳，那时我们条件差，没设备，就是这样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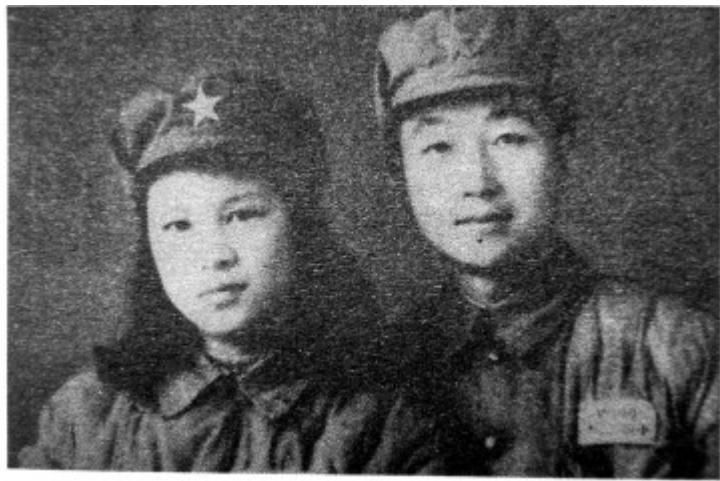
在湘鄂赣，因为我们是团部里的文化兵嘛，伙食还马马虎虎，吃红薯多，白米饭少，但至少吃的饱，不像有些个大头兵，饭都没的吃⁵。没见过军饷，但也沒吃什么苦头。我连当兵，都当得平平安安的。

“在黄埔当教官，蒋介石见的多，他基本上每个月要来训话一次”

湘鄂赣打游击在1942年就结束了⁶。前头说的我那广益中学的同学陈泽纯，他父亲陈纪川在中央军校，我们就去考中央军校，就是黄埔，当时已经迁到成都了。因为有关系，我只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论强国兴邦》，就被录取了。在学校里，学习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毕业后，我还是想上前线，写申请书，但上头说，你这个文质彬彬的样子，打仗不一定顶什么用，你知道这么好，留在这教下一代，也是抗日嘛，我就成了教官。在黄埔当教官，别的没啥，就是蒋介石见的多。蒋介石不一直是黄埔的校长嘛，他基本上每个月要来训话一次。每次都坐得笔直笔直的，对自己要求很严，连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不像现在电影里放的蒋介石那样，板着脸训人。他跟我也说过很多话，我们就相当于学校里的校长跟老师嘛，话当然说过很多喽。记得最清楚的，是要我们“站的直、走的稳、坐的正”，还教我要不要染上坏习惯，“烟酒嫖赌，洪水猛兽”，这都是他的原话。其他的，太多，记不起了。

我在军校一直待到1949年，刘伯承打来的时候，我们就集体投诚了。

哎，我一直都想打仗，却做了半辈子“文化兵”，又做了半辈子文化人，到现在，你看，还是文质彬彬的，哈哈。这是跟家庭出身有关喽，改不了。我是地主家的少爷，小时候旧学、西学都学的不错。从小家里就有家庭教师，所以我古文好，就是那时的基础。我出生没多久又到北京，在那我上的是汇文学校，教会办的，所以我英语也不错嘛。不过嘛，你现在让我背古文，那是背不出来了。把它拿来，我能读，能讲。英语嘛，也不记得哒。



2013年11月20日，在长沙新开铺“机床厂宿舍”的家中，易唯诚的结婚照。

¹. 早在1938年，国民党军队即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变更了战斗系列，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训，此时将建立敌后根据地提上了日程。1939年以后，湘鄂赣、苏浙皖、苏鲁豫、鄂豫皖、冀鲁豫、冀晋豫、冀察晋绥、冀察热等八个沦陷区先后设立了游击区。其中的一些游击区就是此前内战时中共的根据地。除了抗战外，国民党设立这些游击区也是为了防止中共势力卷土重来，湘鄂赣边区也不例外。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写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 2005 年）一书，1938年武汉、岳阳先后沦陷，湘鄂赣边区成为第九战区的前哨阵地和敌后游击区，军委会指示“第九战区以九宫山、幕阜山一带为根据地，取积极行动，夹击转攻武汉之敌，同时截断敌后方之连络线”，并“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方游击”。第九战区于是奉命在鄂南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以落阜山为中心，包含九宫山、庐山、岷山等山岳地带，设立了游击总指挥部。后来，国民政府甚至设立了一个湘鄂赣边区，有自己的边区政府和党国机构，独立于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之外。先后担任这个根据地总指挥的是第12军团军团长樊崧甫、第33军团军团长李默庵、第93军副军长王劲修。 ↵

². 湘鄂赣边区有一批正规军，如第8军、73军，以及后来的99军等，作为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同时也收编各地保安团，组成了“挺进军”八个纵队，一些地方的县长兼任了支队司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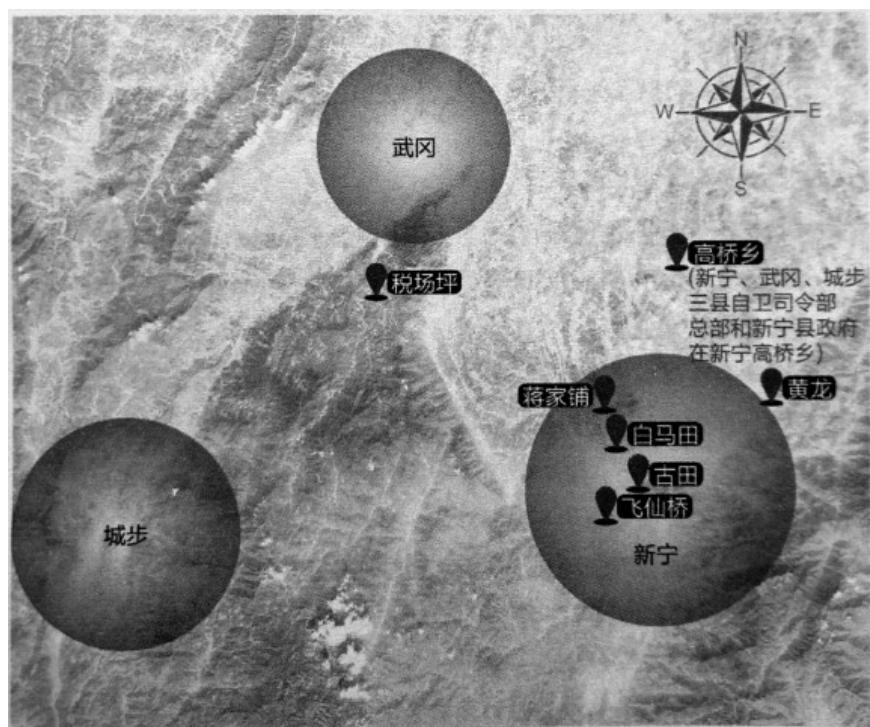
- ³. 三次长沙会战期间，湘鄂赣边区的部队都参加了对湘北日军的袭扰活动。如第一、二次长沙会战，“挺进军”分别于通山、大冶、阳新及咸宁、瑞昌等地打游击。白崇禧后来回顾：“本战区之游击战，系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为根据地，在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协助国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彻底破坏，使敌军重炮、野炮、战防炮、卡车等皆不能通行。故第一次会战，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会战，则因补充不及，空投无济于事，遭我空军之袭击、侧击、追击，敌铩羽而归。三次长沙会战，我国军将士在攻守方面，固有殊勋，然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
- ⁴. 湘鄂赣边区也有一些部队，尤其是地方游击队“挺进军”，贪生怕死，不敢作战。曾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刘公武撰有《抗日时期国民党的“湘鄂赣边区”》一文（载于《湖南文史资料》第3辑），作者回忆，当时边区流传一句顺口溜：“挺进军，贼子心，不打日本人，只打老百姓”。而边区的党政人员，一听到日本人来了，就惊慌失措，准备逃命。
同时，边区的国民党武装也力图绞杀中共势力。1939年2月，湘鄂赣边区所属的江西保安十八团司令钟石磐袭击并杀害了中共的赣北工委和赣北游击队负责人刘为泗、田文灼，逮捕后处决了赣北工委宣传部长辛忠荩，共杀害中共干部30多人，剿灭了中共在这里的根据地。[←](#)
- ⁵. 正规军之外收编的地方游击队给养就差很多。据刘公武回忆，当时边区收编的“挺进军”八个纵队，除了纵队司令部由总指挥部发给一点活动经费外，其他官兵给养都是就地自筹，游击队多是些“衣不蔽体、食不得饱，枯瘦如柴的叫花子兵”。这种情况，也造成了这些游击队在地方搞摊派勒索，当时百姓反映他们“游而不击，见敌则逃，扰民有余”。[←](#)
- ⁶. 湘鄂赣边区作为一级政府于1942年正式撤销，其党团机构重新移交各省政府，一些正规军也陆续撤离，但游击武装一直存在。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洪小夏曾撰有《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论析》一文（载于《中国现代史学会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指出1943年以后仍旧保持的国民党敌后根据地有晋西、大别山、浙苏皖边区、湘鄂赣、海南游击区、福建广东沿海等。总体来看，国民党在淮河以北的各根据地基本丧失，在长江、淮河之间的各根据地普遍遭到削弱，在长江以南的各根据地，则大多能够保持。[←](#)

自卫队：鬼子一出邵阳三县的县城就开打

92岁的戴民同一直遗憾没能给老伴许二娘一场婚礼。2015年6月12日，他们在新宁县政府的主持下补办了一场婚礼，白金婚，70年。7月我们到来时，屋里还保留着大红喜字，老伴许二娘身体较好，但很少说话，戴民同除了腿脚不太方便外，精神还不错，能呷饭，酒也每天呷，烟也抽一点。本来没读多少书的戴民同，也会说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文气的话。

邵阳民风彪悍，1944年日军入侵时，这里也是自卫队遍地开花的地方，而戴民同所在部队的司令徐名虎，更因抗日和整肃地方的功绩，被称为“老虎县长”。当年这支正式名称叫“新宁、武冈、城步三县自卫大队”的地方游击队，分散占据了各个农村、山头，“鬼子一出县城，到了谁的地方，谁就打他。”

那时他们也经常唱歌，有《九一八》、《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都唱，唱这歌才像游击队！”



三县自卫队在新宁活动地点图 / 新宁、武冈、城步三县自卫司令部总部和新宁县政府在新宁高桥乡，在新宁境内经常活动的地点有黄龙、白马田、古田、飞仙桥、税场坪、蒋家铺等。



口述人 / 戴民铜（同），1923年生，新宁县人，1940年入黄埔武冈分校学兵团，毕业后留校当教官。1944年加入新宁、武冈、城步三县自卫大队，抗战胜利后当过警察所长，又去陈明仁部队当兵，后随部队起义，回家务农至今。

采集人 / 刘见华 采集时间 / 2015年7月25日

“当兵嘛，要你送死你就送死”

自卫队啊？比我大的都死了，这边就我一个了。哪一年出生的？记不大清了，只知道我是甲子¹的，家里兄妹六个。

参加自卫队是后来的事，我是先到黄埔军校学兵团的，武冈的二分校²，我那时17岁，不是抓丁，就是有人介绍，我认识那里的一个文书，说是叫老表，其实就是乱叫的。我不想等到抓丁，主动当兵就会对你好一些，抓过去的就当成犯人了。学兵跟学生不一样，军校学生至少要中学毕业，我没读什么书，顶多算是预备生。他们学生其实是官嘛，军官，出来后是少尉、中尉、上尉；我呢，就是兵，出来后是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然后是上士，当班长，那就是“兵王”，再往上就是官。

军校里先练军姿，两腿绷直、小腹收紧、抬头挺胸；然后练打枪，每人一把中正式，立姿、卧姿、蹲姿，扣扳机的时候，还要屏住呼吸。除了学步枪，也学机枪，像捷克式轻机枪、带个盘子的俄式轻机枪，还有我们叫它水机关枪的重机枪，枪管子打热了要用水冷却，一个带子有200发子弹。还学各种炮，60迫击炮、枪榴弹、掷弹筒、山炮、野炮，只要是军队里用的武器，我们都要学。不是炮兵也学炮，不懂原理，但要会用，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还有榴弹炮，那都是美国人的，新式武器。

学了炮，又进劈刺班，拼刺刀，练习时要戴护腿、护腕、护面，护腿和护腕是竹片做的，护面是铁的。把这一整套学完，就搞了三四年了。出来后我作为二等兵，留在学校当教官，带新兵，主要是训练，和学兵团一样，军事队喽。出来后怎么混，看个人运气，学兵出来一般最多做到班长，也有少数运气好的，跟军校学生一样，做排长。我教新兵打夜战、打游击战，打仗时到了一个山头，情况不一样，战术也不一样了，很多军官到了山里就“没用”，就跟你硕士、博士没实战经验一样，没用。

1944年打衡阳的时候，我们学校里的学员、学兵，都派到邵阳、衡阳交界的地方，维持秩序、运伤兵、运弹药。当兵嘛，要你挖土你就挖土，要你抬担架你就抬担架，要你送死你就送死。那时老百姓挑着担子，走在路中间，往后方逃难，路两边

是伤兵。逃难的成群结队，一听日本人来了，其实还在前边老远的县呢，中间还隔一个县，这边县城的人就跑光了。

我们从武冈、邵阳到衡阳，去的时候运弹药、运补给，回来时运伤兵，都是步行。路上很少有汽车，有，也是烧木炭的，军车有一点油，坐车的都是当官的。伤兵都是衡阳那边正规军的，武冈、新宁这边有第七休养院，把两个县的祠堂、庵子、庙都放伤兵了。伤兵也死了好多，都埋在这边，没得亲人来收尸，但比战场上好一些，至少不是万人坑，都是一个个埋的，排的很整齐，还有小牌子，写着名字、哪支部队、哪里人，等等。死在哪就埋在哪，新宁这边就在老卫生院那里，埋了好几百人。

“俘虏头一伸，还说‘顶好顶好’”

邵阳跟衡阳没隔好远，日本人从衡阳来了，我们就退，直退到绥宁、新宁，结果日本人打过来，占了新宁县城，我们的县政府跑到高桥农村里去了。我这年7月回新宁来，本来要结婚的，结果到了9月份，婚还没结。听说徐君虎³搞了一个新宁、武冈、城步三县自卫队，我就跑去了。徐君虎那人也是蛮高大的，既是新宁县长，又是总司令。自卫队有三个总队，新宁、城步、武冈每县一个总队，每个总队下面有三个大队，大队下面是中队、分队，分队就相当于班。我毕竟当过兵嘛，就让我当了特务班的班长。

那时日本人占了县城，我们的县政府在农村，但隔的不远，县政府差不多就是前线了。游击队都是分散的，我们占了农村，还有县城往农村的各个路口，日本人一出来我们就打⁴。也不是所有部队都上，到谁那谁打，一般是消灭他几个，日本人就跑回县城了。

打仗的地点呢，我还记得几个，黄龙、白马田、古田、飞仙桥、税场坪、蒋家，飞仙桥那一仗，我们死了三个，伤了四个，日本人也有死的。他们哪，也真是不怕死，挺起胸膛就冲过来了，也不躲。我们还捉到一个日本人，当然不是我亲手抓的，别人抓来给我看管的，东京的，四十多岁，蛮高大的一个人，名字不记得了。抓来后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来打中国人？”但怎么问他也不说话，我想这没办法了，让他写，他就写了“日本中国，兄弟同胞，打倒英美”。我火了，就用枪托砸他脑壳，做样子要枪毙他，他呢，也不怕，把头一伸，还说“顶好顶好”，我们也听不懂，就是听到“顶好顶好”这几个字。

问不出什么东西，我们就把他关在老百姓家的一个谷仓里。饭还是给他吃的，还是白米饭呢，他吃了一大菜碗还嫌不够，还用筷子在桌子上画一个圈，我们就再给他吃。我看他身上脏得很，痒得一直抓，又看着他到塘里洗了个澡。有人听说这里抓了一个日本人，跑来这里要打他，被我们拦住了。哎，他也是炮子嘛，他在家里呻的好好的，上头要他来他就来了，他有啥办法？

别的地方抓到俘虏，都要奖励、给钱，我们这没有，只听说上头奖给司令部一挺轻机枪，但也没到我手里，至于奖没奖钱，我就不晓得了。我们关了这个俘虏七个多月，后来把他送到常德，交给正规军看管了。⁵

那时，我们游击队也经常唱歌，最喜欢唱的是《九一八》《黄河大合唱》，也唱八路军的《游击队歌》。

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就解散了，我在家待了两年，还教了一年书，因为我在军校学了点文化嘛。然后又到宝庆府当了一年城区警察所的警长，相当于班长吧，这差事也是找徐君虎弄来的。后来又去陈明仁部队当了兵。当时我早就成家，有一个小孩

了，但还是去当兵，因为家里三兄弟必须有一个当兵的，我当了好多年兵，搞习惯了，再去不吃亏，那两弟兄又不晓得打。在陈明仁的部队，番号我记得，71军88师202团，我先当排长，再当副连长，后来就跟部队起义了。⁶

¹. 甲子年应为1924年，但家人说老人记忆有误，实际生年是1923年。 ↵

². 黄埔武冈分校原为武汉分校，1938年秋，日军进逼武汉，武汉分校被迫迁至武冈，后来又迁会同。至1945年10月，这个分校招收了第14期至19期学员，训练了10个总队，另设军官训练班、技术训练班等，共毕业学员23502人。分校旧址现在武冈二中，于2013年5月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³. 徐君虎（1906~1996），新宁县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蒋经国、邓希贤（邓小平）、张闻天等人同学。徐君虎相当一段时期是站在反对蒋介石的立场上的，1931年还曾回新宁“立杆子”，拉武装，打烂了国民党县党部，起义未果，遭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悬赏通缉，辗转广西桂林，开办农场。期间还曾得到桂系支持，到湘西组建“抗日救国义勇军”，对抗蒋介石，与湖南省保安团作战。1937年冬，蒋经国自苏联回国，邀徐君虎赴江西担任赣南专署主任秘书，徐君虎欣然前往，助其实施“建设新赣南”计划，后因意见相左愤而离赣。

1944年日军入侵新宁，徐君虎回乡抗战，后来受命出任新宁县县长兼武冈、城步、新宁三县自卫区司令。而“受命”的原因，据《乱世县长徐君虎》（李波，新宁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1986年）一书载，县城沦陷后，县公安局大队长不听县长廖佩之号令，廖佩之无奈，逃到武冈，并从正规军借来100支长枪，招兵买马，可那里土匪猖獗，土匪们假装投靠廖佩之，领到枪后，就上山去了。廖佩之无奈之下，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徐君虎出山，主持军务。 ↵

⁴. 据《乱世县长徐君虎》载，徐君虎还曾亲自化装成卖柴的农民混进新宁县城，在日军司令部门口叫卖。司令部厨房买下柴火，徐君虎从厨房烧火的新宁人口中打听到一队日军将进瑶山扫荡，掌握了日军的人数、武器装备和兵力分布等情况。徐君虎带领自卫队在半山伏击这股日军，歼敌150多人，日军司令西原也受了伤，这也是自卫队取得的一场较大的胜利。 ↵

⁵. 据《新宁县志》载，自卫队在一年多时间内，共歼灭日军300多人，活捉了13名俘虏，而新宁在沦陷期间被屠杀民众2800多人，被杀耕牛4280余头，烧毁房屋4900余栋，耗损粮食17万多担。 ↵

⁶. 自卫区司令徐君虎1949年起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告台湾同胞书》后，徐君虎还致信老同学蒋经国，倡导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化干戈为玉帛。

有熟悉徐君虎的人撰文回忆，徐君虎有两大爱好，一是喜欢钓鱼，一是喜欢吃狗肉。上世纪60、70年代徐君虎闲居新宁老家，每天都去城郊的江口老桥或柳山小学旁的银塘湾钓鱼。那时，农田施药少，总能钓出肥鱼。“文革”时期，上小学的娃娃也知道他是“阶级敌人”，每当徐君虎钓鱼，就有孩子扔小石子，让他钓不着鱼。徐君虎则不愠不火，“浅笑挪窝，挂食另钓”。徐君虎吃狗肉，还特别喜欢新宁土狗。1992年，有朋友带两腿新宁狗肉拜访徐君虎，“徐老喜极，时年近九十，然齿力刚健，嚼骨有声”。（事见彭贵珊文《想起徐君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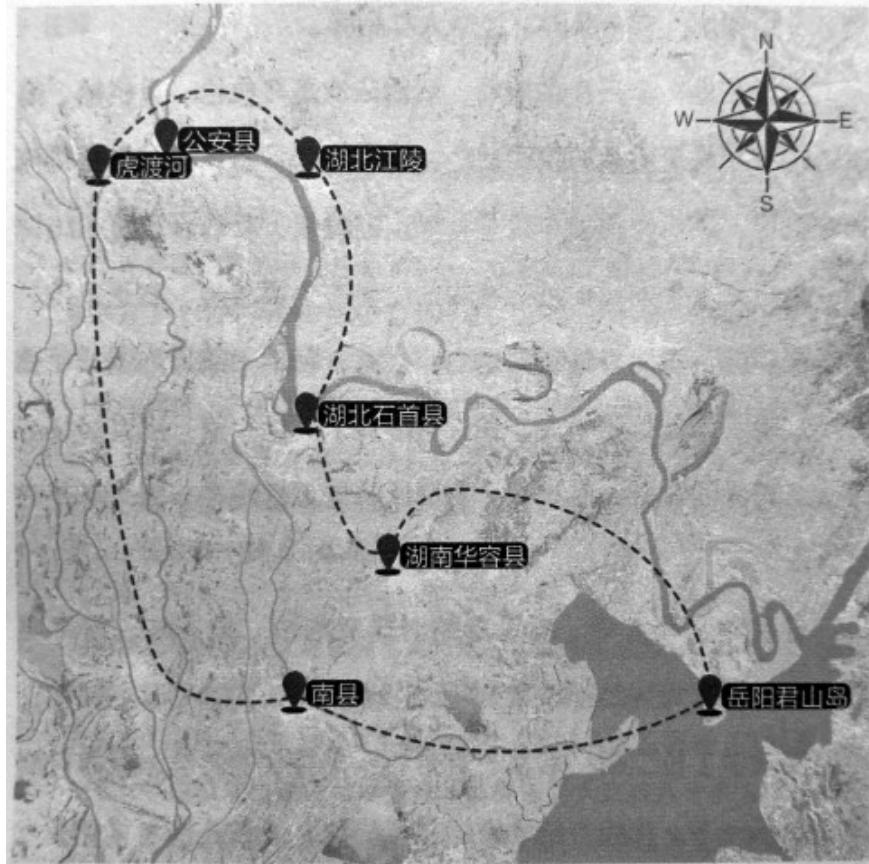
根据地：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

岳阳名山许市镇，在抗战年代属于岳阳县西乡，离当时被日本人占领的岳阳市不远。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到来时，金宣训和颜君福就在这里当了兵。

金宣训现在和老伴住在土坯房里，在村子的一角，夏天的门前长满了荒草，儿子也在村里，但他们还是自己住、自己吃。虽然“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却与一般农民不同，衣着整洁，会说点普通话。

乡土味气息浓厚的颜君福，却是喜欢拉二胡的，“正月探梅是元宵，我看我的小妹子生得这样俏，她在门前走为什么不理我……”老人现在依然会唱岳阳河西民歌《十二月探梅》。他当年当警卫员，喜欢玩手枪，十几年前，还可以拿派出所的手枪，在几十米外打树干，“百发百中”，但“现在差劲了，枪都拿不起了”。

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和他们的桃花山抗日根据地，鼎盛时期占地三千多平方公里，有二十七万多人口和七个联乡办事处。“他们虽然打游击，但可不是‘乌合之众’。



石公华抗日根据地范围图 /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建立了桃花山根据地，也称石（首）公（安）华（容）抗日根据地，位于湖南华容县与湖北石首县、公安县边界，东濒洞庭湖到岳阳君山岛，西临虎渡河，南起南县，北抵湖北江陵；荆江横穿而过，把它划成江南、江北两个部分，连绵22.5公里的桃花山横贯其中。桃花山根据地鼎盛时期是一个拥有3000多平方公里、27万多人口和七个联乡办事处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口述人 / 金宜训，1923年农历三月生，湖南岳阳人，1943年加入新四军五师江南挺进支队，从士兵到班长，一直在洞庭湖流域和湖北一带打游击。抗战胜利后，1946年于中原突围中负伤、被打散，后回家务农至今。

采集人 / 刘见华 采集时间 / 2015年8月6日

“常常我们走过去了，连老百姓也不知道过新四军了”

我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新四军来了我就去参了军，他们不抓丁，但我也不是什么“精忠报国”，就是恨日本人，要打他们，这些个娘操的！

新四军五师名义上是一个师，李先念当师长，但分得很散，活动在洞庭湖这一带的有干把人，我们这个小部队是一个营，三百多人。我所在的特务连，连长黄大金，排长是一个姓易的东北人，班长叫黎松林，后来我也当班长了，手下管12个人，1944年10月又入了共产党。

给我们发的枪有三八式、汉阳造，也有刺刀、手榴弹、轻机枪，打小仗时就是这装备了，打大仗时才能见到重机枪、迫击炮。我进部队后，就没安安静静地训练过，都是一边打仗、一边训练。今天在这里驻扎了，停几天，训练一下，过几天又走了，碰到鬼子就打，打仗比训练管用！不过新兵会放在根据地靠后方的地方，像华容那一带，鬼子少。新兵不是不打仗，是仗打得少一点。等训练得差不多了，有武术、有本事、会打枪、一枪能打死一个了，才放到跟鬼子地盘挨界的地方，那里仗就多了。

我们的基本策略就是转山，会跑、跑得动是我们的基本功。每天要跑一百多里路，碰到小股敌人，就消灭他们，敌人强大，就赶紧跑。不管怎么跑，都是绕着山走，山是我们的保护神啊。一个山环境好，够隐蔽，就多待几天，环境不好的，待一天就走。还虚张声势，人不多，但弄的到处都是新四军，让鬼子搞不清我们的底细。常常我们走过去了，连老百姓也不知道过新四军了。本来我们纪律好，又打鬼子，老百姓是欢迎我们的，但还是偷偷走，不跟老百姓说，是怕鬼子知道来打我们。鬼子会抓老百姓啊，老百姓一吓唬还是会说的，还有汉奸耳目，如果鬼子探听到我们的人数、装备，就会派大部队来剿我们。这事不能让鬼子占便宜，只能让我们探听他们的消息，偷袭他们，不能让他们袭击我们啊，吃亏的事我们不干。

除了绕山，我们也绕湖，哪个地方鬼子多，不好走，就坐小船从湖里绕过去，有时还绕到江北。打游击战，你就得会绕、会打圈圈。

“我打算假装跟他握手，然后突然用刺刀刺死他”

有次我们袭击了广兴洲¹的鬼子，干掉了他们一个中队一百多人，还缴了100条枪。我们就扒下他们的衣服，穿上，拿他们的枪，伪装成日军中队，坐了八条船，在洞庭湖里转。碰到一队鬼子，三条船，大概一个排。他们用中国话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我就回答，“我们是广兴洲的。”然后他就说他们是麦山铺的。为什么会用中国话呢，当时鬼子弄了很多伪军，日军里也有汉奸翻译官，遇到他们都用中国话问。我伪装成鬼子中队长，打头阵，他们打头的像是一个班长。我们两边的船往一起靠的时候，我呢，打算假装跟他握手，然后突然用刺刀刺死他，但我那几个兵没忍住，船刚靠上，他们就一把抓住鬼子兵的枪，夺了过来。鬼子班长身边有个机枪手，抡起机枪就要打，我一刺刀刺过去，咳，太急了，没刺中，他一躲，没站稳，就掉到湖里了，湖水也不深，但到了脖子，他在湖里端机枪扫我们，但也没打到我，也是因为太慌张。他水性也不好，湖底下有淤泥，他踉踉跄跄的，我又刺了一刀过去，这下中了，刺到他右胸，他就倒在湖里了。我们两边的人都是一阵慌慌张张地瞎打，有打枪的，有用刺刀刺的，有的在船上，有的掉到水里，打的都没章法。鬼子后来看我们人多，就划着船跑了。我们死了两个，连长也受伤了。除了被我刺死的机枪手，没看到日本人的尸体，死伤在船上的可能被带走了。这个死的日本人，就因为他是机枪手，所以首先要干掉他，不然他不会这么倒霉。

我又跳到湖里，把那挺“歪把子”机枪捞起来。我们连长受伤不轻，子弹从右腮帮子打进去，从左腮帮子打出来，满嘴满脸全是血，不知道是不是机枪扫中的。我们这次来，除了连长，其他的排长们都不在，连长负伤，我这个班长就成了最大的官，连长交代我把部队带回去，还说功劳也给我。

回到华容驻地，部队为我们开庆功会，连支队长也来了。袭击据点、伪装鬼子、洞庭湖缴机枪，我因此得了一等功。上级给我发了一个功章牌，比啤酒瓶盖大一点，银子做的，写着“新四军五师”“练兵英雄”什么的。不过我这个一等功呢，不是靠这一次仗，我们有个规定，三次小功可以累积算一次大功，我之前有了两次二等功，这次也是二等，就算成一等了。这一仗，赫赫有名，这边老百姓都知道我了。

那股鬼子往回跑的时候，又碰到建新农场过来的日军，以为他们也是新四军假冒的，跟他们又打起来了！不过也没打多久，打一会就发现打错了。这是我们听老百姓传的，没亲眼见到。

没多久，鬼子就来我们驻地报复了，还是那股麦山铺的日军。我们是被偷袭的，我们支队长不熟悉地形，本来我们有力量干他们的，但因为胆子小，没敢怎么打就跑了，死了二三十人，吃了亏。

我们跟国民党是合作的，互相之间不会打，但我们打鬼子，他们也不会帮忙²。

1945年鬼子投降，1946年我们跟国民党就打起来了。³



口述人 / 颜君福，1925年农历正月出生，湖南岳阳人，1943年加入新四军五师江南挺进支队，先做通讯员，因为一次作战两个人打跑了九个敌人，被“提拔”到支队部当警卫员，后来又当副排长。抗战胜利后，1946年参加中原突围，曾与支队长郑怀远躲在农民家里，只身回家，后在国民党的乡公所里当差。1949年解放军南下，带领乡公所警察起义，迎接“老首长”郑怀远入湖南。之后，复员回家务农至今。

采集人 / 刘见华 采集时间 / 2015年8月7日

“我以少胜多立了功，从步枪换了手枪”

我还没出生我老子就死了，长到13岁，娘老子也死了。1943年新四军来到我们这边，我就参军了。新四军五师是李先念的部队，他们搞了个江南挺进支队，我跑去当了通讯员。当时支队长是杨震东，副支队长郑怀远，主力部队活动在岳阳天井山、华容桃花山，还有湖北省的公安、石首、监利、洪湖。

白天我们派人扮成商贩或农民去侦察敌情，晚上找准机会袭击鬼子据点巢穴。为了保存实力，我们一般都选择逢年过节或者天气很坏的时候打鬼子，这时他们麻痹大意，好打。

挺进支队刚来时只有一百多人，后来就发展到五六百人⁴。仗呢，都是小仗，一般双方都是几十人、上百人，一次战斗死伤几个。敌人那边，真的日本鬼子很少，每次都是一两个日本人骑着马领头，下面全是伪军。日本人还有山炮、野炮，炮弹有尺把长，但我们也很少碰到他们用炮。所以我们打了很多仗，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打死的、俘虏的，还是中国人。像岳阳新沙洲那一仗，敌人三十几条枪，被我们打死十几个，活捉了三个。公安那一仗，下着大雨，碰上伪军百把人，我们打死他们一个，俘虏两个，缴了几条三八式步枪。那两个俘虏是君山岛上广兴洲的，我们有手枪班，看了他们三天，按共产党的政策，俘虏不打不杀，又把他们送回家了。

我们在洞庭湖的洪水港搞了一次夜战，敌人还是伪军，二三十人。我们打死他们一个，自己没伤亡，缴获土手枪一支，这种枪很落后，手枪的形状，却只能装一发子弹，像步枪一样，打一枪后要把枪掰开，退子弹壳。日本人收编了不少土匪，但也不给他们装备、军饷，他们还是穿的破破烂烂的，装备也差，很多人都拿土手枪。

在湖北调关，有次我和另一个通讯员打那路过，刚好碰到九个伪军骑马过来，拿的却都是土手枪。我们就干起来了，他们那破枪哪是我们三八式的对手，被我们干掉了两个，就掉头跑了。我们缴获了两匹马、两支土手枪。因为这一仗以少胜多，我

立了功，被提拔到支队当警卫员，我也从步枪换了手枪，快慢机，20发子弹，上面有个扳机，扳到慢机上，像手枪一样“啪啪啪”单发，扳到快机上，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连发。

因为是警卫首长，我这以后很少到前线拼刺刀，但还是打了几次大仗。在湖北毛家口，敌人是伪军一个团，我们还用了迫击炮，打死了他们几百人，他们团长是湖北人，也被我们活捉，作为匪首，把他枪毙了。他手下的那些兵，我们跟他们讲政策，愿意留下当兵的就留下，不愿意留的，送你回家，还真有人留下了。这一仗我也受了伤，右小腿被子弹打穿了。

我们还赶跑了华容的两伙土匪。他们一百多人，盘踞在山上，没有投靠国民党也没有当汉奸，但也不打日本人，专打老百姓，抢东西、敲诈勒索。我们出动了一个营，有三挺重机枪、九挺轻机枪，把他们赶走，我们就占了他们的地盘。两个土匪头子和他们的残兵败将，往洞庭湖跑了⁵。1949年在湖北监利，共产党又抓住了这两个家伙，毙了。

“枪没响的时候真的怕，枪一响，就不要命了”

我们那时不造枪，都是缴获的，乱七八糟各种枪都有，所以我玩的枪很多。手枪除了快慢机，还玩过五六发子弹的左轮、右轮，八发子弹的“南部式”，就是“王八盒子”；步枪用过汉阳造、中正式、德式的、俄式的，俄式步枪最重，中正式最好用；机枪不玩，但知道怎么用，像“捷克式”“歪把子”，我也懂，日本的“歪把子”，枪托向右边弯，也没“捷克式”好，那是国民党造的。我们连子弹也不造，都是缴获了，统一上交，上面再分派下来。

武器虽然造不了，但新四军的后勤还是尽可能保证的。我们也有后方医院，药品不多，技术不先进，用的也是农民的房子，但治伤还是可以的。军服也是统一的灰色土叽布，每年农历三月发单衣，八月发棉衣，年年都发，这个不缺。

我们也有军事培训，送一些人到师部去学习，不是正规军校，但有老师、有教官，教理论、教技术。我因为表现好，也去学习过，教室都是农民房，教官给我们讲各种战略战术、武器性能等。很多东西，到现在我还可以教你。轻机枪要三个人，一个正射手，一个预备射手，还有一个装弹匣的，换掉的空弹匣要一个人把子弹一发发装进去；重机枪要一个班，有正副射手，有用手托子弹带的，也有人装弹药，换掉的空子弹带，要重新装满250发，还有一个人专门管水敷的，重机枪打完两袋子弹就发烫，枪管要换下，用水冷却；一门迫击炮也要一个班，一个观测，一个架炮，一个装弹，还有人扛炮弹。

布置阵地，步兵在最前面，后面依次是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打起来是后面的掩护前面，迫击炮掩护重机枪，重机枪掩护轻机枪，轻机枪掩护步兵。打据点的时候，后面轻、重机枪掩护，步兵突击手匍匐前进，匍匐的时候左手撑着地，右手拿枪，快速往前挪。不能直接趴到地上，心脏一贴地，敌人炮弹或手榴弹打过来，即使打不中人，在旁边爆炸了，地一震，就会震坏心脏。共产党的队伍，有组织、有制度，虽然打游击，但可不是乌合之众。

打仗啊，吓人嘞，枪没响的时候真的怕，枪一响，就不要命了。那时人的神经都很紧张嘞，不知道哪一天就死了。我呢，小时候就学了拉二胡，后来一直带着，不打仗的时候，就靠它解闷、娱乐一下。我经常给大家唱《三娘女》《教儿经》《孟姜女》《十二月探梅》……“正月探梅是元宵，我看我的小妹子生得这样俏，她在门前走为什么不理我……”

打败日本人后，1946年我们跟国民党干起来了。中原突围，我们吃了大亏，我是一直警卫我们首长郑怀远的，部队打散了，我跟他一起躲在农民家里，后来他自己去找主力部队，还留给我一百块大洋，要我保管的，但这些钱都被我花了。我一路跑回家，又养伤，要花钱的。伤好后到国民党颜先岳部手枪排当班长，后在乡公所当卫兵。解放军南下，我听说老首长郑怀远又回来了，就带着乡公所的人起义，还把乡公所里的一挺机枪和十几支步枪都送给解放军了。⁶

¹. 岳阳君山广兴洲，是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活动区与日军占领区交界的地方，据《岳阳市志》记载，日军在这里驻扎了一个宣抚班30余人，还有一个湖北监利人张世杰的伪军大队，有200人。新四军针锋相对，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广兴洲乡抗日民主政府，导致日军经过广兴洲的粮草，经常被封锁和断绝。双方在这里频繁交锋，如1944年5月，日伪军对广兴洲实行扫荡，挺进支队就派一个排袭击了日军宣抚班，击毙日军四人。后来，张世杰带领伪军大队从广兴洲出发到华容边境扫荡，挺进支队一连连长彭守春率兵埋伏在柿村岭附近的大道两侧予以伏击，打死伪军十多人，俘敌四十多人，缴枪50支。 ↵

². 当时新四军挺进支队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关系很复杂，既有合作，也有敌对，还有收编，不仅是像老人说的互不干扰那么简单。《石公华抗日烽火》（《石公华抗日烽火》编写组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一书载，原国民党保安司令张震华部陈玉龙大队有八十多人驻扎在桃花山，挺进支队进驻桃花山后，陈部被改编，分别编入支队各连。华容东山的胡道高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抗日队伍，自称“华容县自卫大队”，1944年初，胡道高要求投奔江南挺进支队，但其部分队员害怕严格的军纪和艰苦生活，不愿投奔，挺进支队经过半年的努力，也收编了这支部队。

而国民党游击队侯宗瀛部一百多人，多次进攻桃花山根据地，与挺进支队抢夺地盘，1945年2月，挺进支队和侯宗源部大打出手，双方互有伤亡。 ↵

³. 据《华容县志》记载，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侵占华容的日军仍从县城调集日伪军180多人，对桃花山根据地发动扫荡。支队长郑怀远率五个连的兵力，于山坡两侧埋伏，打退了日军先头部队七十余人，又派兵截击了日军后路。经此失败，这一带的日军才没有继续顽抗。抗战结束后，金宜训被调到湖北潜江“打国民党”，后来到大别山参加中原突围，左膝盖被手榴弹炸伤，弹片至今没取出来。再后来分散突围到洪湖，熬了一个月，看看没希望了，团长下令部队解散，金宜训自此返家。 ↵

⁴. 《石公华抗日烽火》一书中有挺进支队兵力发展的记录，支队刚成立时仅一百多人，有手枪三支、步枪38支、机枪一挺。后来新四军在根据地内逐级建立了民兵基干队和新兵大队，从民兵基干队和青年学生中挑选人员，为挺进支队输送新兵。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5月，共输送新兵800多人。到1945年9月，挺进支队的主力正规军即发展到五个主力连，一千余人。打击和收编土匪也是挺进支队扩充实力、赢得声望的一个重要方法。 ↵

⁵. 据《华容县志》记载，他们到华容后，首先收缴了土匪唐云涛部几十支枪。1943年12月，土匪张金芝到板桥乡一带抢劫，支队长杨震东率领挺进支队一百余人赶到板桥乡，活捉了张金芝，缴枪十余支。1944年6月，土匪严忠烈带了八十多人，到沅江县茅草街，将喻仁山、杨大孝等农民抓走，绑票索款，根据地联乡办事处率领民兵基干队，将严忠烈匪部击散，救出农民，赢得了农民的拥护。 ↵

⁶. 因为一直打仗，颜君福27岁才结婚，“那个年代算是很迟了”。“文革”期间，因为曾在国民党的乡公所里当差，颜君福被批斗，说他是土匪。他把负伤证、起义证拿出来给批斗他的人看，但“那些人是‘土蛮子’，不懂政策，也看不懂”；又把证件拿给公社书记看，书记懂，摆了摆手，“算了算了”，颜君福才没被打。1984年平反，岳阳市档案馆从档案中查实颜君福的履历，重新补发了证件。此时他的老领导郑怀远在湖北省军区当司令员，岳阳市“落实办”还把颜君福带到武汉去落实政策，“其实就是玩了一星期”。现在他享受国家优抚复员军人津贴，每月800元。 ↵

游工队：一直游动，一直流浪

1937年，因战事影响，长沙大东书局的账房先生把两个儿子留在了南县（今属益阳市）的外婆家¹。半年后，哥哥刘革凡由南县返回长沙，彼时11岁的弟弟刘津，肩膀上坐着周家的少爷。

刘津每天放牛、杀草、做家务，以“骑蛤蟆”的姿势接送周家少爷上学放学。“我是书局帐房先生的儿子，是周家童养媳的侄儿”，刘津说，他是逃难来求生活的，日子不好过。一年后，刘津进入药铺做学徒，却照旧是做家务和接送少爷。

因此，当哥哥写信来告诉他游工队²的事情时，刘津看到了生活的转折。在南县呆了两年后，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刘津从药铺跑出来，偷偷乘船回了长沙，随即参加了游工队。

在游工队，刘津爱上唱歌，他的聪明调皮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父亲不幸过世后，为养活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他辗转各个部队剧团，“在旧社会，我做什么都是为了生活出路”，刘津说。

无法想象，生活的沉重是如何压伤一颗年幼的心的。1951年，税务所所长刘津遭遇一个女孩的猛烈追求，“她把我拉到她身上，睡到了一个床上，我都哭了”。半个多世纪后，刘津说起此事，依旧激动而悲伤。后来，女孩跟别人结了婚。刘津说：“不是我不要人家，是因为没有钱，没有住处，我自卑啊！”随后谈恋爱，但没有结婚，没有小孩，至今单身……也许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因自卑而失去的女孩。

2015年5月26日，岳楚区金岭小区。屋里堆放了不少书，大部分是文学书籍。今年90岁的刘津，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称自己仍每天看书，“我想写一些这样的故事”，他说。



口述人 / 刘津，1926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出生，长沙人。1940年参加第二游工队，后辗转多个部队的剧团。1943年投奔哥哥，进入中美混合空军大队，1944年参加青年军，1947年随204师到台湾，1948年返回大陆后脱离部队。这段口述主要讲的是他在游工队的经历。

采集人 / 明鹤 采集时间 / 2014年3月21日、2015年5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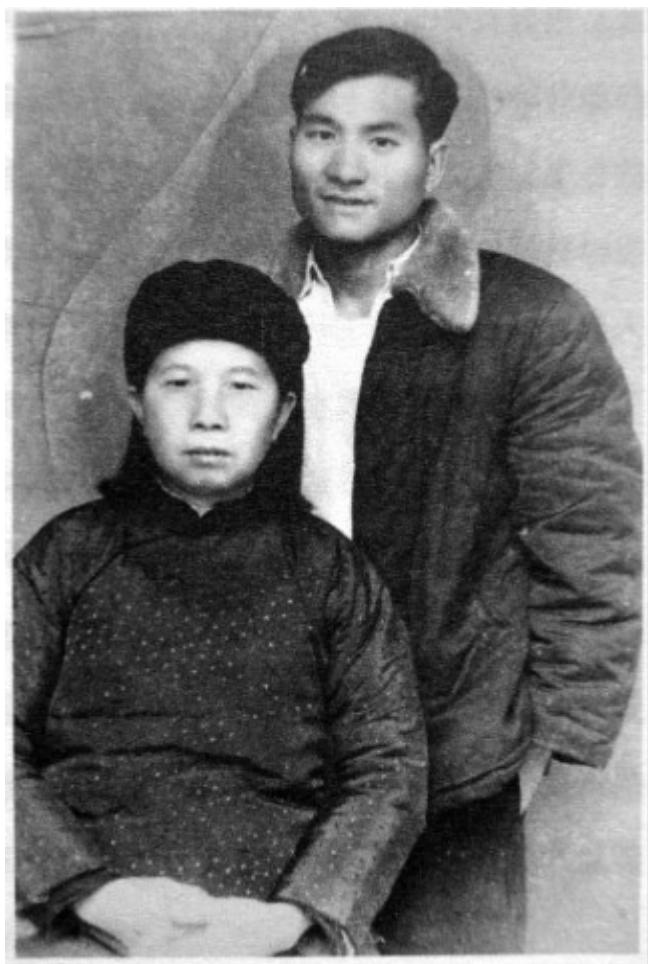
“我们在南岳训练了一个月，学会了吹口琴，唱抗日歌”

游工队不属军队，也不归政府管，它其实是由教会组织的一个慰问团，主要是到部队唱歌、跳舞、演剧、放映电影等，进行慰问活动。为什么叫游工队呢？因为我们是游动的，每个队都配有电影机，所以又叫电影游行工作队。

长沙大火的时候，我哥哥进了第一游工队。那个时候，我还在常德外婆家，他就写信给我，我这个心就动了。回长沙后，我参加了第二游工队，里面几乎全部是小孩，我是当中最小的一个，当时只有12岁。游工队成立后，跟着我们就划了区，我哥哥所在的一队叫湘桂区，我们第二队划入湘赣区。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南岳训练了一个月，学会了吹口琴，讲普通话，唱抗日歌，演街头剧、独幕剧等，我个人喜欢唱歌和指挥合唱团。

我们在部队集中的地方，像王耀武的74军，其中有几个师部，当时在湖南及周边。我们到他的部队去，给士兵们唱歌，进行伤兵慰问，也抢救当地难民，还帮伤员们写家信，说得好笑，我们自己还是小孩子，能够写多通顺的信啊！但那就是一个“情”字。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都是这个样子。我记得，我母亲有一次去教堂，路上碰到日本兵，他们拿刺刀背在我母亲额头上敲，也没有杀我妹妹，当时妹妹小得很。我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就这样子逃难到了教堂。这在我心里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一提到日本鬼子，我满肚子的火。当然，比我们家惨的太多了。



1957年冬，刘津和母亲。



1984年，刘津从大凉山农场退休时与同事的合影。

当时我们游工队有17个人，队长雷子哲，河北保定的，他参加的最早；艺术干事甫才干，专门训练我们唱歌、跳舞和演剧的；电影技师高重沛和生活干事卢文华，另外还有一个炊事员，当时是编外的，我们都叫他叔叔，非常喜欢他。只有这五个是大人，其他的全部是小孩，后来在江西又进来了几个，就不只是17个了，他们的名字我也都还记得。我那个时候不叫刘津，我叫刘建民。

我们里面的小孩子，有几个后来很不简单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人叫陈瑞陵，从我们进队开始，他就是男孩子里面最倔的一个，也是最能干的一个。游工队解散后，他去了重庆21兵工厂，好像还是工会主席，后来听说，他也是最早加入地下党的。我对我的老战友非常怀念。

“走到哪住到哪，我们从不打扰人”

游工队常年四季都在出差，走到哪里工作到哪里。我后来还学会推鸡公车（手推独轮车），我们里面小同工³都会。不是要放电影嘛，放电影就要电影机，电影机有放映机、变压器，还有煮饭的炊事箱子，十几个箱子，都要靠我们自己推。

我们队开始划入湘赣区，因为战事转移，后来又划入了浙赣区。南岳培训完后，我们过醴陵，走万载、莲花，到了江西吉安。吉安有国民党军队的修养院、伤病院，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在江西樟树镇，当时在王耀武的部队里，我们遇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那时我十三四岁，背着伤员返回后方，这么大（他两只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圈）的碎片穿中我的右小腿，我就这样痛得倒了下去，直到其他同工把我扶回去，你看，伤口现在还看得到。后来有一次，王耀武在台上给士兵讲话，“我们要穿着草鞋，去战胜日本人的皮鞋”。当时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后来，我们过鹰潭，到上饶，随后还跑到蒋介石家乡溪口。溪口的环境很好，风景很漂亮，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在一个小街道上，睡两根扁担（两根扁担拼在一起睡），第二天就走了。后来又到了宁波，在那里进行了培训。

我们一路走，经常是哪里有条件，我们就在哪里培训。最远到了镇海，然后我们就返回了吉安。去不得了，再过去就是沦陷区了。当时，我们游工队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就是走到哪住到哪，我们从不打扰人。

我们青年会组织蛮严密的，当时我们还有自己的制服，就是我们工作队的制服。你可能没听说过，我们队在长沙四方塘成立的，就是原来的老疗养电影院，它成立的时候是非常轰动的。长沙青年会的总干事，叫做刘良木，在那时的音乐家里面，他

也算很有名气的。我们第二队里面，男女差不多各占一半，年龄也都相差不多。

我们不是部队，我们是属教会组织的，当时一路走过去，沿途有比较乱的地方，当地部队还要派兵保护我们。我们到地方，吃啊，住啊，都是高要求接待的。在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还设宴招待我们；74军的王耀武，我们去了一个星期，每餐都陪着我们一起吃饭。但是，我们的生活费不高，初期分每月30块、20块和10块三个等级，但大部分人只有10块。我因为年龄太小，最开始只发了2块，后来到8块，最后才到10块。

我们回吉安后，父亲因肺结核病故，我就回长沙奔丧去了，那是1941年左右。后来好像也有过多久，第二游工队就解散了⁴。奔丧后，日本人打过来，我和我母亲分别了。我到教堂（北正街教堂）去的时候，鬼子已经从那边过来了，我和母亲往回走，从三角塘绕过去，还是回到了教堂。我穿着制服，会被杀头，母亲一着急，就叫我快跑。我把制服脱了，穿一个小褂，赤脚沿着湘江边上跑。到南郊公园附近，看到河边有一条小船，是王耀武92师的，就接我去了他们政治部，参加了他们的星海剧团，后来跟着又去了朱亭（株洲县南部的一个古镇）。

一个月后，长沙的鬼子跑了，我们又回来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星海剧团被冲散。我到小吴门的码头，就在太平街河堤边，遇到王耀武74军下面的82师。有一个士兵看到我从河边过来，讲话南腔北调的，就说我是小汉奸，把我抓去交给了连长。这样我就被抓了壮丁，跟着去了常德临澧。

他们看我还会唱歌，不知道我是干嘛的，我就说我是干什么干什么的，他们把我当个知识分子，然后把我弄到无线电台，让我在里面摇机器，其实我不会无线电。

常德细菌战的时候，82师又调回长沙。本应该进市里的，因为知道了日本在常德搞细菌战，所以部队绕道回长沙，然后住在了橘子洲。我到那里，就想家了，我是被抓来的嘛。我家在晴佳巷，从橘子洲可以看到。我看到它在冒烟，我的家被炮轰了，但我还不能回去，那个江边不能通过，是戒严啊。

“那天夜里，弟弟是我抱在手里死掉的”

那个时候，日本人刚刚退，城里戒备森严，还紧张得很。我们部队的班长是湖北人，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打了我扁担。我跑啊，我想回家，我不知道家人生生死亡，我就跑啊，但没跑成，他把我抓了回来，打了我扁担。我的脚被打烂了，一个娘舅看了，就讲“何事（长沙方言，怎么）下得了手，一个细伢子。”她把我抱起睡到猪楼屋（养猪的房子）里，帮我搞草药，她讲：“伢子，你莫急，你等我把你养好了，我喊我崽伢子（方言，指儿子）把你送过河去。”

部队不管你，你是逃兵，他还管你啊！我们老老实实做人，你抓我当了兵，也要让我去看下母亲，我屋都被炸了咯。后来，那个爹爹和他崽半晚上摸黑把我放到小船上，这样把我送到了岸边。回去后，屋里一个人都没有，什么都有得了，唯一的念头是教堂。我往教堂跑，轻车熟路，果不其然在教堂，母亲，小妹妹，后面还生了个小弟弟，是我父亲死之后生的，长沙人喊“背腹生”，他们三个人住在教堂的角落里。

我跑了后，班长带起兵来抓，开始他跑到我屋里，后来又跑到教堂。看到他一来了，戴小姐把我藏在她厨房，就是教堂那个牧师啊，她跟我讲：“孩子，你不要管，你等我去。”她就去了，对着国民党兵吼了一阵，然后把他们轰跑了。

总算一家团聚了，但生活却一点出路都没有。离开教堂后，我母亲、我，妹妹和弟弟，四个人只能挤在一个居民楼的楼梯间。那个冬天，我满长沙城找朋友，找工作。正是打仗的时候，哪里有什么朋友可以找？找工作更难。年三十的晚上，弟弟发高烧，没钱买药，连个躲风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叫喊天天不应，这就叫喊天天不应。那天夜里，弟弟是我抱在手里死掉的。街道上一个老头子可怜我们，告诉我们可以到哪里去埋。母亲用仅有的一件破棉袄，把弟弟包好后，让我去埋了他。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我们跟着往衡阳跑，这就喊作逃难，整个大撤走啊。到衡阳后，我们住河边的一个茅草棚棚里。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拿家里仅有的钱跑“单帮”⁵，那还是靠人家接济得来的钱。后来，遇到原来星海剧团的朋友，跟着进了新三军剧艺社。

领了一点安置费，把母亲安顿好后，我就跟着部队走了。后来，剧艺社解散，我去了桂林的空军招待所。⁶

链接：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部歌

3/4 F调 柳傅作词 舒模作曲

61 33 | 54 33 | 61 33 | 32013 |

献身人类 献身民族 不惜牺牲

3212 | 133— | 6133 | 5433 |

要为抗战服务 鼓励军民 奋发参战

6133 | 544— | 5432 | 133— |

要使战士快活 要使伤者恢复

66— | 6536 | 6536 | 6—— |

愿在 炮火下尽 我们的职责

33— | 3213 | 3213 | 3—— |

愿在危险中求民族的出路

553556 | 635122 | 3322 | 22355 |

完成建国的伟业 建立全民的幸福 齐正我们的步伐

66— | 6536 | 6—— |

踏向光明的道路 踏——

¹. 大东书局位于长沙南阳街，这条街以书店集中而闻名。抗战时期，很多书店纷纷撤离，其中也包括大东书局。1937年，作为书局账房先生，刘津的父亲分得了一些书，到南县城关码头开了一个书店。但是，没有多久书店就开不下去了，家人只得又搬回长沙。当时家徒四壁，因家里小孩众多，刘津和哥哥刘革凡被留在南县外婆家。 ↪

2. 1937年，青年会全国协会筹措经费组成了“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总部最先设在河南许昌，后转移到信阳、汉口和重庆，设立了三十多个支都和三个电影队，分别在各战区和后方开展工作。军人服务部的工作项目主要有：在铁路沿线和公路要地备茶水、稀饭招待过往军人，配送少量书报；在疗养院慰问份员、协助换药、代写书信、设立俱乐部等；在前后方，组织电影队，配备马达发电，放映电影以及其他随军服务；运送枪支到前方，接运伤员到后方等。1939~1941年，服务部先后成立了四个游行工作队，全名叫“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游工队”，分别在湖南、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地活动。 ↵
3. 在军人服务部内部，志工之间互称“同工”。如果年龄较小，则称“小同工”。
↵
4. 除了基本工作外，军人服务部还定时练歌唱，做游戏，安排读报、读书、座谈等，几乎每周都要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俱乐部的书刊多是生活书店等进步书店和杂志社出版的，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后来在国统区越来越被某些人注意和怀疑。为避免卷入内战，1945年10月，“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正式宣布解散。 ↵
5. 抗日期间，衡阳相比耒阳要繁华一些，猪肉要贵一点。刘津偷爬火车到耒阳，买上一些猪肉，藏在衣兜里，带回衡阳售卖，这样来赚取其中的差价，叫做“跑单帮”。 ↵
6. 刘津的哥哥当时在桂林空军招待所工作。 ↵

工兵：从这里通向东京

乱世情

兄弟：老兄胆子比较细，我打死就打死了

上午11点，浏阳普迹镇，刘光德拄着拐杖从卧房走到堂屋，双腿瑟瑟发抖。70年前，他曾挑着子弹跑遍湘赣，在枪林弹雨中爬无数山坡，趟大小河流。坐在凳子上，目光茫然。“耳朵聋，不听见，娘啊？早病死了，不记得了。”老人像看着我，又像看着远方。

1945年，从江西萍乡的部队赶回浏阳，刘光德看着母亲吐血而死，弟弟刘光尧此时在前线打仗，两个月后才收到家信。刘光尧清楚地记得是4月21日早晨，他说他印象中的母亲，“刮瘦刮瘦，哭个不停”。

问他，假如没有战争，会是怎样？“起码不会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吧。”父亲呢？“父亲也悲伤，不记得太多，他1964年过世。”89岁的刘光尧说。

70多年前，两人一同参战，又先后平安返乡。这对幸运的兄弟兵如今都住在普迹镇，尽管两家相距只有6公里，但上一次相见还是半年前，“年纪都大了”，刘光德说。刘光尧认为，自己和哥哥不同，“老兄胆子比较细，我打死就打死了。”

2015年7月，我们在浏阳分别采访了这对兄弟。



口述人 / 刘光德，1924年农历七月初五出生，浏阳市普迹镇人，现跟儿子住在普迹镇新府社区。1943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入伍，进入100军19师输送连。1945年，母来病危请假回家，随后留在家中。老人现有风湿，行动不便。

采集人 / 明鹊 采集时间 / 2014年7月7日、7月14日、7月16日

“任务急的时候走路没停过，慢了要挨打”

我当兵以前是竹匠。乡里捉壮丁，17岁就有名字，我不到二十岁去当兵，最恨日本人，恨不得用扁担拍死日本人。我屋里有九兄妹，我是老四。17岁就躲壮丁，开始是请人去¹，没钱了以后就自己去。我和我老弟（刘光尧），还有一个老兄（刘光厚）都进部队去了²，老兄不晓得在哪个部队，我和老弟进了100军19师。

19师驻扎在青龙头。我们找部队打了证明，到政工所取了收条³，他（刘光尧）进了特务连，我就去了输送连。输送连有80个人的样子，没得骡子没得马，总是靠人担，担起担子就跑。

到桃源漆家河就打仗了，他进我就退，退到王家棚，围了三个月，后来去了益阳、常德，还把日本人赶到湖北藕池。我们输送连没有枪咯，一根扁担，运子弹到前线去。

一个班只有一杆枪，拿枪的负责放哨。我只拿过三天的枪。班长把枪分给我，我就对他说：“你非要我拿枪的话，就莫怪我当逃兵。”

后来又去了安化、武冈、临澧、衡阳、芷江，我们杀了四个日本人。输送连送子弹，送粮食，还做扁担。他要我送就去送，送了又还要送，也不敢挑着粮食跑，没有一个人敢跑，万一被日本人打死呢。

我在部队里胀也胀过，饿也饿过，一天吃三餐，有时两餐，总是挑担子。走路穿草鞋，经常要站在水中，一站两三个钟头。任务急的时候，走路没停过，慢了要挨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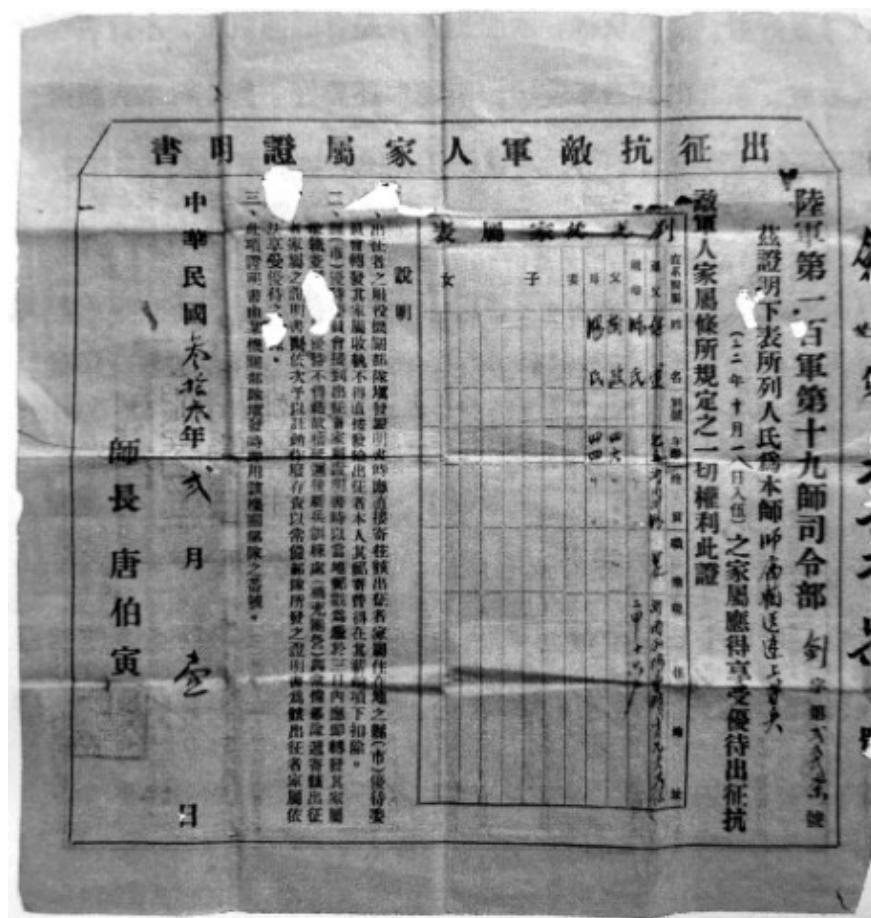
“衡阳过后，他走一条路，我走一条路”

我没有上战场打仗，送子弹粮食还搞不赢，夜里也要送，饭都没呷完就跑去送。老弟是特务连的，总是跟着师部走；我一直随唐伯寅⁴走，来了信就跟着走，挑五十斤，还要担起跑。七月份在衡阳明南寺打得狠，死了的摆在平地上，遍地都是死尸，哎呀，死尸闻不得，肚子生蛆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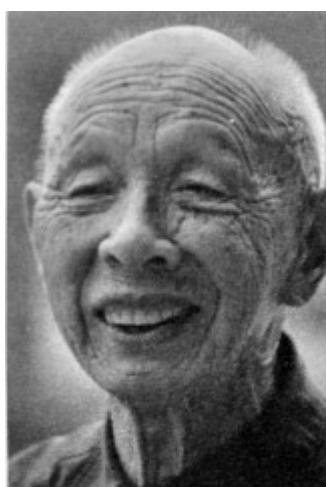
挑东西累，但没太大的危险，前面有人开道，除非是天上来飞机。有一次在衡阳送东西，飞机丢下的弹片从我后脑勺擦过去，只听见“嗖”的响声，我一摸，哎呀，手上都是血，现在这里还有印子。衡阳以后我们两兄弟就分开了，他走一条路，我走一条路，我去了江西。

接到娘的信时我在江西萍乡，我老弟没看到那封信。我耳朵聋，听不清，又没读什么书，只读了三年，信里面讲娘生病了，不晓得是什么病。

到江西萍乡后就接到屋里的信，娘已经病了好久。部队写了东西上去，然后就批准我回去，请了三天的假，走了半天到屋里，娘老子吐了好多血，第二天就死了。后来准备回部队去，结果部队去了浙江，就没回部队了。



刘光德的抗敌军人出征证明。



口述人 / 刘光尧，1926年农历八月初二出生，浏阳市普迹镇人。1943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入伍，进入100军19师特务连，1948年返回家乡。

采集人 / 明鹤 采集时间 / 2014年7月7日、7月14日和7月16日

“一天走了两个，她哭得不得了”

(1943年) 农历七月十三日，天气不热，穿两件衣服，已经到秋天了。那天下雨，早上来了命令说12点走，队伍还没走就落雨了，然后说下午4点走，又没落了，等到四点又落了，一直落。那段行军的时候都落雨，走了15天，一休息就不落，一行军就落雨。

我娘住在普迹镇银皮洞，我夜里回自己屋里时，她晓得我要走，看着我，一直不肯回去。一天走了两个，她哭得不得了。就在下头那个供销社那里，她从这边跑到那边，那边跑到这边，一天饭都没呷。我民国三十二年（1943）离家，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娘死，都没见我娘的面啊。

我进部队先培训了三个月，到农历十月开始往北行军，路上冻死了好多兵。副师长叫杨任，看到死了兵，就跟我们讲，“你们慢慢来”。到桃源漆家河遇上了日本人，夜里一个连长被打死了，是57团第8连的连长，姓杨，当时他去拆浮桥（用竹子木板搭建的浮在水面的桥）。

那个晚上，日本人冲过了河，河有普迹河那么宽，他们设备足啊，加上河水又浅，汽车从河里就开过来，过来就把我们围了，然后放火烧了我们仓库。我们有三个团：55团、56团和57团，一共一万多人，日本人不晓得有好多。开始住在漆家河街上，日本人打过来后，我们就退到了金鸡山。围了两三个月，一直到74军从溆浦过来才解围。在漆家河那时，我老兄也在，有时候看到，但没讲过话。

“每次打仗前，钱全部买牛蹄子吃，打死了就打死了”

我是特务连的，是负责保护师部、士官处、军械处、卫生处、参谋处的，我们有四个排，一百多人啊。打仗呢，我随师部走，我老兄搞补给，主要从兵械处把子弹运到的前方。漆家河后，一部分兵往常德、益阳开，我往沅陵，后来我去观音码头，在那里又军训了三个月。

特务连上战场不多，不过长期要围着师部走，夜里没好多时间睡觉。打衡阳的时候，我们傍晚5点得到命令要摸到后方去，只带武器，其他什么都不带。但是第二天天亮，城里面的第10军就全部瓦解了，我们也退到了水同江。日本人厉害呢，做了四五层防范，攻也不容易攻。

特务连没有迫击炮，配了机枪。我们拿步枪，一个人200发子弹，上战场时，还背两个手榴弹，多的时候配四个，有二三十斤重。

衡阳过后，就不晓得我老兄的去向了，我去了湘西洪江，那里小地方多得很，名字我都不清白。

1945年，我母亲病逝，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四月二十一日早晨。我六月才收到那封信，信上写着“母亲已死”。那时候我在武冈旁边一个叫长冲的地方，日本人还有投降。母亲过世后，弟弟被送去做手艺，细得很呢，我父亲跟我大哥一起过。

信写得很简单，问“好不好？在哪里？”然后讲母亲死了，是请别人写的。我看了过后，心里很难过，流了眼泪，两三天没呷什么饭。连长曹昆做我的工作，“你母亲也是我母亲，人总有一死，不要悲伤。”他还说，“等任务不大了，我再准你的假。”听了连长的话，我后来就升了官，做了上士班长，管一个班，还加了钱，按级别加的，比下士要多。

特务连每次打仗前都会做些好呷的，钱全部买牛蹄子吃，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后来打水同江、湘西长城、武冈，特别是打湘西长城时，日本人在山脚一个庙里面，我们得到信后爬到山顶，那大炮、手榴弹全部往下投，“轰隆轰隆”炸死了好多，马

啊，人啊，惨得很。打仗就是这样，都靠机枪大炮，步枪是怎么呢，只能在一里以下，打冲锋的时候，特别夜里打冲锋，把刺刀上了，这样去拼命，我没去拼过。

“那天我去上坟，烧了香，还打着一把伞”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我们在安江还是洪江，接手了七百多匹马⁵。那时候我在炮兵营，手上有七匹马，一个月后赶到湖北武昌，死了两匹，剩下五匹。走的时候108人，到湖北剩五十几个，有好多都跑了，马也一匹匹地死，到了武昌城外面，也不晓得交给了谁。

两三天后去了江苏镇江，在那里负责交按日本物资。没得何应钦条子根本就不能交接，那要犯法的呢。我发了一双皮鞋，那鞋子是好鞋，要几块钱，衣服也好，是青的咔叽布，不过我没有发衣服。东北的新四军交接，听说那还要好一些。日本人投降，我们多发了一个月的饷，是在镇江补发的。

后来又去了泰州、杭州，那边有蛮多的苑房（女子卖身的地方），我那时候是班长，管十几个人，其中有三四个去过，只要天亮出操有人，就不会被抓到。我自己没去过，去那个苑房的，有些得了病，有的病得都不清白了。

在那里待了一年多，后来裁军，想回去你就回去，不霸蛮。民国三十七年（1948）六七月份，我把武器都交了，一把79式步枪，可以上五发子弹⁶。回来看到父亲，他没有什么变化，看我回去蛮高兴。一起去了母亲的坟上，父亲和哥哥带我去的。那天我去上坟，下着雨，烧了香，还打着一把伞。

¹. 据刘光德口述，二十担谷请过壮丁，五十担谷也请过壮丁，一共请了五个壮丁，他们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

². 刘光厚从小过继给了别人，因为养父母家里条件不好，所以选择替别人出丁，战争结束后也没回来。据刘光尧口述，当时刘家情况是：大哥已经结婚，二哥过继给了别人，三哥给人当长工，要养活一家人，下面的弟弟妹妹都小，跟着娘老子讨米，老四刘光德和老五刘光尧当时在外面学手艺，迫不得已去当了兵。 ↩

³. 打了证明条子以后，就不会再到刘家征兵了。 ↩

⁴. 唐伯寅（1897~1952），字剑椿，号剑湘，湖南省湘潭县人。1939年8月任第19师师长，11月升陆军少将，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4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1952年2月21日，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杀。 ↩

⁵. 据刘光尧说，这些都是拉炮的马，很多受了伤，不能骑，也没有马鞍。交马时要点数，如果马死了，要把耳朵和尾巴割下来交上去。 ↩

⁶. 刘光尧此说法与之前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有差异。此前，刘光尧曾说自己是1950年在广西玉林向解放军起义投诚后回家的。 ↩

金兰：相识于岳麓山下

1937年，18岁的刘俊明在山西太原遭遇了一场炮火轰炸。那个硝烟弥漫的夜晚，他出逃至陕西潼关，饥肠辘辘地走出火车站，随即加入“抗日敢死队”。自此，老家成为过眼云烟。

刘俊明随“敢死队”南下，经河南开封，最后到达长沙岳麓山，在此接受了基本培训，后又学习无线电技术。九个月的时间，让他从一名高中生转变成为“电波勇士”，同时让他庆幸的是，认识了金兰之交黄乃仁。

无线电情报战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1944年8月，刘俊明转发出衡阳守军的“最后一电”¹让看过的人潸然泪下，如今它却成为一封罗生门电报。

刘俊明说：“我们独听到自己的跳，也能听到敌人心中的声音。隔着70年的岁月，这封电报到底由谁发出？对于96岁的刘俊明来说已不再重要，“如果能找到黄乃仁和黄圣杰就好了。”刘俊明1947年奉命去台湾，因爱人病重，不久即返回湖南，而“金兰”黄乃仁同时却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从此再无联系。



蒋介石发给方先觉的电文原件，蒋希望第十军“存亡关头，努力杀敌”。1944年8月6日，不能再战的方先觉为保全近万名官兵性命，发出电报，“此电恐系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口述人 / 刘俊明，1919年农历十一月初五出生，山西太原人，1937年参加“抗日敢死队”²，后进入第九战区军政部江南无线电总台，第二次长沙会战后升任电台台长。1945年，编入第四方面军，在天津接收日本投降物资。长沙和平解放后，在长

沙市第八中学任教三十多年，现和女儿一家一起居住。

采集人 / 明鹊 采集时间 / 2015年6月23日、6月26日

“在岳麓山底下的防空洞发密码、收密码”

黄乃仁原来叫做黄百川，是我们无线电培训班的同学。他是河南人，也是个美男子，他的个性啊，和我差不多，耿直又憨厚。我们当时有一百多人，在湖南大学的第五宿舍培训无线电技术。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物理学教授，是湖南大学的，还有一个美国顾问，他教会了我很多英语。³

我们学习了莫尔斯通报技术，一些机务知识，还有通讯中的干扰技术。后来从岳麓山跑到了江西，在江西一中搞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回到了岳麓山，完成了总共六个月的培训。黄乃仁呢，他就没有回岳麓山，他从江西直接去了桂林。那个年代，我们搞无线电的，调动是很频繁的。

我通过考试，留在了岳麓山，当时只有25个人留下来。第九战区和重庆国民政府当时都靠（岳麓山的）江南无线电总台和（重庆的）江北无线电总台联系。我开始是通讯员，当时的司令长官是薛岳。在岳麓山底下的防空洞里，我们发密码，收密码，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内容。密码的种类很多，比如第九战区发给重庆的电报，上面就写着“甲宗”、“乙宗”等等。

几个月以后，黄乃仁从桂林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们晚上睡觉枕头都靠在一起，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就躺着聊天。我记得我跟他讲了我的初恋，那是我高中的女同学，叫做路微多（音），父亲叫做路介夫，很早就去了美国。有一个晚上，八九点钟了，我们在天心阁，她说要我跟她一路去美国，我当时想去又不想去，后来还是决定不去了。我说：“我很对不起你，但是我很喜欢你。”她就躺在我怀里哭脸了。我当时没有钱，一个穷光蛋，去那里要依靠她父亲，但我希望自己自立。后来，她一家人都去了美国。大学毕业后，她跟一个美国人结了婚，还生了三个小孩。她给我写了许多信，随着战局变化，后来我就没收到信了。

很快就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我们电台撤退去了株洲。后来日本人由汨罗江打入长沙，我们就派人破坏公路，从新墙河到长沙的公路全部被我们挖断了，还埋了许多炸弹。这样，他们的机械化装备就不能同行了，长沙就是一座空城，到最后他们就这样撤退了。

我们都是随着部队进退来完成通讯任务的。我们通讯部队也有枪，有自卫能力，还有一个排来保护我们。

黄乃仁很聪明，在无线电通讯技术上搞过很多名堂，所以他调动很频繁。他后来又调去了平江，在那里遇到一个女学生，叫做董圣杰，家里人都是基督教徒。黄乃仁说，他们认识不到一个月就在一起了。那个时候抗战，相爱了，自然就在一起了。后来他们回长沙时已经生了一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董圣杰也很漂亮。黄乃仁如果调到其他地方去，董圣杰就带着女孩回平江。

他们感情很好，虽然他们经常分开。黄乃仁经常跟我说：“结婚后，夫妻间的扯皮啊，是很正常的事情。”有时候黄乃仁脾气很大，还会打董圣杰，我就说：“你打人家就是不对。”他说：“你不要做这个裁判员，到了晚上，我们抱在一起，自然就好了。”我那时很天真，黄乃仁比我大一岁，他们的夫妻生活啊，什么都喜欢告诉我。我那时候是光棍，心里很羡慕他们。

“日本投降了。”“啊？靠得住吗？”

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我们电台向衡阳转移，在到株洲的前一站遇到了空袭，听说来了9架飞机。听到警报以后，我们马上出去睡在地上，只听见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有的人就这样被打死了。无线电台有三十多个人，那一次，我们被打死了九个。当时我也中弹了，我跟三个报务员睡在一起，飞机走了以后，我看到他们都不动了，于是我站了起来，哪晓得站起来后，右腿像流水一样，我一看，才知道自己也中弹了。

那个子弹没打透，当时还摸得到，后来战地服务队把我抬到医疗的地方，也没有麻药打，就这样拿刀子划开，我当时也没有哭，只是叫了几声。第二天，我的这个腿肿得跟水桶一样大，一直青肿到小腿这个地方。我在临时医院疗养了三天，后来就让他们担架抬到无线电台，因为还得继续工作啊。我当时在台里是班长，下面有18个人，每一组三个人，一天有六个班。我们无线电功率比较大，需要二十四小时保持联系。回来不久后，我就升了少校台长。

战争期间，日军经常全天发射干扰信号，使我们和重庆电台的通讯中断。开始的时候，我们准备了四个频道频繁切换。后来日本人掌握了我们电台的信号、通讯的时间，我们呼叫重庆电台，日本电台就冒充重庆电台，要我们把电报发给他们。日军电台的手法、信号和我们规定的暗语不同，我们将计就计发报给他们，这样既停止了电磁波干扰，重庆电台也能收得到，不过，敌台收到电报却不能破译，也没有用。

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在洪江。我是电台台长，所以最早得到消息。洪江那边当时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是司令官。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日本投降了”。“啊，靠得住吗？”“靠得住。”王耀武后来带着我和我的电台到了芷江。第二天开会，日本人是坐飞机来的，一下飞机就给我们行礼，再不是那个凶恶的样子了。我当时负责发报，就报这些消息给重庆。

“你蠢里蠢气，你怕什么？”

我后来被编入第四方面军，升为了中校科长，肩膀上两朵梅花，袖子上一个黄杠。黄乃仁呢，他被分配到河南开封，在那里当公安局局长。

河南的封建势力严重，帮派势力很强。有一个帮派头子啊，说黄乃仁作为新任局长，应该要先去拜访他，黄乃仁就是不愿意去，没见面两人就生了矛盾。后来，黄乃仁叫卫兵去喊他来，他来了公安局，一开口就看不起黄乃仁，他说：“你当局长，你还要靠我来支持。”黄乃仁一听，脾气就来了，说：“你好大的一个帮会头子，地方上很多人都揭发你。”那个帮会头子说：“我看你还能当几天公安局长。”黄乃仁火气上来，拿起手枪“砰砰”，对着他脑壳开了两枪，当场就死了，外面的人都还不知道。和黄乃仁一路去的同事说，“这里的帮派势力好厉害，你最好还是躲一下，他们一定会来报复的。”这样，黄乃仁带着董圣杰和小孩，一家人跑到了上海。

他到上海后打电话给我，我当时已经在青岛了。我不记得那个时候我给他寄了多少钱，那时我已经结婚了，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她当时在长沙。

当时的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是王耀武，因为我学的是无线电，当时在前进指挥所负责接收日军的器材，像无线电机、交通材料、汽车，等等。现在想起来，我那个时候，一个礼拜就学会了开汽车，就是日本人那种小汽车。当时，第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叫做郭礼幸（音），他是我的老师，也是黄乃仁的老师，教过我们无线电培训。

黄乃仁坐飞机到青岛，我就带他去见了参谋长，郭礼幸听了帮会头子的事后讲：“你这个事情太荒唐了！”他下命令让黄乃仁留在青岛，当少校科长，接收通讯材料，我负责接收交通等其他材料。

我们在青岛待了一年多，住青岛铁山路36号，我住楼上，他们住楼下，吃饭都不分彼此。我们楼对面住了四个日本女人，她们睡榻榻米，都只有二十几岁，有两个丈夫大打仗阵亡，两个丈夫快被遣送回国。日本女人很温顺，好几次来敲我的门。我记得有一次，我早上才起来，她们敲门后看到我，就低头说：“早上好。”她们用中国话告诉我，希望能和她们的爱人一起回日本，但是当时规定她们不能一起回去。有一个日本女人说她的爱人牺牲了，她不想回日本去，还好像好关心我的样子，那个时候我爱人也不在身边。我后来告诉黄乃仁，他就说：“你蠢里蠢气，你怕什么？”我说：“军纪不允许，如果我跟她有了关系，她赖着不走，以后怎么办？”她后来还是回了日本。

“电报里简单的两句话，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

1947年左右，我去了台湾，黄乃仁那次没有去，他是后来去台湾的，我和他没有碰到头。我当时带了家属，和陈宝仓的外孙住在一起，他叫周秉穷，现在还在台湾。我的这个爱人当时是个新闻记者，我们抗战胜利时结的婚。

当时是介绍的，她姐姐也在电信局，原来就和我有过来往，她说要把妹妹介绍给我，托电信局的男同志给我讲。我当时在跳舞唱歌的时候其实也曾看到过我爱人，但不认识，自她这样说了之后，倒是很不自然了，我时常要注意她一下，一群人一起跳舞唱歌，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后来一接触呢，就有了感觉。当时感觉是很痛苦，又不知道怎么很冲动，但是也不敢随便追求。我失眠睡不着觉，胡思乱想，到医院看医生，医生说：“你需要恋爱结婚了，不然会影响你的身体”。那个时候我26岁了，没有跟哪个女的真正接触过。

第一次正式见面就只留下我们两个，开始我坐这边，她坐那边，到后来，我们就抱在一起了。她就是我的爱人。

我们到台湾后，她心脏病经常发作，一天到晚往医院跑。我们是到台湾的先头部队，那时候有一个中将看到我这个情况，就要我把爱人送回湖南，我就买飞机票飞回了长沙，待到长沙和平解放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是想回台湾去的，当时也做了一些安排，那时她的病也好了一些，但交通突然就断了，火车票买不到，飞机也停飞了，我就这样被迫留在了长沙。也是那个时候，黄乃仁从香港九龙打电报来问我“是不是可以回长沙来？”我回他一个电报“回来也好，缓来也好”。就这么简单的两句话，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

1983年，我爱人过世了，我一直想找黄乃仁。1993年，有二十几个台湾人回长沙来探亲，但我那个时候不敢提这个事情。去年（2014年）这边有人去台湾，了解到他去了美国，但具体在美国哪里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

¹. 1944年8月7日，方先觉与各师检讨战况之后，以悲痛欲绝的心情，命参谋长孙鸣玉草拟呈蒋介石电稿，经大家研阅后交参谋处长饶亚伯送电台拍发，并依令对电台做炸毁之准备，此即当日震惊中外的衡阳守军“最后一电”：“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绝不负钩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系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因为衡阳电站功率较小，不能直接发报到重庆。有人认为，“最后一电”是先发到江南无线电总台，后转发至重庆的；也有人称“最后一电”是通过芷江空军基地中转至重庆的；还有人怀疑“最后一电”的真实性。 ↪

². 1937年，刘俊明18岁，本来考取了清华大学，但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很快就攻占他的家乡山西太原。刘俊明在日本人的炮火下，逃难跑了出来。他一个人跑到火车上，家里的人都不知道上哪里去了。刘俊明跑到河南到陕西的黄河口潼关，在火车站候车室待了两个晚上，没有吃饭，没有一分钱，后来走出车站来，看到军政部招“抗日敢死队”，他就去报名了，当时报名的青年有三百多人。当晚，火车就把他们运到河南开封，在开封他们转了另一趟火车，“也不晓得上哪里去，火车是敞篷的，赶着下大雨，300多人，个个打得透湿”。一天后，他们就到了湖南长沙。 ↪

³. 1938年8月25日，湖南省无线电总台在长沙建成，并开始在各行政专员公署设立区台，各县设立分台。1940年冬天，各地区分台相继建成。在这之后，军政部开始招办无线电培训。 ↪

袍泽：我和李默庵

民国二十八年（1939），日军向长沙逼近。初春时节，国民党第三次来舒家征兵，¹老大舒和荣终于站了出来。

舒和荣至今记得，他走的那天，初春寒气逼人，母亲站在门口依依不舍，刚上小学的弟弟一脸懵懂。他匆匆辞别家人，跟着舒家一族叔翻过大山，直奔李默庵的部队，从此，他的命运与战争交织。

2015年4月15日，望城区桥驿镇。在一栋漂亮的小洋房前，舒和荣说：“当年，我就是从这里出去当兵的，这些土地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

阳光明媚的四月，儿子舒德新说：“我爸爸从小习武，力气大得很，四百多斤重的东西，他一下子就拎起来了，我们两只手都难得搬动”。96岁的舒和荣，此刻身旁放了一根拐杖。



口述人 /舒和荣，1919年农历十月初四出生，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人。1939年参军，进入李默庵²警卫营。后考入黄埔军校独山第四分校³，参加独山之战，毕业后到浙江建德县任职，后回到李默庵身边，成为其警卫营副营长。1949年，李默庵南下香港时，他选择留在老家。董信美，1926年出生。浙江建德县人，舒和荣妻子，1947年随舒和荣来到桥驿镇。

采集人 /明鹊 **采集时间 /**2015年4月15日

“李默庵是个和善的人，我没看到他发过脾气”

我和李默庵算是挂角亲（方言，指远房亲戚），但两家有交情。我们从这里（望城区桥驿镇）出发，翻过几座大山，走了四五个小时，到达李默庵老家，北山大屋。

那个时候，李默庵是游击干部教育长，他从老家召集了不少新兵。当时有一百多号人，属于保护李默庵老家的自卫队。训练了大概三个多月后，我们见到了李默庵本人。

李默庵当时穿了件黄色军服，他一出现，我就觉得此人气度不凡。不高不矮，长得端正，一看就是个官。我也是身材高大、年轻帅气，加上我原来学过武术，那么多人中间，李默庵一眼就看中了我。所以，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把我和另外两人一起带去了部队。



1937年，忻口会战期间的李默庵（中）。

就是这样，我进入了李默庵的警卫营。李默庵是个和善的人，原来他家里很苦，他老子是贩罐子的。当时作为他的贴身警卫，我没看到他发过脾气。有好几次，他给培训的学员搞演讲，总是说，“年轻人要为国家，要保卫我们祖国！”他的声音不算大，但非常坚定有力，大家听得清楚认真。

当时我们在南岳，李默庵搞游击培训，所以打的仗少。基本上是他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警卫营有一百多号人，每天笔直地站在门口，主要任务是保护李默庵，保护游击培训基地。⁴

那一年的秋天，日军第二次进犯长沙，李默庵奉命率部队回祁阳，作第二次长沙会战的预备战，以保卫后方的运输线。这是我跟随李默庵第一次近距离靠近战场，不过也没有打上一枪。

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我每天守在李默庵门口，看着他吃饭睡觉，看资料，搞培训，开大小会议。彼此之间无须过多言语，就有一种天然的熟悉和亲近，要不，1949年的时候，他还特意派人来叫我和他一起去香港？

在警卫营的时候，我们也偶尔进行操练，不过更多的时间就是站岗。后来，因为我自己想去学习，好像是在1942年的时候，经过李默庵的推荐，我进入贵州独山黄埔四分校，是黄埔17期步科班的学员。

“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又回到了李默庵的身边”

进去的时候，和其他人一样参加了军校考试。我还记得，那时有个题目是“青年人应有的责任？”，我当时写的就是“打日本鬼子”。

我们学校在贵州独山，除了基本的课程之外，学校还开设了日文课程。开始时我也去过几次，不过，觉得实在没有语言天赋，后来就没去了。当时我心里就想，“我为什么要学日文呢？小日本帝国侵略我们，我还要去学他们的语言？”

当时日子很苦，在学校的时候，没有东西可吃，我们学员就吃糙米，菜也是几根豆芽和几粒豆豉，经常是填不饱肚子。但每天的锻炼非常充实，早上天还没亮就起床，到晚上还要进行“夜间教育”。

我在学校的第二年，冬天的时候，日本人突然攻打独山。当时的部队都在前线来不及调回，我们学生被派到前线⁵，我当时还担任了机枪连副连长（代理）。

这一仗打的惨，当时死了很多人。学校总共有两个队，一个是我们队，一个是华侨队。华侨队全部由海外华侨和外国人组成，当时他们独自在一个山头抵抗日军，前面有进攻，后面有偷袭，他们死得最惨，80%的都死了。我们队稍微好一点，但也是死了很多。因为第一次上战场，开始有点害怕，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日本人很矮，大部分都比我矮，但是也很滑溜。我没有杀蛮多日本人，可能就只有几个吧。

日本人的飞机炸了我们学校，房子有一半都起火了，当时，里面有十几个负伤的同学，他们全部被当场炸死了，我们队就有两个人。那一战，我们最后面打赢了，日本鬼子就是那里打退的。⁶

那一仗不久后，日本人就投降了。我也从黄埔军校毕业，回到了李默庵的身边。

李默庵当时在浙江，负责解除日军武装并受降，我回到部队后，其实也没多少事情可做。李默庵有个秘书，叫做李明治，长得很帅气。有一天，他问我：“你愿意和我去建德从官不？”我当时就想，战争结束了，去做做小官也不错。

建德是浙江省的一个县，到那里后，李明治当上了建德县的县长，我做了建德县保安团的中队长，日子也算悠闲自在。有一个叫董其光的，是县里的保长，经常和我们一起玩，一起吃饭。

有一次，董其光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那时候正是金秋时节，我进他们家门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个女孩在玩，我当时就一阵心动了。

后来知道她是董其光的妹妹，叫董信美，当时十五六岁。那一次，我就喜欢上她了，不过，她是后来才中意我的。她哥哥是县里的保长，舅舅是当地有声望的人，门槛很高。我那时就是个穷小子，当兵的，没什么钱。

后来，李明治替我向董家提亲。我用八抬大轿迎娶了她，当时办了几桌酒席，请了一些贵人来，但我母亲没来，因为太远了，而且是战乱时期。

两年后，我们离开了建德县，回了湖南老家，那时我们已有一个小孩。从建德县到长沙县，当时走了好几个月。回来后，过了多久，我又奔李默庵去了。

“李默庵希望我能和他一同去香港，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回到部队后，我成为李默庵警卫营的副营长，当时，他正在领兵进攻苏中解放区。⁷

在江苏东台县的战场，我和很多人一起被俘了。共产党给我们吃大米，自己吃麦子，还问我要不要加入他们部队。我那时一门心思只想着逃脱，就说：“我不想当兵了，我要回家去种田。”没想到，大半年后，竟然真的放我们走了。

回来后，我又回了李默庵身边，他还问我被俘的情形，我只简单地说，是在路上，自己乘机逃跑回来了。跟了他这么久，脾气性格我都一清二楚。

1949年，李默庵准备和平起义，但是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去了香港。那一年，好像还是年初，他派人来我家，希望我能和他一同南下去香港，“但是，只准你一个人去。”那个来报信的人告诉我。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也想跟着他一起去，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家里。

后来他回国，我还去北京看过他。他邀请我参加同学会⁸，好像是九几年吧，那个时候我也去了。2001年，他在北京过世，我那次没去。



舒和荣。

¹. 此前两次征兵，两次抽到舒家老二。老二天性胆小，一把鼻涕一把泪，母亲只得花几十担谷请人代替。到了这第三次，家里已无力再请人，舒和荣只好主动参军。 ↪

². 李默庵（1904年10月17日~2001年10月27日），长沙县北山村人。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担任西南干部培训班教育长，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时，参与酝酿和筹商湖南和平起义。后出走香港，长期居住在阿根廷和美国。1990年回国定居，2001年在北京去世。

↪

- ³. 黄埔四分校，始建于1927年，原址在广州燕塘的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其前身为陈济棠创建的燕塘干部学校。它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指令，招收海外青年学生的定点军事院校。1942年春天，军校迁址贵州独山，校部设在城东北五公里的铜鼓井，距离盟军飞机场约三公里。 ↵
- ⁴. 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曾流传这样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李默庵因卓有战绩，而得到国民党内部高度评价，以致被称为游击战的专家。1939年，李默庵被任命为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教育长。 ↵
- ⁵. 当时情况紧急，最高统帅部临时决定，成立黔桂边区警备司令部，任命军校中将主任韩汉英为司令，迅速整编军校学生阻击敌人。 ↵
- ⁶. 黄埔军校独山这一战，并没能阻挡日军步伐。1944年12月2日，日军进入独山县城，发生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大肆烧杀抢夺，居民逃散四乡，文化名城付之一炬，独山黄埔军校亦不能幸免。为制止日军继续北上，蒋介石急调29军由川入黔，和先头部队第91师协同对日作战。最终，因独城北10公里处的深河桥被炸毁，斩断了日军进攻路上的“最后一桥”，战事才由此开始出现转折。 ↵
- ⁷. 李默庵与粟裕的苏中之战，被粟裕称为“七战七捷”。李默庵在其回忆录中称：我们之间的战争，各自写在了历史上。由于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收复地盘，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解放军以歼灭有生力量为主，从这一点看，粟裕部队也是胜利的。 ↵
- ⁸. 1984年6月，李默庵回国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大会，并出任副会长。后回国定居的李默庵于1995年6月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

嫁给他：做了两年半的夫妻

“他很爱我，随便什么都依我，我说得不好，他也依着我。”年轻时候的邓得凤，一定是个任性的女孩。14岁离开泸溪老家，此后的家乡记忆是大花园，父亲的辫子和爷爷的“顶子帽”。“留在家里学裁缝还好一些。”她说。

兵荒马乱，她却只是一个渴望爱的小女人。在贴标语，喊口号之际，邓得凤认识了大她15岁的朱炳乾，随后两人谈起了恋爱。

2015年7月17日，在岳阳楼区蔡家村的儿子家，邓得凤说以前的事自己记得不多，但记得和朱炳乾有关的所有细节，说到动情之处，88岁的老人开心得像个小孩。

有时候，记忆会自动筛选，只留下美好的东西。来不及深刻认识和了解，邓得凤对于这场战争的记忆，便慢慢被时间洪水所淹没。可是，谁又能苛求于她？她只是一个小女人。

左手中指上有一只金戒指，用青布包着边，“孙女买给我的”。朱炳乾被抓后，那对金手镯随之消失。处说：“谁痛惜我？谁爱护我？没有半个人痛惜我！”。1951年，邓得凤第二次结婚，庆幸的是，第二任丈夫对她很好。



口述人 / 邓得凤，1927年农历正月初四出生于泸溪县。14岁被姐姐带去重庆，在秀山难民学校学习，一年后进入黔江县政府工队¹，主要负责贴标语、搞宣传、喊口号。1946年，调入灵县“第一旅”，与部队的朱炳乾认识并相爱。前后两次，邓得凤在第一旅待了几个月，但她不记得自己部队的番号。1947年，两人在晃县结婚。1948年，回岳阳老家，1950年，朱炳乾自杀，1951年，邓得凤再婚。

采集人 / 明鹊 采集时间 / 2015年7月17日

“政工队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每天要走60多里路”

我父亲留着好长的辫子，还照了相。我出生的时候，他有48岁，等到我14岁，父亲就过世了，他死的时候，飞机把我家后面的屋炸了。我家前面通正街，后面通河街，中间一个大花园。我爷爷是戴顶子帽（清朝官员戴的帽子）的，我不晓得他是几品，他死的时候，把顶子帽也戴走了，我那时只有4岁。

父亲叫邓守平，是田赋管理局局长，在省里管钱管粮，平时和我二娘住长沙。我就在泸溪家里，由奶娘带着²。我还有个叔叔，那时在长沙读大学，他后来也被逮捕了。我去过一次长沙，8岁的时候，奶娘带我去的，是坐轿子去的，不记得好多，

只晓得中间换了几趟。

我小学毕业，父亲就病死了，我姐姐知道后就从四川回来了。我姐姐大我10岁，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了长沙，在一个绣花厂绣龙绣凤，在那里认识了我姐夫，后来他们去了四川。父亲过世时，她回家把我接了出去，我当时在学裁缝。一直到1975年，我才回的泸溪。

1941年，我离开泸溪，当时我弟弟不愿意我去，他站在门口望着我，问：“么子时候回来？”我说：“姐姐送我回来我就回来。”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姐夫是黄埔四期的，他叫萧书一，比我姐姐大15岁，比我大25岁，他是重庆宪兵营的中队长，相当于宪兵旅营长，他的警卫喊他“中队长”。我们到四川后，他把我送去秀山的难民学校。学校有四五十个人，连煮饭的一起有六十个人左右，都是家里条件比较好的，那个学校一般人还进不了。

在家里读书时，日本人来轰炸，就没读出什么名堂，在难民学校时，没书就读报纸，还学了几个字。有一个老师叫张志中，他在地上写了好多字，还教我们读报纸，学习七七八八的事情，他也是我们后来政工队的教导员。

难民学校吃饭呢，早上吃稀饭，中午黄豆打成粉，放点油和青菜一起煮，这样一个人一碗。平时三个星期打一次牙祭，就有点肉、鸡、鱼。过年，初一的早晨，每人这么大一个饼子，比手还大一点，还有一个蛋。年三十晚上，每个人也吃一个饼子。

读了不到一年，我就到了黔江县的政工队，主要负责贴标语，做宣传，在外面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护中华民族！”我们政工队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每天要走60多里路，边走边贴标语。穿草鞋，用布绑了腿，走了黔江、秀山、恩施、巴中等好多县。白天出去贴，夜里坐卡车回来，我专门贴标语、喊口号，演话剧都演得少，只少了人我才去演，因为没读什么书。有一次演话剧，我扮了一个老太婆，一个男同学扮日本兵，他就欺负我，好多老百姓来看，有一坪的人来看。后来日本投降了，标语归《大公报》去贴，我们就不管了，那时乡政府和县里要我们搞宣传，我们就去。



抗战后期，“武镇”政工队的抗日宣传。

我在政工队的时候，一个月只有五块钱。后来，我姐夫就把我送进了政工团，一个月15块，是银元。15块钱一个月用不完，两块钱到馆子里吃，有时候还吃不完。我姐姐、姐夫对我非常好，我到了政工团以后，他们说：“你自立了。”我就哭了。姐姐说：“说你自立，你还哭！”我其实是想父亲，想二娘，还有弟弟。

“在重庆的大街上，我看到了蒋介石”

从政工队入政工团时，我们去部队里学习，当时我和蒋介石还照过相呢。那时候在重庆，有人说，“把政工团的小朋友们搞过来照一个相。”我们政工团的六女、六男就坐在地上和蒋介石一起拍照。白崇禧也在。蒋介石穿军装，长得帅，讲普通话。我戴个宪兵帽子，歪着左边戴，上面有一朵蓝花，帽子是绿色的，衣服也是绿色的，穿个薄袜子，外面套个麻草鞋。

当时蒋介石讲，“抗战第一首要，打仗不要怕死，该死的就死，不该死不会死，不要学汪精卫。”

我后来还看到过蒋介石，在重庆的大街上，宪兵旅一旅人跟着他，我姐夫也跟在后面，参谋长高克平也跟着，他是我姐夫黄埔四期的同学。

当时的重庆街道不宽，屋很多，蒋介石住的地方好宽。有一次，我姐姐、姐夫带我去杨森的家里玩。杨森是20军的军长，他是极有名的，长得好，有12个老婆，个个都漂亮，他的第三个老婆跟我姐姐玩得好。那时我见到的杨森有五十多岁了，听说好厉害，1937年出川，淞沪会战后，一直往南方退守，打了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常德保卫战。在常德，日本人死了三万多，两边的山上有好多尸体，杨森当时也在那里打。

政工团多半时间在黔江县，受训就去海棠溪。有一次，六个姑娘在那里游泳，有白崇禧的姑娘，孔祥熙的姑娘，还有一个麻子姑娘，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就在边上招呼。那个布篷很高，我们就站在外面，不挨着她们的身，不跟她们讲话，她们也不跟我们讲话。我们像警卫一样，帮她们招呼一下，怕衣服丢啊，怕有人进去啊。当时，别人在那里说，我就在那里听。回去就讲给领导听，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

在黔江待了四五年后，1946年，我被调去晃县第一旅，是我姐夫介绍去的。我在那边政工处搞宣传，不记得是哪个师了，只记得旅长姓王，他爱人姓李，他们都是湖南人。在那里认识了朱炳乾，他是黄埔五期的，当时在医药室搞管理。其实也算我姐夫介绍的。

开始调过去时也不讲这个事，他们怕我不肯去，也不晓得我恋爱没，我姐夫试验我呢！看我在里面规矩不规矩。后来，在旅部见了个面，就是认了个同事。王旅长堂客就做媒，问我：“小邓啊，你同意不？”我没作声。她继续讲：“你不作声就写一下。”写也不写。

过了一天，王夫人又跑到我宿舍，我睡在里面，她把我喊起来讲：“来来来，我跟你讲清楚。”我也没作声。问了两夜，我才说了一个“好”。她说，“好，是你好，还是我好啊？”我讲，“你好。”我那时只有二十岁，不好意思呢。我个性强，怕随随便便，别人看我不来。也不敢跟我姐姐讲，怕她说我。平时她给我钱，我就接着，问她要我不要。

我一答应了，他就拿了一对金手镯给我，我没接。他总是要我收点什么，我就跟王夫人讲：“拿东西是小事，假如心不好呢，我拿东西有什么用？”

“我不愿意穿旗袍，穿旗袍走得慢，也不喜欢擦口红”

结婚之前，我跟他讲，“你不能瞒年纪，你要是有40岁，我就不同意和你结婚。”他就跪在地下发誓，“我只有35岁。”我那时只有20岁，他比我大15岁。那时没有年纪轻的，有些还瞒年纪，他没有。

几个月后，我又回了黔江县，我姐姐、姐夫同意后，1947年九十月份，我们到晃县（现新晃县）结了婚。他人长得漂亮，高大，结婚前，我要他去医院检查，他不肯去，最后没有去检查，但我还是相信他。

我结婚没穿旗袍，穿着黄制服，带个歪帽子，只收了他的一对金手镯。酒席是在部队办的，杀了一头猪，每个士兵都吃了肉。结婚证明是旅部打的，后来那个证明不见了，好多证件全部烧了，金圆券都烧了好多。

结婚后，我要他站东，他不能站西。王旅长就笑着跟我姐夫讲：“你妹妹好厉害，你晓得不？”王夫人后来转述给我听，我就讲：“怎么厉害了？我又没打日本人。”

结婚以后我就到了第一旅人事处。衡阳的彭年打电话来说：“不要在部队了，到县里来当科长。”彭年和他是亲戚，当时在衡阳当县长，叫他去当财务科科长，不过后来彭年也被抓了。

我们当时没去，我们又回了黔江县，我回到了政工团。1948年，我姐姐和姐夫去了南京，去之前对我讲：“我不能带你去，还有一个伢子，也不晓得什么情况，我先去把房子搞好，你后面再过来。”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不晓得她死在南京，还是死在上海，要是不死的话，台湾早开通了，她不回来找啊？现在还音信全无。我估计，上海打仗的时候，他们就被打死了。

没过好久，我们买了去武汉的票，打算从武汉飞南京，再去台湾。票是提前五天买的，准备过恩施、荆州到武汉机场，但是第二天就听说，汀泗桥被炸了，这样就去不成了。去不成武汉，就决定回岳阳。我们到荆州玩了半个月，和另外的几对夫妇一起，她们都穿了旗袍，我穿的是讨衫。他就笑我，说“没买衣给你穿呢”。我不愿意穿旗袍，穿旗袍走得慢，也不喜欢擦口红。

1948年6月，我们回到岳阳。我后来联系到政工团的指导员戴国成，他告诉我说：“从上海、南京也出不去，要从广东才能去台湾。”

“一付了砖瓦钱，他就被逮捕了”

回岳阳后，他就靠着胡春台。我们在老火车站附近，现在的老二医院对面，一个大旅馆里租住了半年。朱炳乾娘爷都死了，乡里的房子被日本人搞坏了，所以准备在这里做个房子。

当时看地方，做屋、买田地，都是胡春台介绍的。买了一个半立方木头，烧窑烧砖，还买了三担五斗³的庄田，一共用了六百银元。砖瓦钱全部付了，你要不相信，我带你去问。一付了砖瓦钱，他就被逮捕了。

1950年上半年，胡春台被抓了，他打死了三个解放军。在一个叫康王的地方，当时两边各一个士兵，在他身上一边串一根铁丝，在梅溪桥那里枪毙了。

朱炳乾被逮捕以后，屋里所有东西都没收了，包括我那对金手镯。

速捕前，他跟我讲：“我死了你要去看不？”我说：“我怎么不去看，我要去看呢。”他就讲：“不能去看。你也万万不能回泸溪，钱都找不到，一千多里路，你也走不回去，只有在岳阳，嫁个老实农民，好好过日子。”

他被逮捕后，我们就离婚了。过了八天，他就自杀了。四月份死的，我躲在山上哭，当着群众不能哭，我又不是岳阳人，哪个看得起我。一只狗子过身，人家还喜欢，我一个人过身，人家还骂。他对我是真心，只怪我命不好，结婚才两年多他就死了。

我被扫地出门后，附近一家姓赵的收留了我。她对我讲：“小邓啊，你不要哭，我给你做个媒，你做我的女儿。”我在他们家住了大半年。

1950年腊月三十八，易志书父母接我到易家，正月初八就请客，然后打了结婚证。易志书一根扁担倒下来，一个“一”字都不认得。当时，赵家的人帮我做媒，他父母看中了我，说我老实本份，又不乱讲话。我那时不讲岳阳话，讲四川话和普通话，现在讲岳阳话。

我嫁到这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要是抽了脚（方言，指离去），那个人就不算人，所以我不能回去。我这个人讲志气，就是没得饭吃也不会到外面讲，就是易老嗲（第二任丈夫）对我不好，我也不到外面讲。1999年，易老嗲过世，死的时候73岁。



中国昆明，市民正在看官方报纸《中国灯笼》，旁边的海报说的是德国已向盟军投降。

¹. 按所在的区域，邓得凤所在的政工队极有可能是第六战区司令部黔江县政府队。邓所在的政工队，大队长邱健，副大队长潘世曾，中队长何真（音），教导员张志中，指导员宋世册，排长张彬，邓得凤担任班长。 ↪

². 邓得凤三岁时母亲过世，由奶娘带大。奶娘是邓的二娘请的，姓孙，邓得凤称她为孙婆。 ↪

³. 当时在农村，习惯用“担”来衡量土地面积，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了这种习惯。一担就是十斗，三担五斗就是三十五斗，当时朱炳乾花了三百七十块银元购置这些田产。 ↪

忘记他：如果当时和他去了呢

1930年代，浏阳永安，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因吸食鸦片误事，清晨被秘密处决¹，其女儿后来参加了青年远征军。

没人知道她参军的真正理由，1944年，这个叫文淑仙的女孩，如愿成为了一名青年军护士。在贵阳陆军野战医院，文淑仙看到“那些要死的伤兵，在病床上拱来拱去。”她不忍见到那种场景，申请调到中央军医联络站。

那时，她刚满二十，皮肤白皙，娇小玲珑，爱上了一个叫李观尧的同学。一年多的柏拉图恋爱后，两人于1948年在岳阳结婚，随后生下一个女儿。

1949年初，国民党军溃败前夕，李观尧去了南京，他本决定五月返回，带妻女逃亡台湾，却不曾料到，这一别竟是40年。

1989年两岸三通后，李观尧从台湾飞赴长沙。这场40年后的见面着实让人有些尴尬，曾经的丈夫，成了他人的丈夫，曾经的妻子，还算不算是妻子？

2015年5月15日，外面下着小雨，长沙市望城区安华山庄（养老院），文淑仙指着墙壁上的相片说：“就是他，2009年过世了。”依偎在一瘦高男人的怀里，照片中的文淑仙有着娇羞的笑容。



口述人 / 文淑仙，1925年农历九月初九生，浏阳永安人，原名文淑霞。1944年参加青年军²，在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学习医护知识，毕业后分配到205师军医联络站³。抗战胜利后退伍，1949年，带着女儿跑回娘家，后在长沙工作、定居至今。

采集人 / 明鹊 采集时间 / 2015年5月15日

“谈了差不多一年多，我们一直没有拉过手”

1945年秋天，我在中央联络站（205师614团），礼拜天的时候，他（李观尧）和同学一起来玩，然后就看中了我。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学校的，家乡在哪里，我都告诉了他。回去后，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里面说羡慕我，就是喜欢我的意思。第二次过来时，他跟我说话还脸红了。我看他还蛮老实的，就答应了他。谈了差不多一年多，我们一直没有拉过手，旧社会还是很规矩的。

刚准备上前线，就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没多久，我请假回浏阳永安看祖父母。回家后，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上说：“你不要回来了，现在大家都退伍了。”他叫我退伍，然后和他结婚。我祖父母就问我：“他家里的情况好不好过？”我冇晓得，也冇问过他，于是，我就写信问他：“你家里有多少田地？每年收多少谷？”，他回信说：“每年二十担谷。”其实他撒谎，他家是个大地主，我后面才晓得，但我祖父母也同意了，主要是因为我喜欢他。他长得比较帅，性格也很好，牙齿很白，皮肤比较黑，笑起来好可爱的，而且对我也很好。他喜欢拉胡琴，喜欢唱京戏。我们结婚后，住在岳阳，有一次烤火的时候，他拉胡琴，我心烦，我说：“你不要拉了好不好？”但他还是拉，结果我抢过胡琴，在地上一摔，再用脚一蹬，胡琴当场就被我弄烂了，但他也有发脾气。

商量好了之后，他从部队直接到了我家，然后把我接到岳阳去了。好像是1948年吧，回去后，我们就结婚了，不久生了一个女孩，当时叫李纯芝，后来改名李佩芝。

纯子还有满周岁，他又回了部队，然后去了南京。我记得那一年，过了正月他就走了。走之前，他就决定了要去台湾⁴，还讲五月份来接我和女儿，叫我在家里安心带小孩。我也冇讲要他不要去，我想他在部队里面，跟部队走也是应该的。但是，冇到五月，他就走了，走之前，他还到了株洲，当时来过一封急信，要我带小孩去株洲，然后和他一同去台湾。他父母都已经过世，家里只有一个后家娘。结婚的时候，她对我们都还蛮好，但后家娘毕竟是后家娘，她讲，“现在是国乱时期，这么危险，我哪里有钱啊。”所以最后冇去成。当时我要是和他一起去了呢，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我哪里敢去呢，我怕一被抓住，就被枪毙呢。”

去台湾后，就没有通过音信了，也不知道他人是死是活，直到改革开放后。

开始很不习惯，我想他嘛，是自己的丈夫，但是冇过好久，就到了“土改”，我后家娘好拐（坏），本来家里是她当家，她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因为他们家，我差一点死掉，但我只恨我后家娘，不恨我老公，我们两个感情好啊。我嫁过去的时候，也不晓得有那么大的家产，他爸爸原来是海关税务局的，家里房产土地都有好多。我就被抓去了，东西都被没收了。幸好我参军的证据和在歌乐山学习的证据，都被我放到搞饭的灶里烧掉了。

新来了一个土改干部，是山冲冲里出来的，冇好多文化。他一接手，就想毙掉我和另外一个人。农协会一位干部看我老实可怜，他就讲：“她是异乡人，是长沙的，不是岳阳人。”

土改前，我当过一年时间的老师。那个干部后来又偷偷地问我：“文老师，你是长沙人，你回长沙还有书教撒？”我冇一个钱，怎么走呢？他讲他会想办法。我们住在铁路边上，当时在开娱乐会，民兵都到站里去了。晚上的时候，干部带了票过来，叫我带小孩赶快走。当时，大家都去看戏去了。我把小孩背在身上，走进草丛里，那个茅草好深，看到有人过来，我立即蹲下去，等人走了后，我又站起来走。我小孩也很听话，我对她讲，“纯子，你莫作声，有猫记（湖南方言。猫）。”她很听话，也冇作声，就这样一直到了铁路站台，那个干部把车票给了我，还对我讲，“你到长沙后要来信啊。”我哪里敢去信呢，我怕一被抓住，要被枪毙的呢。

我原来叫文淑霞，到长沙后，改名叫文淑仙。后来，碰到橡胶厂的张继成书记，他是南下的北方人，有两个小孩，都上幼儿园了。我到他们家做保姆，帮他们带小孩，也帮他们搞饭呷。那时我小孩寄在我姐姐家，六块钱一个月的伙食费，我自己

工资才十多块钱。

张书记的老婆怀第三个小孩，我当时觉得做保姆工资低，所以等到小孩出生后，他就把我介绍到五一线袋厂，后来叫经编厂，就在坡子街那里。当时一个叫郭子群的，他叫我帮他写大字报，我有想太多，然后就帮他写了，贴出去大家一看，说这是读过书的人写的字啊。然后我就被找去谈话，问我读过好多书？我讲没读过好多书。然后他们问我家里的成份，我还是有承认，他们就去调查，结果知道了我是地主。从那个时候起，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虽然上班下班还是一样的，但有么子事就被盯着。

后来把我调到南门口，一个卖破棉毯子的地方，再后来又到了红旗织布厂，依旧是四类分子，一直到邓主席的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才帮我纠正。

在红旗织布厂的时候，我打报告给保卫科，我说我不是四类分子，跟地主家里结婚，但也不是地主⁵。保卫科的人就讲，“你不要着急，以后会给你解决的。”后来到公安局，“文淑仙，不属于地主分子，请留证”，这样，我的成分才被纠正。

“大概1988年，他看到报纸寻人，终于和我们取得联系”

两岸三通后，他（李观尧）到他家乡找我；我已经回娘家长沙来了。后来，台湾有人回来，我托人在那边登报找他，大概是1988年吧，他看到报纸寻人启示，终于和我们取得了联系。

1989年，他第一次回来，已经不像年轻人了，几十年了呢。他一个人到那边，又有亲人，就在那边我了个老婆，还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些我都不怪他。我就想他很可怜，应该找一个老婆的，哪个晓得他找一个有文化的，是台湾本地的高山族人。

那个时候，我跟我女儿住浏城桥，我已经退休了，在家里帮女儿带小孩。他不讲多话，胆子很小，说怕有窃听器。看到我们的外孙女，他喜欢得很。外孙女叫李亚琴，跟着她外公姓李。后来，他几乎每年都过来，九月来，十月或十一月走，住一两个月。最后一次，他不愿意回台湾，台湾的大女儿来接他回去，我送他上火车的时候，他指着上面说：“你睡上面。”我说：“我不去，丽珠（台湾的大女儿）睡上面。”然后他对丽珠说：“你大妈人很好啊！”

他如果留在家里，就会被枪毙了，他是大地主，又参加了青年军。他结婚，我也不怨他，他去的时候还年轻撒。我有结婚，因为我小孩小，怕对小孩不好，不是亲生的儿女怎么对她好，加上那时候打成四类分子，上班去下班回，不与人家打交道，而且好多男的坏得很，有老婆还思想不纯。

他其实想回（大陆），但他说不能回，因为那边有财产和儿女。他叫我去台湾，但我都有去，他那边有老婆，我去了要怎么过？后来，他病了，因为老说我比他台湾老婆好，他们之间老闹矛盾。一直到2009年他过世，我都去过去台湾，但我女儿去看过几次，和那边每年都联系，现在关系都还不错。



两岸三通后，李观尧写给文淑仙的信。

1. 文淑仙的父亲曾是一名小商贩，当时家里有一个当铺，在永安镇条件算是非常不错的。他接触了一些进步青年，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不料因偶然原因，不小心染上了鸦片，最终因误事被秘密处决。 ↵
2. 父亲走后，母亲改嫁。因从小失去父母，文淑仙懂事极早。文夕大火后，她考入芷江国立二十中，恰好上完高一，就参加了青年军。 ↵
3. 614军邮联络站，主要是负责信件的收发及对外联络。当时联络站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叫罗文玉的湖北人，另一个人就是文淑仙。 ↵
4. “太平轮”事件时，李观充还在老家岳阳，他跟妻子说起去台湾的事，文淑仙对他的决定并不反对。还是年前，南京的部队写信来催，告诉他形势已不容乐观，希望他尽早赶过去。此时人心惶惶，大家都在考虑去留的问题。在上海，二月过后，抢搭轮船的依旧络绎不绝，似乎几天就忘记“太平轮”事件。在湖南，没有人去关心“太平轮”，不少士兵南下又返回，有的甚至上船又下船。但李观尧很坚定，过完正月，他收拾好行李，出门时再三嘱咐妻子：“在家带好小孩，五月来接你们去台湾。”夜色朦胧，李观尧搭车去了南京，来不及返回岳阳，不久就搭船去了台湾。那时，女儿不满一周岁。 ↵
5. 当时的政策是，嫁入地主家里，要在地主家住三年，才算地主成分。嫁给贫农，也要住满三年，才算是贫农。文淑仙嫁到李家只有两年多，所以有此说法。 ↵

军中情：最艰难的时候，爱情也没有消失

2015年4月15日，长沙望城区安华山庄。阳光打在窗台，王琦霞松弛的脸上，显出淡淡的妆容。她给我唱了一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一定有不少人爱慕过您吧？”我问。她笑着摇头：“北方人耿直忠心。”旁边，闭目养神的张谷初，嘴角不经意露出一丝笑意。

1948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各地交战，揣着一叠张谷初写给她的信，王琦霞独自一人搭上火车，一天一夜，从河南到了湖南。没有婚礼，两人就这样生活在一起。

1949年后，王琦霞成为浏阳市柏加乡的一名老师，张谷初则在常德市的行攻公署任职。但好景不长，自“反右”运动起，他们开始遭受打压，一直到“文革”结束，两人备尝艰难，但爱情从未消失。

木心说，以前的日色变得慢，一生只多爱一个人。事实是，战争年代，一切变化太快，能够始终如一的，只有坚定的情感。相识相伴70年，两人都早已不记得来往情书的内容，但爱情沉淀在彼此心里。2015年4月29日，养老院的大厅有演出，王琦霞对着里屋的张谷初叫道，“张大爹，去看戏不？”



口述人 / 王琦霞，1925年农历八月初五出生，河南信阳人。1944年参加青年军，进入205师614团政工队，抗战胜利后复员回老家，1948年到湖南和张谷初组建家庭，后育有三个子女，目前住在长沙。

采集人 / 明鹊 采集时间 / 2013年12月17日、2015年4月29日

“宋美龄骂她们：国军在抗日，难童在逃亡，你们竟然还穿高跟鞋”

我是河南信阳人，家住一小火车站旁边。那时候日本人一来，沿铁路一路烧杀，所以，大人把十五岁以下的儿童一批一批地送到四川保育院¹。

我那时十二三岁的样子，和我妹妹一起，跟着一群人去了四川。我们首先寄住在武昌法租界，后来又换到一个英国地方（英租界）。我妹妹很小，她坐在火车头上，火车灌水的时候，她跳下去玩，火车一开动，她的两条腿被轧断，还有到四川，在路上她就死了。

我们到宜昌坐船，船来接还没接上的时候，飞机在天上炸，我们在地下跑，一批一批死了好多。当时有十二艘船的三百多学生，全部翻船被淹死了。

过了三峡，到一个叫大渡河的地方，那地方容易翻船，宋美龄特意到那里看我们。她站在河边，腰上系一根皮带，穿白衬衣，黑裙子，脚下是一双白色的跑鞋。看到那些穿高跟鞋的，宋美龄还骂了她们：“国军正在抗日，难童正在逃亡，你们竟然还穿高跟鞋。”

我们后来到了四川歌乐山保育院²。有一次围着吃饭的时候，宋美龄来了，她问了我们的情况，我没跟她说话，我站在她背后。宋美龄非常漂亮。

我在保育院从没吃过一餐饱饭，经常只有几颗蚕豆，常年打赤脚，冬天一双草鞋，怕头上长虱子，就把头发剃光。也教认字，但是没有本子没有书。保育院的院歌有几句是，“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大家每次唱到这里都唱不下去了。

“我在重庆培训了三个月，团长是蒋介石，主任是蒋经国”

到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蒋介石号召知识青年当兵。我报名参加了青年远征军，但我没文化，我就给他们唱，“日本鬼子的大炮轰炸了我们的家，抢走了爸爸，又拉走了亲爱的妈妈，叫爸爸也不答应，叫妈妈也不答应，单单留下我难童一人到处飘零”，唱到这里我就哭脸了，然后我一边唱一边哭，他们就录取了我。当时我十八岁左右。

我在重庆培训了三个月，学开枪打靶，学唱歌，团长是蒋介石，主任是蒋经国，还发了证明书和青年远征军的通讯录，上面有远征军、有学生老师名字，后来1957年打右派就是根据这个。日本投降后，怕被搜到，我把它们放在屋梁上面，他好像没有。

那时候参加青年军，看戏看电影不要钱，发帽子和衣服，伙食也好。后来我们去了贵州修文，我进了205师614团³政工队，相当于现在的文工团，在那里认识了他（张谷初）。

我们整个205师都没打过仗。如果要去我们也会去，我们可以上前线做护士。河南好多同学参加了青年军，有一个还给我写信，说她去前线打仗了，好像是到印度，我不记得她名字了。



1950年代的张谷初和王琦霞。

当时在修文，我住这边，他住对面，就这样认识了。205师当时在修文办了一个民众小学，他就在那里教书。我们政工队也在那里练唱歌。我们相对而住，我经常练习唱歌，他经常朗读英语，他有时过来听我唱歌，我有时也过去看他的文章。

我不跟男的一起玩，他那时年纪小，只有16岁，我比他大，有18岁。我们政工队一共有六个女的，有一个贵州30岁的大姐，现在已经不在了，那时经常喊他“小鬼”，所以我们都跟着喊他“小鬼，小鬼”。他不喜欢跟大哥哥玩，经常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跑。

他会写，写得好，还教我读书认字，很上进，又不吸烟、喝酒，一个年轻伢子。日本投降后，我自己脱离部队回了家，那时候205师是流动的，参军也是来去自由。我回去后，他就每天一封信、每天一封信地写给我，告诉我部队发生的事，还写了一些其他的，想我之类的话。他的信写得好，我给他写信少得很，我那时不认得好多字。

在河南的时候，青年军要给我介绍对象，我一直都不同意，在河南待了一年多后，决定回湖南找他。1948年，我坐火车到湖南花了一天一夜，当时他已经退伍，在湖南大学读书，我到学校找他，然后他带我回了浏阳，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当时有没有办酒我记不太清了。那时候，他一放假回来，就教我读书认字。解放后，我参加教师培训，后来就在浏阳柏树乡教一年级的小孩认字。

¹. 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由宋美龄担任会长。当年5月1日，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建院，随后各地保育院陆续出现，最多时有五十多个，一直到1946年9月，全国保育院被撤销，历时八年多。 ↵

². 歌乐山保育院其实属于重庆。历史上四川和重庆分分合合，至20世纪40年代，重庆（市中心）就不属于四川管辖。但把重庆说成四川，依旧是当时百姓的习惯。歌乐山保育院于1951年10月撤销，其历时十三年又五个月，是存在时间最久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

³. 第205师由1945年2月在贵州驻扎的新编第23师为基干改编。1946年9月整编为第205师第1旅，师长刘安祺、胡素（1946年2月），下辖第613、614、615三个团。 ↵

爷爷：我六十年前就肯定他

1946年秋天，陈暄¹和刘伯承在郓城对峙。对于陈暄来说，愿望没有实现，生命戛然而止。10月30日，他死在了郓城，没人知道具体的细节。

在此三年前，陈暄在自传里写道：余愿派赴东夷三岛，参加安抚流亡，宣示我中华民族之伟大，为我赫赫神州伸张正义，为余唯一之愿也。

多年后，妻子刘容说丈夫，“29日那天晚上，他内心很矛盾痛苦，撕下白衬衣的一角，他用钢笔写上“速回长沙”，然后让副官化妆冲出来，最后把那字条交给了我。”

从最初相识相恋，到在汉口举行当时罕见的集体婚礼，再到七十几人的坑里辨认丈夫的尸体，刘容用漫长的一生镌刻了和丈夫陈暄的爱情。“我心里一直是肯定他的。”她说。

陈暄的孙子陈树说，“我穿军装的时候，奶奶觉得我很像爷爷。”被时光掩埋的历史，和被历史掩埋的生平，通过奶奶的诉说和查阅战史资料，在陈树的口述中慢慢浮出水面。



口述人 / 陈树，1982年出生，湖南商学院图书馆馆员。爷爷陈暄曾亲历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

采集人 / 明鹊 采集时间 / 2015年6月4日

“穿白色婚纱和黑色西装，在汉口举行了一场罕见的集体婚礼”

奶奶说我像爷爷，我自己看照片，觉得也是有点像。家里人说，爸爸和伯伯长得像爷爷，但他们偏书生气较多，我呢，神情中有军人的感觉，可能和我爷爷更相符一点。那张照片，是台北忠烈祠赠送的，里面陈列的也是这张照片。



陈煊

我奶奶叫刘容，出生于1910年，是名门之后。爷爷在他自传²里写：妻子为刘武慎公³的重孙女。民国初期，女人还是习惯缠足。奶奶生性自由，且喜欢搞些运动，所以每到晚上，她偷偷把绑带松开，这样慢慢到后来，她的脚长到38码。

年轻的时候，我奶奶个子比较高，在1米65到1米68之间，她是周南女校排球队的。她是毕业后在北正街一带认识我爷爷陈煊的，他当时是部队的一名营长。具体怎么谈上的，我不是很清楚。我后来听大伯说的是，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曾一起看过电影，一起坐过黄包车，这在当时都是比较潮的事情。我奶奶的父亲是湖南大学国文系教授，他不希望女儿和军人交往。为了讨好岳父大人，我爷爷还送过一辆黄包车给我奶奶的父亲，不知道是在他们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

后来，我爷爷部队到了武汉，我奶奶自己跑到汉口，并在那里和我爷爷举行了婚礼。那还是1931年，爷爷奶奶和其他29对新人，身穿白色婚纱和黑色西装，在汉口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上了当天的报纸，我爷爷奶奶走在最前面。他们的证婚人是我奶奶的伯父，武汉大学代校长刘永济教授。

结婚后，奶奶跟着爷爷的部队成为了随军家属。大约是1941年，当时我八岁的大姑姑在随军途中得了痢疾，没多久就过世了。我奶奶非常伤心，经常晚上做噩梦。枣宜会战的时候，打仗回来的爷谷，给我奶奶一把日本军刀，他说“这个刀是可以辟邪的”。

刀大概有三尺长，是把狭长的弧形刀，刀面寒光闪闪，刀口斑斑血迹。我奶奶想把血迹擦掉，但我爷爷说：“别擦，日本军刀上的血，是我们同胞的血，留着这个刀口的血，激励我对日本人的仇恨。”所以一直到后来，这个刀口的血都没有擦。我伯父和我爸爸小时候都见过这把刀，上面的血迹已经变成黑黑的一层。“文革”的时候，奶奶因为怕人说这是阶级复仇工具，把它扔到了长沙泰安里的一个水池里，日本军刀就这样消失了。

他们起先打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后，我爷爷负责守在那里断后，那一战打得非常漂亮。徐州会战后，我爷爷的部队在安徽、河南、湖北北部等这些区域活动。作为第五战区部队，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往大别山那个方向攻，成功牵制日本军的兵力。

后来，我爷爷又缴获了字画和墨盒，送给了在湖南大学教书的岳父，这些东西后来传给了我奶奶，接着又传到了我父亲的手里。我估计，这些物品缴获的时间相隔不长，大约在1940年到1942年之间。我查阅了战史，根据部队的移动情况，一步步

去拼凑，去理顺他的人生轨迹。

“你不怕她报仇，把我们女儿掐死？”

奶奶住通泰街的四合院，那是民国时期湖南省主席鲁涤平的院子。那时候奶奶喜欢跟我讲爷爷的故事，她记性很好，她告诉我爷爷的部队番号，我去图书馆查，之后发现了爷爷部队的很多战史。2005年，根据我写的一些文章，中央给我爷爷颁发了抗战勋章。

我奶奶随军的途中，曾经受过两次大的惊吓，一次是我大姑姑的过世，一次是她一个人在后方，河南开封叫陈留的村子里，碰到了鬼子进村。

这两件事情，让她备受打击。她父亲写信让她回长沙去，但奶奶舍不得爷爷。说起我爷爷，奶奶就会讲：他很爱干净，喜欢把皮鞋擦得光亮；喜欢冬天光着膀子到河里洗澡；进家门时，喜欢用门背后挂的拂尘把身上的灰尘拍掉；明明有军车可坐，偏偏喜欢骑马；甚至有一个冬天，在黄河边上跟日本人打仗，他还自己牵马到河边去洗澡。

大约在1942年左右，当时在河南，119师打了胜仗，俘虏了不少日本人。有一次，我奶奶在部队看到里面关着一个20来岁的日本女人，长得白净漂亮，问了部队的翻译，才知道她也是随军，丈夫是军官，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跑了，反正是老公不见了。

我奶奶跟我爷爷求情说，想把这个女人带回家，让她帮忙做些家务。后来这个日本女人就进了我奶奶家门，和他们一同生活了两三年。

她非常勤快，也讲究卫生，一天要给我姑姑洗两三个澡，那时候我姑姑一两岁。有一次，爷爷打仗回来，看到日本女人在哄我姑姑，他就非常担心，“她老公是我们打死的，你不怕她报仇，把我们女儿掐死？”我奶奶倒是很坚定，她说：“不会，她很善良。”

过了一段时间，她能说些中国话了，为了方便沟通，奶奶还给她取了中文名，开始的时候叫李小玲，后来又叫她蒋玉英⁴。李小玲喜欢叫我姑姑“芬子”，我姑姑叫陈书芬，她这种日本叫法，我奶奶不但没反对，还跟着她一起叫，这种习惯甚至一直持续到了晚年。

抗战胜利后，遣返日本战俘，李小玲哭哭啼啼的很不舍，丈夫估计是阵亡了，她不晓得日本还有没有亲人。李小玲去日本后，她们就没联系了，因为我奶奶随军，居无定所，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联系也联系不上。

“第二天，张团长果真投降了，我爷爷后来也神秘失踪”

1946年10月30日，爷爷在郓城战亡。开始在山东菏泽，部队一直很顺利。我查了相关战史，听说郓城当时是一个空城。爷爷的119整编旅和集团军一个炮兵团，配置少见的美军榴弹炮，到郓城和刘伯承打。很奇怪，刘伯承开始打打退退，到一个叫白衣集的位置，五六倍的兵力突然包围了我爷爷所在部队。10月29日，爷爷部队里一位姓张的团长，晚上找到我爷爷说：“我们被包围两天，我已经打算投诚。”我爷爷听后，当时说了一句：“你滚！”到了第二天，张团长果真投降了，我爷爷后来也神秘失踪，死不见尸。

我奶奶说，29日那天晚上，爷爷内心一定很矛盾痛苦，他撕下白衬衣的衣角，用钢笔写上“速回长沙”。然后让自己的副官化妆冲出去，把字条交给我奶奶。后来，遵从我爷爷的遗愿，我奶奶怀着我爸爸，牵着我姑姑，抱着我伯伯，回到了长沙她的娘家。再后来，她去那里认尸，但都没有找到尸体，七十几个人一个坑，她被吓晕了过去。

我奶奶长得漂亮，有不少人喜欢她，但她对我爷爷感情深，此后几十年，她都没有再婚。我姑姑曾问过我奶奶：“我同学的父亲是个反动军官，他妈妈为儿女的前途改嫁给一个干部，妈妈你为什么不改嫁呢？”我奶奶说：“因为你们的父亲是个好人。”

2005年8月29日，长沙市统战部一位副局长看望在病床上的奶奶，说经过中央严格审查，已确认爷爷为抗战将领，于国家民族有功。我奶奶说：“谢谢你们的肯定，我六十年前就肯定他，我心里一直是肯定他的。”

2012年10月，奶奶刘容过世，享年102岁。

延伸：六十年来尘扑面，且将海水洗衰颜

68岁的陈书良说起父亲陈暄，几次热泪盈眶。那个从未谋面的父亲，一直影响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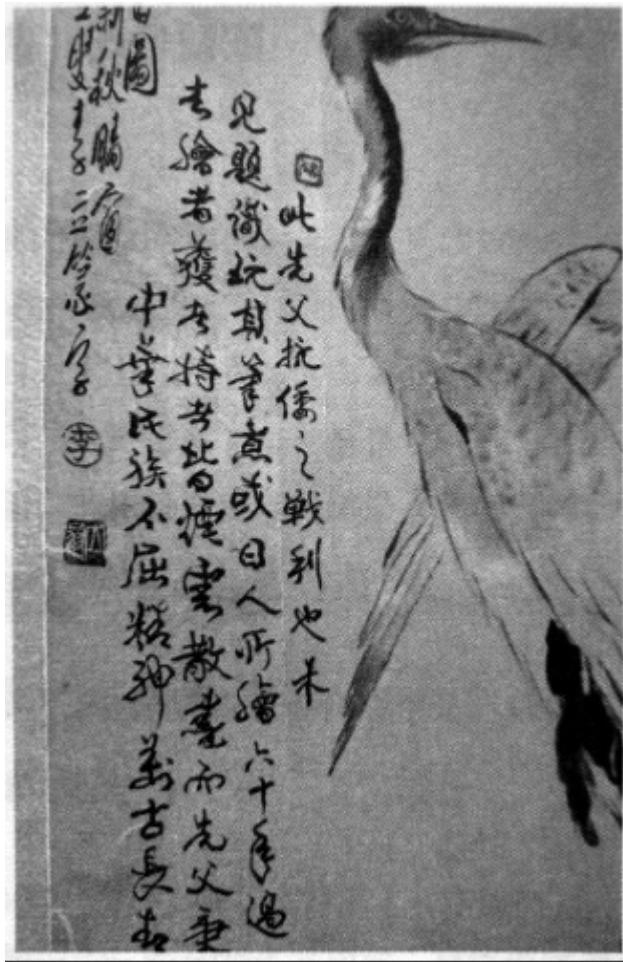
1947年闰二月，陈书良在岳麓书院出生，在书院进门的左边平房里，呱呱坠地的男婴并不知道，父亲在他出生半年前已过世。陈书良儿时不快乐。他说，“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在里屋睡午觉，听见外面一个街坊对我妈妈说，‘你死了丈夫，家里有三个小孩，你把最小的送掉，这样生活会好一点。’当时听了这个话，我心里非常害怕。虽然我妈妈拒绝了她的建议，可当时我心里那种难受、后怕，是很多人都没有体会过的。”

因为从未谋面的父亲是一位“反动军官”，“文革”时，陈书良被叫成狗崽子，高中毕业，档案被打上“不宜录取”的烙印，成为了一名搬运工。1977年恢复高考时，陈书良已经30岁，在亲朋鼓励下，决定参加高考。

他晚上学日语，白天拉车的空余看书。那个时候，他在北区搬运站工作，对于大街小巷，拐弯坡度，他几乎了如指掌，但工作并不仅仅如此。一次紧急任务：要从潘家坪的粮油库，运米到望城县仓库。于是，装上几百斤大米，他来回搬运了一整天。第二天，又是紧急任务：再把望城的米搬回潘家坪。他费力所做的这一切，只因一位首长要去望城参观。陈书良说：“我是个聪明人，但在错误路线下，也干过这样的蠢事。”在那些荒诞的岁月里，他口袋里始终装着一本书。1978年，陈书良以高中学历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

“我始终觉得父亲在看着我。”陈书良说。2005年，他到日本九州游学，在福冈大学讲授《文心雕龙》。福冈大学提出，根据陈的讲义，在日本出版《文心雕龙释名》。“我要求日方在扉页印上：六十年来尘扑面，且将海水洗衰颜。——谨以此书献给我父亲陈元明将军。没想到他们也都答应了。

2014年，陈书良在台湾忠烈祠看到父亲的灵位位于张灵甫灵位的隔壁。他还看到父亲1943年写的自传材料。“我父亲没给我留下什么东西，除了外祖父交给我的一幅画和一个墨盒外，另外就只有这本自传材料了”。那幅画，原来没有题目，后取名叫《松鹤同春》。那个墨盒，上面“京都”两个字，至今清晰可见。



陈煊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这幅画，原本没有题字。后由陈煊之子陈书良在上面题了几句话，其中有：“此先父抗倭之战利也”“先父秉持之中华民族不屈精神万古长青”之句。

延伸：陈暄自传（摘选）

余负责一一九师政治工作，因全部均能本亲爱团结，分工合作之旨，以故工作推展至称顺利。惟部队原为前西北军旧属，下级干部多出生行伍，头脑单纯，士兵则多系新进补充，水准低下，加以部队驻守前线，甚少休息与训练之机，故一般缺乏严格训练，但官兵均能吃苦耐劳，上下脉络一致，则其所长也。依据上述，余对于部队方面，工作要求，则不得不稍行降低，而以实际效果为重，同时亦未拘泥于固定方式，推因时因地以制宜，并顾全战地实际，尽量利用机会教育，更以加紧推行识字教育。对民众方面，则以协助地方政府，推行新县制，整理保甲，训练民众，防止奸伪，激励民气，协助耕作，使农产品增加，促进军民合作为主旨。关于国家现状之观察，日寇虽发动太平洋之暴行，实强化了民主国家阵线合作之力量，同时我中华民族蕴蓄力之伟大，在将近六年抗战艰苦中，毕竟确保最后之胜利，使和平之神，行将照耀着全人类的光明。

¹. 陈暄（1901年7月20日~1946年10月30日），字元明，又称陈元明。郴州桂阳人，黄埔五期毕业，后进入国民革命军第68军119师，任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抗战中打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后参加国共内战，于1946年10月30日在山东郓城阵亡。据《陈暄自传》自述，陈暄早年参加过军阀军队，后与林彪一道进入黄埔四期，因生病到广东东山医院治疗，所以延迟至黄埔五期毕业。 ↪

². 据陈书良父子讲述，2014年，他们在台湾找到陈暄参加中央训练团时的自传。 ↪

³. 刘武慎公，即刘长佑（1818~1887），字子默，号荫渠（一作印渠），湖南新宁人，湘军重要统帅、清朝大臣。初在湖南办团练，与江忠源友善。1852年以拔贡随江忠源率乡勇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及天地会起义。次年春因扑灭浏阳征议会众起事，擢知县，旋升同知。6月，太平军围困南昌时，奉命独领一军自长沙驰援南昌；旋即偕罗泽南赴援解吉安围，并分兵克泰和，后官擢知府。 ↪

⁴. 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和陈暄、刘容夫妇关系很好，因此，刘容给日本女人取名叫李小玲。后来考虑再三，还是觉得跟着蒋委员长姓更合适，于是给她取了另一个名字叫蒋玉英。 ↪

去台湾：一个永安女人的一生

一头银发的柳庆禧身穿白色的休闲衬衣，深深陷入硕大的沙发之中。这位漂亮的太太，年轻的时候在彭位仁将军家里用餐，被彭将军称“庆禧啊，什么都不用做，看着她吃饭，就是一种享受！”，但是此刻，她说：“我是个小人物，而且我老了，也没有用了”。

对于老人来说，回忆往事，总是悲喜交加。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悲伤远多于欢乐，谁愿意老叨念那些悲伤的故事？除非他的内心一直对此无法释怀。相较于大陆很多老兵，台湾的柳庆禧显然更幸福，甚至相比台湾其他老兵，她也应该算是快乐的，因为她和丈夫周以成一直在一起。

给台湾老兵画像的陈琪说：“很多台湾老兵，九十年代回大陆找老婆，因为他们在台湾找不到老婆。”我有时候想，1949年的时候，柳庆禧如果没有找到周以成，今天的她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命运没有假设，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处。

所以，柳庆禧说：“我很感谢我先生，他把我带出了永安”。



口述人 / 柳庆禧，1924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浏阳市永安人，1941年进入73军后方医院，从护士做到军医，1949年随丈夫周以成去台湾。周以成1995年去世后葬回浏阳东沙湾。柳庆禧现居高雄市左营区106巷，她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其中大女儿在浏阳，二女儿在马来西亚，三女儿和小女儿在美国，儿子在台湾。

采集人 / 明鹊 采集时间 / 2015年7月28日

“他说，我追不到你妈妈，这辈子都不结婚”

他开始住上营盘街¹。我后来问他：“那里不远有一个戏院，对不对？”他说：“对的。”他叫周以成，江苏扬州人。有一天，周以成看戏回来，碰到也是从扬州逃难过来的他的家庭医生，好像叫做杨天佩。他问周以成：“你这个小孩在这里做什么？”周以成回答：“我跟姐姐逃出来的，我没赶上火车。”²于是杨天佩告诉他说：“73军的孔繁瑾是我同学，他在部队里当处长，你到里面去找他吧。”那时周以成大概十八九岁。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我们永安市（浏阳的一个镇，旧称永安市），他那时已经是军医了，住在离永安五里远的彭家冲³。他比我大四岁，他追我的时候，我只有17岁，什么都不懂。当时我父亲也不肯，他就请来军医处处长和军事处处长，向他们发誓保证以后会对我好。周以成后来跟我们的大女儿讲：“我当时就想，我追不到你妈妈，这辈子都不结婚！”

1940年，我们结婚了。头一天部队出发，他当天才告诉我，我一直很怪他这点。那时我们结婚才几天，我一边走一边哭，到了长沙他就说：“我对你不起，因为你爸爸那么严厉，我不敢回去，到了目的地我们再写信回去！”我父亲一直不满意这个女婿，甚至我们结婚也没有去参加，这也是让我最痛苦的事。

大女儿是在路上怀的，是“跨门喜”。他把我寄在补充团，每个礼拜来看我一次。我们每天要走60里路，我那时没吃过这样的苦。补充团的团长姓贺，他看到我就说：“新娘子，你怎么老是愁眉不展？应该要高兴啊！”我也不讲话，只晓得低着头，好像我先生故意害我似的。

1941年，我回到永安，大女儿三月份在娘家出生，他当时和部队在江西，我带了女儿一百天后，就离开了永安去找他。再次回来看女儿时，已经是抗战结束了。

我到73军不久，就进了后方医院。军长彭位仁是湘乡人，他喜欢培养年轻人，进部队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打赌，我说，“周以成，等你回来后，再看看我柳庆禧是什么样子！”



彭位仁将军与夫人结婚照。

他那时经常调到其他地方，我们分分合合，很多次都是我去找他的。我在长沙伍家坡⁴受训，每天早晨到塘里面洗脸，冬天也是这样的。在后方医院，我开始学做护士，后来又学做药师，最后又当了军医。我东西都整整齐齐，配药也非常利索，每个箱子放什么药，我都搞得清清楚楚。军医处军医院来拿药，我一下子就拿给了他们，我们院长谢树庭非常信任我。

当时伍家坡有几十个学生，每月有月考，中间还有小考，挑到后来只剩三十几个。我们学习了六个月，然后到了后方又断断续续地培训。我先生也是一样，他到台湾后还补了课，原来没有学完嘛。

“我虽然是军医，可开枪的步骤我都掌握了”

那年秋天，73军奉命以77师为主力编成一个加强师，从湖北郝家枝江角横渡长江。那次过长江的时候，我和另一个医生奉命到前线救治伤员，子弹就在我们耳边“嗖嗖”飞。我们冲上阵地，夹住一位伤员的左右臂，然后将他拖了回来。那是我第一次抢救伤员。

我们医院都是随着部队走，每次一打仗，伤员首先会送到我们这里，伤重的再转往后方医院。看着那些战士一批批地死，现在想起来，我都非常难过，感觉心里在流泪。记得在江苏宜兴的时候，新四军跟我们73军并肩作战，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当时，后方医院也是死了一批批的人。

73军暂编第五师师长彭士量，他也是浏阳人，常德会战时牺牲了。当时他奉命掩护73军撤退，完成任务撤出石门时，部队遭到了日军的围击，彭将军在南岩门口被机枪射中。彭士量很帅的，可惜了啊，当时只有三十几岁，台北忠烈祠有他的灵位。

5

在江西铜鼓，部队还设置了靶场，不定期进行射击训练。我虽然是军医，可开枪的步骤我都掌握了。1944年，长衡会战时，73军从慈利向长沙挺进，当时我们后勤人员留守在桃源。六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前方来电需军款。当时我一个战友叫曾异三，他也是我和周以成的好朋友，他奉命带了军需和输送兵，加起来一共二十几个人，他们将现金包在军毯里，再打成背包背在身上，走了三百多里路，到达军部所在宁乡县横铺子。曾异三后来说：“要不是平时训练用枪，我们一定都到不了那里。”

“他说，以后要给我做春夏秋冬的衣服”

那一年的秋天，我去了江苏扬州，第一次见了他爸爸，也就是我的公公。当时我一个人，他爸爸到南京来接我，回去的路上有一条河，需要坐那种“砰砰砰”响的轮船，我记得当时在轮船上，我们遇到了他舅妈。舅妈问我是谁，他爸爸说，“这是小成子的太太。”舅妈还回说了一句，“哦，那很不错！”当时我怀了小孩，一到我公公家，孩子马上就流掉了。

我公公非常喜欢我，他说，“我们家啊，还只有我们小成子，只有他还比我争气。”意思是讨了我这个好太太。他们家开了一家粮食行，叫做“恒源祥粮食行”，我回去后，公公要我管家里的粮食行。他说，“你很聪明，你帮我管粮食行。”我说，“不行啊，我又没有学过做生意。”“你只要会把算盘，把出进的账写一下就可以。”但是我又说，“没有做过生意，我害怕呢！”他耐心地说，“不要害怕，我慢慢教你。”我那时心里想：我不愿意在家里，我一回去孩子就掉了，所以根本就不想待在家里。坐完月子，我就回南京去了，那时我已经有职务了嘛！

周家还有一个米厂，叫做“万大米厂”，是与别人合伙开的。公公怕人不在吃亏，要周以成去打理，所以他抗战胜利以后还回过一次家。周以成以前经常跟同事讲，“我们家里不说多有钱，但还是很不错咯，我会让我的太太去吃苦吗？我不会要她吃苦的。我们现在都穿军服，以后要给她做春夏秋冬的衣服。”大陆有春夏秋冬嘛，台湾是没有的，台湾都是夏天。那时候，周以成也不愿意在家，他说：“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在部队里面还有事情！”



着戎装的柳庆禧。

“我拿了四万块钱奖金，那时候算非常多的了”

抗战胜利时，周以成在云南昆明，是第五军的远征军，负责第五军的药品。当时药房一女的追他，还说要招女婿呢！他们营长周中梁把他关在牛栏里，然后对他讲，“周以成，我听说你有太太了，你太太还写了信给我呢！”我当时写了信过去，还跟我们处长孔繁瑾讲，想调到他们第五军去。他就说，“你这个孩子真是天真，我就是派个人送你去，我也不放心呢！”1946年，周以成回南京归队73军。

从他家出来后，我又去了湘潭，当时我还拿了四万块钱奖金，那时候算是非常多的了。我在那里学了骑马呢，那些马是日本人留下的，每个医院当官的都有一匹。那时刚好有一匹矮一点的马，我们院长对我讲，“柳庆禧，你赶快学骑马，这匹马配给你，比较矮一点。”只学了几天，我就会骑马了。

那时候，我们同学关系都非常好，到后来也是。我先生死的时候，徐怀印夫妻俩哭得不得了，一直喊：“周大哥周大哥……”他们刚到台湾时，就住在我六个榻榻米的房子里，当时很多同事住建业新村啊，自治新村啊，毕静琳他们去得晚，没有房子配给他们。

还有一个同学叫屈锦霞，她儿子刘光三现在在上海开妇产医院。那一年，国民党军在济南惨败的时候，我去南京参加屈锦霞的婚礼，就这样躲开了。当时我借了两个月的饷，还临时做了一件旗袍，留了一个纸条子给我先生，说我去南京参加婚礼了。负责借钱的军需叫宋望之，他的太太叫做廖孙，后来改名廖逸之，她也是我们长沙人。去台湾后，我们常常来往。

“如果那一次找不到他，不知道后来会是什么样子”

后来局势越来越紧张，我们药房有一个叫石刚林的，他对我先生说，“周以成，你不要走，我到济南医院帮你找个职务，我是潜伏在73军里面的。”他说他是共产党。周以成就讲，“我还有柳庆禧在湖南呢。”那时候我已怀孕了。“没有关系，马上打到湖南。”石刚林讲。但周以成还是走了。

抗战胜利后，国防后方医院一个搬到零陵，一个搬到冷水滩，我调去了零陵，那时叫92后方医院。到了那里才十天，女儿就出生了。1949年，我带着八个多月的女儿离开92后方医院，去厦门找我先生。火车上人非常多，我还遇到了去衡山拜佛的很多人。

到了厦门，我遇到部队就问，厦门话我听不懂，终于找到一个工兵团，团长是湖南湘乡人。他们军需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这样检查就不阻拦我了。原来一直以为周以成在福建，到了才晓得他已经到了福建平潭岛，在那里当野战医院的院长。现在想来，好危险的呢，如果那一次我找不到他，就这样分离了，不知道后来会是什么样子。

平潭岛的人吃鱼，吃地瓜，日子很苦的，我看了却很想吃。我跟我先生说：“你去跟老百姓换点鱼和地瓜，我也尝一尝，好久没有吃过了。”我在那里只待了六天，五月的一个晚上登船，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基隆。我们几个太太一起住进了眷村，一个星期后，周以成也过来了。他进了海军医院，我们很多朋友后来都进了海军部队。

抗战胜利时，我曾经在新化看到了日本军队，还是整整齐齐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去过一次日本，街道干干净净，人也很有礼貌。

1. 周以成姐姐叫周方，读高中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和父母关系不是很好，于是带着弟弟周以成，从江苏跑到了湖南长沙，住在上营盘街的夫家。柳庆禧说：我先生蛮会唱戏的，部队里的周纪赏会拉胡琴，他就附和着唱戏，我以前都记得，现在都忘记了，但我儿子还记得，他经常会说，“爸爸和周叔叔就是会唱这个戏呢！” ↵
2. 周以成的姐姐坐火车去了延安，他就跟着姐夫家的妯娌一起过。 ↵
3. 1939年3月，73军参加南昌会战后，调至湖南平江、浏阳一带整补。当时浏阳永安还没有日军侵入，于是周以成所在的团部一千多人就驻扎在永安彭家冲。 ↵
4. 现在叫野猫坡（位于今长沙市岳麓区），自抗战起到1944年，伍家坡的洪家大屋，一直都是73军的后方医院。 ↵
5. 彭士量烈士遗体于1944年公葬于南岳，南岳忠烈祠有烈士的纪念碑、遗书。“文革”中，彭士量墓遭损毁，后修复。1992年10月，墓地由忠烈祠驾鹤峰寿苑迁移至忠烈祠东岗。台北忠烈祠也有烈士的灵位。 ↵

后记：诚惶的附随

最开始有做一本书的想法还是在2014年的冬天。

在那之前，我们曾用六年的时间，完成了四百三十余位抗战亲历者的口述信息及影像采集。不论是他们的从战经历，还是生命故事，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解到。在三年前的岁末，对来年我曾有过这样一个计划：一次图片展、一座记忆库和一本抗战口述书。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那一年的8月，图片展和记忆库如期展出、上线，唯独这本书却迟迟没有出版。和很多朋友想象的不一样，延期出版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生于长沙，亲历过抗战的黄仁宇先生曾用“极大的规模的颠簸”和“无数的纵横曲折”来形容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这是一段以“悲伤”“惆怅”为情感基调的过去。具体到抗战，我们该如何提取、梳理手头的第一手资料，又该以什么样的体例、形态来呈现才能破除“窄狭”的言说窠臼……

应该说，对这一段过往的复原尝试，我们进行得有些诚惶诚恐。

从成稿、修订、再修订，到移交出版社……尽管我们所用的时间长于预期，但这依然是一段大体顺利的进程。临门一脚，原本以为会有终点在即的解脱感，但遗憾的是，种种已无法完全规避的缺失，只是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它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

这是一段让人苦恼的距离。从章节界定到注释行文，从特写头像到视觉搭配……如实地讲，这并不是一本完美的书。缺憾感充盈的心头总是七上八下。其实，我的忐忑还源于一个一直不愿多想的假设：以组合现有的协作，还有素养储备，即使再用两三年，我们能够做得更好吗？要知道，很多事情都是拖没的。

2016年9月3日，接送前游工队志工刘津参加纪念活动，在汽车通过湘江一桥时，谈兴盎然的老人一时间没了话语。不经意回头，我瞥见老人正对着橘子洲怔怔地出神……尽管时空已过七十年，橘子洲已不再是过去的水陆洲，但显然老人的记忆还在。没忍心打断老人，我猜想，老人是想起了打自己板子的班长、有炮火余烟的晴佳巷，或者是当时不知去向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刘津已有92岁，但老人的记忆力依然绵细、有力。老人超乎寻常的记忆力让橘子洲在我们眼中有了不同今日的样貌，也让一座城市的过往呈现出更多的层理和细节。在这座至少曾有四次大规模抗日战事的城市，拥有像刘津一样的亲历者是我们的幸运。

抗战胜利45周年前夕，刘津曾参与编写了一本追忆游工队往事的回忆录。用这些“同工”的话，这是一次对“失误空白”的弥补。2013年第一次走访刘津时，老人将这本自费刊印的回忆录交到我的手上，“它对你更有用”。

讲述过往，或旧物交接，我们愿意把它当作是一种托付。这种托付跨越人际，甚至代际，是尘世时光连缀、移接的凭依。

如同刘津，最后入选这本书的口述者多是那段家国悲歌的唱响者。他们就像《圣经·提摩太后书》箴言所记述的那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潜德之幽光”。

而传递这份微光，或许便是我们不忌缺憾、不忌平庸，坚定完成这本书的动力来源。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写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也是我们必须做出的“附随”。

大家最终能见到这本书，得益于潇湘晨报社、汪涵先生及“圣火爱心公益基金”对前期信息采集阶段的支持。

[抗战亲历者记忆库](http://www.nobody.org.cn)（www.nobody.org.cn）感念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一路的帮助和陪伴，你们是我们的伙伴，是这本书不具名的著作者。

马金辉

2017.03.16

经统计，以下口述人现已过世：

周义云、刘俊明、刘建白、李祖元、易唯诚、肖若霖、蒋大洁、金宣训、刘光德、杜学义、王有恒、何月祥、曾兴湘、易信贤、王琦霞、黄德明、戴民铜、刘津、向梦瑞、陈玉龙。

截至2019年12月19日。